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SHIJI YANJIU

# 史記研究（下）

第三卷

分卷主编◎施丁 廉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三卷

# 史記研究

## （下）

SHIJI YANJIU

分卷主编 施丁 廉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目　录

#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李长之

## 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加以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

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地,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丝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鲁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以司马迁的史诗之笔，他可以写小说。事实上他的许多好的传记也等于好的小说。自来在对司马迁以古文大师视之之外，也就有一种把《史记》当作小说的看法。不过这看法并不早，大概始于明，大盛于清，又为近代人所强调。这种看法原不错，司马迁原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呢。

假若照我的看法，中国小说史可以分为五个时代：一是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是志怪时代，那就是汉魏六朝。三是传奇时代，从隋唐

到宋。四是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是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现代没有完,我们不敢也不能有总括的说明。其他四个时代却都有一种演化的共同点,那就是大都是由神怪而到人情。例如第二个时代中是以《神异记》、《十州记》那样的书开始,而最高峰却是《世说新语》。第三个时代是以《白猿传》、《古镜记》那样的神怪开始,而最高峰却是《莺莺传》那样的人情小说。第四个时代亦然,最高峰便是《红楼梦》一类写实的人情小说。而在第一时代中,假如以《庄子》那样的神怪寓言作为开端,而司马迁的《史记》便恰又代表一个最高峰,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了。

同时司马迁也确乎是生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意义的时代的,因为那同时便有一个大小说家虞初,说不定他们见过面,虞初的有些材料是得之于他的!

这是就司马迁的《史记》本身说是如此,倘若就以后的影响说,不但《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颇有自司马迁的《史记》中采取了的材料,就是司马迁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便也很像给后来的恋爱小说作了先驱,而朱家、郭解的故事也直然是《水浒传》一类小说的前身。《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那更是仿效《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过去的小说家,在意识上或不意识上,受司马迁之赐,恐怕是不可计量的。

同时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富有那么些传奇的材料之故,也成了后来戏曲家的宝库,试看《元曲选》中的:

郑廷玉《楚昭王》　　纪君祥《赵氏孤儿》
高文秀《谇范叔》　　无名氏《赚蒯通》
李寿卿《伍员吹箫》　　无名氏《冻苏秦》

尚仲贤《气英布》　　　无名氏《马陵道》

《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又有：

郑光祖《周公摄政》　　　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金仁杰《萧何追韩信》

《脉望馆钞本元曲》中另有：

李文蔚《圯桥进履》　　　杨梓《豫让吞炭》
郑光祖《伊尹耕莘》　　　丹丘先生《卓文君私奔相如》
高文秀《渑池会》(《录鬼簿正音谱》作《廉颇负荆》)

这是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剧中之十六种采取自《史记》故事的剧本。还有逸套见于《雍熙乐府》中者二种：

赵明道《范蠡归湖》　　　王仲文《汉张良辞朝归山》

而京剧中之：

《渭水河》　　　《武昭关》
《八义图》(或称《搜孤救孤》)　　　《文昭关》
《战樊城》　　　《浣纱计》
《长亭会》　　　《鱼肠剑》
《渑池会》(或称《完璧归赵》)　　　《未央宫》
《五雷神》(或称《孙庞斗智》)　　　《喜封侯》(或称《蒯彻装疯》)
《黄金台》　　　《盗宗卷》(或称《兴汉图》)
《宇宙锋》　　　《监酒令》

《博浪椎》 《文君当垆》

《霸王别姬》

也统统是由《史记》中的故事而变为剧本的,正如唐人的传奇之作为元明剧作家的材料来源一样,也正如中世纪的传说之为莎士比亚所取资一样,司马迁的《史记》是成了宋明清的剧作家的探宝之地了。

我们说过司马迁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小说家,这话同样可以说他和戏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这是就他之善于写紧张的局面(如楚汉大战,荆轲刺秦王,灌夫闹酒等),以及善于写对话而可见的。

因此,司马迁不惟在传统的文艺上有他的地位,就是以现代的文艺类属去衡量时,也同样有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比重。

##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司马迁是一个创作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常和历史家成为不解缘。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们可由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看。

先说他的理论,这又可分为五项:

1. 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　人为什么要创作?历来学者的答复是不一致的。有的以为有利于"世道人心";有的以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有的以为是为求偶;又有的以为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以拥护其利益;更有的则以为有如清泉松风,无非是一种天籁而已。

这些答案都可以说明一部分的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但不能解释所有作品,或整个作品,因为他们全然忽略了文艺创作家个人的心理的缘故。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活动,在心理方面

岂可以无因？所以现代的心理学界，有以压抑说和补偿说来解释文艺创作的了，但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却也早已有了一个同调，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
>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
>
>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
>
> 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

这也可说是司马迁自己的体会和自白。我们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创作家，他之体会到创作的冲动之来源时，与其谓为由往例归纳而得，毋宁说也是由自己的实际体验扩充而出，却又悟到前人也是如此而已。你看他在“故述往事，思来者”之后紧接着说：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在"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之后,紧接着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可知他完全是以一个创作家而做的一种创作过程的自白,说到前人处却只是印证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创作家的创作过程之自白,所以更值得我们重视,也更增加了我们的信赖,并更显得其中确有几分真理。按照变态心理学家佛洛伊德(Freud)说:创作是人类受了压抑的欲望,在一种象征世界里的满足,所以创作与梦同工。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即根据于此。不过佛洛伊德在人类压抑的欲望中特别强调"性的要求",未免把人类的生活看得太狭,——至少把一般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创作的动机看得太狭了。后来阿德勒(Adler)又创了一种补偿说,以为人类在某一方面有着缺陷,便会发生"落伍情意综"(Inferiority Complex),于是常在另一方面要求胜过他人,以为补偿。例如他说许多写实的小说家都是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楚,由于这方面不如人,遂发生落伍情意综,结果遂在想象方面特别用力,思有以胜过他人,于是那描写入微的栩栩欲生的作品便产生了。司马迁的学说和他们有些相近,但佛洛伊德、阿德勒都是心理学家,厨川白村只是文艺理论家,远不如司马迁以一个创作家而"现身说法"来得更真切,更可靠,更中肯。

我们试加以比较。照司马迁的意思,创作的动机无疑也是一种补偿。他所谓"意有所郁结"恰可相当于"情意综"。既然说"有所郁结",又说"不得通其道",可知是有被压抑的成分了,这一点和佛洛伊德的看法相同;但被压抑的却并不一定是性的要求,则和佛洛伊德相异。而且司马迁认为文艺者并不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之象征的满足,却是在另一方面求一种补偿,此则更和佛洛伊德有距离而接近于阿德勒。然而阿德勒的说法却又嫌过

分重视落伍情意综，所给的说明也未免琐碎鄙近，难道一个大写实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的创作也只是因为眼睛的近视么？至于司马迁的解释，却是多方面的：或事业失败，如孔子；或精神郁闷，如虞卿；或遭遇不平，如屈原、韩非；或肢体受难，如孙膑、左丘。司马迁的看法是广阔得多，注意之点也大得多了。

然而司马迁的意思尚不止此。他觉得另有两点也很重要：一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这就是所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安书》）貌美的人不会躲在家里，口才好的人不会学缄默，天才总是自知的，也没有不爱表现的。虚伪谦卑的人决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二是创作由于寂寞。人类最难为怀的时候，无过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写一写荆轲如何刺秦王，杨志如何卖刀，或者林冲如何雪夜上梁山了（鲁迅躲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候才写《呐喊》）！"述往事，思来者"，正就是这种心情。

补偿、寂寞、表现才华，这都是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创作由于受了压抑后的补偿，由于寂寞，由于表现才华，这观点是由人类之非理性成分出发的，所以就是单以司马迁的文艺理论看，司马迁也是浪漫的。

2. 文艺创作之有用与无用　文艺创作是无用的，然而这种无用正是大用。此种无用为大用的道理，《老》、《庄》、《易传》里都有所推阐；但具体引用到文艺上，则自司马迁始。他一则说："思垂空文以自见"；再则说："自托于无能之辞。"无能者就是无"奇策才力"之能，无"招贤进能"之能，无"攻城野战"之能，无"取尊官厚禄"之能。就浅近之功利的观点看，文学家诚然无能，文学家

的文章也诚然无用,然而"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到底是哪一类人更有永久性呢?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是不是真无能呢?艺术的天才高于一切,艺术品的征服,所向无敌。以汉武帝与司马迁比,司马迁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决不会不及汉武帝,从这里看也就可看出在一方面无用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大用的道理了。文学家常常卑视自己的成就,但却也常常对自己的才能与事业有着自负。这是因为文学家一方面既意识着他的大用,但也悲哀着另一方面的无用。可见他不必悲哀,他的大用正是无用的补偿!他倒应该感谢他的挫折、愤懑和郁结!

3. 创作原理　创作有两种原理:一是当人类看见世界上许多具体的事物时,每想从中得到一些抽象的道理,这种道理不只在科学书与哲学书中有,就是文艺书中也有。例如"交情老更亲",就几乎像一个普遍的原则,像这种原则的获得,可称之为创作上的抽象律。一是当人类空有一些观念或情绪时,却又每喜欢把它推之于具体的事物上,例如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情感,而去写出具体的一百单八个好汉的故事便是。这可称之为具体律。抽象律是给许多肉体以灵魂,具体律是给一个灵魂以许多肉体。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的赞里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①"推见至隐"就是抽象律,"本隐之以显"就是具体律。

---

① 《司马相如列传》的赞,因为其中有扬雄的"靡靡之赋,劝百讽一"两句话:王若虚《辨惑》说是"后人以《汉书》赞益之"。现在看《汉书》赞,的确和《史记》赞文字差不多,不过开首有"司马迁称"字样。我们现在实在辨不清到底史公的原文是保留多少了,但无论如何,我所引用的二句紧接"司马迁称"四字之下,必是史公原文无疑。

4. 艺术之节制作用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宣泄，其作用是节制而非激动，所以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乐书》）[①]《正义》对这话的解释是"不乐至荒淫也"，正说对了。

5. 幽默解　幽默（Humour）是人生和文艺里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西洋的美学家或批评家都有很多学说去讨论它。在中国有与之略略相当的一个名词，就是所谓"滑稽"。滑稽和幽默当然有距离，这距离越到后来越大，但在司马迁所解释下的滑稽则与幽默的真解不相远。他曾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太史公自序》）又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凝滞和纠缠的确是幽默的反对物，凡是"化不开"的人物不会懂得幽默。功利观点也是凝滞和纠缠的一种，所以懂得幽默的人或者在某一刹那而处在幽默空气中的人，他一定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所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正是指此。幽默是不伤害人的，否则变成冷讽；因此人类对于幽默的反应也是没有恶意的，所谓"人莫之害"是。幽默包括智慧和超脱，而且还有一点悲悯和温暖；它是会心的微笑，但其中含有泪。我们可以这样说：高等的滑稽就进而入于幽默，低级的幽默却不免流于滑稽。太史公在七十篇列传之中，居然给滑稽留出了一个独立的节目，可知他对此道之重视。他的《滑稽列传赞》也非常幽默："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指连赵事）；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以上是司马迁在批评上的理论。

我们现在再说司马迁在批评上的实践。司马迁是富有天才、识力和同情的大批评家，他具备着所有伟大批评家所应当有的条

① 《乐书》多取《乐记》，但我所取的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马氏文字。

件。虽然他不曾写什么条理分析的批评论文,但他用叙述的方法把他那深刻而中肯的了解织入他的创作中。他像近代欧洲文艺传记家一样,描写就是批评。因为他观察深入和清楚,能够见到一个人的底蕴(包括好和坏),而出之以赞美或憎恶的浓烈情感;且即使是憎恶,却又不失其对书中人物的同情,所以他的书富有无限的魔力,我们可以说,他的书是时时在创造着,也时时在批评着。所以我们假如要在其中找出几段纯粹的批评文字是不可能的。下面也不过是一点"样本"而已。

1. 对于孔子之礼赞 批评孔子,是一大难题,因为孔子的地位太重要,方面也太多,价值更是太大。如何称誉才能不失分寸?这应该是使太史公棘手的事。然而他却轻松地写出来了:

>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 ——《孔子世家赞》

他清楚地指出孔子的整个价值在对于六艺的贡献,尤其是礼。言简意赅,这是何等的识力!所以他时时以六艺和孔子并称,例如"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都是。

六艺中，司马迁尤其着重孔子与礼的关系。《孔子世家》可说就是以礼为线索的，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到"适周问礼"，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到"追迹三代之礼"，到"《书》传、《礼》记自孔氏"，直到"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在太史公心目中，孔子一生是与礼结不解之缘的。孔子的伦理思想原是由群到个人的，个人与群如何相安？孔子的解答也就是"礼"——礼是就群的立场而给予个人的一种合理的制裁。太史公是真能了解孔子的。

同时太史公也很了解礼，所以他能够知道一生汲汲于礼的孔子的重要；但一般人常不愿受礼的约束，于是孔子就不免成为一个寂寞的失败者了。他说：

>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
> ——《礼书》①

① 《礼书》多取《荀子》，但我所取的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马氏文字。

孔子是极其热心实现理想的人,但也是不轻易和现实妥协的人。例如太史公写道:

>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 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作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 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太史公自序》）

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2. 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3. 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

而是论文或随笔。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他为了要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

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谈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

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的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帖。

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沉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像司马迁没有坚持主

---

① 因为班固的《离骚序》上有"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论似过其实"的话,后人遂以为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系采淮南王安文,我以为未必可靠。淮南王安作《离骚传》的话,只见于《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列传》,而不见于《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就班固所引者而言,这《离骚传》的确作得不坏,司马迁不该在《淮南衡山列传》里抹煞不提,况且他果已引用,更不会对此事推作不知,此其一。我们再看淮南王安的行事,只是一个庸才,就是所传的《淮南内篇》也多半是"集体创作",他本人能否做出这样好的文章,诚为疑问,此其二。况且高诱(建安时人)的《淮南子叙目》上乃是说"诏使为《离骚赋》",并不是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离骚传"条说"传"应该是"傅"字。"傅"与"赋"古字通,颇可信。即《文心雕龙》虽然在《离骚篇》上说淮南作,而《神思篇》就又说"淮南崇朝而赋《骚》"了。可知刘勰已不能肯定。淮南作《离骚赋》比较可能,因为他作过那种《招隐士》一类的"楚辞"。我疑惑《屈原贾生列传》根本并无袭取淮南王安之处,反之,有人袭取《史记》而托之淮南,为班固误信,倒是可能的。班固的取材本不严格,不然,何以《古今人表》上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人物?此其三。退一步言,司马迁就是采取淮南《离骚传》,也不过《汉书》所引的几句而已,而且即这几句,为史公使用时也业已铸入史公的风格,是史公的创作而与淮南无涉了,此其四。总之,我们有理由说,《屈原贾生列传》的著作权应该归给司马迁。

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做到了。

司马迁既深切地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地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借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 四 司马迁之讽刺

曾有人写过《骂人的艺术》这样的书,但我认为在中国文人中最精于骂人的艺术的,恐怕没有超过司马迁的了。从前有人称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章学诚很不以为然,说这是“读者之心自不平耳”,然而照我们看,《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它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巅峰。

他讽刺什么,以及如何讽刺,经过了清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渐渐有了确切的结论。大概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力自明末清初便有了飞跃的进步,以后也更有着继续的发挥。倘若单以考据推许这个时代,那就只见其一面而已。

我们现在先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吧。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之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总之，他要在他的笔下，而把汉代形容得一文不值。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下面即历叙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汤武之王，修仁行义十余世，就是秦之统一，也百有余载，结论是"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言外是汉凭什么，既无德，又没费力，却这样容易得天下！他讥讽地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假若只看这两句，也许以为他是真地在颂扬了，然而这两句之间，却插入"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重复慨叹，就知道他确乎是以赞作讽了！

整个的汉代之来历，在司马迁眼光中是如此。而刘邦之为人，司马迁尤其挖苦得厉害。在《项羽本纪》中，项羽要烹他的父亲了，他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在《高祖本纪》中，他曾给太上皇拜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萧相国世家》中，特别给萧何的封地多，那是因为"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第一例见他之不孝，第二例见他之无赖，第三例见他之小气。而萧何的功绩虽然那样大，但如果不以家财佐军，不强买民田，以表示不能顺从民欲，则刘邦对他的猜忌是一点儿也不会放松的。就是对于韩信，韩信每打一次胜仗，他便"使人收其精兵"（《淮阴侯列传》），这同样见刘邦之忌刻。至于真正打仗的本领，

那更没有。他有许多神异的事,仿佛是真命天子了,可是司马迁早借萧何之口说出:“刘季固多大言。”那么一切神异也就多半是刘邦自造,化为乌有了。

和刘邦作对比的是项羽。项羽有真本领,有真性情,有真气概,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

不唯刘邦本人如此,就是他的周围,除了张良、陈平常设诡计之外,大半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老粗。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的赞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萧相国世家》中也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曹相国世家》中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绛侯周勃世家》中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意思是说他们统统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而已。

这样的一个低能集团,那有才能的人处于其中,就未免太委屈了。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可惜的人才。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说:“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他并非责备韩信之不当叛逆,却只责备他发动得有些迟了而已!这意思多么明显!

司马迁在讽刺整个汉代以及汉初人物之外,时常揭发汉家一线相承的刻薄。高祖的猜忌,已见于《萧何传》和《韩信传》不必说。文景二帝似乎是忠厚正经的人,其实不然,在适当的时候,司马迁就不惜揭穿那真相了。例如《张释之传》中,文帝为一人惊了自己的马,就要致之死地,亏得释之据法力争,才处了罚金。可见这位废除肉刑的文帝,也是一个伪君子而已。又如《佞幸列传》

中，文帝为爱一个宦者邓通，便许他铸钱成为富翁，文帝的行为何尝不乖张荒淫？至于景帝的刻薄寡恩，只要看《张释之传》中，因为释之曾在景帝为太子时弹劾过他不下司马门，到即位后，虽口头上说不忌恨此过，但只有一年多，便把张释之调为淮南王相了。司马迁在记"景帝不过也"之后，便拆穿了说："犹尚以前过也。"又如《周亚夫传》中，因为周亚夫不许给王信封侯，景帝虽默然而止，但后来便故意请他吃饭不放筷子，给他难堪，到逼他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了。司马迁冷然写去，已把景帝的真面目揭露了。

可是在这种种之中，司马迁所要讽刺的最大的目标，却是汉武帝。在《封禅书》中劈头即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无其应而用事，功不至，德不洽，都是暗指武帝。封禅的本身，原已荒唐，但即退一步讲，却也有配有不配，司马迁是直然认为武帝不配的。他不好明讲，便借管仲阻齐桓公，仲尼不肯论封禅，作为武器，略事攻击。整个文章中，都是写武帝之愚蠢、幼稚与可笑的。

《封禅书》之外，司马迁便在《酷吏列传》中写汉代残酷的家传，而尤重在武帝。其中屡有"天子闻之，以为能"之语，可见那酷吏之惨无人性，实在是武帝的授意和怂恿。那最大的酷吏如张汤、杜周也不过是"善伺候"，能窥探武帝的意旨，而去找出理由，又去执行而已。

武帝之刻薄寡恩，不止对一般的臣下为然，就是对于宗室贵族也毫无留情。司马迁一则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推恩（其实是削弱诸侯）的办法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他说这样一

来,就可以"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其实他只是在打官腔,下面却说出了实话:"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意思是说如果不仁不义,手腕虽高,毕竟还是危险的了。二则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原先受封的百有余人,到了太初,不过百年之间,只存在了五个人,其余都坐法亡国。司马迁在表面上把"子孙骄溢"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网亦少密焉"放在次要的地位。就是这样,他仍怕别人把"网密"看重了,下面紧接"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目的在再冲淡一下。然而其实他却正是重在"网密"的。太冲淡了,也怕别人把他的真正意思误会,但他又不能明言,于是只好混统地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意思是就是兢兢于当世之禁,也未必不犯法,因为"网密"的缘故!他的文字富有层次转折,于是让他的真意在若明若暗之间了。

武帝之好事,司马迁借汲黯之口直说出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则说自来都是喜欢外攘夷狄的,"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就是天下太平,也要动动刀枪呢,于是有了许多封侯了!

至于武帝之横征暴敛,让民生凋敝,是见之于《平准书》中。但他不明指汉,却骂秦;也不说当代,却说古代不然:

>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

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武帝周围那些人物,他也很少瞧得起。公孙弘、张汤都是外宽内深的官僚。在《张丞相列传》中更说:"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则武帝时之无人也就可知了。至于能为社稷臣的汲黯,以及已成为名将的李广,却只有埋没抑郁以终而已。

武帝所用的人多半是恃裙带关系的亲幸之辈。田蚡、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是。司马迁都对他们各加讥讽。其中卫青、霍去病尤受宠爱,他们都以卫皇后为靠山。司马迁写卫皇后时便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提到霍去病时便说:"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这都是说他们出身微贱,父女姊妹的关系也在可考不可考之间的。笔端是十分鄙夷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了司马迁的笔下,算是一无所长了;浪漫精神是无限的,是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是没有任何奴隶的烙印的,我们于司马迁之讽武帝见之。以上尚是明显的,可指的讽刺,另外有些散布在各篇的夹缝里的,还有很多很多。

司马迁讽刺的目标既明,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他的阵法。他的阵法大概是这样的:一则用揭穿事实的方法,事实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讽刺。如他写景帝,只说周亚父死后,乃以王信为盖侯,就够了。二则用无言的讽刺,凡是他不赞成的事便不去写,如《循吏列传》中不叙汉代,《张丞相列传》中不叙那些备员的人物的事迹,读者自然可以晓得什么是在缺乏着了。三则用互见的方法,他决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忌刻写在《高祖本纪》

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四则用反言的方法,他口头在赞扬,骨子里却是在讥讽。五则用轻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则用指桑骂槐的方法,他不骂汉而骂秦,其实他对秦并不坏,《六国表》可见。七则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用孔子抵挡封禅,用汲黯直斥武帝。八则全然在语气里带出来,他用几个"矣"字,往往就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九则常用无理由为理由,如三世为将不祥,坑降不得封侯之类,那真正的理由却是统治者的忌刻。

总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隐藏,这样便瞒过了那时当局者的检查,也瞒过了后来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读者了!

撇开司马迁的一切文学造诣不谈,即仅以讽刺论,他也应该坐第一把交椅!

## 五 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然而在说过一切之后,司马迁却仍是一个抒情诗人!

只是感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不错,他有识力,也有学力,但就他本身而论,这却并不是他的性格中之最可贵,最可爱的。

他虽然因为家庭教育之故,对于儒学有些倾慕,然而并没有掩遮他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根性。即以这道家的自然主义论,却也仍没有淹没了他那更根本的一点内心的宝藏,那便是他的浓挚、奔溢、冲决,对一切在同情着的感情。不错,他看事情很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的见解的导引之力。不错,他讽刺的对象很多,然而就是他所讽刺的人物,在他笔下写来,也依然带有大量的可爱的成分。他的自然主义,如果不加上"浪漫的"三个字,便成了没有生命的概念,与他的本质毫不相干了。

他的事业，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另有不朽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却是留下了最伟大的抒情篇什，虽然形式上却是历史。在他后代有许多知己，有无数的追踪的人物，但与他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除非那些知己和追踪的人物在感情上和他有着共鸣。“发愤以抒情”，这是楚文化的精神，却也是西汉所承受了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而集中并充分发挥了的，只有司马迁。那是一个浪漫的世纪，司马迁就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最伟大的雕像。

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和哲学并没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归到根底，他唱起命运感的调子来了！“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着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孔子是如此，屈原是如此，信陵是如此，荆轲、项羽也是如此!

司马迁能赤裸裸地接触一切人物的本质，又能烛照一切人生的底层，于是而以情感唱叹着，同情着，描绘着了。

他是热情到这样的地步，因为热情而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他所觉得不可知的命运最后却也和他自己开起玩笑来。他在极大的屈辱之中，而与世长辞了！确切的卒年，我们不晓得。但公元前90年，也就是司马迁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渺茫漶漫了。

司马迁身后的情形如何，我们所知的，也一如他的卒年之那样模糊。他的家庭生活怎样，也从没有记载。有人说他有两个儿子，但那是根据华山道士的胡言，当然不可信。有人说他有一个侍妾隋清娱，可是这是褚遂良所见的一个女鬼，更觉荒唐。

唯一可靠的倒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是一个老实人。杨敞的儿子杨恽却很有棱角,颇有外祖之风,连文格也十分相似(他之《报孙会宗书》直然是他的外祖《报任安书》的姊妹篇),他很爱读他外祖的《史记》,但他却因口祸被腰斩。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这和司马迁最有着精神上的联系的亲属却也以悲剧终!

(原载《文潮月刊》第1卷第5、6期,1946年9、10月)

# 《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高　亨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兼文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我们民族文化创作中的一个光辉成就，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在我国史学史上、文学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司马迁受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史记》里表现出一些缺点，那些缺点是应该批判的，但并不足以贬低它的价值。我们今天纪念司马迁，指出《史记》这部书的社会意义，给予它以正确的评价，让这位历史上的伟大史学家兼文学家及其作品，在我们新文化的创造上也起着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虽然是“《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但只是提出几个重点，加以叙述。其中自不免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指正。

## 一　《史记》的思想性的两个重点

司马迁的《史记》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乃是现实主义的辉煌巨大的一部杰作。它反映出三千年间经济基础的发展，反映出三千年间政治文化的演进，反映出三千年间社会上的种种矛盾与斗争，并刻画出三千年间社会上各阶级及人物的活动。他已经能够或详或略地涉及社会的全面，而不是专为帝王将相作“起居注”

和“升官图”。他已经能够或隐或显地揭示社会的本质,而不是专为最高统治阶层作“朝报”。而且他在史料的选择上,有他的取舍标准;在事迹的叙述上,有他的是非尺度;在人物的刻画上,寄托着他的褒贬,流露出他的爱惜,也提出他的批评;因而在《史记》中表现出他的丰富思想和强烈情感。自今天看来,这部书有些不够的地方,有些落后成分,但就它的整体来说,是具有充分的、多方面的进步意义,而且继承了、发扬了我国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它的思想性是比较强的,有许多值得表扬的。现在提出下列两个重点说一说。

(一)《史记》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我们祖国在司马迁以前,已经出现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司马迁叙述这些英雄人物,都是怀着敬意与热爱,给予了适当的评价。现在举几个例子。

1. 司马迁在《屈原传》里,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崇高品质大力地加以赞扬。他说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于屈原的被放与自沉,抱着无限的悲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就显示他对于屈原的崇拜和热爱。他崇拜屈原,热爱屈原,是为着哪一点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单纯地、片面地加以理解,但主要方面可说因为屈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说: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见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屈原所以坚决地和恶势力斗争,决不妥协,所以两次被放,所以穷困愁苦,所以写出许多诗歌,所以自沉汨罗江,完全是为了楚国和楚王的利益(那个时期的人们的意识是把国家和国君结合在一起的)。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屈原的伟大,主要是在他热爱楚国。司马迁所以崇拜屈原,热爱屈原,主要也就在这一点。司马迁的这种思想情感,和两千多年以来广大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致的。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班固却说屈原"露才扬己";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胡适却想把屈原这个人一笔抹杀,就更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伟大了。

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记载着: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立下了战功,做了赵国的上卿。蔺相如是赵国的文臣,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勇敢地、不怕牺牲地挫败了敌国的国王,完璧归赵。他出席秦王、赵王在渑池的会议,又勇敢地、不怕牺牲地挫败了敌国的国王,使秦王"为一击缻"。因而蔺相如也做了赵国的上卿,位置比廉颇高。廉颇不服,宣言要侮辱蔺相如,而蔺相如却处处躲避他,不和他冲突。传里记载:

> 相如曰:"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我们从这里看到,蔺相如是一位爱国的英雄,他只重视国家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私怨。廉颇也是一位爱国的英雄,一听到蔺相如的话,受了感动,立刻负荆请罪,勇敢地接受批评,纠正错误。两位英雄能够团结起来为国家效力,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在今天还把两位英雄的故事排成戏剧,来教育大家,是有它的深刻意义的。司马迁的这篇传,写得细致,写得生动,写得具体,写得形象,能够表现出他个人对于两位英雄的崇敬和热爱,也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于两位英雄的崇敬和热爱。司马迁赞扬蔺相如说:

>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司马迁给蔺相如以崇高的评价，就足以说明司马迁思想在这方面的正确性，也足以说明史记内容在这方面的正确性。

3.《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上记载：田穰苴是齐国的名将。齐景公的时候，晋国、燕国都来侵略齐国。景公用穰苴做将军，用庄贾做监军。穰苴和庄贾约定次日正午在军门相会。次日穰苴早就到场，立个木表来测日影，设个漏器来观察时间。等到正午，庄贾不来，他就一个人发号施令了。庄贾是一个尊贵骄傲的大官僚，觉得自己是景公的宠臣和监军，何必着忙。临走前，他的亲戚左右人等，摆上酒席，给他饯行，直到天晚，才来到军门。穰苴问他为什么来晚了。庄贾说："大夫亲戚给我送行，所以来晚了。"穰苴说出这样几句话：

>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

结果，穰苴把庄贾杀了。这里摆出两种人物。一种人物是庄贾。他只知道有个人，不知道别的，他不管敌国的侵略；他不管国家的危急；他不管人民的灾难；他不管国君的忧虑；他不管自己的责任；他不管国家的纪律，这种人物是封建社会一般官僚的典型代表，是司马迁所否定、所憎恨、所鄙视的人物。另一种人物是穰苴。他知道有国家，有人民，有国君。他为了给国家干事，不顾自己的家庭；为了维持国家的纪律，不顾自己的亲人；为了保卫国家，不顾自己的性命，这种人物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极少数的

典型代表，是司马迁所肯定、所喜欢、所崇敬的人物。扼要地讲：司马迁所批判的是自私自利的丑恶官僚；司马迁所表扬的是爱国爱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说：

>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见《太史公自序》）

这两句话，肯定了具有进步内容的司马法，肯定了爱国英雄穰苴，也指出他所以作穰苴列传的意义。

4.《史记·田单列传》里叙述：燕国使乐毅伐齐（还联合秦韩赵魏等国）攻下七十多个城。只有莒城和即墨城没有攻下。田单守即墨，他使六条妙计打败了燕兵，恢复了齐国土地。那六条妙计，如果勉强给它们起个名字：1. 反间计，2. 拜神计，3. 割鼻计，4. 掘墓计，5. 诈降计，6. 火牛阵。司马迁怀着敬爱田单的心情来写这篇传，写得很仔细。传的后边还有这样一段：

>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

在这篇里摆出两种人物：另一种人物是成功的爱国英雄田单；另一种人物是守义的爱国志士王蠋。两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一个处在被敌人围困的城中，有可以和敌人周旋的余地；另一个是处在被敌人攻陷的乡村，差不多等于敌人的俘虏。因而两个人的表

现与结局也不同:一个是运用妙计,打败敌人;另一个是拒绝收买,牺牲自己。但两个人有个共同之点,就是都具有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与崇高品质。司马迁所以把这两个人物列在一起,无疑地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个共同之点。司马迁对于田单的妙计极力赞扬,表扬他的功业,说"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见《太史公自序》)。对于王蠋就强调他的爱国精神和品质的感召力量,说:"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可见司马迁认为王蠋的为国牺牲,对于当时的齐人,乃至对于以后的人民,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通过上面四个具体实例,我们就看出司马迁写《史记》,对于历史上爱国的英雄是尊敬,是热爱,是表扬,是歌颂。这就是《史记》的一个珍贵的内容;这就是司马迁一种伟大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纪念司马迁的一种深刻的革命意义。

(二)《史记》中的人民性

考察《史记》中的人民性,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司马迁写《史记》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呢?我的答复是司马迁既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而实际并不矛盾。因为司马迁生在二千年前,受着当时社会条件与个人条件的局限,不可能不拥护阶级制度,不可能不拥护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不可能不拥护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就是说他不可能不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也使他对于统治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憎根,对于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因而他反对统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采用凶暴的手段,反对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达于残酷的程度,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反

对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他忠实于社会现实,也忠实于史官职责,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通过具体事实的叙述,加以讽刺与批判;他维护劳动人民在当时生产关系下一定限度的利益。他同情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起义加以表扬与鼓励。这就是他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总之,司马迁一方面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而反对他们的罪恶行为,一方面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而只是维护他们的一定限度的利益。他希望统治阶级减轻剥削,来缓和阶级矛盾,来实现太平景象。这就是司马迁的主要政治观点。司马迁由这种观点出发,来同情劳动人民,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初步愿望的。所表现的爱憎,基本上是劳动人民的爱憎;所论断的是非,基本上是劳动人民的是非;所给予的表扬和批判,基本上是劳动人民的表扬和批判;《史记》中的人民性就在这里,而其人民性的局限性也就在这里。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差不多灌注在《史记》全书之中。他给用宽和政策对待人民的政治家作《循吏列传》,正是代表人民的拥护,他给用残酷手段对待人民的官僚作《酷吏列传》,正是代表人民的憎恨,就是很突出的例子。这且不谈。

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陈涉世家》。秦王朝对于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陈涉、吴广开始领导人民起义,各处响应,结果推倒秦王朝的统治。司马迁对于秦王朝的统治,表示强烈地憎恨;对陈涉、吴广的起义,表示热烈地赞扬。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作《陈涉世家》。"(《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是崇拜汤武和孔子的。他把陈涉的起义比作汤武的征伐桀纣,比做孔子的写作《春秋》,这是何等推崇!陈涉称王仅仅六月,就战败被杀,而司马迁就把他列入世家,又是何等推崇!可以说司马迁对于陈涉、吴广的认识代表着

广大人民的认识,对于陈涉、吴广的情感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情感。我们看后来的“正史”对待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怎样呢?封建社会里每个朝代都有农民大起义,著名的如有:赤眉、铜马等的起义,新莽因而灭亡;有黄巾、黑山的起义,东汉因而灭亡;有窦建德等的起义,隋朝因而灭亡;有黄巢等的起义,唐朝因而灭亡;有李自成等的起义,明朝因而灭亡。这些和有陈涉、吴广等的起义,秦朝因而灭亡,都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关键,都是劳动人民的光辉历史,故事虽是各式各样,而本质并无区别。这些领导人民起义的英雄,站在人民的立场,都应该歌颂的。然而作《汉书》、《后汉书》、《隋书》、《唐书》、《明史》的人们,对于这些起义的农民都看做“反贼”、“流寇”;对于起义的领袖,或者不给立传,只用几句话叙过,或者给立传而大加诬蔑。把他们和司马迁对比,便看出他们专为统治者服务的立场观点的一面,便看出他们所作史书的歪曲荒谬的一面;便看出司马迁同情人民的一种进步思想,便看出史记替人民说话的一种正确内容。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马迁是爱人民的,因而对于历史上爱人民的人物必然是加以表扬和赞美。例如《司马穰苴列传》里不仅叙述穰苴的爱齐国,而且叙述穰苴的爱人民。传里说:

>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

这一段记载有下列的进步内容:1. 穰苴对从军人民的一切生活都

加周密的照顾;2. 穰苴注意从军人民的健康与体格;3. 穰苴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对待从军人民;4. 从军人民乐意在穰苴领导下,贡献自己的力量,保卫他们的国家;5. 晋国、燕国听说齐国士气这般旺盛,都自动撤兵。穰苴领兵追击,收复了失地。这段记载证明了一个规律,就是人民是保护国家的基本力量;统治者能够爱护人民,才能领导人民战胜敌国,司马迁已经看到这个规律,已经看到人民的力量,已经看到人民爱国的高贵品质。他写这段,不仅赞扬了穰苴的爱人民,同时也赞扬了人民的爱国,《史记》里类似这种的记载是很多的。

《吴起传》说:

> 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田单传》说:

> 田单……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

《李广传》说:

>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这些记载内容虽然不完全相同,而司马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表扬爱士卒的名将,这种写作思想是一致的。

《平原君传》里有一段记载,也值得我们注意。战国时期,秦国派兵侵略赵国,把赵国的首都邯郸围了好多天。《平原君传》记载,邯郸的传舍吏李同(原名李谈,司马迁避他父亲的名讳,改“谈'为“同”)对平原君赵胜的劝谏说:

> “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

在这里又摆出两种人物:一种是担任守城任务的人民,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交换着吃儿子们的肉,用人的骨头做柴,砍木头制造守城的武器;另一种是不担任守城任务的高级统治者,妻妾有好几百,吃的是粱肉,穿的是绸缎,家里藏着很多金石器物,而不肯拿出来改制兵器。平原君不过是这种人物的代表者而已。司马迁这段记载,有四个意义:(一)表扬赵国人民爱国的热情和保国的功绩;(二)揭露赵国高级统治者不爱国、不爱人民的罪状;(三)表扬李同爱国、爱人民、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四)表扬平原君能够接受批评,和人民站在一起保卫国家。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司马迁爱人民的思想,也看到司马迁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表扬爱士卒的将领,一方面也批判不爱士卒的将领。《霍去病传》记霍去病是这样的:

> 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霍去病的战功，司马迁是肯定的。霍去病的不爱士卒，司马迁是批判的。

我举出以上几个例子，目的在说明司马迁表扬爱士卒的将领，批判不爱士卒的将领，因而说明司马迁的爱人民的思想，因而说明《史记》中的人民性。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不够全面，但是也突出地说明这个问题了。试问司马迁表扬爱士卒的将领，不是和表扬爱人民的循吏相一致吗？他批判不爱士卒的将领，不是和批判不爱人民的酷史相一致吗？他在借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来表达他的爱人民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总之，《史记》书里的人民性是比较充分的，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做更深入地发掘和探讨。

## 二 《史记》的艺术性的两个重点

《史记》的艺术性是很高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全书的组织、每篇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表现的手法以及形象的刻画、近于典型人物的塑造等。现在只提出形象性、典型性两点做个具体的说明。

(一)《史记》中的形象性

司马迁写《史记》是采用重点突出的写法。不是重点所在，他只是有选择地编排史料而已。遇到重点，他就运用他的天才，凭借他的素养，根据他的见闻，根据他的认识，用大力量加以叙述与刻画，因而在写人物故事上，有好多地方具有比较生动的形象，在

形象中表现出他的爱和憎,表现出他的表扬和批判。最突出的、为大家所欣赏的如《项羽本纪》、《李广传》等,我在这里不谈。现在举几个其他的具有形象的例子。

1. 我在前面提过,燕国乐毅伐齐,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只有莒城和即墨城未打下来,田单守即墨,使用六条妙计,打败了燕兵,恢复了齐国,最后一条妙计是“火牛阵”。司马迁在田单传里写道:

>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

这段记载,司马迁所费的笔墨并不多,但已经画出一个火牛阵图。在这图上,是夜景,有一千多条大牛,每条牛身上披着红紫色带有龙文的衣服,角上扎着锋利的刀剑或枪头,尾巴上拖着用芦苇做的加油浸过的火炬。火炬燃着熊熊的火,照得光明耀眼。一千多条牛都愤怒地跑进燕兵的阵地,到处把人冲伤或冲死。在这图上,有齐国壮士五千人,口里含着木片,向燕人进攻。还有好多齐人,打着鼓,呐喊着,跟在后面。还有好多人在城上打着钟、铜锅、铜盆等,打得惊天动地。在这图上,有燕国的兵,都带着心惊胆落的神色,失掉抵抗力的姿态,乱乱烘烘地逃跑,司马迁虽然写得不

大细致，但是“火牛阵”的形象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了。

2.《陈涉世家》记载陈涉起义做了陈王，当日曾和陈涉在一起耕地的伙伴，去见陈涉。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 陈胜……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辨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

这里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位天真质朴的、不懂得所谓“朝廷礼法”的农民形象。这位农民说话的语气和神气，我们读来如同亲闻一般。也随带叙述出看守宫门的“作威作福”的小官吏，和不对老朋友摆臭架子的、农民阶级出身的陈涉。司马迁刻画这位农民的形象还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然而已经很鲜明了。

3.《滑稽列传》中的《淳于髡传》记载：

>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

这里刻画出一个滑稽大家淳于髡的形象。他的仰天大笑的状态，他说话的语气神气，他的口才与智慧，他对齐王的藐视与嘲讽，都

已勾勒出来了。而在他的小小寓言中,又勾勒出怀着热烈生产希望的、怀着五谷丰收的憧憬的农民。淳于髡笑这位农民,正暴露了他的阶级意识。司马迁在《淳于髡传》里仅仅写出淳于髡三个故事,我们认为还没有充分地显示淳于髡的形象,然而在每个故事的叙述中,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形象性,是不容否认的。

(二)《史记》中的典型性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中,又往往能够根据历史事实,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品质,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人物,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某种人物,而且显示出他们的阶级。史书的塑造典型人物,和小说的塑造典型人物有个主要区别,就是史书塑造典型人物必须根据个人历史事实,不容许夸大,而小说塑造典型人物,只要根据当时社会现实,可以夸大。因此作史书的人塑造典型人物就受到局限,而比较困难。司马迁生在二千年前,而且《史记》是一部史书,所以在典型性方面还是不够的。如果说《史记》在塑造人物上已经具有典型性,那未免提得稍高;如果说仅具有典型性的倾向,又未免看得稍低;只有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比较切当。现在举几个例子:

司马迁在《李斯传》里,就根据李斯的生平事迹塑造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典型人物。传里开始说:

>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司马迁为什么写这个小故事呢?正是揭露李斯求学动机的卑鄙。

李斯所以要去“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是不想做茅厕的老鼠,而想做米仓的老鼠,为了自私自利,为了升官发财,并没有为国家为人民的意识。这个小小的故事很形象、很生动地、很深刻地指出李斯在求学以前的人生观。司马迁接着又写李斯学成以后,要去求官,和荀卿告别时说的几句话:

>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这几句话也简捷了当地揭露了李斯在学成之后,那种人生观并没改变。他仅仅“诟悲”个人的“卑贱穷困”,并不“诟悲”广大人民的“卑贱穷困”。后来李斯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李斯传》正集中地表明了李斯的这种思想品质。例如记载秦始皇病死于沙丘,留下遗嘱,立长子扶苏做皇帝,而赵高打算立始皇的少子胡亥,对李斯说:“扶苏做了皇帝,就必用蒙恬当丞相,而不用你了。如果立胡亥,你的丞相禄位可以永远保持。”最后的几句话是:

> 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 ……

李斯听了赵高的话,才和赵高改了始皇的遗嘱,杀死扶苏和蒙恬,立胡亥做皇帝。胡亥更加残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不久秦王朝就亡了。在传里,司马迁很明确地指出李斯立胡亥杀扶苏和蒙恬是为了个人利益。又记载胡亥责问李斯说:“吾愿肆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这时候,

陈胜、吴广等已起义,秦王朝责问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传里记:

> 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

这封书就是所谓《论督责书》。这封书的影响是:

> 书奏,二世悦,于是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在这里,司马迁很明确地指出李斯上《论督责书》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又记载李斯和赵高的矛盾,有一段话是:

> 赵高因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因上书言赵高之短。

在这里,司马迁指出李斯后来弹劾赵高,也是为了个人利益。结果被赵高所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总之,李斯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典型人物。司马迁的《李斯传》正是要把这样一个人物刻画出来(李斯为了个人利益害死韩非,见《韩非传》)。但是李斯并不是毫无封建道德观念,并不是绝不为秦国利益着想,可惜他的这种思想却战不胜他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司马迁也揭露了李斯思想上的矛盾,显示出他和赵高还有点

不同。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由领主封建制度进入地主封建制度,李斯确是起了某些作用。关于这一点,司马迁肯定了他的功绩,但是他的思想品质是卑鄙的。他的卑鄙的思想品质在当时政治上也发生了许多极坏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司马迁也表现出他的憎恶和批判。

又如《酷吏列传》中的《张汤传》,写出汉武帝刘彻时代的一个大酷吏张汤,写他怎样做到了汉王朝的大法官,怎样迎合刘彻的意图,怎样运用两面派的手法,怎样拉拢士大夫而排挤异己,怎样用残酷手段论断大狱,以至"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个奸巧的、虚伪的、残酷的、毒辣的大官僚。而在传的开端,有这么一段:

>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个小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张汤的思想性格,说明了张汤的生平事迹都是这个思想性格的表现,都是这个小故事的发展。这个小故事在塑造酷吏张汤的整个形象上增加了非常鲜明的一个部分。司马迁刻画李斯见老鼠的故事,刻画张汤杀老鼠的故事,都是高度的艺术手腕。

我们再看《石奋传》里刻画石奋说:

> 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刻画石奋的大儿子石建说:

>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

又刻画石奋的四儿子石庆说: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石奋传》里说:"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司马迁在这个传里用力地刻画这种人物的形象,让他们典型化。他们的故事里有落后成分,也有进步成分。专就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而论,那种小心谨慎,也有进步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活现出对专制皇帝极端恭顺的奴才相。这是专制皇帝所最喜欢的奴才,所以他们父子五人都做到年俸"二千石"的大官,所以石奋得到"万石君"的称号。

我们再看《直不疑传》:

>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去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种人物。这种人物就是旧社会里的所谓"长者"。这种"长者"的作风,可以看做一个人器量的宽宏,也可以看做处世方法的技巧,但总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刻画历史人物故事上，往往具有生动而鲜明的形象。由于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因而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刻画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在刻画形象中，通过大小具体事实，体现出各种人物的不同思想性格作风与品质。我们说《史记》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不为过誉。

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结语：司马迁的《史记》是具有多方面进步意义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其中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最值得我们珍视。《史记》又是具有比较高度的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其中形象性和一定程度的典型性也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史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在一起，有些地方达到比较高度的饱和，对于读者发生相当的感染力量和教育力量。我们今天纪念司马迁，要认识司马迁的伟大，要吸取《史记》中的精华。至于《史记》中的落后观点和艺术缺点，我们还是要批判的。

（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2期）

#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

施锡才

项羽和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人物。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曾为他们分别写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以下简称《项纪》和《高纪》,引文中的重点号系笔者所加),并对他们进行了评价。这为我们研究和评价项羽与刘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篇文章不是想对项羽和刘邦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评价,只是谈一下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事迹是怎样记述和评价的问题,顺便和近人对这有关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商榷。不足之处,尚希诸位同志指正。

项羽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反秦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的行为很残暴,失民心,他在反秦斗争胜利以后开历史的倒车,分封十八王国,把天下弄成割据纷争的局面。刘邦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他的行为基本上是顺时利民的,得民心的,他不仅在反秦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反秦斗争胜利之后依靠人民将天下归之于统一,制定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我们的观点是历史唯物论,我们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史记》,特别是其中的《项纪》和《高纪》。那么,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考虑这一问题:司马迁是怎样描写和评价项羽和刘邦的呢?

不少同志在体会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描写和评价时，有近于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司马迁把项羽"写成了一个叱咤风云、豪气盖世的英雄"，"他以极端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给项羽以最高的地位"①。"汉高祖虽然被列在本纪，但司马迁对这位皇帝的讽刺是入骨的，甚至叙述他是'无赖'"②。"他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无赖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③。最近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司马迁"饱含着热烈的感情在赞叹"项羽，"作者对这人物不免有偏爱"④。

他们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来呢？理由不外乎是：(一)项羽曾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不幸"被刘邦和他的谋臣所算，至于失败"，因此，"司马迁对他寄予同情"。刘邦是汉朝的开国帝王，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因而就在刘邦身上发挥了"大胆的批判精神"。⑤ (二)项羽出身于贵族阶级，司马迁也出身于贵族阶级。司马迁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而"这感情是有阶级基础的"。"司马迁给项羽等人写的好传，是对他们共同所属的阶级的凭吊"。⑥ 他们以此来说明司马迁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和批判精神。

---

① 季镇淮：《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文艺报》，1955年第十八号。

② 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第3版。

③ 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史学》版。

④⑤ 《中国文学史》第1卷第131～137页。

⑥ 何兹全：《司马迁和项羽》，《光明日报》。

我认为，他们如此理解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评价、写作态度以及举出的理由，皆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妨首先依据《项纪》和《高纪》来探讨一下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究竟是怎样描写的。由于项羽和刘邦同是秦汉之际政治风云中的著名人物，而且是互相对立、不同类型的人物，因此司马迁在写《项纪》和《高纪》时，基本上是用两相对照的写法来描写项羽和刘邦的斗争生活的，他以比较的办法道出项羽和刘邦的长短得失来。而且这两篇文章常有犬牙交错之处，两者彼此对衬和互为补充，以达到对项羽和刘邦的对立性的描写和不同的评价更为明显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探讨司马迁究竟是怎样描写和评价项羽和刘邦这一问题时，也就不能不以两篇文章进行对照研究的办法来进行。

现在，我试把两篇文章中对项羽和刘邦的不同描写和两相对照的地方提出数点来(间或插引一些别的篇章的材料)，并据之以申述司马迁的原意：

## 一　项羽和刘邦少壮时性格和抱负的不同

司马迁在《项纪》篇首说到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寓有称允之意；但作者主要是批评项羽的"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继学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的浮躁和不能善始善终的作风。项羽见秦始皇时曾云："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对他这种大言是感到惊奇的。

《高纪》篇首载有"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醉卧，武负、王媪见其(刘邦)上常有龙"等语，这是司马迁称允和推崇刘邦之语；作者也指出了刘邦染上了"狎侮"的

作风和“好酒及色”的不良习性,寓有批评之意,但这是次要的。他对刘邦见秦始皇时之语:“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是表示赞叹的,认为刘邦有大抱负。

司马迁之所以要在两篇文章之首对项羽和刘邦两人少壮时的性格、抱负等进行描写,不仅仅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为了和描写人物的政治活动相呼应,因为他把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看成是一个人的政治生活成败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不能把他对于项羽和刘邦的性格、抱负等的描写与其对项羽和刘邦的政治生活的描写割裂开来看待。

## 二 项羽和刘邦起事情况的不同

项羽和刘邦的起事情况是不同的。司马迁写刘邦的起事有被迫因素,而其基本部队是下层群众。刘邦本是泗水亭长,因“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他没法,也只好道亡,形势迫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胜起义之后,萧何、曹参和樊哙等拥他为沛公,于是真正地起义了,他的基本部队成员多为沛县的人民。

项羽的起事和刘邦有些不同。陈胜起义后,会稽太守通和项羽的季父项梁商量起事,项梁和项羽便把通杀掉,夺取了政权,“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从项梁和项羽本人来看,他们的起事没有被迫的因素,他们的基本部队成员也多为吴郡县的原有士兵。可见这和刘邦的起义是有些不同的。

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起事情况作了真实的记载,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示可否的态度,但却告诉了我们刘邦和项羽成败的契机,那就是:刘邦植根于较基层的群众,萧何、曹参、樊哙等自始至终是刘邦的得力助手;而项羽起事时仅为次要人物(项梁为主),

没有可靠的群众,缺少得力的骨干分子。

## 三 司马迁第一次较含蓄地透露出刘长项短

秦将章邯围攻赵的巨鹿之时,赵不断派使来向楚义军求救。这时楚义军在彭城附近,项羽和刘邦时已为楚义军中的重要将领。楚义军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议决了正确的两路出军的决策:一路军救赵,一路军西略地进关中。救赵军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西路军以刘邦为首。楚怀王与诸将约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时关中为秦的窠穴,推翻秦政权是义军的愿望和目的,谁能先入定关中就算谁的功劳大,故有此约。

楚军定决策和约言之时,在两路军首领的人选问题上曾发生了一场争论。《高纪》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慓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楚诸老将的"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毋侵暴,宜可下"之言,是经过数次革命斗争后得出的宝贵的经验之谈,起义军一定要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才能胜利;他们对项羽的"慓悍、猾贼"对刘邦的"素宽大长者"之评价,也是根据平时共同生活和斗

争时的观察而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因此，他们推荐刘邦，而反对项羽为西路军首领。

司马迁对于楚诸老将之言是相信的。我们一方面从《高纪》篇首有“（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的描写得到证明；另方面他对项羽的残暴已早有记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这足证项羽的残暴行为是存在的，楚诸老将之语是有根据的，所以司马迁借了楚诸老将之口，批评了项羽的慓悍、残暴，而称允刘邦是宽大长者。他意识到残暴者不能得民心，而只有宽仁者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作者把这一情节的描写放在《高纪》里，一方面为刘邦将来的胜利巧妙地伏了一笔；另一方面也为项羽将来的失败给了必要的暗示。这种匠心是极为高明的。

## 四 项羽和刘邦在两个反秦战场上的不同作用

司马迁写项羽和刘邦在两个反秦战场上的不同作用是十分着力的。他记述：楚两路军人选问题争论的结果，还是按照原来的决定而不变，项羽随宋义北上救赵，刘邦带一股军西进。从此，作者便分叙两路军的情况。

项羽随宋义北上救赵。他发觉宋义是个贪生怕死和只图享乐的人，便将其杀掉。楚怀王便命他为上将军。接着发生了巨鹿之战。司马迁对这一段史事作了突出的描写：

>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

> 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司马迁在这里,除了指出"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的英勇作战精神外,同时也称赞了项羽的功绩,肯定他在巨鹿之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支义军乘战胜之威,又连续在漳南、汙水两役中获得大胜,终于在秦二世三年七月迫使与赵高有矛盾的这路秦军统帅章邯投降。项羽对章邯加以任用。自此以后,项羽进军甚为缓慢,十一月才至新安;而刘邦于十月已定关中了。

司马迁认为项羽自受降章邯后,在反秦斗争方面已不起什么大作用了。因此,在《项纪》中只简述一句"行略定秦地";重要的倒是揭发了项羽一件非常残暴的罪恶行为:

>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新老士卒间有矛盾是很自然的,秦降卒受折辱而产生顾虑也是合乎情理的,主将如能运用正确的办法,这种矛盾可以很快解决。项羽以坑杀了事,这是多么残暴的行为!司马迁以批判的尖锐的笔锋来记述这一史实,对项羽的憎恶极为明显。司马迁写项羽自受降章邯后至入关争胜利果实这段时期的事,主要是暴露他的杀秦降卒的罪恶行为,其意在说明项羽在反秦斗争的后期已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作者这种高明的心裁值得我们细心注视和深切体会。

司马迁写刘邦的西进军,起初不足万人,故初期和秦军战斗只能进行避强击弱的迂回战。约当项羽在北战场受降章邯之时,刘邦围攻宛,招降了秦之将卒。自此以后,刘邦"引兵西,无不下者"。这时,司马迁着重描写刘邦西路军在南战场的作战情况,他对刘邦的胜利进军有这样一段描写值得我们注意:

> 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这里可注意者有三点:(一)赵高欲与刘邦"约分王关中",可见这时敌方已承认刘邦军为反秦的主力;(二)刘邦不与敌人妥协,积极进攻,智勇兼施,长驱直入;(三)更重要的是,刘邦命令军卒"诸所过毋得掠卤",故"秦人憙",而"秦军解"。作者深具心机地点出这些问题是极具高见的。这是和项羽的坑秦降卒与缓慢进军等相对照的。

正是由于刘邦不妥协,积极进攻,不侵犯百姓利益,得到秦民的欢迎,瓦解了敌人的军心,因此,很快地打垮了秦政权,于十月迫使秦王子婴投降。农民起义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司马迁通过对史实的忠实记述表明:刘邦和项羽在反秦斗争中皆起了一定的作用,七月以前项羽起的作用较大,七月以后则是刘邦起着主要作用。项羽之所以在七月以后不起积极作用,是因为他坑杀了二十余万秦降卒,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刘邦之所以能由弱到强,最终地打垮秦政权,是因为他不仅注意军事攻势,积极进攻,而且军纪严明,不侵犯老百姓利益。司马迁通过史实的叙述而对项羽和刘邦作出的评价是公允的。如果只知道司马迁描写了项羽在反秦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忽略了司马迁也记述了刘邦在反秦斗争起了更重要的作用,那是片面的。只知道作者写巨鹿之战有声有色,而不领悟作者写坑杀秦卒的愤怒心绪;只觉得刘邦在军事上较顺利没有打过大战,而不知道他在政治上有战无不胜的威力,更是错误的。

## 五 鸿门宴事件中的项非刘是、项愚刘智

刘邦先入定关中,按照楚怀王原先与诸将的“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言,准备王关中,令军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关。项羽闻知刘邦已入定关中,大怒,随即打进关中;又闻刘邦欲王关中,心中更怒,说道:“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见他是气势汹汹、杀气腾腾而来欲独吞胜利果实的。这事以当时楚义军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刘邦为是,项羽则非。

当时项羽有军四十万,刘邦军十万。项羽占了压倒优势,想一举消灭刘邦。刘邦和张良计议,明知力斗不过项羽,决定斗智。

于是,众所周知的"鸿门宴"故事产生了。

《项纪》内"鸿门宴"一节,写得非常生动,作者将项羽、刘邦、张良、范增、樊哙、项伯等一些重要人物刻画得个性突出、精神面貌极为鲜明,真是绘形绘色,淋漓尽致。我认为:司马迁通过"鸿门宴"事件的着意描写,在于说明项非刘是、项愚刘智。有人认为,司马迁在"鸿门宴"一节中,刻画了"项羽的磊落气概,不愿在宴会上暗算他的敌手"①。这种理解和司马迁的原意是不符合的。从"鸿门宴"事件的前因来看,司马迁认为,刘邦是应王关中的;项羽欲杀刘邦是不对的,毫无"磊落气概"。"鸿门宴"设在项羽军中,刘邦和几个从属人员赤手空拳去赴宴,范增在宴前三番两次示意项羽杀刘邦,项羽始终没有动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一下司马迁巧意记述的三个原因和情节:(一)项伯(项羽的季父)曾事先对项羽讲过:"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是需要深思的意见,项羽曾许诺。(二)樊哙当场指责项羽,指出他欲杀刘邦是残暴不义的行为,使项羽哑口无以回答。不然,事亦难预料。② (三)项羽骄傲轻敌,把刘邦看作掌中之物,故对范增的示意宴前杀刘邦不甚答理。依据此三点,可见把司马迁描写的项羽不杀刘邦的情节,理解为司马迁刻画了"项羽的磊落气概",是与作者之意背道而驰的。司马迁在表达了项非刘是之同时,也描写了项愚刘智。项羽本为杀人而来,见而不杀,反而把刘邦属下的叛刘归己的曹无伤的话告诉了刘邦,多么愚蠢;刘邦处境十分危险,燃在眉睫,但能和张良等通过斗智转危为安,多么沉着和机智。因此,我们

① 《中国文学史》第1卷第136页。

② 可参考《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与其说"鸿门宴"一节是司马迁刻画了项羽的磊落气概,还不如说是司马迁描写了项非刘是,项愚刘智。在"鸿门宴"一节的结束处记有范增骂项羽的几句话:

> 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这就是司马迁借项羽的谋士范增的话来评论项羽的。榷而论之,项羽确实不足谋。

## 六 刘邦和项羽入关后的不同行为

刘邦和项羽两人的入关中,从目的性来看,刘邦军是为了消灭秦政权(刘邦本人当然有王关中的动机),而项羽之来是为了争吞胜利果实,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如果再从入关以后的行为来检查,两人更有天壤之别。

司马迁对刘邦入关后的行为,在《高纪》中是这样记述的:

> (刘邦)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刘邦能采纳正确的意见[1]，不先图享受，与秦民约法三章，故秦民喜悦，从而得到他们的称颂和拥护。司马迁热情细心地记载了这段史实，意在称誉刘邦是很清楚的。

项羽入关后的行为则和刘邦大大不同。司马迁揭露他道：

> 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
> 项羽遂西……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这对项羽烧杀淫掠的罪恶和不听良言的愚蠢行径是多么深刻的揭露！

司马迁写项羽的残暴、野蛮、愚蠢的行为，使"秦人大失望"是如此；而述刘邦的贤能、善行、机智，秦人唯恐其不为秦王则如彼，其明辨是非，褒谁贬谁的态度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了。在这里，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和批判精神显示了高度的结合。

## 七　项羽分封和刘邦反项的是是非非

项羽凭借武力压倒刘邦，又不用楚怀王之命，号令诸侯军，"欲自王，先王诸将相"，把全国分封为十八王国，自尊为西楚霸王，王梁、楚等九郡，都彭城，把刘邦排挤到偏僻的西南去。项王

---

① 可参考《史记·留侯世家》。

这一分封活动,使得本来可以统一全国的良机烟消云散,而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这是反历史的逆流。司马迁由于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但他因具有一定程度的敏锐的洞察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能看出项羽分封之非和刘邦进行反项统一战争的是,这表现在:

(一)他看出了刘邦与诸侯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和分封后这一矛盾的立时触发。司马迁认为,项羽对刘邦的分封是个"阴谋",表面上是分封,实际上是"迁",他写道:

> 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

司马迁在这种叙事中明显地寓有论断,等于明显地说:项羽的分封刘邦,是项羽和范增搞的阴谋,实际上是"迁"。事实上,当时刘邦属下的将领如韩信辈也知这是项羽的阴谋,韩信曾对刘邦说:"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司马迁在这里不仅表明了项羽分封的不是,而且也暗语了刘邦的反项是有理由的。作者于此处寓有鄙视项羽和同情刘邦之意是很明显的。

不仅刘邦、韩信等对项羽的分封不满,就是田荣、彭越、陈余等人也都对项羽的分封不满,他们认为"项羽为天下宰,不平"。项羽的分封刚一结束,天下又纷争起来了。

(二)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从侧面看出了人民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和对刘邦反项的拥护。《高纪》有云:

>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

> 人。从杜南入蚀中。……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
>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

从这段材料里，我们不仅透视出，项羽分封刘邦时夺了刘邦七万人马（刘邦在鸿门宴时有十万军，现在项羽"使卒三万人从"），而楚与诸侯"慕从"刘邦者有数万人，又一次旁证了项非刘是。更重要的是觉察到，项羽于反秦胜利后没有妥善地处理起义兵士，让他们还乡从事生产和家人团聚，而是使他们抛妻别子远离家乡到南郑去，这就难怪他们要逃亡（此责任不能由刘邦负担，因其为被分封者），他们的逃亡实际上是对项羽之命的反抗。刘邦东向反项，正迎合了这些士卒的希望，他们自然是拥护刘邦的。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述，表明秦民也是反项拥刘的。

仅据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司马迁是笔斥项羽的分封和称许刘邦的反项。换言之，司马迁认为楚汉战争的正义方面是属于刘邦的。

## 八 楚汉战争时，项羽的残暴和刘邦的仁施

还在项羽和刘邦未直接作战时，项羽就复发了"老病"，用残暴的手段对待齐之军民了。《项纪》云：

> 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

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作者于此处又一次指出了项羽的残暴行为,并指出由于项羽的暴虐,引起了齐人的普遍反对,致使他"连战不能下",将足陷入泥沼之中。项羽这种暴虐行为,在楚汉战争时是不乏其例的。

刘邦和项羽相反。他继续了以前的宽仁作风,在迅速平定三秦之后,作出了有利于民的决定和增强军力的办法。司马迁云:

> 二年,汉王东略地。……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
>
>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刘邦这种态度和措施,自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诸侯的向心。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的残暴行为是很少见的,他的抚慰父老之事倒是常有的。

司马迁把刘邦的宽仁待民和项羽的暴虐人民在楚汉战争初就作了显明的对比,使我们见到了刘邦之必胜和项羽之必败的端倪。作者之高明笔法和处处着眼到一些著名人物和人民的关系,是令人崇敬的,这是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和思想性、艺术性的紧紧结合的标范。

还有一个为司马迁所注视的问题,在这里也谈一下。项羽因当初楚怀王和诸老将不同意他为西路军首领,怀恨楚怀王。入关中后,他虽然尊楚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自己号令天下,不久就把义帝迁杀了。义帝本来是不足道的人物,但既然当初项梁和诸义军首领共推他为楚怀王,继又尊他为义帝,使其成为名义上

的共主，就不能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项羽因私怨而迁杀之，在道义上是一失。刘邦从关中东下时，闻义帝被害，便加以礼葬，并号召诸侯王讨伐项羽，这在道义是一得。司马迁很注意这件事，在《项纪》、《高纪》中皆有记述。我想，这不是随便命笔，他是把这事看成为项羽的一大错误和刘邦的识得大体而提出的，他是把道义归于刘邦的。

## 九　项羽和刘邦在谋略上的优劣

楚汉战争过程中，项羽由强到弱，刘邦由弱到强，这一对比力量的相互消长，以至于项败刘胜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司马迁除了说明项羽分封和刘邦反项，项羽杀义帝和刘邦礼葬义帝、项羽暴虐人民和刘邦宽仁爱民等情况是项害刘利、项非刘是之外，还以不少具体例子说明项羽和刘邦在谋略上有优劣的不同，项羽愚蠢，刘邦机智多谋，从而道出楚汉战争的必然结局是项败刘胜。

司马迁认为，刘邦在勇力方面是不及项羽的，[①]但在谋略上则远胜于项羽。他对于项羽和刘邦在谋略上的优劣的描写，可举者约有五个方面：

（一）关中问题。关中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物资较丰，足备军需应用。项羽不听良言以都关中，而都彭城。彭城乃四面受敌之地，物资上又供不应求，难怪别人笑他“沐猴而冠”。刘邦反楚，首先传檄而定关中，以为“根据地”，命其得力助手萧何守之。是知项羽和刘邦在认识军事地理形势上是有优劣之分的。

---

① 《淮阴侯列传》载有一段韩信和刘邦的对话：“（韩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二)战略战术问题。刘邦因为初期军事力量不及项羽强大,常用迂回战术,声东击西,攻敌腹背等法。他有时分散活动有时集中作战,有正面作战又有敌后之扰,有西面战场又有东方出击,使项羽前后、左右、内外皆受打击,照应不及。项羽不讲究战略战术,只想凭军事优势硬拼,后来力量削弱了,还是想决一死战,可见在战略战术上的项愚刘智。

(三)利用对方弱点和矛盾的问题。刘邦知道黥布、彭越等人和项羽有矛盾,便把他们争取过来,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项羽的实力。他和陈平了解项羽有自恃勇力、不能任贤纳谏的缺点,便设法除去项羽帐下唯一著名的谋士范增。自此以后,项羽的势力就愈益下落,帐下的智勇之士就更为稀疏了。项羽也曾想分化刘邦集团的内部团结,当韩信为齐王时,他曾派武涉去说韩信归己。韩信感刘邦知遇之恩又知项羽不能任贤用能,①没有同意。项羽的计谋落空了。

(四)政治攻势问题。项羽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一手段,他使用的多是野蛮拙劣之法,刘邦则善于使用这一手段。司马迁在《高纪》中详载了刘邦数说项羽的十大罪状,一方面是承认刘邦会用政治攻势,另方面也说明他基本上是同意刘邦对项羽的谴责的,只要参考一下《项纪》的赞语即知。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项羽的失败"寄予同情"之说难以成立,司马迁既然同意刘邦反项就不会再"同情"项羽的失败以造成自相矛盾。

(五)麻痹和有心的问题。项羽分封刘邦于巴、蜀,又王章邯三秦将于关中以阻之,以为从此万事大吉,便东下彭城。刘邦被

---

① 《淮阴侯列传》记韩信言:"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迫赴南郑，因军力弱小，听张良之言，“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后来张良又向项羽说明刘邦无东向之意，项羽信以为真，便麻痹起来。其实，刘邦是有心人，不久就复修栈道打向关中。楚汉战争后期，项羽和刘邦的军事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是时，楚汉以鸿沟为界，暂时停战。按军事来讲，处于劣势的项羽应该趁此喘息之机重整旗鼓和严加备敌，但项羽在约后“引兵解而东归”，又以为万事大吉了。居于优势的刘邦听了张良、陈平之言，继续准备进攻，不久，便和韩信、彭越等约而一举击败项羽。从这两个事例来看，亦可证项羽之无谋而刘邦之有略。

司马迁在文章中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描写，表明了项羽是愚蠢无谋的，刘邦是机智多谋的。作者于此处没有挖苦和讽刺刘邦之意，更没有认为刘邦是“狡诈无赖”的人；他也没有意思去说明无谋无略、“匹夫之勇”的项羽有英雄气概。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如果首先能从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斗争究竟系谁是谁非的看法上着眼，就容易得出较为明确的答案。

## 十　项羽和刘邦待士用将的不同

前面谈的谋略问题，一般来说是这一方对付另一方的问题，这里要讲的待士用将问题，是双方各自的内部团结、利用问题。司马迁对这一问题也是很注意的。项羽和刘邦的待士用将是不同的，刘邦的特点是重封赏、轻责罚；项羽的特点是重责罚、轻封赏。正因为如此，项羽帐下的智勇之士如陈平、韩信等都脱离他而去归顺了刘邦；黥布、彭越等后来和项羽闹了大矛盾，而纪信、周苛等则愿以死对刘邦效劳报命。司马迁曾在《高纪》中记述了

这样一件事:

>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作者对这段话是相信的,如实地记录下来。在这里,司马迁同意高起、王陵等识判刘邦“慢而侮人”和称允项羽“仁而爱人”,但主要意思不在此。其重点在说明,项羽的“仁而爱人”是表面的虚假,实际上是“妒贤嫉能”,忌功疑贤,重责罚,轻封赏,故智谋之士不为其用;刘邦虽然不大注意待人礼节,“慢而侮人”,但能重封赏,知贤任能,故智勇之士为其尽力(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郦生来拜访刘邦时,刘邦正坐在床上洗脚,未起来迎接郦生,郦生批评他傲慢,刘邦听了接受其批评,马上“摄衣谢之,延为上坐”。这说明刘邦礼贤纳谏)。司马迁将刘邦君臣在反项胜利后检讨敌我双方待士用将的得失之语直录入史,加以肯定,这是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毋庸置疑。

## 十一 楚汉战争的必然归宿——项败刘胜

司马迁通过对项羽和刘邦种种描写和对比,使人看清了项非

刘是,项劣刘优,项愚刘智,项暴刘仁,从而引往项败刘胜的必然结局的描写。

《项纪》最后一部分对项羽垓下失败情景的描写是很深刻的,寓有批判之意的。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段文字是司马迁以凄怆而悲壮的笔调来写项羽的"英雄末路"的,说司马迁对项羽的失败寄予同情和悲叹。我很不以为然。我认为:

(一)司马迁引用了项羽垓下被围时的诗句,这是引项羽之诗还议其身,指责他怨时不利己的荒谬,嘲笑这个刚愎自用的暴虐者终于掉下了失败的眼泪,决不是同情项羽。汉军中四面唱起了楚歌,足以表明人心归向了刘邦。项羽的眼泪唤不起广大士卒的同情,因此只好带八百骑偷偷地逃命,渡淮时只剩下从骑一百余人了,可见其狼狈样。

(二)司马迁引这样一则故事以说明人民对项羽的唾弃和反对:

>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这虽是一个平常的小事,但它反映了一个大问题:田父为什么要骗失败中的项羽使其陷入大泽中而不怜悯救之呢?无疑的,是人民唾弃他、反对他。

(三)司马迁详细地记叙了项羽率二十八骑在东城"决战"和在乌江自刎的情况,无非是说明:项羽虽有"匹夫之勇",终于惨遭失败,再无颜面去见江东父老(江东父老也不会欢迎他),只好于乌江自刎。"慓悍、猾贼"是必定要失败的,只有宽仁长者才能成功。

(四)司马迁特地记载了项羽在败亡前讲的几句话:

>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作者引这些话在于说明:项羽至死不悟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十分愚蠢的。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项羽的失败没有寄予同情和悲叹,只是嘲笑和指责。他对刘邦的胜利是称颂的,基本上没有讽刺。

## 十二 司马迁《高纪》、《项纪》的赞语是扬刘抑项的结论

现在让我分析一下两纪的赞语。《项纪》赞云:

>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在这里,一方面肯定了项羽灭秦有功,承认他以勇力很快地霸有天下的事实;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批判他兴起之暴,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自矜功伐,奋私智而不师古,强调他至死"不觉寤而不自责"的错误和言"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荒谬。司

马迁的“何兴之暴也”一语是对项羽愤怒的谴责和切要的评价,《史记》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批判精神,就表现在这个地方。有人特别强调《项纪》赞中“然羽非有尺寸”至“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段话,以此认为司马迁对项羽很崇敬。其实,这只能说是司马迁表示了惊叹。如果能把全赞内容统一起来看待,就可以知道司马迁不推崇项羽了。还有人认为,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推崇之意,显然可见”①,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司马迁把秦始皇、吕后、汉武帝等列入本纪就不是为了推崇,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政权,必须立纪。同样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也是因为他有“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的事实存在,并不是为了推崇他。

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语是下得好的,《高纪》赞云:

> 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有一定的道家思想,他强调“与民休息”,反对行暴政重苛刑,他评刘邦之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是相当推崇的评价。如果我们暂不追究作者的哲学思想,那么,理解“得天统”一语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是可以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写刘邦“因有所忌讳,不能不规避其词”。其意大概是认为:司马迁本来嫉恶刘邦,但“因有所忌讳”,所以不能描写其丑恶面目了。我看并不如此。司马迁对其当时皇上汉武帝还露骨地讽刺,难道还不敢贬斥刘邦吗?事实上,他不忌讳,只是他更注视史实,不以

① 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山东大学学报》第二卷第2期。

刘邦的微瑕而掩瑜罢了。

综观《项纪》和《高纪》的正文和赞语,可以清楚地感到,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描写和评论是较全面公允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夹杂不正确的爱憎态度和曲意渲染史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和忽视,司马迁在两篇文章中描写有刘非项是之处。如,他写楚汉战争初,刘邦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以致被项羽打得大败而逃的狼狈样。他讥笑刘邦的轻躁行为(闻韩信欲立为齐王便怒骂起来),他鄙视刘邦的慢而侮人,他讽刺刘邦登皇帝位以后的贱相等。他对项羽杀宋义的正确行为,破釜沉舟一意救赵的决心,巨鹿之战中表现的勇敢精神,皆予以表扬,肯定了项羽在反秦初期的作用。这说明司马迁记述史实是较为客观和全面的,他不掩一个恶人之善,也不盖一个贤人之恶。

我认为,司马迁通过史事的叙述和对比,明辨是非,明显地寓有自己对项羽和刘邦的评价,那就是:项羽虽然反暴秦有功,然其以暴易暴,虽然有勇,但为匹夫之勇;他为人残暴、愚蠢、做事不公、妒贤嫉能,这是其主要的基本方面,所以众叛亲离,失天下人心,最后必然失败。刘邦不仅反暴秦有大功,而且反项羽的暴虐也对;他为人宽仁,机智多谋;虽然待人少礼,然能任贤用能,因此智勇之士皆归,人民拥护,终于获得胜利。司马迁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的限制,不可能知道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他已能注意到人民群众对某些历史事件起着一定作用,这可以从他对项羽和刘邦的成败兴亡与人心向背有着很大关系的描写上得到证明。

(原载《辽宁日报》1963 年 3 月 18~19 日)

# 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

朱东润

传记文学是现代滋生的一种文学样式。在中国,我们可以追溯到《史记》,但是中间隔了二千一百年的漫长时期,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变化,我们不能指望现代传记文学完全遵奉《史记》作为必然的模式,事实上也无从作出这样的要求。

《史记》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创作。无论太史公怎样自称推重《春秋》,无论《汉书·艺文志》怎样把《史记》列入《春秋》家,《史记》确确实实是一部独具一格的作品,不特空前,而且几乎绝后,因为《汉书》以后的史书大多是断代史,而《史记》是通史,后代固然有《南史》、《北史》这些著作,但是数量不多,远远不如断代史的大量出现。在这些方面,我们暂时不作深论,因为我们只考虑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考虑对话的问题。有人说在叙述事实方面,只要列举事实,用不到插进对话,当然这是一种主张,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完全摒除对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任用禹、稷、皋陶等的事迹,完全是用对话。记载历史事实的发展,有时必须用对话,才能表现当时的神态。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叙述,不一定很真实,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没有录音机,谁能保证完全真实呢?但是立论推求太过,有时反而窒碍难行。古人没有录音机,

并不能证明古人没有对话。不仅如此,我们在记录语言的时候,有时也不妨转译。舜和禹、稷、皋陶的语言,在《尚书》和《史记》中,就不完全一样,在记载的时候,只能按照当时的语言规律,给予记录,这不是录音机所能办到的。

事实上,《五帝本纪》只是一个平凡的例子,《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都有非常生动的记载,项羽、信陵君、窦婴、灌夫、田蚡这些人物形象都是栩栩如生,没有太史公这样笔肆墨饱的记录,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生动记载的。

因此在传记文学的叙述中,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太史公学习,学他那种生动活泼的记录。但是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在于学习《史记》的互见法。

什么是互见法?

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是最复杂的。孩子们看电影,首先要问你这是好人、坏人,这个问题提得并不错。不知道谁是好人坏人,我们怎能理解电影?但是要作出答复可不简单。我们凭什么可以一下子说某人是好是坏呢?人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人比较容易识别,有些人就不容易识别。表面看来是好的人,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却非常坏;表面看来是坏的人,可能尽管外表相当粗暴,内心却非常善良。问题复杂得很,不但一下子说不清楚,甚至一下子也看不清楚。

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有时还有一个时代标准的问题。古代人的标准不一定和后代一样,甚至解放前的标准也和解放后不一样。在人民没有发言权的时候,最坚强的人当然应当起来参加革命,但是统治者的要求是安分守己,做一个听话的老好人。可是现代却不如此。我们要求的是能把国家大事作为自己责任的人物。时代不同了,要求当然不一样。《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

《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做人要有一个标准,这是对的,但是这个标准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即使作者自信是一个正常的人物,他不能完全不受时代的影响。以《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为例,就可以看到。太史公对于魏其侯窦婴、将军灌夫是抱有极大同情的,因此经过武安侯田蚡的挑拨诬陷,二人被杀以后,太史公说:“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太史公的同情,是在窦婴、灌夫一边的。太史公是不是正确呢?我看也不一定。窦婴的问题不大,可是灌夫的为人,如太史公所说:“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样的人,正是人民的祸害。但是太史公的同情,却在窦婴、灌夫这一边,我们不一定说是太史公的错误,但是他用以衡量人的标准,显然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但是这只是衡量人的标准,还不是互见法。

什么是互见法?一个人的成就有长有短,把长和短统一起来是统一不了的,无论是舍长取短,或是舍短取长,都是不全面的。那怎么办呢?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所以如能通读全书,那时对于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一览无余,也可以作出适当的评价;倘使只读本传,那就只能按照太史公给他的结论作出评价。

即如田蚡,在《魏其武安侯列传》里我们只看到他是一个阴毒

险狠的小人,可是倘使我们把《史记》通读一遍,我们会有不同的评价。《史记·河渠书》记元光三年,黄河瓠子口决,田蚡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当然,从现代的水利常识看,黄河决口还是可以塞的,但是也必须在水势已经缓和时着手,才有堵塞的可能,要是在那惊涛骇浪之中,用人力强塞,那是完全无效的。田蚡提出正确的警告,但是武帝不听,终于造成更大的灾祸。

《史记·东越列传》又说:“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复,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这是一场剧烈的争论,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田蚡的考虑是周到的。

我们可以说田蚡的为人,有老成持重的一面,也有阴毒险狠的一面。太史公的做法是在田蚡的本传中写他阴毒险狠,但是在《河渠书》、《东越列传》中却写出他老成持重。这样的写法在本传里固然是淋漓尽致,但是在全书中仍然掌握恰当的分寸。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又是一种写法。这是两位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立大功的大将,太史公尽力推重他们,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缺点的。太史公的写法是:

> 骠骑将军(指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

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大将军（指卫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从这篇列传里，我们看到太史公对于卫青、霍去病并不是完全同意的。在《佞幸列传》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几句："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这里指出卫、霍是大将，和一般的佞幸不同，但是在《佞幸列传》也挂了名，这就是说即使他们确有才能，但是毕竟也沾上了佞幸的边。

特别在《李将军列传》里，我们更看到太史公对于卫青的谴责。李广是当时的名将，在他和匈奴经过多次搏斗，立功塞外的时候，卫青才刚刚爬起来，可是后来由于外戚的关系，卫青成为统帅。在一次战斗中，他把李广调离前线，要他迂回作战，这一次迂回不但使李广失去立功的机会，而且耽误了战期，使匈奴便于撤退。大将军要李广的幕府官回报。李广说："我的部下无罪，我自己去回报。"太史公的记载是：

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在这一节里，太史公举出李广的极端愤慨和对他部下的最大

同情。他写到当时百姓的悲痛,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这种夸张,是入情入理的,是从修辞方面考虑,完全容许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必然是对于大将军卫青的一种谴责。

从另一篇作品《魏公子列传》,我们看到太史公对于信陵君是倾注了最大的同情。若干年以来,有不少中学生都读这篇作品,有不少评论家都推重这篇作品,好像秦的统一全中国是一件历史的错误,信陵君的击杀魏大将晋鄙是完全应当的。不仅如此,尽管秦兵在对赵作战中,前后斩首四十五万,可是信陵君"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事情是有些不易理解,但是很多人总是相信信陵君的丰功伟绩,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们不相信历史的演进会出现什么奇迹,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写作技巧,把长期以来的读者都胡弄过去了。

事实上当时的山东六国由于看到赵国的阽危,正在酝酿一种六国联盟的形势。齐、楚、燕都在准备出兵,赵、魏在作战中,再加上一个多年以来与魏唇齿相依的韩也准备加入联盟,六国的大会战即将出现,因此秦军不得不急速退却,一切都有一个发展的线索,可是《史记》在《魏公子列传》中没有写清楚,因此我们把破秦救赵的大功都推给信陵君。这篇列传是一篇有名的文学作品,信陵君也成为大家推崇的人物。

信陵君的人品是不是这样完整呢?我们不必举"金无足赤,人无十全"的原则,就从《史记》的记载里也可以看出太史公对于信陵君不是没有别的看法的。范雎得罪了魏相公子魏齐,逃到秦国,为秦相,他就借重秦国的兵力,要求魏人杀魏齐。魏齐也是魏公子,可能是信陵君的兄弟或叔、侄辈,由于受到秦人的压迫,逃到赵国,赵相虞卿舍去相位,陪同魏齐回魏。魏齐希望得到信陵

君的支援，可是信陵君不见他，魏齐愤而自杀。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虞卿可以舍去相位，陪同魏齐亡命，可是信陵君没有表示一点同情，终于造成魏齐的自杀。从这里看，信陵君的那一套"公子为人仁而下士"的本领又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信陵君的懿德。但是在《魏公子列传》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

太史公对于信陵君、魏其侯窦婴、灌夫、武安侯田蚡，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都有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的本传只给我们片面的认识。倘使我们能通读全书，我们也会得到全面的认识，万一只读本传，那就只能得到片面的认识。这里不是由于太史公的认识不够全面，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认识作者的用心，责任是我们自己的。

这里我们也得指出太史公所推重的美德不一定和我们现代的认识一致。他所推重的人物，如《刺客列传》的聂政，为了受到一个封建社会头子的一些恩惠，去刺杀另外一个封建社会头子，甚至破面决眼，自屠出肠，而不悔。这样的人物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重视的地方。又如荆轲，这当然是比聂政高明得多的人物，但是在秦人破灭六国，统一全中国的形势已经成熟以后，要想胁迫始皇，重温四百多年以前曹沫生劫齐桓公，退还鲁国失地的故事，实在是一种倒转历史车轮的幻想。《史记·刺客列传》中生动活泼的记载，只能加重读者的叹息，并不能有其他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史记》是二千一百年以前的著作，经过长时期的琢磨，语词的意义，和现代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高祖本纪》说："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陈丞相世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魏其武安侯列传》："今日长者为寿。"这三处的"长者"和经常所说的"高年有德"的意义是有距离的。用现代的语言，我们也

许可以说是“好脚色”,一种有气魄、有声势的人物。看来太史公所说的沛公、陈平和陈平的宾客以及灌夫都是。时代变了,我们的认识在变,我们所用的语词也在变。字面没有变,而字面所代表的意义也正在变。

人是复杂的,他有优点也必然有缺点。要求一个只有优点或是只有缺点的人物,这是枉费心计的。太史公的写法是在一个人的本传中只写他的优点或缺点,而在其他的篇幅里把他的不同表现也写出来。因此在我们读这人本传的时候,只见到他的一面(太史公所认为主要的一面),而在其他的篇幅里看到他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全书深入钻研,始能看到他的全面。这是太史公描绘人物的笔法,是每个钻研传记文学的人必须知道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向《史记》学习呢?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无法学习的。因为在进行传记文学的创作中,我们只有这一本书,即使我们很理解太史公互见的用法;也是无法学习的。我们要求钻研《史记》,理解《史记》,但是我们无法模仿《史记》。那么在传主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情况下,我们怎样下笔呢?从我的认识看,是不是可以把传主的特点分出一个主次来?传主的认识、表现和行动,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主要的一面反复写、深刻写,而把次要的一面简略写,但是却千万不是不写。这样一来我们既交待了传主的主要一面而又不是掩饰他的缺陷或是忽视他的成就。我们应当学习《史记》,但是在学习之中也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学习《史记》写作的用心。

(原载《人物》1983年第1期)

# 《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及其叙事特点

季镇淮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著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司马迁一生努力完成的《史记》就是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的开化史，它是根据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和著者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司马迁是属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家的行列的。

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为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了公元前一世纪初以前中华民族三千年开化发展的历史。这是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是前所未有、并世少见的创作。

五种体例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八书"以叙事为主，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是全书叙事单一集中的补充。它们叙述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始终变化。"十表"是依朝代顺序并把它们分为几个阶段而制作的，它们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以简单的记事为主，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历史现象或事件的始终变化，是全书

叙事的联络和补充。就历史著作说,这“八书”和“十表”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但它在《史记》中却居于次要地位。《史记》的主要部分是“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这是全书的中心。“十二本纪”除《秦本纪》、《项羽本纪》外,是历代帝王世系和纪年的系统,是叙述历代帝王的政绩的。“三十世家”除《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七十列传”除《匈奴列传》等六篇外,叙述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型人物活动的历史。上述例外的那些篇,有的仍是割据的世袭侯王的历史(《秦本纪》);有的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有的实际上也还是思想家活动的历史(《孔子世家》);有的则是秦汉以来在东南沿海新的割据侯王的历史(《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有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君长的历史(《西南夷列传》);有的是外民族君长的历史(《匈奴列传》)等。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首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发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

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由此可以想象，事实也正是如此：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主要写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而是帝王将相和官僚士人的历史，也就是历代统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到地主阶级、特别是汉兴以来地主阶级的历史。司马迁的世界观或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汉兴百年的统治思想，从战国晚期以来的阴阳家思想，到汉初的道家思想，到汉武帝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而兼阴阳家的思想，对司马迁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司马迁的世界观或历史观是很复杂的。"天人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以及历史上朝代的兴亡盛衰的变化，是汉兴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统治阶级共同探讨的根本问题。司马迁把他著作《史记》的最终目的也归结到这里，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的。作为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两套历史循环论"即"五德循环论"和"三代循环论"，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他的世界观或历史观基本上跳不出这些圈套。它们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人事最后由天命来决定，历史上的朝代兴亡盛衰以及个人的成败得失，都说成是非由人力所致，而是由天命来决定的。这种愚民的统治思想在《史记》里有不少反映。例如：作者在《六国年表序》里说秦"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十分强调地说汉之代秦，"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

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而《高祖本纪赞》则完全用董仲舒的“三代循环论”。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乱其例,提高孔子的历史地位,实由于迷惑孔子为周公卒后五百年天命的圣人。《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更根本的是以帝王即圣人为中心,这在《太史公自序》里也是说得清楚的。此外汉初统治阶级信奉道家黄老学派“清净无为”的思想,实质是统治阶级企图稳定封建秩序、束缚人民手足的一种愚民的思想,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先秦的法家思想,到汉武帝时代,实际并未禁绝,而为统治者与儒术同时运用的统治工具,这对司马迁是有切身经验的。但从政治思想上说,司马迁大致和司马谈一样,承认它对封建统治有“正君臣上下之分”的作用,而批判其“严而少恩”,极端残酷的刑法统治。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进步思想意义和历史内容在于:司马迁不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公式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观察历史的变化发展,这就是《太史公自序》里所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他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八书”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王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因而并不像唯心主义的“三代循环论”

撇开了秦王朝短暂的统治。① 承认秦汉之际项羽的统治和吕后的统治，也都是从历史实际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循环论的公式出发的。他作《陈涉世家》，把陈涉起义比之为“汤武作”和“《春秋》作”，以“圣王”看待陈涉，不仅因为陈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最初的发难者，而且也因为陈涉在秦楚之际确有发号施令半年的统治。这也是从历史实际的变化出发的。与此相应，对社会发展，司马迁赞成道家老子的顺其自然，有消极的因素；而反对它的“小国寡民”历史倒退论，却是把历史看成变化和发展的。

正是由于司马迁从历史实际观察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他在观察了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之后，就能发现了问题。在《伯夷列传》里，他对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天道观，反复地举出了相反的事实，提出了质问，最后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在这里，他所举出的善人、恶人诚然是有问题的，但基本观点却是怀疑神秘的“天命论”即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或历史观。这是对当时统治思想的圈套的突破。同样地，在《游侠列传》里，他比较了各种人物，也怀疑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道德。而肯定社会下层人物游侠的救人之急、牺牲自己的道德。他这里引“鄙人”的话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又在《货殖列传》里说：“人富而仁义附焉。”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的虚伪性的揭露。不论司马迁的自觉意识怎样，这些例证实际上包含着道德观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对立存在的看法。这是对封建统治思

---

① 钱大昕：《史记志疑·序》谓“史公著述，意主尊汉，近黜暴秦，远承三代，诸表微见其指，秦虽并天下，无德以延其祚，不过与楚项等，表不称秦汉之际而称秦楚之际，不以汉承秦也”。此论显未体会司马迁承认客观实际，发展的历史观，而说“近黜暴秦”，更不合史公之意。

想的又一突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差贫贱。”班固说的第一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三两点却正是司马迁的进步思想。

从历史实际出发(观察历史),关键问题还在于是否忠实于历史事实,依照历史实际的本来面貌记录下来。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发生“忌讳”的问题。但司马迁是坚持了“实录”的精神的。《史记》的人物传记,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第十篇)中所说:“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即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历史。这直接表现在对汉代统治阶级一系列人物的历史记载。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1968 年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河北满城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两座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在《五宗世家》里对刘胜骄奢淫逸的揭露确是实录。这种实录精神,有古代史官记事的影响,如《左传》里就有许多记载是对奴隶主阶级罪恶历史的揭露;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认真对待亲身经验的结果。这是《史记》所以被认为是“谤书”的由来。但是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不能不受他的世界观或历史观、政治

思想以及个人好恶制约的。他的实录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而其目的归根到底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例如在《酷吏列传》里，他写了汉武帝时代残酷的刑法统治，是实录；又写了在这种统治之下所造成的官逼民反的严重情况，也是实录。因此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写了阶级斗争，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时的民反，就是人民的起义反抗，而认为是"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结果。由此可见他的实录是为他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而其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者寻求统治方案，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司马迁的实录，无论是古代的历史还是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我们还需要加以分析和研究。

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又是怎样写作人物传记的呢？首先是为什么人作传的问题。他所写的人物很广泛，主要从实际出发。有些人物不得不写，如帝王和公侯贵族有关纪年、世系为历史著作所必须；此外还有广阔选择的余地。他所选的人物，不是取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在《张丞相列传》末，他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可见，一些无所作为的丞相，没有什么发明，没有功名著于世，不过是备员而已，只有一句话概述了几个人，并不给他们一一作传。司马迁不为那些庸庸碌碌无所成就的丞相作传，相反，他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的。人物选写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人物无论大小，他

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做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其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干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脩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其一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人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彻妙”(刘载熙《艺概》卷一),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前,摧毁秦王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但有时可能使人有“依违”之感。唐萧颖士“尝谈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

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新唐书·萧颖士传》)。"依违"是"不专决"的意思[①],即倾向性不明显。如《商君列传》,写得很完整,把商鞅的变法主张和经过写得具体、仔细,读到最后还觉得作者是赞成这个人物的。但是在传《赞》里,才表明他对传主的看法:"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这就是说,《史记》人物传记于叙事中寓褒贬,有时不很显明,要结合传《赞》才能认识清楚。《史记》里许多人物,无论作者对其人是爱是憎,大抵都是如此写法。只有少数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叙事兼议论,或则发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给他作传,使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特别是《屈原传》。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所以鲁迅先生以为这两篇如小品文(《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史记》传记叙事的又一特点是个性和典型性统一。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

---

①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

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事简。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都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文繁。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秦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文繁,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

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避免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言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语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个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发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 司马迁的审美观

韩兆琦

《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关于《史记》的思想意义,人们谈得不少了,本文想着重从它的艺术上大致地作一个勾勒,看一看《史记》的审美价值主要在哪里,作者的审美观是怎样的,以及作者的审美观与汉代的美学思潮是什么关系。

## 一 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记》是一个巨大的生动的历史人物的画廊,这个画廊上起远古,下至西汉武帝时期,而其中最主要的乃是春秋末期以来的四百多年间的人物。这段时期的历史特征是一贯的,社会风气是相似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也是相通的。司马迁可以被看做是这段时期的各种观念的总代表,《史记》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时代观念的集大成。

《史记》是历史书,它的记人记事都要依据一定的历史资料,都要反映事物一定的本来面貌,这是无疑的。而且由于司马迁本人有着突出进步的历史观点,和一种少有的无畏的求实精神,因而使《史记》在这方面取得了其他史书所从未取得的重大成就,不

然,为什么刘向、扬雄从一开始就称赞它是“实录”呢?但“历史”毕竟是经过历史家的鉴别取舍,是在他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观的照览下产生出来的。何况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历史和文学尚未分家,它们各自的标准和各自应该采用的方法也尚未明确,因此《史记》明显地带着一种作者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明显的虚构成分。这一点,只要我们把《史记》和《左传》、《国策》等稍加比较就可以明白。也正因此,《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曾受到过后人的许多指责;但是作为一部描写人物的文学书,它的创造性是空前的。《史记》中的形象有一部分是汉代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早于司马迁二三百年以至四五百年的先秦人。但是当这些历史人物一旦在司马迁笔下活动起来的时候,就无疑地具有了一种同一性,它们身上都带着某种汉代的时代气息,体现着司马迁的精神面貌,它们是按着司马迁的审美观被重新塑造出来的。从这些特点来讲,《史记》又很像小说。因此,研究汉代艺术而忽略《史记》,恐怕是不应该的。

《史记》人物的总特点是什么呢?首先表现在它的构成上。《史记》所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人物。它们都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都站在时代洪流的尖顶。《史记》中也写了一些小人物,诸如依附于贵族权门的士人食客,杂侧于市井草野的豪侠等,但是这些人又无一例外地都是与那些大人物、大事件有关的,他们也都投身到时代潮流的漩涡中去了。如侯嬴之与信陵君,李同之与邯郸之围,王蠋之与田单复齐,荆轲、高渐离之与六国抗秦等。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豪迈行为,他们的历史作用,都足以使他们跃居于大人物、大英雄的行列。《史记》中也有一些反面角色,如夏桀、殷纣,如二世、赵高,如公孙弘、张汤之流,这是作者鞭挞的对象,他们是作为英雄人物的对比、陪衬而存

在的。

其次是反映在《史记》人物的人生观上，他们大都有一种豪迈的进取精神，他们积极奋发，志欲建功立业，他们都追求轰轰烈烈，而不甘心碌碌无为。刘、项见到始皇车驾时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陈涉辍耕垄上的叹息“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以及陈平的“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都是大家熟知的。伍子胥不从父兄俱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韩信忍胯下之辱，连兵百万，一举灭项羽于垓下，亦比比皆然。总之，胸怀大志，锐于进取，建功扬名，是司马迁笔下人物的典型特征。

其三是这些人物还都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色彩。他们为了事业，为了功名，为了某种道德观念，而不怕挫折，不怕困辱，不惜以身殉“功名”，以身殉“事业”。晁错力行削藩，诸侯怨恨，其父乃往劝阻之。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后竟衣朝衣被斩于东市。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最后乃遭放流，渔父劝其改节从俗，屈原不顾，竟怀石投汨罗而死。豫让为智伯报仇，“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其所以如此强为其难，目的就是要“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李广自结发与匈奴七十余战，未得封侯。年逾花甲，尚请率部居前，“以死单于”。其他如吴起、商鞅、张仪、范雎，亦莫不如此。他们或为功名，或为事业，皆锲而不舍，义无反顾。

以上三端，是《史记》人物所共通的，帝王将相如此，小人物如滑稽、游侠亦如此，男人如此，女人如聂莹、如姬亦如此；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如此，那些不受人喜欢，甚至连那些被后人谴责的人物也具有这方面的某种气质。例如苏秦曾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

大体上这样说,《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的画廊。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异常悲壮、异常惨烈,其主要人物又大都是悲剧性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杀、自杀,如项羽、陈涉、伍子胥、商鞅、吴起、屈原、韩信、彭越、李广;有的困辱,挫折,结局悲惨,如孔子、虞卿、齐桓公、赵武灵王、信陵君;有的虽终生不可一世,但一息方止,祸变顿生,如秦始皇、吕后、田蚡;有的本人虽看起来似乎志得意满,但其内心也颇荒凉寂寞,时而流露出一种下世的悲鸣。例如刘邦因大杀功臣,而弄得亲离众叛,当他唱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时候,也禁不住"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了。再加上室内不和,吕氏难斗,连自己心爱的一妾一子日后也恐怕难以庇护,刘邦这位大英雄的晚年心境可以想见。《史记》全书中的人物传记共一百一十二篇,以被杀、自杀的人物标题的三十七篇,以其他形式的悲剧人物标题的约二十篇,作品中有主要人物被杀、自杀,或带有其他悲剧色彩的总共将近七十篇。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如同欧洲文学史上的某个历史时期,作家们好写悲剧一样,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特别以写悲剧人物而享盛名。

但是,作为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它和我国后代任何一部悲剧作品(如《红楼梦》等)都不同。这里边的人物死得大都非常壮烈,有政治意义,有重要价值,他们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事业已经成功,如商鞅、晁错,以及刺客专诸、聂政等。有的虽然也说不上有什么事业上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某种愿望已经达到,如豫让、聂莹、李同、王蠋等。也有的其功虽未成,但其影响巨大,流传广远,如荆轲、高渐离、李广等。试想当一个人

死后，竟使得“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这是一种何等的感召力！还有什么仪式比得上这样的哀荣？因此，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悲伤的叹息，而是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精神气质，这样的道德观念，是与战国以至西汉前期的社会风貌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敬仰英雄、崇拜英雄，积极奋进，追求事功的时代。当时整个社会的意识就是如此，认为人就应该这样生，这样死。只有这样才是美的，值得歌颂的。《报任安书》中说：“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太史公自序》也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司马迁的人生观、荣辱观，也是他的审美理想。司马迁的气质人格，和他在《史记》中描写的人物完全相同。《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合起来也是一篇壮烈的悲剧英雄的传记。

## 二　关于立意、选材和场景情节安排

明代陈仁锡曾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以‘天幸’二字为主。”动笔写作之前先确定文章主题，确定本文要突出的思想倾向，这是后代写小说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却是首先从司马迁开始的。他为什么人立传，他要突出这个人物的什么思想品质，这都反映着司马迁的审美理想。例如《管晏列传》，写管仲他只是突出了管仲与鲍叔的交情，突出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的发自内心的慨叹。写晏婴他

只写了从囚徒中援拔越石父,与荐其御者为大夫二事。作为一种奇闻轶事,这三件无疑都是很生动的。但作为一篇春秋大国两位杰出政治家的传记来看,则显然是过于单薄了,它不足以反映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本质面貌。因此刘知幾说它“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梁启超说他“走偏锋”,说他“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原来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借此表明一种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准则。这是作者正面表达其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一篇颂歌式的文字,同时也是对汉代现实的一种鞭挞与批判,它字里行间凝集着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明代陈子龙说:“管晏功能甚伟,而太史公载其一二轶事,大约在于结友推贤,意有所寄耳。”(《史记测义》)再如《季布栾布列传》只是写了这两个人在生死面前的态度,最后作者意犹未足,又在赞语中议论道:“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覆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茅坤曰:“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家一片胸臆。”凌约言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啧啧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史记评林》)这都清楚地说明了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在其写史立意时的决定作用。这个问题在历代史书中,惟有《史记》表现得最突出。

由于司马迁喜爱英雄人物,喜爱悲剧主题,喜爱豪宏壮伟的气氛、色彩,这就决定了他的选材。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那些战争、政变、格杀、祝捷,是大军的行列,是巡狩的仪容。在这里没有那种日常的琐细生活,没有那种家庭之乐、男女之爱和什么田园隐居之美。在这里一切都是猛烈的、紧

张的、豪迈的、粗犷的。即使写个宴会也是勾心斗角，剑拔弩张。《史记》中也有不少细节描写，但一般说来，这些都是为那种悲烈的壮举做铺垫、做陪衬的。在《史记》里，除吕后其人像是一种“变异”外，一般说来妇女是不占地位的，她们仅仅作为一种陪衬、摆设而存在。虞姬在项羽心目中，其地位也不过是略等于一匹名马。这里也写婚姻，但绝无感情，而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

文学作品突出地选取这种题材，表现这种生活，这是战国以至西汉的特殊现象。魏晋的飘逸俊爽，唐代的才子佳人；宋代的市井风物，这时都还没有正式地进入文艺舞台。

《史记》为了表现人物，在情节和场景的安排上是极为注意的，它突出地强调场面的戏剧性，特别注意描写那种扣人心弦的情节。例如写楚汉成皋之战：“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又如写韩信破陈余：“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佯弃旗鼓，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看，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场面！其他如长平之战、马陵之战，以及荆轲刺秦王，周勃灭诸吕等就不必再说了。

《史记》中有不少描写忍辱发愤的情节，《越世家》云：“吴既

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这是何等愤慨激烈的情景啊! 当然,吴国当时的做法也不弱:"吴王病伤且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这都是司马迁倾心敬仰的英雄气派,故而精心刻画如此。

由于《史记》的写作注意情节,特别是好追求那种曲折生动、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情节,因而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剧烈、紧张、悲壮的色彩,带有一种飞动、迅猛、不可阻抑的力量。这种追求饱满的力量,追求剧烈、紧张的场面情节,是汉代艺术的共同特征,而《史记》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 三 《史记》文章的艺术风格

《史记》文章之美,前人之述备矣。明代茅坤曾说它"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蓄百家,包括万代"。这与唐代韩愈所说的"雄深雅健"也差不多。《史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气势豪迈宏放的文章风格,是与前述的那种塑造人物,选择题材和安排特定的情节场景相一致的。但这样说还不够,似乎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朴拙"。朴拙才能使文章浑厚。朴拙、浑厚、有气势、有感情,这才是《史记》文章的基本风格。

《史记》中有不少细致的描写,甚至某些个别人物(特别如刘邦)还刻画得极其丰满。但是总地来说,它仍主要是靠粗笔浓墨夸张地勾勒人物的主要特征。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也往往只有一个侧面,只能让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大致轮廓,而缺少丰

满的血肉。如孙膑、韩信的军事天才,张良、陈平的运筹帷幄,专诸、聂政的勇猛格杀,大概也就仅此而已。它们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生动的故事,而不是丰满的有性格的人。它与《红楼梦》人物的精雕细刻固然不同,它与唐人的《李娃传》、《霍小玉传》也大异其趣。这里追求的是故事的威武雄壮,与气势的浑茫奔放。说它是艺术水平的局限也可以,但说它是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却更为恰当。《史记》的这种风格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的壁画,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的风格刚好平行。

我们说《史记》朴拙,除了表现在上述的粗笔浓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它像是滚滚洪川,鱼龙漫衍,泥沙俱下;又像是苍山老林,尽管它有指说不尽的枯枝败叶、偃木斜柯,但是它那种古朴浑茫的原始气象,却永远不是任何整齐茂美的园林所可追拟的。司马迁的文章,激情滚滚,一气写下,情之所至,笔亦随之,至于有些矛盾、有些岔头、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计较的。"丘左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谁不知道这段话的事实有错误呢?但又有谁因此去责怪司马迁呢?说话的人说清了,听话的人听懂了。心领神会,得鱼忘筌。

当然,我们并不是嗜痂成癖,这种错迕纰缪的东西太多,终究是不好的。班固早就说它"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这里面有因为他死得太早,太突然,文章未及细校阅、细打磨的缘故;但是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审美观问题。当时人们写文章往往就是只注意大关节、大道理,而不大顾这些细枝末节。例如贾谊的《过秦论》就是一例,三篇文章中被后人攻驳、订正的事实达五六条,但历代人们又都交口称誉这是汉代少有的大

手笔、大文章。

《史记》文章的这种朴拙,这种原始气象还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史记》使用的基本上是一种稍加规范的书面语,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的一部分口语。由于作者注意追求故事的生动,追求文章的气势奔放,追求情感的酣畅淋漓,因此他随意挥发,以致使得许多地方不合"语法",或失之过简,或失之过繁,或丢上句,或缺下句,而作者对此又都似乎在所不顾。倘若以刘知幾和王若虚的观点来审定《史记》的语言,那么《史记》应该修改的地方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在看待这种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司马迁的审美观,和他建立在这种审美观之上的对文章语言的要求,而不能轻易地说它"不合语法",或用什么"疏略"、"冗复"一类的考语去指斥它。例如《项羽本纪》:"当是时,诸将皆慴伏,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诛乱"字下语气未完,应有"固宜为上将军"等字样。因这样易与下文重复,故史公略去,而直接用叙述语补足。《张耳陈余列传》:"陈余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必如公言"字下,亦语气未完,但是文章却把当时的遑急状态表现得异常清楚。

《史记》为了突出气氛,用语有时不厌其繁。《项羽本纪》:"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一段话中,"楚兵"、"楚战士"、"诸将"、"诸侯将"皆连续地反复出现,构成一种极其紧张的气氛。如果按照王若虚的观点去"删繁",这段话自然是有可删的。例如《汉书》就删简成:"当是

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惴恐。"简则简矣,而气势也就没有了。洪迈曾称道《魏世家》、《苏秦列传》、《平原君列传》、《鲁仲连列传》,说它的语言"重沓熟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容斋五笔》),确有见地。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写人、写事,而不是像后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推敲字句,因此尽管它有毛病、有纰漏,但是它真实、它自然、它朴拙,韩柳以下的文章左规右矩,炉火纯青,一篇篇如精金美玉,光彩照人;但是像司马迁那种感情充沛、气势雄浑、笔墨朴拙的文章却很难见到了。

## 四 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勾勒,我们对《史记》中所表现的司马迁的审美观,应该有个大致的轮廓了。他的这种审美观有其时代性,例如赞美英雄气质,歌颂追求事功,注意紧张情节,文风朴拙而不事繁华,这些大致都与汉代的其他艺术相一致。但是司马迁的审美观、审美理想还有其突出的独特性,我想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这是除《史记》外,其他汉代艺术中所难以见到的。正是在这些方面,他高标独树,使他的那些同代人如司马相如等难以望其项背。司马迁这种审美观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春秋后期以来,到刘邦建立汉朝的五百年间,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一切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叱咤风

云的豪迈时代。那此起彼伏的建国、亡国,那指说不清的组合、分裂,瞬息万变,简直使人应接不暇。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掠卤、屠城,真是悲惨而又雄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壮烈悲歌。这些英雄前仆后继,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悲壮的活剧,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推动了时势的迅猛变化。

从刘邦建汉到武帝尊儒,虽说这其间有所谓“文景之治”,但是外族入侵、藩王内叛、诸吕方消、七国又起,名曰“无为政治”,实则何尝息兵!汉初的政治、经济、文化虽说多承秦制,而世俗民风实则仍多与战国相同。司马迁被这个时代的壮烈气氛所濡染,被这些豪迈英雄的气质风节所吸引,这是他审美观形成的第一方面的条件。

其二,战国以来,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阶级,他们积极地从事各种变革,从各个方面都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这个时期,士阶层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这些人有本领、有才干,他们欲有所为,想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的品德有高低美恶之分,而他们的奋发上进,百折不挠则带有其共同性。这是一个重才情、重实效、重功利的时代。有才干的人就应该有名利、有富贵,他们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被人崇敬歆羡。“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这就是战国时期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司马迁和苏秦等人不同,在《史记》里,战国士人的那种卑微自私,反复无行被扬弃了,司马迁所景仰的是乐毅、屈原、蔺相如、鲁仲连。但是苏秦、张仪、

范雎等战国士人那种雄心勃勃，为追求事功而生死不顾的精神气质，则为司马迁所欣赏、所继承，这是形成司马迁审美观的第二方面的条件。

其三，从刘邦建国到司马迁写《史记》，中间相隔一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割据叛乱与反割据反叛乱，抄掠入侵与反抄掠反入侵，周回反复，最后终于演变成了汉武帝对“四夷”的大举用兵。以今天的观点看来，后来的这些战争许多是不正义的，是掠夺性的，是出自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和物质欲望，是出自一种“恶”的动机。但是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现象，今天只能客观地对它进行历史评价了。这些战争是污浊的，但的确也正是在这种血污的战争中，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汉帝国形成了。她自豪地雄踞于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民族之林。人民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上也富饶起来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整个汉代社会的意识状态是多么宏阔壮观啊！他们有信心、有力量、有眼光、有气派。他们自信是攻无不胜，取无不得的。他们追求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这时也搞过什么“尊儒”，但其实质乃是一切为我所用。“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汉武帝的一封求贤诏。看它有多么活泼、多么开放，没有一点框框，没有一点顾忌，真是宏阔之极，豪迈之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不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光荣。“君子鄙没世而名不称”这句孔子的老话，在这时竟成了一条品评人物的至高准则。而这个时代也的确是人才济济的，他们都为国家、为伟大的民族，建立了许多使后世叹为观止的丰功伟绩。这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环境，也是他人生

观、审美观形成的第三方面的条件。

其四,是战国以来的美学思潮对司马迁的影响。《史记》是先秦文化、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也是先秦文学艺术的结晶。它总结吸收了以孔子儒家学派为中心的北方思想和北方艺术,同时也总结吸收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思想和南方艺术。这两种优秀文化的融会,奠定了《史记》的批判精神,和它慷慨悲壮的英雄气质,同时也赋予了它某种轻灵飘逸的浪漫特点,和感愤淋漓的浓重的抒情性。

《史记》所表现出的审美观,也正好与当时其他艺术门类所表现的美学思想、美学趣味相同,可以由此见到司马迁这种审美观的时代性。李泽厚曾对汉代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基本特点概括说:"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的关系来表现它存在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情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一往无前的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他又说:"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面貌。"(《美的历程》)这话说得很好。我觉得司马迁正是西汉前期这种美学思潮的杰出代表,而当时这种美学思潮又是司马迁审美观所由形成,并得以充分发展的客观条件。

其五,司马迁的惨痛遭遇对其《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巨大影响。受宫刑对于司马迁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这场横祸给司马迁的打击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使司马迁的头脑更

清醒了,眼光更锐敏了,对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和社会上的种种弊病看得更明晰了。同时,由于他个人自身的悲剧经历自然地也就更加突出了《史记》全书的悲剧气氛。例如他特别好写悲剧人物,而描写时又是那样地对人物灌注着全部感情,以致使他们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却经天贯日,永世长留天地间。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又好从汉代的现实生活出发,好带着一种浓厚的个人身世之感。清代刘鹗曾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序)鲁迅曾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汉文学史纲要》)这些话都为我们准确地钩出了悲惨身世与司马迁的审美观、与《史记》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之间的必然联系。

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是《史记》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的审美意义、它的美学价值却从没有像开放以来这样被人们所重视、所理解。对司马迁留下的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视它、研究它。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

# 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

吴汝煜

我国古代《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尚书·周书》中的《牧誓》、《武成》,都已初具传纪文学的因素,但却不是传纪文学作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创造性地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根据真人真事的素材以及一部分传说和有关文献材料,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才第一次诞生了传记文学作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由于他在传记文学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他已经毫无愧色地进入了我国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行列。司马迁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写真人真事同样可以发挥作家的创作才能;传记文学作品不仅必须写真人真事,而且完全能够写好。对于司马迁创作的传记文学,应该如何评价?本文打算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成就是杰出的,这首先是因为他写了重大历史题材,写了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的真人真事(也有一部分是传说中的人物),展示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历史画卷。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仍处于上升时期,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时代的要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想写一部以歌颂

他本阶级的杰出历史人物为主的史书。但是,他只写了一部分初稿,或者说,只做了一些开头的工作就去世了。临终的时候,他对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①司马迁继承其父亲的遗志,决心写完这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不过,他不是单单给“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凡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②的历史人物,如文人、学者、名医、辩士、倡优,都为之作传。这显然已经发展了他父亲的想法,要写这样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当然要涉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本朝历史。司马迁很少顾虑,丝毫也不因为牵涉到本朝历史而有所讳避。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司马迁对孔子的《春秋》是十分推崇的。他的《史记》就是上继《春秋》而作。但是他对孔子不敢写当代重大历史题材、不敢如实反映历史情况是不赞成的。因此,司马迁笔下的传记文学特别重视表现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着力描写汉兴百年间的近代人物。战国末期,秦将王翦以六十万大军击溃楚军主力,虏楚王负刍,战争规模不可谓之不大,但司马迁没有详细去写,而对秦汉之际的钜鹿之战、垓下之战,却写得有声有色,十分精彩。因为这些战役同汉朝的兴起直接有关系。司马迁正是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的描写,突出歌颂了汉兴百年间的历史人物的功绩。

司马迁写传记文学的态度很严肃。他十分注意“考信”工

①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作。除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并严格进行选择以外,还尽可能亲自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他写《夏本纪》,亲自探过禹穴;写《淮阴侯列传》,亲自到韩信家乡淮阴(今江苏淮安县)作过调查;写《孔子世家》,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可靠资料,补充史载的缺失,又汰除了很多不可信的传闻。他比较严格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传记,所以真实性比较强。后世学者曾怀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武的存在,怀疑司马迁所说的孙武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可靠性。但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的出土,证明孙武是确有其人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确为孙武所著。司马迁人物传记经受了时间和科学的检验。可以说,他的传记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写了真人真事,并且忠实于真人真事。试想,如果从地下发掘的资料恰恰证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不可靠,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当然,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还夹杂着神奇怪异和宿命论等不足征信的、并应予以汰除的成分。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进行分析批判的。今天,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他那种敢于写重大历史题材,敢于写真实历史人物的战斗精神和气魄。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还表现在他对于历史人物做了必要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传记文学不同于人物年谱,也不是履历表。它必须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描写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使读者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根据表现主题思想的需要,对历史人物一生丰富而生动的材料加以剪裁、取舍、概括和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艺术加工，使之具有更典型的意义。司马迁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奠基者，具有很高的艺术才能。他长于选材。对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材料，他有一个选择的标准。凡是与"天下所以存亡"[①]有关系的，他就著录和描绘，反之，就加以抛弃。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标准。根据这个政治标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谈到自己对每篇传记的写作重点有过深刻的考虑。关于《廉颇蔺相如列传》，作者说："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据此，作者重点写了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不仅在当时赵国的内政、外交方面都显得特别重要，而且它们所反映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在战国时代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只有把蔺相如置身于这样的矛盾斗争之中，才能充分展示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出色的外交才能和高度的爱国精神，从而使蔺相如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一般地说，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往往是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出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但是，这不等于说，司马迁完全忽略细节材料。不是的。凡是对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有关系的细节材料，司马迁同样予以重视。他十分擅长于选择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富于特征性的动作，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气质，借以增强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感。在《陈涉世家》中，作者写陈胜起义前的一段故事："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

---

① 《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这里“辍耕”、“怅恨”两个动作是富于特征性的,表现了陈胜对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强烈不满;“苟富贵,无相忘”是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了陈胜希望穷兄弟们都摆脱封建剥削与压迫、都过上好日子的理想。这段小故事,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陈胜后来敢于发动起义的思想基础,确实是传神之笔。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汉武帝为霍去病营造府第,叫霍去病去看看是否合适,霍去病回答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短短九个字,口吻逼肖,神态毕现,把这位急于建功立业的爱国将军的英雄性格写活了。司马迁的笔端饱含着丰富的感情。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古代英雄人物所感动,字里行间洋溢着崇敬的心情。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又寄予深切的同情。《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一生未获封侯,反而被迫自杀,作者沉痛地写道:“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由于作者由衷热爱李广,所以写来真切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司马迁通过这些艺术手段,在严格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为他本阶级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并在上下几千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广阔的面貌和深刻的本质。

此外,司马迁创立了多种与内容相统一的传记形式。帝王的传记称本纪,基本上采取编年的方式,诸侯的传记称世家,一般以世系为经,以人事为纬。其他历史人物的传记称列传。列传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所谓分传、合传、寄传、类传等数种。重要人物用分传,如《淮阴侯列传》、《商君列传》等;生平事迹相关的用合传,如张耳、陈余合称《张耳陈余列传》;次要人物用寄传,如虞卿事迹

附寄于《平原君列传》;属性相同的用类传,如《滑稽列传》、《儒林列传》等。各传之间又详略互见。这样,就做到了量体裁衣,因人设传,构成了我国传记文学人物形象的洋洋大观。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这些杰出成就,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原载《光明日报》1977 年 10 月 22 日)

# 《史记》与汉语成语

黄懋颐

## 一

本文所谈及的成语是指《史记》中的词语或句子已经巩固下来的固定词组,它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成语宝库中的一部分。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言。《史记》中的词语句子等,流传后世形成成语的达三百六十余条。就其来源和形成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首见于《史记》以前的古代典籍,这些词语在当时不一定是成语,由于以后不断地使用,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这一伟大著作中的使用,就成了汉语成语宝库中稳定的一员,或者更迅速地成为成语。

司马迁在写作中运用了不少古代历史文献和百家典籍。他叙述春秋战国的历史,许多地方依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有时甚至整篇整段节录。如《孔子世家》和诸子列传,就引用了不少诸子的文章。这一类出自古代著作,而《史记》予以运用、提炼的成语就有一百一十多条,出现二百余次。

《尚书》:四条,出现五次。如《鲁周公世家》:"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艺",见《尚书·金縢》)

《左传》：十一条，出现十三次。如《晋世家》："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唇亡则齿寒"，首见《左传僖公五年》）

《战国策》：二十七条，出现五十二次。如《范雎列传》："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危如累卵"首见《战国策·秦策四》）

《论语》：十九条，出现十九次。如《孔子世家》："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循循然善诱人"首见《论语·子罕》，成语"循循善诱"渊源于此。）

《孟子》：三条，出现四次。如《楚世家》："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取长补短"，见《孟子·滕文公上》）

《庄子》：五条，出现九次。如《留侯世家》："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白驹过隙"，见《庄子·知北游》）

《荀子》：五条，出现九次。如《乐书》："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移风易俗"见《荀子·乐论》）

《韩非子》：十条，出现十四次。如《萧相国世家》："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汗马之劳"首见《韩非子·五蠹》）

其他如《周易》三条，出现三次；《管子》三条，出现四次；《淮南子》三条，出现九次；《国语》、司马相如赋、《老子》、《诗经》、《晏子春秋》及贾谊文各二条，《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墨子》、《孙子兵法》、宋玉赋各一条。

以上一百一十多条词语，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均见于比《史记》早的古代著作。《史记》的沿用，使之固定为成语，或对其形成为成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史记》如何继承和使用它们的情况来看，又分为三种：

（一）《史记》从古代著作中，以一个固定词组的形式作为一

个意义完整的单位,完全继承下来。此类颇多,达七十四条。如《孙子·谋攻》:"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史记·魏世家》:"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百战百胜"后来成为成语。像这类的还有夙兴夜寐、唯命是听、不毛之地、挥汗成雨、视死如归、夜以继日、分庭抗礼、势不两立,远交近攻等。

(二)古代著作中的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组,经司马迁在实际运用中加以修改、提炼,后来在语言发展中约定俗成,逐渐发展为成语。这一类有二十八条。如《苏秦列传》:"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战国策·秦策一》原作"前倨而后卑"。"前倨后恭"是用来描摹苏秦的兄弟妻嫂对他前后两种不同的态度。将原"卑"字改作"恭"字,更为精确。后来"前倨后恭"用来形容某些人的丑恶嘴脸。又如《留侯世家》:"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荀子·儒效》原作"置锥之地"。司马迁将"置"改为"立"。"立锥之地"用了更夸张的手法,越发形象、生动。在这里是形容一个国家丧失了国土,连竖一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了。后来"立锥之地"这一成语就用来形容极小的地方。又如《魏世家》:"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韩非子·有度》作"负薪而救火"。司马迁将"负"改作"抱",形象更加逼真、传神。"抱"比"负"更能说明匆遽之状。《史记》还将"前功尽灭"(《战国策·西周策》)改为"前功尽弃";"犹豫未有所决"(《战国策·赵策三》)改为"犹豫未决"等等均属此列。

(三)古代著作中的一句话或一段话,《史记》继承其原意,文字上有较多的加工,后在长期运用中逐渐凝炼为四字格的成语。《管晏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

气扬扬,甚自得也。""扬扬"一语,早见于《荀子·儒效》,作"扬扬如也"。杨倞注:"扬扬,得意之貌。"后《史记》的"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被压缩为"扬扬得意"这一成语。又如"唯唯否否",原为"唯唯"、"否否"两词,分别见于《左传》和《史记》。《左传·昭二十年》:"君所谓可,据(梁丘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史记·赵世家》则记载:"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左传》的"否否"和《史记》的"唯唯"以后在长期使用中联合而成为成语"唯唯否否",形容阿谀奉承的人。

第二部分:首见于《史记》的。从来源上说,现代汉语成语有一些是司马迁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史记》对后世的无可比量的影响,这些词语流传下来,凝炼为成语。《史记》的语言十分丰富多彩,无论是描写、叙述还是议论,司马迁所使用的词语都准确生动,形象鲜明,而且高度概括,能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有些词语很富哲理性,耐人寻味,它们都是这些词语形成为成语的原因。这类出自《史记》的成语有二百五十多条,出现二百八十多次。这一部分成语的形成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史记》中的某些词语或句子,整个地传留下来,固定为成语。这一类较多,共一百二十五条,出现一百四十九次。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完璧归赵"、"怒发上冲冠";《吕不韦列传》中的"奇货可居"等。《孙子吴起列传》:"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批亢捣虚"是说在战斗中要抓住要害,乘虚而入。"形格势禁"是形容事情被形势所牵制而不能进行。"批亢捣虚"和"形格势禁"都成了成语。又《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其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就是两条成语。《史记》中还有一些词语或句子,曾

出现数次,但每次出现时个别字词有所不同,后来其中一种形式发展为成语。如《淮阴侯列传》:"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刘敬叔孙通列传》作"肝脑涂地"。《司马相如列传》作"肝脑涂中原"。后来,"肝脑涂地"成为成语。其他如不寒而栗、陈陈相因、大喜过望、短小精悍、名山事业、人自为战、约法三章、正襟危坐、民不聊生等等。

(二)原文出自《史记》,经后人加工修改或节缩,逐渐形成为成语。这类有四十七条,出现五十四次。如《韩长孺列传》:"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汉书·韩安国传》换了几个字,作"冲风之衰,不能起羽毛,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夫有盛有衰,犹朝之必莫也"。司马迁以"强弩之极"和"冲风之末"形容一种力量由盛到衰。为了用词有变化,使用了同义词"极"和"末"。后来,班固以"末"替换了前面的"极",成为"强弩之末",遂为人沿用,形成成语。又如,汉高祖六年,刘邦用陈平计,擒得心腹之患韩信。群臣祝贺高祖时,分析当时汉的兵力和地势说:"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这就是成语"高屋建瓴"的来源。其他还有如"嫁祸于赵"形成"嫁祸于人"(《赵世家》);"恨相知晚"形成"相知恨晚"(《魏其武安侯列传》);"吏士皆无人色"形成"面无人色"(《李将军列传》);"死灰独不复燃"节缩成"死灰复燃"(《韩长孺列传》);"因其势而利导之"节缩成"因势利导"(《孙子吴起列传》);"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节缩成"解衣推食"(《淮阴侯列传》)等等。

(三)《史记》中的一段话或一个故事,后人取其意而以四字来表达,形成了成语。这类共二十三条,出现二十四次。《史记》记载的历史故事很多,有些在人民中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深受

群众喜爱,叙述这些故事的某些文字,有些就成了成语。例如“令人发指”,“负荆请罪”等。《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从字面看,“破釜沉舟”这一成语,是由“皆沉船,破釜甑”两句话节缩而来,但最初这一成语的含义,却要从这一段文字来理解。后来,就以“破釜沉舟”比喻做一件事情要下定决心干到底。“指鹿为马”见于《秦始皇本纪》。还有“纸上谈兵”“围魏救赵”,“毛遂自荐”,“暗渡陈仓”,“多多益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都是由《史记》中的一个故事形成的成语。故事流传至今,这些成语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四)《史记》中使用的谣谚、俗语、古语等,后来形成为成语。这类共四十九条,出现五十六次。司马迁写《史记》收集资料的范围,不限于皇家图书馆。他还深入各地,实地调查,发掘到许多宝贵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民间的歌谣、谚语。运用这些语言描写人物,叙述故事或论赞品评,使得文章更为生动。《史记》中的谣谚、古语有些也就形成了成语。如《楚世家》:“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滑稽列传》作:“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两句话的个别字词有异,但意思相同。后以“一鸣惊人”比喻一个人平时不露声色,看不出有什么作为,但能突然做出大事,使人震惊。这种隐语可能当时在民间流行,司马迁用来说明道理,简洁而富形象性。《曹相国世家》:“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形成了成语“萧规曹随”。《司马相如列传》:“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形成了成语“坐不垂堂”。《季布列传》:“楚人谚语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形成了成语“一诺千金”。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将军列

传》),鄙语“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道家之言“当断不断”(《齐悼惠王世家》)等都形成了成语。

## 二

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这些词语,采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物,塑造人物。其修辞方式生动多样,在修辞中使用的词语亦极其凝炼精粹。现在分两方面谈谈:一,对塑造人物的作用;二,在修辞中的作用。

《史记》所记叙的人物包罗万象。除帝王将相外,还有大小官吏,贵族公子、政客、文学家、学士、思想家、说客、隐士、刺客、游侠、医生、商人、优伶等等。司马迁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运用了丰富的语言,塑造出种种不同的历史人物。使人物各具特点,栩栩如生。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运用的语言具有生动、准确,鲜明的特点,其中许多发展为成语。如《陈涉世家》中,描写陈涉与他的伙伴在一起佣耕时的谈话,陈涉太息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一成语,就用来比喻一般庸人不理解英雄的远大志向。人们最熟悉的一段“鸿门宴”,其艺术表现之生动、巧妙,人物塑造之细致、深刻,俱臻上乘。这一段一千来字的故事,写了好几个人物。这一故事中所运用的词语形成了好几个成语。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令人发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后来都演变成为成语。司马迁还善于在人物的对话中表现人物的特征。《史记》中人物对话的语言也形成了一些成语。这些语言显得特别精练,形象。如项羽少时,与叔父项梁观看秦始皇帝游会稽,见到帝王的威风,说了这么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少年项羽这一句话就显示了他“初生牛犊”不怕一切的

性格。又如秦末项羽、刘邦相争，刘父为项所掳，项欲烹杀刘父，以此要挟刘邦退军。但刘邦竟说，如烹其父，要项羽“幸分我一杯羹”。仅此一言，即极其生动地表现了他那副流氓嘴脸。以上的对话形成了成语“取而代之”，“分一杯羹”。再如在《张丞相列传》中对周昌一段对话的描写，可谓绘声绘色。“……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庆义的《世说新语·言语》中说，邓艾口吃，一开口就要说“艾艾”，以后“期期艾艾”就合为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说话不流利或结结巴巴的样子。

《史记》中的修辞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往往以一种人们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作比，使人们感到自然、亲切、形象。《李将军列传》中，太史公论赞道：“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司马迁用“桃李不言”，比喻李广，确实中肯、深切。“下自成蹊”既表达了众人对李广的怀念，也深深寄托了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在《平原君列传》中，对有才能的人，作了这样的比喻：“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使遂（毛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这个比喻含蓄有致，一两句话就说明一个问题。《汲郑列传》中，汲黯对汉武帝用人很有意见，他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后来居上”这条成语后用以称赞后来的人或事物胜过先前的人或事。司马迁贬抑一个人物时，又往往以动物作比。如“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形成了“羊狠狼贪”，比喻贪官污吏压迫人民；“则桀之狗可使吠尧”形成成语“桀犬吠尧”比喻走狗一心为主子效劳。《史记》中还有将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比喻作“危若朝露”（《商君列传》），将一个国家的衰败比喻作“土崩瓦解”（《秦始皇本纪》），这些词语都是既贴切，又通俗易懂，它们以后均发展为成语。

《史记》运用排比句的地方也很多。议论之中使用排比,则使得说理层层深入,形式整齐而匀称。《史记》中此类推比的语句,也有许多后世形成了成语。《淮阴侯列传》:“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成语作“兔死狗烹”和“鸟尽弓藏”)《刘敬列传》:“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成语作“一狐之腋”)以上两句,均为三句排比,但前两句都是以他事作比喻,真正的意思落在最后一句,这样,不仅文字整齐、均匀,且使内容更加生动、明确。《张仪列传》:“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四句话皆为成语,均比喻坏事虽小,积累起来,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或指毁谤积得多了,也足以致人于毁灭之地。

司马迁极能运用丰富的想象,描写人物与事件,用夸大事物特征的手法,使表达更趋生动活泼。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怒发冲冠”形容人极怒的样子,用以夸张相如持璧盛怒的姿态,跃然纸上。《淮阴侯列传》:“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秋毫”一词,早见于“孟子”,作“明察秋毫之末”。“秋毫”是极细小的东西,说明刘邦入关以后,丝毫没有侵犯群众利益,可以“王关中”。这里以小喻大,但以“秋毫”与“货宝美人”对比,又完全是夸张。“秋毫无犯”这一成语后来用以说明军纪的严明。

有的地方,司马迁还运用了对比、对偶等修辞方法,也使语言更生动形象,如“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字千金”、“人弃我取”等,都是从两件事物或两种行为对比,鲜明地说明了问题。

此外,司马迁对于前人的语言能灵活运用,并加以锤炼,达到水乳相融,不露痕迹的境地,如同作者本人的语言一样。经司马迁运用或锤炼,前人若干词语便形成为成语。如“不可同日而语”这条成语,原出贾谊的《过秦论》,作“不可同年而语。”《史记》曾用过这句话,但字词和句式略有不同,作“岂可同日而论哉!”(《苏秦列传》),“不同日而论矣!”(《游侠列传》)。这些句子与文章中的上下文连成一气,非常自然。后来“不可同年而语”衍变为“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成语。将“年”改为“日”,时间大大缩短,更强调了两件事不能放在同一时间内相提并论。出自《战国策》的“道不拾遗”,《史记》运用了许多次,但个别字词略有改动。其中“道不拾遗”五次;“途不拾遗”一次;“郡中不拾遗”一次。这也是作者根据写作要求的灵活运用。更有意思的是,原出《墨子·非攻》的“不可胜数”,《史记》曾使用了三十多次,有时改变了个别字。其中“不可胜数”二十一次;“不可胜计”四次;“不可胜记(纪)”三次;“不可胜载”一次;“不可胜言”三次;“不可胜道”两次。这条成语的中心词是动词,使用时,将中心词改动,意思就不同了。这几个动词,意义全然不同,不能互相代用。如“费不可胜计”(《平准书》),指费用计算不完。“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列传》),这是张骞对大宛王讲的话,所以用“说不完”这个意思。《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里是“数不完”的意思。以上数例,可以说明“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胜数”等词句当时还不一定形成了成语,只是一种经常的习惯表达方式,通过后人不断使用,逐渐定型,发展成为成语,而像“不可胜 x”则是一个普通的语言格式,x 是各个具体的动词,后来凝练为成语的只是“不可胜数”。《史记》使用这些词语,使其形成为成语确实是承上启下,

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三

出自《史记》的成语,从音节数目来看,主要是四字结构,即由四个音节组成。这是汉语成语主要的也是基本的形式。古代汉语十分精练,单音节词较多,短句较多。先秦两汉的作品,四字的短句或词组所占比重较大。其实,四字一句结构并不单纯,其内容丰富,形式整齐。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主要用的四言。《史记》中,以四字结构为句子的亦很多。《淮阴侯列传》:"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货殖列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几段话,多数为四字句,除有些词句已形成为成语外,还有些词句的结构和其他一些成语也很相似。如:又危又安——又惊又喜;威震天下——名满天下等。再从《史记》中的一些词语凝炼为成语的情况看,可以说明汉语成语以四字结构为基本形式是一种规律。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成语"高屋建瓴");"后来者居上"(成语"后来居上");"家居徒四壁立"(成语"家徒四壁");"使人人自为战"(成语"人自为战");"倒行而逆施之"(成语"倒行逆施")等等。以上词语在凝练过程中,有的砍掉了虚词,有的去掉了一些不重要的或重复的实词,使其成为较整齐的四字结构。大部分汉语成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而来,所以成语的结构也继承了这一点。在语言发展中,现代汉语还不断产生一些新的成语,其中也是按四字组成的为多。《史

记》中的词语后形成为成语的，还有的为非四字结构。八字结构也是两个四字结构的组合，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有六七字乃至九字结构（但偶字为多）的有：不可同日而语；三寸不烂之舌；贪天之功以己力；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等。

出自《史记》的成语，从结构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句子：桀犬吠尧，怒发冲冠，人定胜天（以上含有主语、谓语、宾语）；奇货可居，孺子可教，死灰复燃，前功尽弃，韦编三绝（含有主语、谓语）。

二、两个句子形成的联合词组：羊狠狼贪，日暮途远，风起云涌，人给家足，土崩瓦解，人弃我取，人微言轻，知尽能索。

三、两个动宾形式的联合词组：论功行赏，善善恶恶，胶柱鼓瑟，拔山扛鼎，改名换姓，追亡逐北，拔帜易帜，舞文弄墨，取长补短，斗鸡走狗。

四、两个偏正形式的联合词组：酒池肉林，先声后实，四分五裂，因势利导，前倨后恭，正襟危坐，倒行逆施，一倡三叹，远交近攻。

五、由两个名词组成的联合词组：赤县神州，九鼎大吕，规矩绳墨。

六、偏正词组：心腹之患，丧家之狗，不毛之地，立锥之地，强弩之末，汗马之劳，一家之言，妇人之仁，刎颈之交，靡靡之音，漏网之鱼。

七、以叠字结合的词组：陈陈相因，忽忽不乐，沾沾自喜，期期艾艾，唯唯否否。

八、不×而×式词组：不劳而获，不期而合，不约而同，不寒而栗。

九、其他:决一雌雄,背水一战,运筹帷幄,招摇过市,坐观成败,以貌取人,分一杯羹,等等。

以上情形说明出自《史记》的成语,无论从音节数目看,还是从语法结构看,都反映了汉语成语的特点。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 《史记》妙笔三例

张中行

还是多年以前，我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给他们的“阅读和欣赏”节目写了几篇解说古典作品的文章，记得其中有语文课本的选文，有《聊斋志异》的故事。承编者好意，有一次交稿，问其后还打算写些什么。我一时力小而心高，未再思三思就说，聊斋故事已经写了两篇，还想写一篇，凑个事不过三；此外还想谈谈《史记》的奇笔，推想对写作会有些启发，计可以成三篇，播三次。慷慨话说过，不想编者就记在账上。然后是宛转催索。聊斋故事只一篇，比较容易，于是把菊花精黄英女士请来，协助还了愿。《史记》呢，就一直没有下笔。原因有两种。其一轻些，是广播文难写，一要变诉诸目为诉诸耳，这就不能不“白”，即浅易流利，像话；二要恰好五千字支持半小时，没有昔年制义的训练就难得应付裕如。其二重些，是我有自认为更急的文章要写，拿不出洋洋一万五千言的时间。我先是拖一阵，后来决定赖账。承电台编者体念下情，用沉默的方式表示不再催索。可是我却没有忘记这久存于心的想法，即《史记》的这类妙笔颇值得说说。还旧账，难；不如也来个妙笔，写一篇诉诸目的，大题小作，点到为止，也许压三为一，总共五千言就成了吧？于是决定写这一篇。

近年选讲《史记》的文篇，以及书，不少，其中常收的是多篇列

传,如廉颇蔺相如,魏公子,李将军,魏其武安侯,刺客,滑稽之类。这是因为,这类传中有生动的人物活动,读者会感到有兴趣。人物活动写得精彩,是文笔高妙之一证。我这里想谈的,是人物活动以外,文笔还可以主要表现自己,至少我看,那就更高更妙。想举两篇加一组为例:两篇是《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一组是多篇后的“太史公曰”,其后史书称为“论赞”的,篇数多,只举少数为例。

## 一 伯夷列传

为人立传,不管依什么法,都应该由传主写起。《史记》就是经常这样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开头是“廉颇者,赵之良将也”,《魏公子列传》,开头是“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李将军列传》,开头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伯夷列传》却不然,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为什么忽而这样不守常规?还有更不守常规的,是全篇782个字(依古法,不计标点),写伯夷、叔齐,由“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起,中间叙述兄弟让君位,互不相下,都逃走,欲投奔西伯昌(后追尊为周文王)而西伯死,路遇武王伐纣,谏而不从,周灭殷,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到“遂饿死于首阳山”止,只用二百一十三个字,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守常规必有原因,我们无妨猜一猜。一种可能是伯夷、叔齐事迹少,所以变个写法,敷衍成篇。显然,这个理由不怎么强有力,因为同样用常规,可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另一种可能是兴之所至,因而就忘了常规。这个理由也不成,或更不成,因为太史公著史,是遵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嘱,当作

“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大事做的，不会拿起笔而听任兴之所至。兴之所至的反面是有所为。为什么？这要看他于伯夷、叔齐的事迹之外，都写了些什么。我以为，像下面这样的话是值得反复琢磨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凭，依赖，态）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埋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三段，第一段意思最沉痛，是世道很坏，干坏事走运，干好事倒霉，

使人灰心;天道也靠不住,经常是好人得恶报,坏人得善报。怎么办?于是过渡到第二段,灰心而良心不能泯灭,只好洁身自好,甘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可是想到人生一世,甘于独清,究竟所为何来?于是又来个第三段,慨叹有不少隐居之士,道高德重,却没世而名不称,与草木同腐,也不免于心境凄凉。

所有这些感慨与伯夷、叔齐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有关系,是这些感慨都是伯夷、叔齐引起的。有伯夷、叔齐饿且死时作的歌为证,歌词是:

>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的主旨是对世道绝望,所以勾起同样的感慨。也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对于伯夷、叔齐,孔子的评论是"求仁而得仁",孟子的评论是"圣之清者",都是由钦佩人品方面着眼,太史公这三段却是躲开本人,大发其愤世嫉俗的议论。这有关系无关系之间,也可以挤出个骑墙但合情理的解释,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酒杯确是他人的,而借,则着重浇自己的块垒。这样做好不好?用制义的清规戒律衡量,这是放松中间的八股,而在大结上用力发挥,不合常规事小,放言无忌,会惹来横祸事大。撇开制义,评论就会是另个样子。比如用两个标准衡量,一是内容的分量重不重,二是感人的力量大不大,我们就都会承认,痛心退巽。慨叹人生,分量很重;行文一字一泪,使千载下的人诵读,也禁不住要陪着落泪。说起泪,我们又不能不想到太史公的身世,或加细说,品格、见识、抱负和遭遇。他心在天上,眼却不能不看地上,于是他愤懑,就不能已于言。这可以直截了当,于是他写了《报任安书》;

也可以借题发挥,如《伯夷列传》就是这样成篇的。这样,至少我看,这打破常规的写法就不只是也可,而是更好,因为更沉痛,用时下的话说,更有教育意义。

现在可以回到本题,看这笔法之妙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体会。一是执笔为文,要有分量重的内容。何谓重?不过是发自内心的悲天之怀和悯人之泪而已。二是文无定法,应该随着思路驰骋,有时合了常规,起承转合,可以;有时不合常规,如用兵之背水一战,也未尝不可,甚至未尝不好。

## 二 货殖列传

《史记》选本,我看过一些,几乎都不选《货殖列传》。推想原因是,内容讲古所谓食货、今所谓经济的情况,怕读者感到难,并且枯燥。我的看法不同,甚至可以夸大说,《史记》列传七十篇,如果不能都读,挑挑拣拣,不管选取多少,《货殖列传》一定要入选。理由有求知方面的,是往古的经济情况,与社会和人生关系密切,应该知道。这里只说写法方面的,是一,内容复杂,最难写,我们应该见识见识,在太史公的笔下,如何举重若轻;二是本篇想着重说的,是写柴米油盐之类的事,竟也能够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怀,富有诗意。记得果戈理称自己的《死魂灵》小说为诗篇,我多年来多次读《货殖列传》,也有类似的感觉,分着是看生产、积聚、商贾、财富、世俗、人情等等,而总的则像是读一首长诗,心情随着激荡。

何以故?先岔出去说一点点与本篇有关的意思。计有两点。其一是对本篇的评价,因为太史公没有鄙视富厚,有的人就说是崇势利、羞贱贫,不合圣人之道。孔子确是说过"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所以这样评论也不是无中生有。也有不贬而褒的,如

姚鼐说"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数",即用意不坏,理据是旧的;又如胡适作《太史公替商人辩护》,谈"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即誉为开化,理据是新的。我站在褒的一面,还想加个理由,是来于太史公的遭遇。我们知道,太史公是因为无财,不能交赎金,才不得不受腐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想,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遭遇,拿起笔,讲财富,会写些什么?恐怕开卷第一回必是子路的"伤哉贫也"之叹。我读《货殖列传》,感到有浓厚的诗意,就因为字句间总像是晃动着一种情怀,即"伤哉贫也"。再说其二,是本篇确是比较难读。原因之一是往古的许多事物,我们感到生疏。这没有补救办法,只好多见面识,求由生变熟。还有原因之二,是头绪多,难得理出个脉络。昔人也有这种感觉,如清朝阳湖派文人恽敬曾说:"《史记·货殖列传》千头万绪,忽叙忽议,读者几于入武帝建章宫、炀帝迷楼。然纲领不过昔者及汉兴四字耳。"这是大结构。大结构之下还有小结构,又各部分都难免夹叙夹议,如果用这样的目光去解析(我试做过),理清脉络是并不难的。

岔出去的话说完,接着前面说这样的题材,如何能够写得有诗意。我的体会,一种,来于用欣赏的态度写所见所闻;另一种,来于用伤痛的心情写感慨和眼泪。

前一种,人各有见,估计有的人会不同意。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我说我的。记得每次读这样的文句:

>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难解,疑有误字),夷狄益甚。谚曰:"千

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

心里就不只是得所知,而且有所感,禁不住为世道,为人生,更常常联想到己身,而深深慨叹。慨叹可以来于知;而深深,我以为,是来于作者心中和笔下的深情。

再说后一种,简直可以说不只有诗意,而就是用散文的形式写诗。如下面这些就是这样: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 非也?

表面看是推崇富厚,以至于说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亦足羞;而其实,这是抒发“伤哉贫也”的感情而至于愤激,情深,所以应该看作散文形式的诗。如果这种看法不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值得惊讶的情况,是太史公的文笔之妙,竟至于如何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富有诗意。《史记》之后,正史由《汉书》起,食货志不少,就不再有这样的妙笔,所以我们读《货殖列传》,就不免有广陵散之叹。

正如《伯夷列传》,这妙笔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这是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不枯燥,办法是注入自己的深情,以求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 三　太史公曰

如上面介绍两篇列传所说,太史公著《史记》(其实应该说著书,因为本名《太史公书》),写身外事物的时候也不忘写自己。这是因为自己有见识,有感慨,而且有悲天悯人、知其不可而为的热情,于是遇到适当时机就不能已于言。言,如上面所引,在篇什中直抒胸臆是一种形式。此外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春秋》笔法,于叙事中寓褒贬,或爱憎。以秦末刘、项争天下为例,刘胜了,项败了,太史公写,没有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俗套。而且不只此也,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写项羽败走,本来可以过乌江,图再起,至少是逃命,可是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自刎而死,这是表示,虽败死而不失为英雄;写刘邦就不然,用儒冠便溺,洗脚时见客,想尝用生父肉煮的羹,胜利了,到家乡夸耀,

还问父亲太公，自己是不是更有出息，总之是处处露出一股氓气。这是叙事之中寓爱憎。太史公究竟是太史公，这样写，还常常感到不能尽意，于是兼用亲自出马的形式，于终篇之后再来几句，标题为“太史公曰”，即后来著史者模仿，标名的“论”或“赞”的。这是见识和感慨的凝缩，总是言简而意深。尤其在太史公笔下，内容分量之重且不说，专看写法，我总觉得，最宜于用“神出鬼没”这个成语来形容。空口无凭，且看实物。《史记》多篇有“太史公曰”，只抄一点点：

> （《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
>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
> （《汲郑列传》）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看三则就可以感到,这类论赞有共同的特点,是一、简短;二、变化多;三、意深。我们都知道,如果内容不寒俭,写简短了不容易;不只篇,甚至句,写简短了也不容易。所以惯于甚至乐于写长篇长句的,应该看看这个,变变认识,讨点巧。再说变化多,是来于思路灵活。自然,思路灵活还有来源,从三教九流、古今中外吸取营养之外,还有个绝顶重要的,是不入主出奴。不奴则头脑中无枷锁,思路才可以自由驰骋,笔法的神出鬼没只能由这里来。有的人拿起笔,最先想到,也就写到,圣人曾经怎样指示,贤人曾经怎样体会,自然就欲不死气沉沉而不得了。总之,也应该看看这个,学,先求思路解放,然后才能走向风逐云团、瞬息万变的境界。最后说意深,上面已经说过,是来于有超常的见识和悲天悯人之怀。追到根柢说,文是,至少应该是,为人和心境的写照,没有太史公那样的为人和心境,想深下去是万难的。但此理是可见的,所以也就值得深思。

三例说完,想总地说几句。语云,千古文章一大抄。这里无妨退一步,说文笔的高妙,都是学来的(融会贯通以至于悟出点什么,要以学为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移用于文献必顺放大为,任何笔写的、口说的,高至图书典诰,低至泼妇骂街,其中的有些甚至多数,或取其理,或取其语句,都可以吸收而利用之(或反用,即避而不用)。皆可为师,但师有大小,有重轻,大者重者要多用力学,以求增加笔下的资本,变低为高,变拙为巧。本篇所举《史记》的妙笔,我认为应该算作师之大者重者,纵使未必是最大最重的。

(原载《读书》1992年第11期)

# 《史记》峻洁论

俞樟华

司马迁的《史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①。说这话的是晋人张辅,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对马班作比较评论的人。他的话虽不无偏颇,因为文章的好坏,不是以字句的多寡、篇幅的长短来决定的,“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谓之繁;切到精详,连篇也谓之简”,但也指出《史记》辞约事举,意多言少,文章有简洁的特点,却是有识之言。以后柳宗元、茅坤、恽敬、曾国藩、梁启超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评论,说明这是古今一致的看法。

根据张辅的意见,所谓简洁,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史记》篇幅小,反映的历史内容却很多;二是指《史记》的叙事语言准确干练,没有废话。

《史记》上起轩辕,下迄汉武,时间长达三千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道德、法律、宗教、民族、天文、地理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但这一切,司马迁只用五十二万余言就清晰明了地表现了出来,不可不谓简洁之极,精练之至。我以为这与司马迁为写史所确定的一系列写

---

① 《晋书·张辅传》。

作原则有关。因为预先确定了写作原则,做到心中有数,全盘打算,所以使《史记》的篇目设置、人物选择、材料取舍,以及着笔浓淡,一切都能有计划、按步骤进行,而没有顾此失彼、东拉西扯之弊。司马迁确立的写作原则可以概括出许多条,其中与表现《史记》峻洁美有关的,主要有下列几条。

其一,详今略古,着眼当代史。

作为识见不凡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十分懂得"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这种详近略远的作史道理。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离现实越近,关系越密切,教育和鉴戒的作用越大,越应该详细撰写,认真总结。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安排《史记》各篇,撰成一部博大思精的通史巨著,为汉武帝时代的统治阶级提供鉴戒的。在十二本纪中,先秦以前四篇,秦二篇,汉六篇,并且《周本纪》记事详于夏、殷二纪,《秦本纪》又详于《周本纪》;五帝合为一纪,秦则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汉则一帝一纪,朝代越近则记事越详。十表中,从汉诸侯年表算起,也占了六表,并且于三代则作世表,于春秋战国则作年表,秦楚之际则作月表。世、年、月三字的不同,预示了内容的由少到多,由粗到细,由略到详。在世家中,汉代勋贵十二篇;列传中,记汉代人事的有三十八篇,也处于显著地位。由此可见,司马迁以五十二万余言写三千年的历史,竟然用了半数以上的篇幅记近百年的汉代史。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上古时代的史料残缺散佚比较严重,无法详写,不得不略;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司马迁的详今略古思想在起作用,像《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典籍所载的子产、晏婴等人的事迹非常丰富,司马迁或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干脆连传都没有,这显然不关史料有否的问题,而是作者有意如此。正缘于此,才使《史记》节省了大量的笔墨。如果司马迁千篇一

律，不分主次，无所轻重地用写汉代的笔墨去写先秦史，那么，《史记》将不知要增添多少选篇，就绝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那样精悍，那样凝炼了。

其二，多用合传（包括类传、附传），减少专传，是司马迁从整体上精简篇幅的又一方法。

合传这种体裁，创自太史公。所谓合传，一般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合在一起写成的传记，它是列传中的一种，其内涵不包括列传中的类传、附传，更不包括本纪、世家两部分。但这只是后人的理解，在司马迁当时，恐无如此明确的概念和区别。司马迁对“合”字的理解，大概比后人要宽泛得多。他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有种种联系的人物写在一起，是一种合；把同类型的人物写在一起，也是一种合；他在写主要人物时，附带写了与主要人物有关系的次要人物，未尝不是一种合；即便本纪如五帝、夏、殷、周，世家如齐、楚、韩、赵、魏、晋、燕等，因为皆非只记一帝一王的，所以也有合的性质。只不过有些合传，司马迁在题目中标明了，有的未标明；有的名之曰传，有的名之曰本纪或世家，称呼不同而已。如果这个解释庶几符合司马迁的原意，那么《史记》中三分之二的篇章，都有“合传”的性质，数量之大，是惊人的。

司马迁大量采用合的形式来写人物传记，不仅大大减少了专传，而且“数人同一事，彼此互见，自无重复之弊”①，又加强了表达的效果。对此，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有高度评价，他说：“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越少越好，可以归纳起来的就归纳起来。《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若是文章技术低劣，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

---

① 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

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①]梁启超的这番话,把司马迁作合传(含附传)的作用和意义,揭示得非常明白,说明司马迁多用合传,少用专传,无论是节省篇幅笔墨,还是增强写人叙事的效果,意义都是积极的。如果当合不合,强行分传,那么结果必将适得其反。班固曾犯过这种失误,受到清人赵翼的批评,他说:"《史记·淮阴侯列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辩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者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为通作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②]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从班固的失误中,越发可见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

② 《陔余丛考》卷五。

司马迁的明智和伟大。

其三，以表代言，尺幅之间，浓缩着千言万语。

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更多更广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司马迁煞费苦心地创造了《史记》十表，用纵横朗然的表格形式，不仅提纲挈领地把本纪、书、世家、列传四种体裁中所记的内容表现了出来，而且把其他四种体裁不便记、不能记、没有记的大量历史内容也清晰地表现出来。比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分别把一百多人和七十二国受封者的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侯等内容，详细具备地表述了出来，这就大大省却了为他们各自立传的繁琐，取得了以少胜多，以表代文的良好效果。

《史记》一书，涉及到的人物有四千多个，而司马迁真正用浓笔重彩去写的人物充其量才一百多个，一般人物他均以简略之笔出之，至于那些无积劳也无显过，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又不容淹没者，司马迁只在表的适当位置上添上一笔，而不让他们在传文中出现了。所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至少有一大半是靠表保存下来的。司马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总括遗漏，使应该有记载的人物都有了记载，而且可以腾出大量的笔墨和篇幅去精雕细刻他心目中的得意人物了。如果没有表，那么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该写的人反而会被遗漏或者无法详叙。清人牛运震说："后世如南、北诸史，本纪则失之繁细，列传则伤于冗杂，虽缘纪叙不善，亦概由年表不立之故。"[①]这就从反面证明史之有表的好处，否则，是绝对不能使纪传之文做到洁而雅的。

其四，创立互见法，避免史料重复。

---

① 《史记评注》卷三。

《史记》五体彼此配合,融为一体,克服了编年体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的缺陷,而具有“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包罗万象的优点。但是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又必然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史记》记载的时间长、事件多、人物众、场面大。有时一个场面就会牵涉到众多的人物,联系到各个方面,这些都不是一纪一传所能全部概括的。比如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参加的人成千上万,其中的主要角色也有数十人,即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场面,如鸿门宴,也涉及到项羽、刘邦、张良、樊哙、项伯、范增、项庄等多人。假如作者写史,将这些在每个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加以叙述,那势必造成文章的重复冗杂。反之,如果只在某一传中加以叙述,而在其他传中忽略不提,那也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历史,同时也无法体现传主的全貌。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恰到好处地处理历史材料,司马迁创立了互见法。也就是说,他把某一重要事件集中写在此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传中,而在其他相关的传中记得比较简略。如鸿门宴事以《项羽本纪》记载最完整,但在高祖、留侯、樊哙等纪传中也予以提及;诛诸吕事以《吕太后本纪》记载最详细,而在孝文、陈平、周勃等本纪、世家中也有说明;吴楚七国之乱事以《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最具首尾,但在周亚夫、袁盎、晁错等有关此事的十几个篇章中也作了简略交代。司马迁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使历史事实有头有尾,集中明确,减少重复累赘,而且经过互见法的穿针引线,使五体连为一体,唤起读者不要把每篇纪传孤立起来看,而应该联系它篇来考虑问题。

对于互见法的这个功用,朱自清先生曾有精辟的分析,他说:“一部《史记》包括若干人物的事迹,这若干人物的事迹,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项目,若把每个人物的事迹,都叙述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必然有若干重复或雷同,就整部书看起来,便是浪费了许多可

省的篇幅。所以作者把这些共同的事迹,叙述在关于主角的篇章里,同时连带叙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物;而在关于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便节省笔墨,单说一句'见某篇'了事,有时连这一句也省去了。这叫做互见,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重复。"①虽然互见法的意义和作用不限于此,但是司马迁创立互见法的初旨,的确是从避免史料重复来考虑的。因为司马迁有效地实现了这个写史原则,所以大大增进了《史记》文章的峻洁程度。

其五,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注意详细描写历史事实和人物轶事,而对时人的各种文章,包括帝王的制册诏令等等,一般不予著录,这是司马迁写史的又一条原则,也是节省篇幅的有效手段。对此,他在《史记》中曾作过反复交代,如《管晏列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司马穰苴列传赞》曰:"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孙子吴起列传赞》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相同的话还见于《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及《乐书》。对司马迁的这种做法,后人是持肯定态度的。赵翼说:"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②牛运震也认为,"王诸吕,诛诸吕"是《吕太后本纪》一篇的大关键,为了不使其他事与王吕危刘之事相杂,像《汉书》所载的军国政令、妖祥水旱等事,《史记》都"略而不载",这不是司马迁的疏漏,而正是《史记》

① 《史记菁华录》附《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

② 《廿二史札记》卷一。

“明于体要”之“洁”。①

当然,司马迁也不是绝对不录文章,只要写人叙事确实需要,他经过严格筛选,仍然著录了一些文章。《屈原贾生列传》中,于屈原,载了《渔父》和《怀沙》;于贾谊,载了《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其他作品均加以割爱。编述历史著作而滥载文章,这是从班固以后形成的流弊。把诰令文章连篇累牍地引进纪传之中,既多且滥,对于保存历史文献固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冲淡情节,损害人物形象的很好塑造。司马迁定下传其事而不载其文的写作原则。不仅有利于情节集中紧凑,而且极大地节省了笔墨,故深受后人赏识。

其六,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司马迁写人,不作流水账,不填履历表,也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喜欢抓住有关治乱盛衰的大事和人物一生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言行作绘声绘色的描写,将那些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史料删除得干干净净,这样就避免了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出轻重主次的毛病,提高了文章峻洁的程度和表达的效果。对这个写作原则,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曾有明确的表示: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是就写张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王者师的传记而言的,同时也是他写一切历史人物所遵循的普遍原则。他写张良如此,写萧何也如此。近代曾国藩说:“萧何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却皆从没要紧处着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②因为司马迁善于抓大事、抓关键,所

① 《史记评注》卷一。

② 《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以《史记》每篇人物传记，无论长文还是短篇，用笔都很精，用例都很少，而且很典型，常常能以一当十，给人的印象特深。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写人的原则是记大事为主，这个大事，一方面指那些大事件、大场面、大动作，另一方面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实际上却能展示出人物的本质特征的细节故事。像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韩信甘受胯下之辱、陈平为乡党均分社肉、李斯见鼠而叹、李广射猎中石没镞、陈涉的鸿鹄燕雀之比、张汤的劾鼠掠治、平原君的矫情杀妾等等，对表现人物的思想、行为、性格、神态等都极为有用，可以起到点滴之水见太阳的巨大作用，所以司马迁毫不吝惜笔墨地作了委曲详尽的生动描绘。而且这些内容，以后成了《史记》人物传记中最具特色、最有风彩、最感动人心的内容。写一些事情小而意义大的故事，这并不违背“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的原则，反而使这个原则表述得更完美、更全面。

清人魏禧在《日录·杂说》中指出：“东房（即魏际瑞）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删，此可得学简之法。然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便省却多少笔墨。能删题，乃真简矣。”这里的删意、删题，是指内容上的提炼，删字、删句、删篇是指形式上的删改，而删题、删篇则是一种最大的熔裁工夫。熔裁工夫越到家，精练的程度就越高。我们上面讲了司马迁写史的六条原则，司马迁之所以采用这些原则写史，目的就在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去掉那些可有可无的题目，就省掉了许多可有可无的篇章，从而为文章的峻洁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迁这一步显然已如期达到目的。但是要使文章真正达到雅而洁的最高境界，删意、删题毕竟还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得看作者在具体行文时，运用语言的本领如何。司马迁的

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娴熟自如地驾驭丰富的语言来为他的写人叙事服务,并且做到既生动,又简洁。

"文章惟叙事最难"。写历史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把各种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际关系清楚明晰地叙述出来。《史记》一书,上下几千年,举凡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及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司马迁都从容自如地把这些千端万绪、纷纭繁杂的社会历史人事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晰明了,达到了各得其所、各臻其妙的地步。这也是《史记》文章之所以峻洁的主要原因。比如陈涉、吴广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一时是多少侯王将相,起者匆匆而起,立者匆匆而立,遣者匆匆而遣,下者匆匆而下,畔者匆匆而畔,据者匆匆而据,胜者匆匆而胜,败者匆匆而败,失者匆匆而失,复者匆匆而复,诛者匆匆而诛,散者匆匆而散。有六月内结局者,有六月内未结局者,有六月后续出者。种种头绪,纷如乱丝,详叙恐失仓卒之意,急叙又有挂漏之患,岂非难事。乃史公却是匆匆写出,却已一一详尽,不漏不支,不躐不乱,岂非神手!"①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不仅是写陈胜、吴广的性格、功绩,而且是要写与陈涉同时而起的农民起义的各路英雄,但当时事变仓促,人物又多,千头万绪,五花八门,此中安置,颇觉棘手。司马迁却能用简洁的语言,把当时匆忙起事,纷乱复杂的事件写得十分清楚,使农民起义当时那种一哄而起、杂乱无章的情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把错综复杂,乱如丝麻的历史人事条分缕析地叙述清楚,这只是促进文章峻洁的一个因素,为了使历史文章提高峻洁的程度,还必须在写人叙事时,力求用字准确,生动传神。司马迁

① 《史记半解·陈涉世家》。

在这方面曾作了积极努力，他的叙述语有时虽然只有一两个字，但却不仅准确传神，且富有韵味，几乎是一字千金，不可更换。《外戚世家》在记叙窦皇后和其失散多年的弟弟窦广国相见时有这样一段话：

> ……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这里一个"助"字，用得妙不可言。一个"助"字，把当时在场诸人的心理神情以及当时的场面气氛表现了出来。悲哀虽不能助，然而舍却"助"字，又能用哪个字来替换呢？这里是在叙事，但同时也兼有写人、抒情之功。难怪清末林纾对此特别激赏，说："苟令窦皇后见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①

为了使文章峻洁无瑕，不枝不蔓，司马迁写每篇人物传记时，都先确立一个中心，然后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去选材行文，这样一来，每篇作品的主题都很鲜明，形象也很突出。如《吕太后本纪》，司马迁不是按照人物传记的要求，完整全面地记述吕后一生的功过事迹，而是像后世小说的写法那样，为突出吕后和刘氏宗室及功臣元老之间的矛盾冲突，即"王"这个主题进行选材的。吕后一生可叙写之事甚多，司马迁并非事无巨细，兼收并蓄，而只截取她在刘邦死后十五年中行事，关于刘邦生前的许多事情，包括杀韩信、醢彭越、哭谏刘邦亲征黥布等，都没有细写。而对这十五年中

① 《春觉斋论文》。

发生的众多事件,又做了严格取舍,精心安排,该取则取,该舍则舍,该详则用墨如泼,大写特写;该简则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凡是与"王"无关的史料,即便是国家大事,作者也忍痛割爱,或写在其他篇章,或惜墨如金,只作简单交代。但对吕后残害刘邦诸王子的事实,却不厌其详,三番四复,仔细叙写,大肆渲染。这样,文章的主题就既集中,又鲜明,脉络也异常清晰,尽管牵连而叙的人物极多,却没有东枝西蔓、旁行斜出的弊病。

总之,为了保证《史记》文章既峻洁又明晰,既生动又传神,司马迁在写史前,设立了种种规矩,有效地保证了峻洁原则的实施;写史过程中,又十分注意用字准确生动,选材集中紧凑,疏密相间,详略得宜,从而在语言风格上,自成一家,并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典范。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 《史记》与神话传说

## ——《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侯忠义

《史记》是我国最杰出的史学著作,又是最杰出的散文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性。《史记》的文学特征,主要表现在叙事和写人物两个方面,而这种文学特色的产生,又与《史记》的取材有着密切关系。《史记》材料来源之一是先秦与当代人的著作。比如,《史记》通过不同形式或手法,大量吸取了先秦以来的神话传说作素材,为《史记》的艺术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对此,下面略作论述。

## 一　司马迁的艺术追求——爱"奇"

《史记》叙事,多含异闻,使文章增色不少。《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表示对这两部书中的"荒诞无稽"的"怪物"不敢录入历史,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内容不可证、不可考,不能算作"信史"。但从这段话来看,司马迁是把这两种书当作地理书看待的,与他一贯的"疑则阙之"的严肃、认真态度相一致。

但这并不等于说,凡是怪异不经之事司马迁均不入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就以上述二书而言,其中不少内容也并非就没有采入《史记》。问题是如何使用材料,或要说明什么问题。司马迁善

于用神灵怪异材料入史,以表示个人爱憎,这正体现了他爱“奇”的特点,也是《史记》的写作手法和创作原则之一。这其中不仅包括古代和当代人的传闻轶事,也包括上古的神话传说。《史记·高祖本纪》中言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就是有关当代人的一个怪异的传说。《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日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为了证明刘邦的高贵不凡,司马迁竟也同意将这样一个编造出来的并不新鲜的故事,放入“本纪”中,可谓败笔,说明他也不能免俗。

但在《刺客列传》中言及燕国太子丹质秦求归的怪异情节,司马迁表示了理所当然的排斥。他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①]说明他对传说异闻的采录是实事求是、有一定标准和原则的。同时,作者不仅不排斥美丽的神话传说,而且把它们经过加工、修饰后入史,增强了《史记》上古史部分内容上的生动、活泼,以及形象性、故事性,总之,增加了《史记》的文学色彩。

就司马迁提到的《禹本纪》、《山海经》这两部书来说,《禹本纪》早已亡佚,不详其情;而对《山海经》的态度,只不过是表示不取书中不可信之“怪物”,并不是指其书的全部,《山海经》中的某些神话,就在《史记》中得到了印证。治小说者如明代的胡应麟视《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②],是我国小说的源头;博物者如清代孙星衍单见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③];近人王国维从中发现

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

③ 《山海经新校正后序》。

了帝俊的材料[1]。《山海经》是旧籍中保存神话材料最丰富的一部书，它包括了上古历史、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内容。在神话入史的过程中，司马迁既舍弃了怪异不经之文，同时也采录了可靠、可信、可托的“奇事”，并加上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氏族社会里的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等人，又怎么会变成五帝呢？

## 二 神话传说入史的原因与情况

神话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民间文学样式，属于口头创作，它以幻想的形式，经过不自觉地艺术加工，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实际上，神话是上古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的反映。神话富于情趣和幻想，使文学艺术靠了它才显得美丽和年轻。而历史著作《史记》，由于采取了部分神话传说入史，也同样使《史记》显得生动和感人。先秦以前的历史，就是依靠对神话传说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博采众家之长，才能构成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的上古历史。由此可见，神话既是文艺，又是历史的影子，它是“历史上突出片断的记录”[2]。这就是神话传说所以能转化为历史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神话传说转化为历史，是由它的深广社会内容作为前提和条件的。

例一：关于黄帝与炎帝、蚩尤的事迹。

在氏族社会中，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但也不断发生战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

---

① 《古史新证》。

②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场平原大战,黄帝得胜。他所教战的士卒,以六种猛兽之名名之,用来威胁敌人。有人认为这六种是真猛兽,黄帝教以参战。也有人认为六种猛兽代表六种图腾的氏族以会战。总之,战争是因掠夺而起。恩格斯说:“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史记》的这一条记载,就是根据传说写成的。

在晋、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九黎部落,他们的酋长叫蚩尤。炎帝、黄帝部落曾与蚩尤的九黎部落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黄帝战胜了九黎,蚩尤被杀,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

司马迁改造了这个神话,删除了神话中的应龙、风伯、雨师、魃(旱母)等怪异内容和荒诞情节,变成了一段正式的历史记录。我们不妨作一比较:

>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

例二:关于共工的事迹。

共工是西北方的一个部落的酋长和领袖。曾有人提议由他

---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来做尧的接班人,遭到尧的反对。尧曰:“共工善言(花言巧语),其用僻(好搞邪门歪道),似恭漫天(貌恭实傲),不可(不可用)。”《五帝本纪》的这条记载其实是从《神异经》有关共工的神话脱胎而来的。《神异经》曰:“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鬓、蛇身,人手足,也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这似乎是一个落后的未开化氏族的形象。其实这里的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否则也不会有人推荐这个部落的领袖作尧的接班人了。

在鲧、禹治水之前,尚有共工治水之事。《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迫近)空桑。(地名,在今山东)”可以说没有治好洪水,洪水依然泛滥。故《史记·五帝本纪》曰:“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淫辟”即指没有治好洪水。《五帝本纪》:“请流共工于幽陵(即幽州,今北京),以变北狄。”把他流放幽陵,结果使他成为北方部落的酋长。司马迁将神话、传说、史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充满魅力的上古史。

例三:关于少昊氏的传说。

黄河下游一带有太昊氏和少昊氏,太昊氏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氏在奄(今山东曲阜)。在神话中,少昊氏部落中有不肖子孙,他像一只生翅的猛虎,能在天空中飞行,懂得人间语言,食人及鼻,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此事见于《神异经》的记载:

> 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替,辄杀兽住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除地区与《史记》不符外,关于少昊氏部落中的穷奇,在《史记》中

删掉了荒诞不经之处后,成为较为精确的语言:"少昊氏有不才之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

由此可见神话与史的关系。

例四:关于启的事迹。

启是大禹与涂山氏的儿子。关于他的出生,有一段神话传说,见于《楚辞·天问》宋洪兴祖补注所引《淮南子》。但引文不见今本《淮南子》。原文如下:

>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禹治洪水时,变作一头熊,像掘土机一样去打通轘辕山。其妻涂山氏来送饭,见状而羞,跑到嵩高山下变作石头,这时禹又变作人追来,大呼:"还我儿来!"于是石开,生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自称石生,无父母,大约也是受了这个神话的影响。《史记》用了这条材料,但却没有禹变作熊与涂山氏化石等怪异情节,而言:"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终于把神话变成了历史。

正确地对待神话和传说中的史料,鉴别其中的真伪,从中看到历史的轨迹与影子,这是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做出的杰出贡献。

## 三　神话传说入史的内容、特点

具体地说,《史记》吸取的神话传说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

下三个方面：

1. 反映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生活，包括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共工治水等。这部分内容我们不再举例。

2. 介绍各民族产生的历史，尤其是刻画了各民族祖先的形象，这种神话入史使《史记》产生了巨大的传奇性。

3. 讴歌了帝王或圣人的生平事迹和英雄行为，这种传说入史，增加了《史记》的故事性、趣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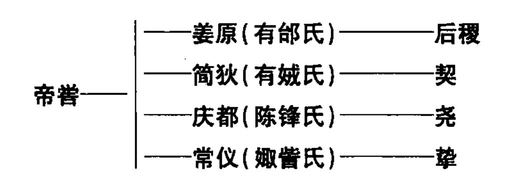
除第一项内容已作了阐述外，下面我们分别介绍第二、三项内容。

第二项，关于各民族形成的历史。

神话入《史记》最典型者，莫过于商、周、秦等民族产生的传说。《世本·王侯大夫谱》记载了帝喾的世谱：

> 帝喾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

图示如下：




帝喾娶了四个妻子，各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分属四个氏族。这个传说并非事实，也不可靠，尤其是为传说中的契、后稷找到了父亲，更是荒唐的。但却被《史记》意外地承认了下来，并将他们出

生的美丽动人的神话带到《史记》里,令人动情。

如后稷,乃周民族的始祖。《史记·周本纪》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诗经·生民》作"姜嫄"。契,为殷(商)民族的祖先。《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尧、挚这一对兄弟都是帝喾的接班人。《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即尧);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部落联盟罢免了表现不佳的挚,而推举了受人爱戴和拥护的尧,开创了上古时期的圣世。司马迁即根据神话传说,给我们描画了那时灿烂的历史图景。

关于周民族的产生过程,在《史记》中,同样是一个优美的神话,这是令人惊异的。这个神话的来源,就是《诗经·生民》。《生民》中记载了后稷出生的神异,他是因其母姜嫄踩到了巨人的脚趾印而怀孕的,是无父之子;出世后被其母所弃,受牛羊、草木、鸟兽的保护得以生存下来。幼小时即有从农之志,长大后果为农师,封于邰,成为周民族的始祖。《史记》几乎全部接受了这个神话,把他记载在《周本纪》中:

>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大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
>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

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记叙生动、合理,将后稷的身世,略略染上神奇与人间悲剧交融的色彩,极为浪漫。

关于商(殷)民族的传说。

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民族的先祖契,就是那个吞了燕子蛋而受孕的简狄之子。据说他曾因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他作了掌教育的官(司徒),封于商地,即后来的陕西商县。后成汤灭夏,建都亳,即今河南商丘;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故商又称殷。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关于商祖出生的天真烂漫的神话,司马迁不觉得怪异。其实这样一个关于民族兴起的解释,也并不坏。《吕氏春秋·音初篇》记有娀氏有两女:长叫简狄,少叫建疵,共居九重高的瑶台上,每餐必敲鼓作乐。有一天,天帝打发一只燕子来看他们,俩人竞相捕捉,抓住后,燕子生了两个蛋,都叫简狄吃了,于是有了孕,生下的儿子就是契。但司马迁用的是另一种说法,即简狄与另两女郎在河里洗澡,看见玄鸟(即燕子)从天空堕下一个蛋来,简狄吃了,于是就生下了契。《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神话的目的只有一个,殷商民族是天帝派玄鸟下来留传的后代,所以契又被其后代子孙称为“玄王”。这个神话故事反映了商民族是以燕子当作自己民族的图腾,也反映了商族在契以前,还未脱离母权制的历史阶段。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

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史记》中关于秦民族的形成的记载,亦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秦民族的祖先是颛顼的后代,在辅佐大禹治水的人中,有一个叫柏翳(或称伯益)的,因治水有功,被舜赐"嬴"姓。他就是神鸟燕子的后代,他的父亲就是鸟卵所生。《史记·秦本纪》:

>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或称伯益),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仲衍,鸟身人言。

伯益仍未能脱尽鸟形,而连他的玄孙,仍然是"鸟身人言",可见神话色彩之浓烈。这个神话的出处,我们不详,但可以肯定秦民族开化最晚。此时,后稷早就从事农业,而他们却仍然从事畜牧业呢!

以上所言三个民族诞生的神话,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三个民族的祖先形象,富有情趣。司马迁选取材料的重点是符合每个民族的特点,他把"历史的影子"变成了历史,尽管这种历史任何人都可以不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即信史来看待。但人们宁愿去听它、信它,因为它在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带来了极大的传奇性。

把本来是历史的空白,变成了形象、具体生动的事实,使历史增加了神话般"永久的魅力",这就是《史记》的贡献之一。

第三项,关于圣人(或帝王)生平的事迹。

一，关于舜的传说，就似一篇英雄人物的传记。《史记》记舜的内容，异常丰富，情节曲折，极富故事性。文中通过细致的描绘，刻画了一幅忠厚、勤劳、忍让、孝悌又有天命的圣人形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史记》的成功，当然借助于传说的力量。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舜，司马迁首先刻画了他的为人，即品质和性格。舜性格的特征之一，是忠厚、忍让。舜父顽是个盲人，舜母死后，顽续娶嚣，生子象，名傲。其父愚蠢、贪婪，爱后妻及其所生子象；后母蛮横、无理，挟制舜父及其行动；异母弟狂傲、颟顸，常欲杀舜，夺其财产。然而舜不失为子之道，兄弟孝慈，“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懈怠）”。表现了一种愚忠、愚孝的儒家思想和品格。

舜有杰出的才能，是他品格特征之二。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备受四方部落首领称赞，于是尧就把二女（《史记》无名，《烈女传》曰：“娥皇、女英”）一起嫁给了舜，并赏赐舜稀衣（细葛布衣）、牛羊与琴，为他修建了谷仓和粮囤。二女为舜治家，兢兢业业，从不娇贵，侍奉瞎公公、刁婆婆、混弟弟，甚有妇道。

尧为考察舜的政治才干，派他到民间，与百姓相处，以观其政迹。由于舜注重道德教育，善于用心灵感化和模范行动影响别人，使历山农民不再为田界纷争，渔民不再为渔场械斗，陶工不再为质量发愁。百姓安居乐业，所居村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一个普通的乡村，三年就成了大都会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说明舜的政绩之卓著。

以上传说，还见于《尚书·尧典》、《楚辞·天问》、《孟子》、《烈女传》等记载，但司马迁尽可能去掉了其中荒诞不经的情节，加以改造后，录入《史记》之中。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通史》载舜两次被其父及弟陷害而脱险事：

> 瞽叟使舜涂廪，舜告尧二女，女曰:“时其焚汝，鹊汝衣，裳鸟工往。”舜既登廪，得免去也。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龙工往。”入井。瞽叟与象下土实井，舜从他井出去也。

在舜修廪、下井劳作之时，其父与异母弟用放火、填土等手段欲置舜于死地，幸得二女相救，穿上绘着鸟形和龙形的衣服，实际上是化作鸟和龙，逃脱了此难。《史记》虽未载其事，却记录了舜的最后胜利:

> 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禀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

这是多么有趣的情节，感人的形象。舜父、弟以为他们的阴谋得逞，于是瓜分舜的财产，象以主谋者的身份索要舜二妻、宫室与琴;其父分得牛羊、粮食。这就是他们屡屡害舜的根本原因。未料好景不长，舜并未死去，也不报复，而是感化其弟象，其实就是驯服野象，后象被封为“有鼻”，亦具象的特点，就是一证。

司马迁吸取了传说中合理的部分，剔除了荒诞无稽的内容，用儒家忍让、勿施恶的仁义思想，塑造舜的形象，也就是仁者、圣者的形象，是极为成功的。故事曲折有趣，生动感人，在利用传说方面，达到较高水平。

二、关于孔甲的传说。夏朝开国之君为禹，继位者是涂山氏化石而开的儿子启。《山海经·大荒西经》说他“珥两青蛇，乘两龙”，也算是一个有神性的英雄。他还三次乘巨龙上天，把天上的

音乐“九辩”、“九歌”偷到人间，改为“九招”，又叫“九韶”。

启把王位传到十多代，到了孔甲的手里。《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饲)，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驯)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这段引文，只能说是“异文”，实不可信，只有部分的真实影子。如“天降龙二”，哪来的天？至于什么叫龙，谁能说得清？而且还是一雄一雌，更是稀奇。因不善养，孔甲派人找到刘累，因他在豢龙氏那里学过几天养龙术。他是尧的后代，现在衰落了。因孔甲宠幸他，故赐名“御龙氏”。结果当他把因他饲养不善而死去的一条雌龙，作成菜给孔甲(夏后)吃后，孔甲颇觉味美，还继续索要，刘累当然拿不出来，又怕发现真相，只好逃之夭夭了。

孔甲是个无能之辈，天赐二龙而不能养；孔甲又是个贪婪之辈，食一不足而求之继。这个堕落、无能的统治者，垮台是不言而喻的。《史记》就在记载孔甲这个简单的生活片断里，插进传说或异闻的成分，使孔甲这个人的无知、暴虐、盲目、轻信、放荡、荒淫，都表现得很充分，也很有趣。

三、关于黄帝的一条传说，是说他得道成仙的。黄帝是五帝之首，说他是天帝也可以，但附着在他身上的神话传说，却是绝对的不是史实。如《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此是黄帝开采铜矿铸鼎，以作为战胜蚩尤的纪念。“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仍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本来就是天神，故龙来迎他回上天，这是司马迁采传说而入史之例。《封禅书》即使不是司马迁所作，亦属汉人的作品，

也可以看到神话入史的情况,甚富情趣。本来上古历史简而无趣,如此写来,生动多矣。

神话传说入史,就其内容来讲,即如上述三项;就其特点与作用来说,首先是弥补了上古史的空白。司马迁把神话传说经过比较和鉴别,剪裁和加工,基本上可以当作信史看待。

在艺术上,由于神话传说入史,使《史记》的叙事富有故事性、传奇性,使人物增加了形象性和感染力。这就是《史记》所以具有文学性的原因之一。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 《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

可永雪

对《史记》的比较研究，古已有之，如南宋倪思的《班马异同》、刘须溪的《班马异同评》、明代许相卿的《史汉方驾》，就是这方面的著作。这三部书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属于下袭性比较，即把《史记》与在它之后，依据它改写改编的《汉书》进行对照比较。然而，在我看来，觉得作这种比较更有意义的是上溯性比较，即将《史记》与在它之前的、《史记》所据以为素材的有关典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吕氏春秋》等等加以比较对照更有意义。吴汝纶说："班氏之录《史记》，其文能变易者盖寡，好事者犹列其异同为书，承学之士有取焉。若《太史公书》变易《左氏》，尤可观省，非班书比也。"(《桐城吴先生文集》卷四《记太史公所录左氏义后》)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还是仅就一部《左传》说的，如果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所有重要著作都拿来加以比较那又将如何呢？

可惜，这种重要的溯源性比较研究未曾发展起来。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倪思除有《班马异辞》(按：即《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外，还有《迁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明吴广霈在题记中称之为《古书异辟》)。陈氏解题介绍此书内容："以迁史

多易《经》语,更简言为平易,体当然也。然易辞而失其义,书事而与《经》异者多,不可无考,故为是编。《经》之外与他书异者亦并载焉。”看来是属于溯源性比较,但久已失传,后来未见继起者。“五四”之后,偶尔有人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也只是就个别篇章发过一些单篇论文,没出现过像《班马异同》那样,逐字、逐句、逐篇进行对勘比较的专门著作。因此,我们下决心来弥补这个空缺,开辟这项上溯性、探源性的对照比较工程。

我们之所以情愿花精力下一番笨工夫来搞它,是因为我们从已经获得的进展和瞻望前景中看到并且深信:这项工程一旦完成并且完成得好,就将既可以为学术界从史源学、从历史学、从文章学、从历史语言学以至古文今译等多方面多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凿凿可据的坚实基础;又可以为自己从文学角度、从再创作角度、从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角度进行研究铺下一条平平展展的道路。

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下笨工夫的工程,是因为要进行这个对照比较,需要尽可能找到所有《史记》据以为素材(乃至考证过的)有关载籍,拿来和《史记》逐字逐篇,一本一本的比勘对照。这当中自然有重点,重点我们选定《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几部,但一经着手就发现,要想穷源竟委彻底搞清问题,就非把《史记》据以成史的所有典籍资料都找到不可。

倪思的《班马异同》,为了达到比较的目的,精心设计和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实用的体式:“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相卿的《史汉方驾》,在体式上进一步有所改

进，它“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于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于左”（同上）。这样更觉条理井然。我们今天的符号、字体等手段，比宋、明时代发达多了，这就可以使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设计和寻找到一种更为科学也更为显豁的比照方式。我们拟定的方案是将《史记》与它所依据的素材——比如《尚书》、《左传》等，分两栏平行排列，《史记》用印刷体，所据素材用楷体，凡被《史记》采用，与《史记》相同处也改为印刷体，《史记》取其意而变其文者改为仿宋体，遇有必要再辅以着重号、删节号等其他符号。总之，务必使哪是本源，哪是参照，什么地方同，什么地方异，能够一目了然。

倪思的《班马异同》影响较大，以至后来形成为《史记》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不过认真说起来，就对《班马异同》所提供的基础和成果的利用这一点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它之后，只有刘须溪的《班马异同评》利用它的对照成果，着重从文章和文学鉴赏两方面做过进一步的开掘和研究，写出了专书，其他方面，比如历史学、语言学等等，就没把《班马异同》所已经提供出来的成果和潜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出来。总之一句话，以《班马异同》为基础进行第二次深加工的工作也并没深入展开。如今时代不同了，比较学以及比较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我们相信，在今后对《史记》的研究中，比较研究，特别是上溯性的研究将日益兴旺。

我们的这项上溯性比较，刚刚开展不久，自然还拿不出结论性成果，但在比勘对照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譬如原来读《五帝本纪》，知道司马迁对孔子所传《五帝德》、《帝系姓》十分重视，可是因为并未找来对读，终究不大明了其所以

然。这次通过比勘对照才清楚:一、原来《五帝本纪》就是以《五帝德》对五帝的评赞为基本评价,以《帝系姓》所述世系作为框架,再纳入和充实《尚书》、《左传》、《孟子》等有关史料组织而成的;二、原来引起人们纳闷的对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各有一段高度抽象、高度概括性的赞辞,就是出自《五帝德》,是孔子对五帝所作的评赞,无怨这几段评语和赞辞都是一种模式,一样口吻了!可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种高度抽象、高度概括性的赞辞和评语是什么时候出现并形成的?是孔子时代吗?那为什么到了汉代才由戴德在他所著的《大戴礼》写定?而这一问题在进一步与《尚书》作对照时便寻出了一些端倪,因为在《尚书·尧典》开头就有一段"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赞语,而《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尧的赞辞,就正是由《五帝德》和《尧典》的两段话揉合而成的。

又譬如《五帝本纪》写舜的事绩,其中舜举八恺八元的事,经查是取自《左传·文公十八年》史书对鲁宣公问中谈论古史的部分。查到这里我们由衷地为司马迁能从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史书中发掘和利用其古史材料的才识击节,并从中体悟到司马迁撰史,超越《尚书》"独载尧以来",断自黄帝始,这样他就为自己出了难题,就不能只依据《尚书》等已有的现成史料,而要千方百计搜集和发掘一切有用的古史资料,以至把史书这类学者谈论古史的材料都运用起来,这份苦心着实可钦。

在比勘对照中,我们发现,《史记》的大多数篇章,基本上属于历史编纂,就是说主要是把史料素材按照《史记》的体例主旨重新编排,加以转录或转述;但有的篇章或有的人物事件却进行了文学再创作,即进行了加工改造、有所删削增润、艺

术想象。

那么《史记》的作者对于哪些人物事件特别发生兴趣，易于动情，并且激起艺术创作的欲望呢？从对照的情况看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那些具有非凡性、特异性、传奇性，具有动人的艺术内蕴而原作却未能予以充分表达的人物、故事。例如《五帝本纪》中虞舜孝亲的故事、《孔子世家》的夹谷之会以及《伍子胥列传》等；一是那些在思想和遭遇上和司马迁的体验有某种相契合之处的人和事，例如伍子胥"隐忍以就功名"，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等；一是那些带有故事传说性的人物事件，例如《司马穰苴列传》中司马穰苴立信树威斩庄贾的故事，《孙子吴起列传》中孙武为吴国阖庐练女兵的故事，孙膑教田忌重射、围魏救赵、减灶灭庞涓的故事，以及吴起杀妻求将、吴起为卒吮疽、吴起与魏武侯论"在德不在险"、与田文论功的故事等。这类人物故事，由于具有传说性质，所受原作的拘囿较少，创作上的回旋余地较大，更易于见精彩。再创作的结果，一般来看，加工的成分越多，创作的因素越重，作品的文学意味也就越浓。

在比照中我们还发现，《史记》的一些传记、一些再创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具有"定型"的作用。其中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是无论其原始史料出自正史、杂传或传说，也无论其记载是主是次、是详是略，在原作当中总是侧重记述或表现人物的某一个或几个测面。而司马迁作传时，多方搜集、务期齐备，材料上既集其大成，内容上又采其精粹，再加上他自己的熔铸创作，这样所写出来的人物事迹就更为全面，形象更为完整，功业品德的评价也足以和人物本来的精神面貌相称，这样的结果，他所写出的人物自然得到人们的共赏和认可。于是乎后人在谈论或称引这个人物时，便总是以《史记》为据，原有的典籍不论是存是亡，反而被忽

略了。比如帝舜,《史记》是依据和采择《尚书》、《大戴礼》、《孟子》、《左传》等书的史料写成,并参考了《尚书大传》、《淮南子》、《韩非子》等等。从舜的世系、出身、家庭环境到他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贩寿丘的经历,帝尧对他的发现和考验,再有他表现出的使耕者让畔、渔者让居,以及“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品德才干,举八恺八元、放四凶、任二十二贤人的功绩都写到,最后还写了他践帝位、南巡狩和崩、葬之地……可以说是够全面够完整的了。还不仅如此,关于舜孝亲的故事,《尚书·尧典》最初记载还较简略,《孟子》据《尧典》和传说进行了再创作,已是相当详细和生动,不过在情节方面还有某些缺漏。《史记》就以这两种素材为基础进行了再一次的加工再创作,特别突出了舜以仁德化感顽邪的博大胸怀,从而使得帝舜的形象更加深刻和光辉!再有《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的事迹,原散见于《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扬子法言》等书,而且其中吴起杀妻、出妻的事就有几说,而司马迁就凭这些零散资料,经过综合整理,不只编织出了吴起完整的传记,而且为吴起塑造出一幅性行狠戾、才智超群的军事家和政治改革家的鲜明形象,成为后人认识吴起的标准。

另一种是对于传主的为人和事迹,传闻异辞,评价不一,其中有一些是误传或误识。司马迁在写这类人物的时候,总要经过潜心的考察、分析、取证(或是知情人、或是文字著作),弄清底里,然后还其本来面目。从此,人物的真实形象被确定下来,原来的一些误识或误传也便销声匿迹。比如李斯这个人物,他被腰斩的当时以至到司马迁的时代,社会上有好多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认为他死得是冤枉的,是胡亥害了他,但司马迁经过一番寻根究底的本质性考察,从李斯一贯的性格发展和他关键时刻所上

《论督责书》等等,揭示出李斯虽有极高的才干,但在道德上却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不惜出卖灵魂的小人。这样,《李斯列传》就为李斯定了形,从此也就再没有人说他是极忠、为他喊冤了。还有荆轲刺秦王究竟刺中没刺中的问题,也传说不一,自从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披露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得到当事人夏无且的第一手材料后,这件事情也就铁定了。

再有一种,像《伍子胥列传》,主要依据《左传》、《国语》有关记载伍子胥事迹和吴起关系的史料写成,同时参用了《谷梁传》、《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部分材料。在传记当中已经为伍子胥树起复仇英雄和耿直忠谏的忠臣形象,而且相当强烈和感人,但是由于作者有意省略某些内容,特别是对伍子胥逃吴过程所经历的艰险和磨难表现得不够充分,因而使读者感到有某些“不满足”。再加上后来吴地的一些作者写出了《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两部著作,于是便出现《伍子胥列传》是把伍子胥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也基本定格了,但却没能“定于一”的现象,以致后来戏曲《过昭关》、《伍胥吹箫》都有一些超越《伍子胥列传》的内容。

还有一种就是《孔子世家》,司马迁是怀着无限景仰之情来为这位“至圣”作传造像的,传记也确实把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代儒学宗师的风采给写了出来,虽然这一形象还不能说十分理想,但算得上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然而由于孔子这个人太伟大了,他的人格和精神内蕴之崇高、深邃,当然不是一篇《孔子世家》所能传达得出和包容得了的;同时,有一部《论语》在,它的光辉,便是任何鸿文伟传都难掩的!因而,《孔子世家》不足以为孔子的形象定型,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研究的设想、方案、试点,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思路,一个刚刚付诸实践的思路——然而,一个明确的构想,一个诱人的思路。往往是引向成功的航标和动力,我们之所以要把它在这里宣布出来,是想既用它来指引和激励我们自己,同时也以此来寻其友声,找到更多学术上的同道。

(原载《天人古今》1994 年第 1 期)

#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宋嗣廉

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直可孤行天地,不当与群书为伍"(《古欢堂集》卷六)。在历史与文学结合上,百代之下,罕见其比。长期以来,当人们谈及在历史上享有绝高声誉的《史记》成因时,多从民族文化的积淀,时代氛围的陶冶,个人遭际等方面探讨,却绝少提及"一代之文学"汉赋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似乎与汉赋绝缘,超然于这一文化现象之外。这不外是由于建国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汉赋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漠视"一代之文学"成就所致。今天,当我们将《史记》与西汉时期的汉赋加以对比考察,不难发现汉赋之影响。

汉赋为最早脱离学术的纯文学,它不仅是一代文学的正宗,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是文学自觉的先声。本来,"赋者,古诗之流"(班固《汉书·艺文志》)。而萧统的《文选》却将"赋冠诗前"。这不是萧统对于赋的偏爱,而是他认识到,赋体文学的出现,是文人创作的开端,这正是把文人文学创作摆在文学史的中心地位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认同。汉赋所以获得"一代之文学"的殊荣,主要是因为它气魄宏大,可以"苞括宇内,总揽人物",适应表现伟大时代的需要;也由于它具有辞藻的美"极声貌以穷文"的特点,最能表现作家的才华与主体意识。"它在中国艺术的发

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强烈地突出了作为一种自觉的美的创造的特征,不再只是政治伦理道德的附庸"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赋是不愧为"汉一代之文学"。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比司马相如小34岁。司马相如大约于公元前139年完成《上林赋》的,当时司马迁16岁,正在京都读书。司马相如死后十几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一代赋人司马相如及其大赋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写作必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 一 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汉大赋的成就

司马迁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文学家(主要是辞赋家)立传的人。至于《史记》中西汉大赋杰出代表、第一个创立并完成大赋体制的作家的《司马相如列传》,正如韩兆崎先生在《司马迁的文学观》一文中所说:司马迁是把司马相如"列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那一类的。在这篇传记里他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论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使之成了《史记》中收文章篇章最多的篇章。全传九千二百多字,比《项羽本纪》还要长。……这里的确表现了他对司马相如这种文学家的高度重视"。② 司马迁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人"的需要。正如刘熙载所说的:"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艺概》)可以说,司马迁与他所为之立传的几位辞赋家屈

---

① 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心"是相通的,那就是为大一统的汉王朝"兴造功业",为"士不遇"而"发愤以抒情"。他认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虽流放,睠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贾谊也是一样,就是被疏之后做梁王傅期间,仍然十分关注汉王朝的命运。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评赞中,把司马相如的大赋与《诗》中大小雅相提并论。他认为司马相如的大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恐怕就是司马迁"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的主要原因吧。

司马迁对辞赋家、辞赋特殊关注,这与他本人也是赋家分不开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先有赋8篇,列入"陆贾赋"类。但仅有《悲士不遇赋》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三〇。虽然司马迁赋的语言,似更接近于荀况之赋,殊少屈原之遗音,而与宋玉、司马相如之作则几乎毫无关系。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屈原、贾谊的骚赋、司马相如的大赋的偏爱与高度评价。

## 二 《史记》与汉赋同是西汉鼎盛时期表现"宣汉"思潮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

"文之道,时为大"(《艺概》)。就是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要把反映时代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司马迁是这样,司马相如也是这样。西汉初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和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的《宣汉篇》,他们提出一代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文学家的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过秦"与"宣汉"。这两个口号的提出,体现了西汉的时代精神。所谓"宣汉",则是对汉代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如果说西汉初年,从陆贾开始到贾谊,他们的辞赋、

论著均以“过秦”为主题的话,那么到了武帝以后,从司马相如到司马迁,他们的赋作、文章则以“宣汉”作为主要倾向了。武帝时汉帝国建立了七八十年,经过“文景之治”,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无论对内对外,都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与发展,“文德武功”,声威远服。和以往的时代相比,割据削平了,战乱平息了,边境安宁了,疆土扩大了,经济繁荣了,国家强盛了,民族表现出从来没有的生气勃勃的风采。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阶级,对此情此景,怎能不极度兴奋。在理想中把自我发展的方向与大一统的发展,即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统一起来,故而内心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意识。而时代也向他们召唤,要他们以绚丽的笔触表现民族的现在,刻画大汉精神与帝国不可一世的姿态。而最能表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强盛气象的汉赋,逢此机缘便勃然而兴,成为“一代之文字”。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着力记叙了司马相如是怎样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时代呼唤下,走上大赋创作道路。“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表明他欣逢盛世,以蔺相如做榜样,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感到为景帝的武骑常侍,乃“非其所好”,便“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客游梁”。他认为只有从事赋的创作,才能一吐为快,“乃著《子虚》之赋”。而这正是时代之需要,故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当武帝得知司马相如是狗监杨得意的“邑人”时,则大惊,迫不及待地“召问相如”,“令尚书给笔札,以为赋”。《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

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司马相如所说的“赋迹”、“赋心”可谓相如赋学观有机结合,即大赋创作中铺陈风格与容纳万境的结构完全契合。司马相如这段赋论,不仅仅说明了作赋技法,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大一统帝国历史风貌与昂扬激越的时代精神及其审美需求,表现出以大为美的风尚与理想。正如王世贞所说:“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艺苑片言》卷一)而这也正是“盛汉之隆”,社会思潮与审美风尚对其影响的结果。李贽在《藏书》卷三七《儒道传》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论者以相如词赋为千古之绝。若非遭逢汉武,亦且徒然。”无怪乎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后叹服不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子虚》与《上林》无不表现着国家强盛的气象,和强大帝国的声威。这种大赋已从汉初骚体狭谷中走出,不再停滞于含蓄淳蕴的个人哀怨情结,走向展示雄浑壮阔的时代。就其讽谏思想而言,也由个人心情的感发,转化为历史的整体忧患。赋中通过虚设人物(主客各代表一方)先将齐楚大国诸侯的声势张扬一番,似乎已无以复加,然后再以“天子之事”压倒对方。在前者陪衬下,后者显得更加伟大无比。以达到歌颂中央集权、贬斥诸侯拥国自重的目的。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所作《子虚》、《上林》赋,推言上林之广大,盛赞天子的排场,所表现的大一统观念,是“合德”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物体写志也”。《子虚》、《上林》中对“天子之事”的铺陈,写事以多为胜,摹物以大为美,篇幅洋洋大观,这正是强大帝国养就的浩然之气在文中的体现,确有一种融古今为一体,含四海为家的味道,体现着“大汉精神”。这种精神既然已形成时代风尚,就不能不感染泽及成书稍晚于《子虚》、《上林》,对大赋特别关注的司马迁。

有趣的是司马相如的绝笔是《封禅文》,大约作于公元前117年。文中力主汉武帝去泰山完成封禅大典。他认为:"大汉之德,逢涌源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尃雾散,上畅九垓,下沂八埏。"和历代帝王相比,汉武帝完全有资格去泰山封禅:"修礼地祇,竭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 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汉武帝读了《封禅文》后,"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决心去泰山封禅,以完成大汉盛事:"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前112),天子始祭后土。八年(前110)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就是在庆太平、告成功的"建汉家之封"的元封元年(前110)。而这一年"不得与从事"的太史谈"发愤且卒"。司马谈出乎史家的责任感,临终时嘱咐为郎中的儿子司马迁要著述史书,以反映"汉兴海内一统"的时代,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谈这份珍贵的遗嘱,可以说体现了时代的要求。36岁的司马迁自觉地负起了这个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俯首流涕"发出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因此当上大夫壶遂询问《史记》欲以何明时,他诚恳地回答:

>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之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显然，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一样，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把歌颂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也是整部《史记》体现了"宣汉"思想的原因所在了。汉大赋一改骚体婉曲回旋之态而为气势雄张、洪流急注之文。正如清人浦铣云："汉人赋，气骨雄健，自不可及。"(《复小斋赋话》下卷)，胡韫玉也说，《子虚》、《上林》二赋，"浩气内转，精充外溢，譬之长江巨河，大波堆银，细沫喷雪，心骇目惊，莫可言状"(《读汉文记·朴字斋丛刊》)。《史记》是以人明史，"描述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世界直接征服取得辉煌成就，表现了'汉兴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它与'从容委曲'、'辞气不通'的《左传》不同，而与'楚汉间文相近'，即'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艺概》)"[①]。当然，《史记》为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画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子虚》、《上林》中所见只有林苑而已；司马相如是以"《诗》之讽谏"奉献"赋心"；司马迁则以"一家之言"表其"尊汉"之志。

## 三 西汉大赋与《史记》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汉大赋与"无韵之离骚"《史记》另一个时代印记就是都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某些艺术特征。汉赋与《史记》是盛汉时代文坛上的两支奇葩。但二者不仅体裁不同，描写的对象也各异。赋，是以"物"为描写对象。正如历代赋论所言："物以赋显。"(王

① 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这些论述都说出了“大赋善于体丰繁之物,言阔大之志的形式美特征”。而《史记》则是以“人”为对象,即“以人物为中心”。这是二者不同。差异中昭示了西汉时期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比如在写实中融入艺术想象,并浑然一体;在艺术结构上均求大、求全、求奇,以“深雄大”为美;“讽谏”、“讥刺”皆为艺术整体结构之有机部分打破了诗歌散文的界限,散韵并举,等等。西汉赋体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这种艺术风尚,必然使汉代散文受到感染而艺术化,进而衍化为“精鹜八极,心激万仞”(陆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史记》的“以人物为中心”,从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看,确是显示了“文学自觉”的来临。不止如此,《史记》这种文学自觉意识还表现在“实录”精神与“入情合理”想象的有机结合上。《史记》是以“实录”为基础,同时在传写人物中又辅以“揣度”、“悬想”、“遥体”、“铺张”,即“入情合理”的想象。“所谓‘想象’,不是刘勰所说的‘神与物游’,就是对经过‘考信’的史料采访得来的流传在人民口头的传闻,通过作者的加工,即形象思维的过程,在头脑里真实地再现一幅幅生活的图景。通过想象也可以补充,但这个对史实的补充,偏重于作者对这个图景的体验,对历史事件事势的‘悬想’”①。《史记》这种写法,固然继承了先秦史传的传统,同时不能不从现实的汉大赋中汲取写实与想象浑然一体的艺术思想。

汉大赋对《史记》的影响还表现在结构艺术上。汉赋的铺张是为渲染“汉兴,海内一统”的气势服务的。在结构上刻意求大、

① 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求全、求奇，而且浑然天成。比如《子虚》《上林》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由齐到楚，再写到天子，一层一层铺陈开来，从而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气势。大赋先写齐王为了在楚使者子虚面前夸耀“车骑之众”，“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并通过子虚之口笼统地道出了楚王“列卒满泽，罘网弥山”的盛况，物产之丰富，田猎之隆盛，大肆铺陈渲染一番，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时时与齐王之田猎相映衬，以绝对优势压倒了齐国。齐国的乌有先生一方面以不屑的口吻奚落子虚“奢言淫乐”，一方面夸齐国之广大，“只数语，已有包罗六合气象”(《汉书评林》卷五七)，从而使云梦失色。最后无是公嘲弄子虚乌有的固陋，用罗列排比的方式，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山水宫馆、珍奇产物，以及歌舞田猎、女色之盛，又以绝对优势压倒了齐楚。层层推进产生了极尽渲染汉之阔大的艺术效果，造成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所谓求全，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对所铺陈的事物，一般不作精细的个性的描写，而是追求全方位的表现。比如写云梦的宏丽壮观，则以“其中”、“其东”、“其南”、“其西”、“其北”为五大纲，将高山、惠圃、平原、广泽、流水、森林平摊其空间，写尽云梦九百里的宏阔景象。又以“其山”、“其土”、“其石”、“其高燥”、“其埤湿”、“其中”、“其上”、“其下”许多纲目，写尽云梦九百里物产。从局部看，这种群峰对峙的并列结构，给人以中然整饰匀称合谐之感。所谓求奇，就是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所说“架虚行危”。比如《子虚》写楚王游猎，就打破了时间界限，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如专诸、干将、乌号、夏服、阳子、孅、阿之类，作为铺陈材料，放到同一时空中加以描写。写到田猎时，我们丝毫看不到时间或空间的转移，似乎是同时发生在一个点上。龙争虎斗的恶战之后，突然转出“郑女曼姬”的婀娜。声色之后，又复写弋猎飞禽、网钓水族的情景。将田猎写作两截，中间

以女声渲染,层层变化,卓诡奇幻,表现出一种流动之美。司马相如就是以这样大、全、奇的结构,完成了前此所无长达三千五百二十三言的鸿篇巨制。司马相如大赋结构方面体现的这种疏阔旷荡的形式美,不仅成了后世大赋之模范,对《史记》也有深刻的影响。《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中的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合起来又可以显示从黄帝到汉武帝滔滔滚滚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一部《史记》,囊括了从天命到人事,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的社会生活。从五种体例的关系看,本纪是世家、列传的纲目,而世家、列传是本纪的注文。除纪传外,还有书与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则排比事实或人物的世次与年代,可以看作是列传人物的附录。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这五种体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庞大完整和谐的体系、宏阔无比。司马迁运用体裁并不拘守定格,而富有变化。五个部分所采用的模式并不是凝固不变、简单而又呆板的,而是根据内容需要进行"微调"。如本纪以编年形式为主,但秦始皇、项羽、高祖等本纪,则兼有列传特征;列传主要采用人物传记形式,但儒林、游侠、货殖、伯夷等传,则采用综合论述而兼有传记形式;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传,采用的是记事本末的形式。十表中,只有四篇形式相近,其他六篇也各有特点。章学诚说:"迁书体圆用神。"(《文史通义》)这也是《史记》结构上卓诡奇幻之处,使得一部浩大的《史记》整齐、和谐而不板滞,统一匀称而不单调。可以说,无论汉赋还是《史记》,在结构上都体现了汉代以"深沉雄大"为美的特点。所不同的是一为赋,一为文;《史记》是纵贯古今,是三千年的历史巨卷,是西汉盛世全景式的鸟瞰,而汉赋《子虚》、《上林》是横向铺陈,所见只是诸侯、天子的林苑而已。

《史记》与西汉大赋的艺术特征还有一点相近，即都具有讽谏与"尚美"的双重风格与功用。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评赞中指出：司马相如的大赋，既有"虚辞滥说"，又有"《诗》之讽谏"；而汉大赋从"尚用"出发，将"微言大义"之"讽"，与"闳业鸿业"之"美"，较好地统一起来。大赋之讽谏，继承了"《小雅》怨诽而不乱"和《楚辞》"作词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传统，也是汉初"过秦"思潮之继续。但与汉初文学直谏相比，显得委婉曲折，隐蕴涵蓄多了。司马相如大赋中的讽谏，大体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曲终而奏雅"（扬雄语，《汉书·司马相如列传》）。即先极力夸张上林苑面积之广，山水之丽，物产之多，田猎之盛，歌舞之隆，而后讽语，"引之节俭"。二是在铺陈中显露一二讽语，了无痕迹。又由于"相如以新进小臣，遇喜功好大功之王，直谏不可，故因势而利导之"（孙执升语）；或以"天子茫然以思"自悟的形式出现"曲终"，或于行文中借人物对话以微讽。无论哪种形式，都不是由第三者直陈其旨。这就是司马相如讽谏之妙用。司马迁对这种讽谏是给予肯定的。不仅在传赞中比之于"《诗》之讽谏"，在《自序》中对"其旨讽谏，归于无为"也予以称赞。正如蒋彤所云："《史记》载司马相如文独多，非贪其美于文，为其切时事而合于讽谏之义也。"（《丹陵文钞》卷二《书司马相如传后》）从艺术构思来看，司马相如是把他的讽谏融会于其艺术整体结构的大美之中了，形成了"讽谏"与"尚美"的统一。这种"讽谏"风格不仅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东方朔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也为司马迁在《史记》加以采用与创造性发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汉大赋的"虚辞滥说"略有微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汉大赋"尚美"的全盘否定。他所不满的是由于汉赋"丽淫"而冲淡了"讽谏"，即赋之主旨被"虚辞滥说"所淹没。司马迁以司马相如为鉴，在处理"尚

美”与“讽谏”即褒美与贬恶的关系上,没有重蹈汉赋的覆辙。《史记》的“微言讽刺”,有的是“刻露而尽相”,有的“幽默而含蓄”,但更多的是采取“婉而多讽”的形式。讽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来揭露自己嘴脸之可恨、可厌、可笑;有的借传中人物之口进行讽刺;有的是借秦讽汉;有的是作者直接予以揶揄嘲弄,或反话讥诮,等等。刘熙载认为,“太史公之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应常在高处”(《艺概》)。司马迁为了抒发这种“悲世之意”,写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文字,但由于他“立身常在高处”,即“立身”于“尊汉”的“高处”,他的“讽刺”,不是对客观的冷眼旁观,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他的“悲世”也就常常唤起和他一样为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而痛心疾首;他的“贬恶”也就常常给人们除却时弊的信心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讽刺”完全是融会于《史记》艺术整体结构的大美之中,可谓水乳交融。但是通过无情地揭露丑恶现象来肯定理想的做法,毕竟是从否定之否定中流露出来的。因而是曲折的、有条件的。只有通过能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的传写,才能直接地肯定和宣扬作者的进步思想,才能使作者理想之光激射出来,并以容纳现实,观照现实。这就是司马迁的“爱奇”、“传畸人于春秋”的用意所在了。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即或是传写“心目中最得意”的“畸人”,也大多有“拨乱世反之正”的用意。《伯夷列传》、《游侠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周亚夫列传》、《魏公子列传》,以及《平准书》中写的卜式等等一批“畸人”就是代表。这样司马迁就把自己的“尚美”与“讥刺”完美地统一在《史记》之中,形成“一家之言”。与大赋相比,可谓后来居上了。

还有《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以散句为主,兼用骈句,也可以视

为接受汉赋的影响。汉赋的特点之一是散韵相杂,句法参差。叙事用散文,如《子虚》、《上林》的序、对话、问答等;而描写则采用韵文,十分讲究音调节奏。从而打破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散韵熔于一炉。《史记》则以散句为主,根据抒情、描写的需要采用了大量骈句。苏秦、张仪、范睢、蔡泽、蒯通等人的说辞,《屈原列传》中对《离骚》的评价,《货殖列传》中地区物产的描述,等等,多是整齐的骈句,读起来铿锵作响,饶有韵味。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总结了先秦一切文化成果,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接受"一代之文学"汉赋的熏陶,得到了启迪。笔者认为,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3 期)

# 试论《史记》引用谣谚的艺术

鲍广丽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①，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②，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用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画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表现了司马迁过人的史识。但遗憾的是，后世评论家尚难脱出正统采经摭传的樊篱，对此多有龃龉，刘知幾所谓“时采杂言”③，班彪讥为“论议浅而不笃”④，郑樵驳为“雅不足”⑤，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近人认识趋于客观，论述多能沾溉并有所褒扬，但尚未能进行具体、详尽、切实的分析，本文试从人物、论赞、语言三方面论述《史记》引用谣谚的艺术。

歌谣、谚语，都是一种体制短小的作品。歌谣是人们口头创作的短篇韵文作品。谚语，相对歌谣来说，哲理性、寓意性更强。在先秦典籍中，已出现一些歌谣、古谚，而在《史记》中，其数量更

①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一九。

② 苏辙:《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

③ 刘知幾:《史通·六家言》。

④ 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⑤ 郑樵:《通志·总序》。

为可观,据粗略统计达六十多条。稍加归纳,可分为三类:一是乐府歌谣;二是民歌童谣;三是俚语俗谚。它们或出自于汉乐府,或来源于民间,都洋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

《史记》中引用的歌谣,涉及面较广,上至天子、诸侯,如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汉武帝的《瓠子歌》、孔子的《去鲁歌》、项羽的《垓下歌》,下至乡老、孩童,如颍川儿歌、齐人歌、百姓歌,可以说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得以操曲以闻,足见司马迁宏阔的气度和卓越的史识。至于俗谚、俚语,多根植于民间的土壤,有的甚至得力于司马迁的亲自采撷,精心辑纂,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性、概括性。就字数而言,所引谣谚有长篇,有短章,最长的为《优孟之歌》,九十三字;最短的为"利令智昏"仅四字。但总地说来,这些谣谚形式结构都较为短小精致,富于灵活变通,内容上寓意丰富,表现力强,语言朴素、明净、深刻、生动,并具有节奏感和气势,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显得摇曳多姿,浸润着鲜明的生活气息,闪烁着人民智慧星星点点的灵光。它们点缀在文章中,有抒情,有描绘,有说理,有叙事,有风趣,有幽默,有婉讽,有嘲弄,时而文笔泛彩,时而语多卓识,使《史记》其文研之弥永,思之弥远。

## 一

《史记》引用谣谚的艺术,首先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著文,最为人称道处,当数那一批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史记》恰当、妥帖地引用歌谣、俚谚,使这些人物更呈现活泼酣姿的形态,使读者恍睹其容,亲闻其曲。这些谣谚充分抒发了作品中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同一人物复杂的性格。如汉高祖刘邦,由一介乡民成为最高

统治者,本该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他回乡时所唱的《大风歌》,极其苍凉空旷,将刘邦茫然四顾、寂寥无人的心态描摹毕见。又刘邦为人权诈多智,富于深谋远虑,但他也有失算之时。如《留侯世家》引《鸿鹄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吕戚争位,吕后请来商山四皓作太子侍从,面对此情此景,刘邦亦无能无力,只好对戚姬无可奈何地唱出这曲《鸿鹄歌》,抒发他难以支配一切的心境。而刘邦复杂、生动的形象,就在反复引用的歌谣之中,雕像般鲜明地直立在那里了。

为了使笔下的人物更具传神的气质,司马迁有时借助谣谚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或意气风发,或慷慨悲凉,或痛疾奸邪。如《项羽本纪》记述垓下之围: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一曲《垓下歌》将楚歌原本具有的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真切地抒写了项羽丰富的感情世界,呜咽悲慨,凄凉动人。把项羽身陷绝境,叫天天不应,入地

地无门，无力挽回失败定局的心情完全给刻画出来了，使其悲剧形象增添了浓浓的感染力量，显得有血有肉，生动饱满。清人吴见思说："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①抓住歌谣的神韵，进行分析肌理地阐发，所论颇有见地。

营造凄婉迷离的抒情气氛，用以烘托人物的心理，这是司马迁借助歌谣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种艺术笔法。如《刺客列传》刻画荆轲离燕入秦，燕太子为之送行的场面：

>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这样一派惊心动魄的氛围中，司马迁用娟娟之笔描绘出荆轲即景作歌这一画龙点睛之笔，使文章呈现出千回百折，纡徐难伸的抒情气韵，而荆轲气冲霄汉、傲睨万物的心理，披肝沥胆、奋然前行的壮士之姿也由此变得慷慨淋漓，姿态横生了。明代孙月峰认为："只此两句，却无不慷慨激烈，写得壮士心出，气盖一世。"②对歌谣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史记》不仅借助谣谚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而且用以鞭挞一些赫赫声名的暴虐人物与残忍行为。在这方面，不论是歌谣，还是谚语，都显得笔锋犀利，凛若秋霜。如《吕太后本纪》载赵幽

---

① 吴见思：《史记论文》。

② 孙月峰：《评注昭明文选》。

王所唱《饥饿歌》,对吕氏乖张戾深的行为严加挞伐,最后哀呼苍天报仇,以泄其愤。痛恨的心态,借用歌谣这一特殊形式,描绘得如泣如诉,感情激荡。再如《淮南衡山列传》,引用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抨击了汉文帝因争帝位而致其弟淮南王子死之事,着重借助歌谣悱恻动人的情韵,言其刻薄残忍之心,一曲既终,意甚悲凉。在引用的谚语、俗语中,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如"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酷吏列传》),引用谚语贴切生动,像一支利箭射向残虐的酷吏,抒发对宁成施行惨绝人寰的酷刑的不满与痛恨。这些谣谚虽只是思想的片断,一鳞半爪的情绪显现,但却表现了深刻、丰富的内涵,故用笔尖刻,是非皎然。

也有引用歌谣、俚谚歌颂贤君良相,主张任贤使能。如《曹相国世家》载汉初百姓唱的《萧曹之歌》:

> 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萧何、曹参二人在汉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实行清静无为的统治,使百姓生活安宁、平和,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誉。歌谣以整齐划一的形式、真纯质朴的语言表达人们对二人功德的颂扬。明人茅坤分析这首歌谣:"清净"、"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①] 乃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定评,引用的歌谣,竟成为一篇文章中的筋骨,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且使文章华质并茂,扣人心弦,可见司马迁引用谣谚的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又如《赵世家》引谚:"以

① 茅坤:《史记钞》。

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赵武灵王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因为他具有发展变化的眼光。这则谚语不仅突出了赵武灵王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应具有的形象,而且渗透着哲理的力量,闪耀着思想的火花,给人以启示。

由于这些谣谚常常表现出抒情、委婉、质朴、简洁的艺术特征,并且司马迁引用的笔法多种多样,行文富于变化,将人物刻画得更为意远神足,耐人寻味,使人们往往超越其字面所涵括的意韵,进行深切地品味、琢磨,以期获得对人物更全面的认识。

司马迁引用谣谚塑造人物形象,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真。为人作传的首要条件必须真实,唯有真实,刻画的人物才可信可感。而引用谣谚不仅使叙事情节如历历在目,而且描绘的人物也生动传神,这主要是由于谣谚的本质决定的。《史记》中所引谣谚由于大多来源于民间,具有民间艺术的写实精神,符合生活的真实,同时又具备艺术的真实,所以一经司马迁随意点染,人物形象鲜明可见,处处生色。二是奇。司马迁是个"爱奇"的作家,最早指出司马迁"爱奇"的是扬雄。他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由于"爱奇",使司马迁特别关注谣谚这支民间文学奇葩,并且不惜费尽身心,亲自采撷。司马迁借助谣谚本身具有的奇特的形式,奇峭的字句,以及字里行间勃郁的奇气,去捕捉和突出时代的社会症结,以诙谐幽默、机智锋利的笔调去暴露一切丑恶腐朽的现象。司马迁这种爱奇的精神,谣谚这种奇异的形式,并没有损害《史记》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反而丰富了史实的内容,增添了《史记》的文学色彩。由此可见,司马迁借助敏锐的眼光,卓越的史识,透过谣谚给人浅

---

① 扬雄:《法言·君子》。

露、直白这一表象，抓住其“真”与“奇”的艺术本性，用以塑造人物，使其鲜活灵动，光彩夺目。

## 二

对《史记》论赞的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引用谣谚艺术的又一表现。

《史记》论赞，言约义丰，博大思精。有的钩稽古史，有的纵论史事，有的褒贬人物，有的叙述游历所得，有的提示取材义例，有的阐明述作大旨，有的隐微讥刺时事，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其较为突出的特点，即在文中引用歌谣、俚谚，给议论以滋养，其态度与引经据典如出一辙，显得郑重其事。平实的谣谚在论赞中，往往对传主作出入木三分、得失俱论的真评价。如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被誉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关于他举贤若渴的事迹，人们已耳熟能详，但想不到他为贪图冯亭陷地的私利，也会经不住诱惑而头脑发昏、失去理智，使赵国在长平覆没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也差点陷落。司马迁对平原君俶傥非常之人，却做出这一失策之举，洞悉于心，发而为文，评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虞卿列传》)这则切实之论的谚语，虽只寥寥四字，却如同一枚钉子，牢牢将平原君这着失策之举钉在历史柱上，警省深刻，使论赞的表现力更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在论赞中引用的谣谚，还给我们指出一条尚论古人不偏不倚的捷径。如叔孙通，是一个阿世取容、而谀得宠的典型，司马迁对其所为有所鄙薄，但考虑到西汉建国之后，他在协助刘邦稳定时局，创立各种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在论赞中借助谚语对其做了客观的评价。

>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刘敬叔孙通列传》）

司马迁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借谚语形象说明智慧难以专有，对叔孙通高人一着的智慧作了不失偏颇的说明，表明司马迁尚论古人公允正直的态度。

在论赞中引用谣谚，不仅能把抽象的议论说得率直、深切，而且能借其发身世之慨，体现个体情感的感受。如《郑世家》引谚：

> 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权利交合，世态炎凉，这是封建社会的弊病，在这样的社会中，守道直行的人往往无济于事。司马迁受酷吏之害而交游莫救，对于权利的交合、世态的炎凉有着深切的感触，故笔下有激扬文字，悲怆的身世之慨，借谣谚一泻而出，字字愤激，语语含慨。

有时由于论赞中谣谚的引用，使议论更为切中肯綮，并蕴涵巨大的感染力，而传主本人也为此流芳百世。如《李将军列传》写汉将军李广廉正不阿的品德，善战善射的将才，一唱三叹，最后在"太史公曰"中，达到高潮：

>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评说真纯质朴,不事雕琢,对老将军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短短八字谚语,朴实无华,但深情自露,平淡的引谚中蕴藏着巨大的感染力,对李将军的倾倒之情,溢于言表。

在论赞中频频引用谣谚,着力评述人物、事件发生时的特殊情状,不但可以使司马迁不自下论断,而且将哲理寄于形象的表达之中,经过人民口头相递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委婉蕴藉的态度,使人们对所论感到真实可信,从而收到妙尽其理的效果,并且使“太史公曰”跌宕跳跃,由此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形态,使评论趋于生动、通俗。

《史记》中的论赞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常常当作精美、耐读的作品,让人手不释卷。议论深刻而不流于枯燥、说教,分析这其中的魅力,朴质的谣谚在论赞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谣谚在“太史公曰”中悄悄向人们展示出两方面的内在蕴质:一是形象美。来源于民间艺术的歌谣、俚谚,本身有着切实而多样的艺术手段,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借巧妙的比喻进行说理,新颖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采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通俗可感。也有的采用长短句间用的杂言体,句式灵活,富于变化。其他手法如排比、反诘、回复等也都有所体现。这些艺术手段的错落展现,使这些精练短小的谣谚具有形象性,使论说的道理易于被人理解、接受。二是睿智美。《史记》中的谣谚,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却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结果,往往借助谣谚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精粹的语言,从独特的角度探求事物的本质,从而接近客观真理,突破人云亦云的陈说,放射出智慧的闪光,启迪人的智慧。这种睿智之美,使论赞的内涵丰富、深刻,具有言外之意的效果。司马迁拥有凌驾一切的史识,用一枝扶摇磅礴之笔,调动这些既具形象美又具睿智美的歌谣、俚谚,去

分析人物、评价史实，常常令人豁然感悟，富有征服力，从而使"太史公曰"的艺术之树永远常青。

## 三

《史记》引用谣谚的艺术，还表现在对幽默诙谐、通俗生动的语言特色的影响上。

司马迁作为语言大师，他既能将文章写得气势恢宏，雍容大度，又能通过揶揄的笔触，讥趣的嘲讽，使语言活泼而生动，诙谐而隐约，新颖而别致。这些在所引用的谣谚方面有突出表现。有的语含善意调侃，如《季布栾布列传》中，曹丘生为了迎合季布，只是慢条斯理地引出楚人之谚"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以轻松俏皮的俗语表明得到季布承诺的荣耀，引得季布转怒为喜，待之"为上客"。借引谚语，对季布的调侃、戏谑，宛然可见。清人姚苎田也认为"季布于此煞是可笑"①。有的转为无情嘲弄，如《佞幸列传》引谚"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是指皇帝身边的弄臣，卑劣委琐自不足论，但他们善于察颜观色，取悦人主，借此平步青云。对这种政体弊病，司马迁借俗谚讥讪讽刺，以此表明对这种苟合取容行为的不满，手法揶揄，笔力如刀，入骨入里。有的富于辛辣的讽刺，如《外戚世家》所引，"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凭借专宠而揽权。引用的歌谣辛辣发噱，又不失轻松俏皮，于三言两语中把卫子夫的骄横、擅权淋漓尽致地酣唱而出。有的善于旁敲侧击的谐讽，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颍

① 姚苎田：《史记菁华录》。

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恍如三五儿童,戏水清唱,灌氏家族的骄态随颍水时“清”时“浊”,忽隐忽现,戏谐之情,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歌词婉约多姿,讽得理趣盎然而又犀利有力。

《史记》的语言特色还具有直白省净、通俗明了的一面,这也与大量引用谣谚有较深的关系。司马迁引用的谣谚,语言明快、简洁,有本色的艺术特质,使文字表达更为生动、有力,蕴寓的内涵更为丰富。如《陈涉世家》载陈涉的伙伴对陈涉说:“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即是司马迁采撷地方上的俗语,将其入文,语言通俗、生动,使着墨无多的文字富有弹性。正如李长之所说:司马迁的精神已经浸润在民间生活的内层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有着民间语言——白话——的生动和有力。[1] 从中可见民间谣谚对司马迁文章语言风格的影响极深。

这种通俗、生动的谣谚语言,与《史记》引用典籍的语言,恰成鲜明对照,相映成趣。一个情趣盎然,一个典重有致,相互穿插于文章中,使行文起伏跳跃,疏阔有间,毫无沉闷之感。如《扁鹊仓公列传》先引用形象、生动的谚语“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以此说明扁鹊、仓公等人遭遇坎坷不平,表达得贴切、自然。紧接着,司马迁又化用《老子》中的句子,伤叹“美好者不祥之器”,哀婉贤才为世不容,再次应证扁鹊、仓公等人的不公经历。语言忽而文,忽而俗,变幻莫测,使人眼花缭乱。历代史家讥之为“雅不足”的俚谚,比之于正统经传之文,毫不逊色,反而挹其清芬,沁人心脾。

这些语言委婉风趣、通俗生动的歌谣、谚语,贴切而不堆砌,深挚而不浮浅,加强了文章的感情脉络和气势,读起来朗朗上口,

---

①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甚至有一唱三叹的韵律之美。它们由司马迁妙笔驱遣,精心妥帖地安置、镶嵌于《史记》文中,恣肆生动、精彩纷呈,大大增强了《史记》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史记》所引用的歌谣、俚谚,思想隽永、文词精美,千百年来,人们广为传诵,如《易水歌》、《大风歌》、《垓下歌》、《颍川儿歌》,“利令智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之所以有这样深远的影响,除了其本身具有便于记诵的特点之外,更应是司马迁独特的史学眼光与见识的结果。

《史记》中的谣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虽为引用前人之言,但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表述上的外向与题旨上的内涵已融为一体,都化作了文章的血肉,体现了司马迁独立的个体情感的自然抒情、议论。它们像一枚枚精致的标签,积淀着思想的火花,蕴涵着艺术的华彩,既增添了文章的思辩力量,又装点《史记》论说、叙事时的文采,使叙事趋于鲜活机巧,论辩显示幽默色彩;形象阐明司马迁作史为文,记人立传的政治、思想观点,让读者掩卷之余,觉韵味无穷。

(原载《江淮论坛》1998 年第 4 期)

# 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

## ——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

张新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出现了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迎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文学理论思想的诞生,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笔者认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影响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关于司马迁的文学思想,拙著《史记与中国文学》已有论述。这里就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影响提出三题,求正于方家。

## 一 司马迁对文学的重视与六朝时对文学的认识

魏晋以后,思想的解放、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突破,把文学创作看成人生价值的追求,看成不朽的事业,而不只是政治道德的附庸,这是六朝新文艺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最为我们注意的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

>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对文学的认识,是六朝文论的第一声"春雷",文学乃是永垂不朽的"盛事",是比个人的生死、荣乐具有更长远意义的事情。文学的独立价值在这里得到确认。曹丕自己在《与吴质书》中,就曾说明他之所以撰写《典论》,就是为了"立德扬名",死后"可以不朽"。这与前期儒家把文学作为教化工具迥然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角度,是从个体人生出发来认识文学的价值,正因此,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奠定了六朝文论的基础。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说:

>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

人的形体生命如同草木之脆,容易腐烂。立言则同金石之坚,永远不朽。这也是从个人生命的价值出发,认识文学作用的。刘勰在《诸子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曹丕、刘勰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认识。①

---

① 关于文学的价值,曹植认为是小道,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无用了。"

由于对文学价值有一定的认识,因此,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也就前进了一大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意作家个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曹丕以此对建安时代的作家进行评论:

> 伟长独怀文抱质,恬寡淡欲……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斐然有述作之意……孔璋章表殊建,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与吴质书》)

尽管曹丕受了当时社会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但他能从作家个人的气质与才能方面去分析创作的得失,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开辟了文学评论的一个新天地。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进一步把作家的性情与作品的风格联系起来,总结了汉魏以来重要作家的创作特征,其结论就是"吐纳英华,莫非性情"。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以后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觉醒,就不会看到,在社会角色之外,人还有自己的情趣、性情。

其二,注意到文学的想象构思特点。陆机《文赋》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晢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词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堕曾云之峻……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

于一瞬。"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在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陆机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首篇《神思篇》中专门谈论构思问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物沿耳目"。刘勰还进一步论证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种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比起魏晋以前,显然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其三,注意对"情"、"采"、"味"的认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文论家对于文学本身的特点有了更多的认识,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就已注意到了文学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著作。沿着先秦"诗言志"的线索,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强调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这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诗言志,指的"表见德性","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说比起"言志"说,更符合艺术的特点,这正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之后,文学由社会的人向着个体的人回归的一种表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创作论部分总称为"割情析采",专设《情采》一篇,详细论述"情"与"采"的关系,强调文采要本于情性,情采两方面要以情为本。在其他篇目中,也多言及"情"、"采"。(见《原道》、《征圣》、《体性》、《熔裁》等篇。)由于对"情"、"采"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刘勰在《情采》篇中对齐梁文坛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

师辞赋。故体性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钟嵘在前人论述基础上,提出了“滋味说”:

>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滋味”说强调文学作品既要有“情”,亦要有“采”。“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作品才能有滋味,才能感动人。

其四,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有一定的认识。曹丕《典论·论文》中认为“文本同而末异”,于是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则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起,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止,属文体论,研究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无疑是前期理论的一大总结。萧统《文选序》也对各种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论述。

六朝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对文学规律的探讨,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为什么那么懂文艺?为什么那么重文艺?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司马迁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说起文学的“不朽”,我们自然想起这种思想的来源。《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谈人生的"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立言"作为"不朽"之一,但"德"是首要的。到汉代司马迁,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在《与摯伯陵书》中劝友人摯峻不要放弃人生价值的追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声,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全汉文》卷二六)就司马迁本人而言,他最初也是要建功立业、效力于朝廷的,但"李陵之祸"使自己遭受宫刑,"立德"、"立功"的路被堵塞。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他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史记》未完成,自己即使死了,与蝼蚁无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于是,他把所有的希望、追求都放到写作《史记》上来,"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安书》)。"文采"要流传后世,这已经见出司马迁对于文学独立价值的初步认识,可以说,由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司马迁把"立言"——写作《史记》作为自己的崇高事业,以顽强的毅力去完成这个不朽的工程。两汉时期,真正对"立言"有明确认识、而且以毕生心血去实践"立言"、要"成一家之言"的人,司马迁当是第一位。曹丕《典论·论文》:"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伟长……成一家之言。"曹植《与杨德祖书》:"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他们立意创新,反对空洞说教,反对形式主义,强调作品要有"情",要有"味",实质上也是提倡文学作品"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中已开始把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有意

区分,注意到文学的独特性①。对文学家及其作品特别关注,给屈原、司马相如等文学家专门立传,甚至非常动情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是《史记》中收文章最多的篇章。《李斯列传》收《谏逐客书》等,《乐毅列传》收《报燕惠王书》,《贾谊列传》中收《吊屈原赋》、《鹏鸟赋》,《邹阳列传》收《狱中上梁王书》,如此等等。足见司马迁重视有文采的艺术作品。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班固的《汉书》,并影响到魏晋南北朝。

司马迁在评价作家作品时,也注意到了将个人品性与作品风格联系在一起。他在评价屈原时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正是由于屈原“志洁”“行廉”的伟大人格,才有光耀千秋之《离骚》。后来的曹丕、刘勰等注重作家个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不能说与司马迁评论作家的做法毫无关系。

总之,两汉时期,有意识地注意文学的特点,重视文学家的社会地位,重视文学作品,司马迁当是第一位。他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到六朝人对文学价值及文学特征的认识。

---

① 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3页。

## 二 司马迁的"发愤"说与六朝时的"蓄愤""怨愤"说

司马迁在文学思想方面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发愤著书"理论。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对前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也是他自己写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在实质上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揭示了文学创作中一条普遍规律,因而受到历代文论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理论上继承并发展"发愤著书"说的是两位文论大家刘勰和钟嵘。

刘勰对"发愤著书"说的发展最主要地表现在他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上,提出了"蓄愤"说。《情采》篇云:

>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乘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

刘勰把《风》、《雅》之"志思蓄愤"与诸子之徒辞赋的"心非郁陶"作了对比,认为《风》、《雅》之作乃是因愤而作,且是发自内心

的“真”性情,这样的作品才具有力量,才能达到“讽其上”的效果。相反,辞赋家及南朝诗人抛弃了“志思蓄愤”、“为情造文”的现实主义传统,胸无怒愤而勉强编造其“愤”,即“为文而造情”,目的在于沽名钓誉,所以他们的作品不能感发人心,也就难以产生社会效果。在这里,刘勰从“真”的角度来论述“愤”。提倡“真愤”,即真情之文;反对无病呻吟,为文造情。这是刘勰对“发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他的贡献所在。而“愤”的产生乃是由于现实的作用,所以,《时序》篇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指出《诗经》中的“怒”、“哀”之音都是由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作家因现实而“蓄愤”,那么“愤”又如何发泄出来呢,刘勰认为是“比兴”。《比兴》篇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比兴都是用来表达“愤”的手法。而在汉代,“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由于辞赋家背离了发愤、讽谕的传统,没有怒愤可泄,因而比兴手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刘勰的“蓄愤”说。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刘勰在司马迁及汉代其他批评家的理论基础上,注意到了屈原作品的不同风格,尤其注意到其中的怨情。尽管刘勰认为屈原作品有不符合儒家经典之处,但他对屈作的“哀志”、“情怨”的认识,还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突破“以经立说”的传统做法,表现出一个文论家的独到见解。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许多地方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如在《哀吊》篇中称赞“贾谊浮湘,发愤吊屈”,说明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发愤之作。在《才略》篇中评道:“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

成珠矣。""蚌病成珠"的比喻,说明人生因坎坷而产生愤怒,而愤怒之作易有审美价值。在《杂文》篇中,刘勰评"对问"一类作品时也说:"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可见刘勰对"蓄愤"的重视。

钟嵘《诗品》论诗突出了《风》、《雅》、《骚》的怨恨传统,与刘勰以"真"论"愤"不同,他着重从"怨"的角度来阐发"愤",提出"怨愤说"。他在《诗品序》中说:

>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钟嵘在这里所列的例子皆属命运不佳者,正是由于残酷的现实、痛苦的人生使他们产生怨愤之情,"心灵"受到"感荡",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展其义"、"骋其情",把自己的"怨愤"之情发泄出来。钟嵘所总结的诗歌创作规律,一方面立足于儒家"诗可以怨"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钟嵘还把"怨愤"之说运用到品评诗歌上来,如评古诗"多哀怨",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阮籍"颇多感慨之词",左思"文典以怨",刘琨"多感恨之词",等等,这些"怨愤"之词,或反映社会动乱,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或表达爱国悲愤,或抒发贫贱孤愤,或讽刺虚伪礼法,或抨击门阀制度。钟嵘从理论上对这种文学创作加以总结,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但在钟嵘的"怨愤"说中,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强调"文典以怨",抒发怨愤必须合乎礼义典则,"得讽谕之致",不能像《离骚》那样怨愤横生、有失典雅,也不能像嵇康那样"过为峻切,许直露才",因此,这又回到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的理论上来,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形成鲜明的区别。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冲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樊篱,表现出强烈的"非中和"思想,其进步意义是很明显的。另外,司马迁提倡"发愤",决不是一己之愤,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呐喊,而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有力指斥,它是建立在进步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热情的基础上,像屈原那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抒发出来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而非个人的私怨。钟嵘把屈原与一些个人之怨的人放在一起,也是由于对"怨"缺乏仔细分析所致。

除刘勰、钟嵘的"蓄愤"、"怨愤"说之外,其他文论家对于"怨""悲"也有所涉及。如萧绎说:"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苟无感,何嗟何怨也?"(《金楼子·立言》)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 三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刘勰的"通变"观

"通变"一词源于《易传·系辞》。变是变化,通是通畅不阻塞。《系辞下》云:"变通者,趋时者也。"由自然界的变化论及社会的变化,指出人们必须随着时势发展而有所变化。

---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将《周易》的通变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在旧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制度的活力问题。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探究中华民族发展史，探究古今变化的规律。这里的"通"即司马迁所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作八书的目的："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平准书》云："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这些论述，尽管还没有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思想。"今天"从"昨天"发展而来，要把握"今天"的社会，就必须了解"昨天"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处处体现出"通变"思想。如从秦楚之际的战争风云，到刘邦建国，社会急剧变化。司马迁从"通变"思想出发，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陈涉、项羽、刘邦三人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三个阶段。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又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今"以"古"为鉴，可以明得失，可以知教训，这即是"通"；但"今"与"古"又不相同，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这即是"变"。所以，司马迁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也包含着深刻的"通变"思想。整部《史记》，上下三千年，司马迁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十表"，把几千年的历史划为三个段落（上古、近古、今世），五个时期（古朴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亡至西汉统一时代、今世时代），"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具体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家，用以表现历史之'变'，具有作规律性

探讨的卓识远见”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都注意到了总结前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文学发展史进行总结。刘勰尤其如此,一般认为,刘勰写作《通变》篇是受《易传》思想的影响,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再结合刘勰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总结与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仅受《易传》影响,而且受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影响。

其一,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心雕龙》不仅提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还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文学史观,并能联系社会背景,分析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各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也作了简要的评述,勾画出从先秦、两汉、魏、晋以至齐历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史大纲”。② 这个纲,明显体现了“通”的特点,犹如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一样。如《明诗》篇,叙述了从唐尧、虞舜、夏、商直到周、秦、两汉、魏、晋、宋、齐历代诗歌发展情况;《诠赋》篇从赋的渊源谈起,逐次论述了战国、秦、汉、魏、晋时代赋的发展概况。关于文学发展的原因,刘勰在《时序》篇中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学随时代的变代而变化。在《物色》篇中又提出:“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学是在不断的继承与革新中发展的。《通变》篇则对此作了更系统的论述。刘勰“原始以要终”,以历史家的眼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具有司

① 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7 页。

② 张文勋:《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 页。

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那种气魄。

其二，对各时代文学的不同特征，及各时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一定认识。这也是“通变”的表现之一。“通变”就是要探讨规律性问题。刘勰在《时序》篇中把宋、齐以前的文学发展史，概括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文风，划出发展变化的阶段，然后加以评价。唐尧虞舜之世“心乐而声泰”；夏商周三代：诗歌由歌颂发展到怨刺；战国时期“百家飙骇”，开创“炜烨”之局面；两汉时期“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建安、正始时期由“梗概多气”发展到“篇体轻淡”两晋时期由“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发展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谈之风；宋齐两代“英采云构”、“才英秀发”。在《通变》篇中，刘勰把“辞采九变”又归纳为六个阶段：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尽管刘勰的概括不很确切，但他在“通”的过程中看到各代文学的不同特征，如同司马迁“通”三千年历史，但又注意不同时代的阶段性那样，是很有价值的。

其三，注意总结教训，为当代服务。要对历代文学进行“通”观，没有批判精神是不行的。刘勰在自己的著作中，由“原道”、“征圣”、“尊经”的原则出发，对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为当代文学服务。当然，他的一些批判是以儒家眼光进行的，因而结论也有错误之处。但总的来说，在批判中总结，在批判中前进，促进当代文学发展，这也是“通变”的一种表现。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曾“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如他所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是为今天提供借鉴。

刘勰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文学史的总结,为今天的文学服务。从这一点来说,刘勰与司马迁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我们认为,刘勰的"通变"思想,是继承了司马迁"原始以察终"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在论述文学发展、探讨文学规律时,表现出"通"的思想,把握不同时期的文学特征,以"通"观"变",以"变"观"通",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以上列三题论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六朝新文论的出现,决非偶然,继承和发展前代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对历史的许多真知灼见,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记》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学的融合。司马迁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在他的写作实践上,即以生花之笔描绘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与历史学思想密切相联的。我们说司马迁开六朝新文学理论思想的先声,并不是有意抬高司马迁,而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张　强

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打虎跳,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然而,如何进行史述?如何把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寓于其中呢?这是大有讲究的事。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是持审慎态度的,一方面他以历史文献为史述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为印证这些文献的可靠性,他又亲自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文献与实地考察之间的相互印证,使司马迁在信古与疑古之间作出了有机的选择,同时也使他的史述更具有真实可靠性。如他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待中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意向: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

性。在史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应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取舍。二是疑古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印证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史述更加真实可信。

那么,是否可以说司马迁就不相信文献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司马迁曾明确地说《史记·殷本纪》系“采于《诗》、《书》”,又如他在《三代世表》中说:“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这就告诉我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十分尊重已有的文化成果的。

依据《史记》所使用的资料情况来看,司马迁最放心使用的资料为六经,进而言之,考信于六艺(六经)是司马迁进行史述撰写《史记》时的基本准则。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司马迁生活在儒学显于朝廷、定于一尊的年代,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六经”为先王政典的观念已牢固地树立在汉人的心目之中了。六经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早在孔子撰写《春秋》之前,除《春秋》之外,“五经”作为先王留下的政典,就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高的法典。这一意识的出现远远地早于儒家提出“六经”概念的时代,也就是说,“五经”最初并不是儒家的文化专利,儒家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取法于现成,通过认同原有的文化典章制度,在推崇孔子《春秋》的过程中才逐步把“六经”视为自己的文化专利的。

汉初,在人们的意识中,“五经”作为先王政典,与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新道家陆贾在推明治国之理的时候,就屡屡地在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①]的汉文帝,已开始在朝廷立一经博

---

① 《史记·儒林列传》。

士,即《诗》学博士。这些情况均表明,“五经”显于朝廷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并没有依托于儒家。然而,在诸子中,没有一家像儒家那样重视文化传统和讲究家学,当诸子们出于自身学说和政治观念的原因,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而儒家却通过师传和家传把“六经”捧为了治道的至理。

进入汉代以后,大力提倡“六经”的主要是儒家,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已彻底地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了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当司马迁把“六经”视为先王政典的时候,其思想虽然不是完全地源于儒家,但他接受和认同儒家的观念则又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事实上,“儒者以六艺为法”①的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历史的传承中,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相比,儒家有更加关心“六经”治道之理的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其父之口明确地表达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的意愿。从这里出发,司马迁“论考之行事”时把握的原则,是以“六经”为原点为师法对象的。毋庸讳言,司马迁认同“六经”不但是因为“六经”是当时最可信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因为“六经”阐述的统治大法早已成了研究治道之理的思想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大体上有三层:一是“六经”皆史,“六经”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郑重地表示他写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二是“继《春秋》”的所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为师法的对象，包含着对《春秋》体制与格式的自觉学习。三是司马迁接受儒家的学说，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文化范本，他以孔子激励自己，以孔子第二自居，一直在把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①，在司马迁看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②。周公与孔子之间的传递是讲文化传递间的统绪，千年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自视很高，他表示要像孔子写《春秋》那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即写出一部可与《春秋》比肩的《史记》，这就告诉我们，《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专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的思想巨著。

六经是先王政典，其内容是中国历代以来治国治民经验的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思想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④。在司马迁的意识中，《史记》更重要的任务是承担着总结历史兴亡之理的责任，这样，“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司马迁提供了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它又给司马迁提供了研究天下兴亡大势的思想武库。可以说，司马迁对夏桀、商纣失国原因的探讨，对成汤、周武得天下事迹的关注，都表现出他对历史兴亡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天官书》。
③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种终极关怀是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的思想相一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因之，司马迁在关注历史的同时，又把他的重点投向了风云谲起的秦汉之际。《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其中直接与秦末汉初事迹相关的有三十篇左右，秦末汉初历史人物的事迹不但在《史记》中所占的篇幅最多，而且也是司马迁刻意描绘的内容之一。仅以十二本纪为例，与秦末历史人物相关的篇幅就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四篇，这四篇本纪不但交待着秦失天下的原因和天下归汉的大势，而且还成功地承担着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

总结历史是为了现实，是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读《史记》则不难发现，秦汉历史人物一直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文以载道，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形式，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呢？它又是如何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的呢？我以为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司马迁热切地关注着秦得天下以后的风云变幻，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除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治理天下的事迹外，他还把重点放在了揭示秦推行暴政的方面，以此引出经验教训，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这一内容不仅仅表现在《秦始皇本纪》的写作中，还反映在《李斯列传》等相关的篇幅中。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借此来充分地揭示秦推行暴政所带来的恶果。贾谊在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统一天下以后，没能及时地用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仁义治理天下，是其丧失天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危民易与为非”，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其结果是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三是“雍蔽之伤国也”，秦二世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暴政，其结果是使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①

在《史记》中，“太史公曰”虽然也时常引用别人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但长篇大段地引用却只有《过秦论》一例。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贾谊的观点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贾谊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初一些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贾谊写《过秦论》之前，先后有陆贾通过他的《新语》，贾山通过他的《至言》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对贾谊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贾谊写作《过秦论》虽然在传达着他像别人一样关心这一问题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他又对秦亡天下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乃至他的《过秦论》带有集陆贾、贾山观点之大成的意味。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这一点在贾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由于贾谊观点的深刻性，使司马迁在关心秦亡天下的原因时，对此予以了必要的关注。第二，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是为了探究长治久安的问题，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司马迁是史学家，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本着这一原则，司马迁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站在这一原则立场上，司马迁特别地注意观察秦汉间的变化大势，特别地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二，司马迁纵横笔墨描绘着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风貌。面对暴秦残酷的统治，陈涉与吴广商量道：“今亡亦

---

① 贾谊：《过秦论》。

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①]寥寥数语，不但深入细致地交待出陈涉扯旗造反的原因，而且透过他的言语还揭示着"天下苦秦久矣"的思想情绪，从陈涉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刘邦建汉再度统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大乱，各类人物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出身不同的人汇聚到反秦起义的潮流中，其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黥布年少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当刑而王"。[②] 等到他壮年的时候，果然受了黥刑，因此，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以为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在汇入秦末大起义的各类人物中，既有像陈涉这样出身寒微的贫苦农民，也有像刘邦这样的市井游民、黥布那样的罪犯，还有像项羽那样的旧贵族。总之，群雄乘乱而起，虽然起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反抗暴秦，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实现人生的价值。为此，司马迁满怀激情地描绘着"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③]的历史，为了肯定他们反抗暴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满怀着激情给这些人写下了传记，极有意义的是，司马迁敢于"成一家之言"，不但把项羽的事迹写入了"本纪"，把陈涉写入"世家"，而且还根据他对历史的理解，为那些入汉以后遭到翦除的异姓王作传，甚至掬出了一捧同情的泪水。这一切，都表现出司马迁敢于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纵横笔墨地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独到的看法，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是难以做得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那么，《史记》就不

---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 《史记·黥布列传》。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会具有深长的历史哲学的意味。

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则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性给六国人氏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创伤,而六国人氏不满暴秦的统治,则四处散布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①,"亡秦者,胡也"②的谶语。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司马迁特别地关注六国反抗暴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巨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的时候,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车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③。在司马迁精心地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所以宋代的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

---

①③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羽平生。"[1]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2]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注意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外，还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具体行为进行前后的观照，以此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历史必然性。如在写项羽勇气可嘉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项羽有勇无谋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项羽年轻时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万人敌"（兵书）。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3]，因为这样的原因，使他不但有勇无谋，而且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终于导致失败。尽管如此，司马迁在关注秦末历史风云时，却又把他的笔墨重点放在了关注这些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方面。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4]而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5]在寥寥数笔中便勾勒出他们最富有个性的特征。可以说，这些独具匠心的选择与司马迁关注人物的英雄传奇性是分不开的。然而，赞扬英雄的传奇性又是与司马迁以六经为评价人物的标准是相通的。寓论断于史述，司马迁在交待项羽失败的原因时，先写了他坑杀秦军二十万俘虏的事件，后又记载了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6]的事情，这种失人心的做法便成了项羽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宋代的胡寅深得司马迁的心意，他在《诸史管见》中指出："莫强于人心，而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

① 《班马异同评》。
② 《史记抄》。
③④⑥ 《史记·项羽本纪》。
⑤ 《史记·高祖本纪》。

以术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力夺也。项籍生于战国,习见白起坑赵卒,效而为之,唯杀是务。二十万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其四,《史记》是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历史著作,进而言之,是一部人学著作。但司马迁又把它视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政要,这样,它给司马迁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深入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把解决“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视为写作《史记》时的重要原则,在解决天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司马迁表现出对现有的宗教神学成果的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①]陈涉对天命的否定,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司马迁以“身死东城,尚不觉寤(悟)而不自责,过矣”之语进行了批判[②]。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并不是非天命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表现出信奉天命的意绪,尽管如此,他对人道的关心却是主要的。

在处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时,司马迁特别关心人物命运与社会构成的关系,经过他的有意识的选择,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深长的人生哲理意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际遇和奋斗往往与他所处的时势相关,一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和际遇,鉴于此,司马迁特别地注意从大处着眼来关心思考这一问题。如身经百战的李广,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建功封侯的伟业,因时势不同始终难以实现,乃致汉文帝都替他感慨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 《史记·项羽本纪》。

哉！"①然而，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夏侯婴等人因赶上了好时光，虽然出身寒微，但自从随刘邦起兵以后，都建功封侯了。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②两相对比，便可得知司马迁对人物进行历史的评价时，是以时势造英雄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这一观念与司马迁在追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是一致的，这样的内容贯穿于《史记》的始终，使《史记》表达出对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思想观念。

其五，《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录入《史记》的各个历史人物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因此，其故事也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质。如何把这些人物统一于"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之下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史记》中，司马迁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本纪编年，突出其纲要的地位，让其他四体围绕着这一编年的线索展开，进而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突出时代的氛围。本纪在《史记》中的编年意义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是《史记》中的纲目，它勾连着《史记》其他四体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发微着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马迁在结构《史记》时显示出来的整体意识。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从发微六经的旨意入手，并赋予十二本纪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经学思想。关于这点，我们从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中就可得知，五帝的事迹很多，但司马迁把他们得天下的事迹定位在以德服天下的方面。这种理想政治经司马

---

① 《史记·李将军列传》。

②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迁的推明,进而演化为了“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路线。以君德推及到臣德,有德者昌的思想作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贯穿于世家和列传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毋庸讳言的。

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最初的意义与宗教神学相关,上古时期有“同心同德,同姓同德”之说,自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后,德在去其宗教神学意味的时候便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德与仁的外化形式是仁与不仁的对峙,这一内容反映到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便成了司马迁进行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基本观点,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格外地关注秦汉之际的大势,试图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以思想观念的先行性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如对刘邦、项羽等人的评价可以说都在贯穿着这一思想原则。

上述五个方面,是司马迁关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握的一个基本尺度,它的一个总的思想方法是以六经为基本的出发点,由此贯穿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主题思想。考察历史是为了现实,因为这样的原因,《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在写法上却非常地注意略古详今的思想方法,这也是我们读《史记》时必须要注意的方面。

(原载《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 《史记》先黄老后六经辨

傅以辉

班固作《司马迁传》,谓其"先黄老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读者疑之。而张氏守节以为史公名显,六家之宗,黄老为道家之首,六经为儒家之首。呜呼!此岂是以知史公立传之微旨哉。史公上继六经,纂述近古,读《春秋》而为良史,综六艺而为通儒,其立意深,其托词微,而班氏非之,所谓泥其言词,忘其奥旨,品评失常,褒贬任声者也。

何以言之?汉承秦敝,劫灰一炬,焚绝百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数种之书耳。六艺残缺,道要沈微,即其所谓儒者,盖亦孔门游夏之支流余裔,舍本而图末,语粗而遗精,洵哉博而寡要,劳而鲜功矣!本原既失,流行愈歧,盖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史公惧吾道之将绝,伤时王之不明,于是作《史记》推崇孔子,尊为"至圣",侪匹夫于有土,先百王而立号,所以明圣道而辟邪说也。初何尝后六经哉!删《书》断自唐虞,史公岂不知之?所以托始黄帝者,正以见黄帝亦人耳,非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如方士所言神仙者也。观其"本纪",一则曰劳动心力耳目;再则曰崩葬桥山;三则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言劳动心力耳目,所以见其非清净无为也。五帝不书葬,黄帝书葬,所以见其死而有据也。谓其言不雅驯,所以斥方士之非也。即本纪黄帝,亦推其神灵首出,敦敏徇

齐,力征经营,民物清理,又不独养生复性变化无方已也。方士乃造为鼎湖乌号之说,谓之圣人不死,以蛊惑时君,盖循名而失实久矣。

至于作《老子传》,一则曰典乡仁里人,再则曰其子宗,宗子注,注子宫;三则曰隐君子也。夫详其乡里,考其子孙,称之曰隐君子,所以见老子亦人耳,非如方士所言能乘云御龙也。且侪于申韩刑名之间,列之管晏功利之后,其取舍轻重之义亦明矣,又何尝先之哉!

尝考其《自叙》一传而已得其大凡,如所谓"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发之最明,慨然有思古之心,故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至于今五百岁",而传之无其人,其怛然自负为何如哉!班氏特读书不精耳。

至乃毛举而细疵之,又谓"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遂使良史苦心不明于世,毋亦责备之太过乎!余故辨而出之,以见西汉之世论定鸿儒贾董而外,史公为首,惜乎班氏识不及此也。

(原载《国学》第1期,1915年4月14日)

# 司马迁崇尚道家说

程金造

## 一

一言及司马迁，则人人知其为中国历史上有名之人物，不但历史学家奉为不祧之祖，即文学家亦极力崇拜之。盖其所著《史记》一书，起自五帝，迄于天汉，凡数千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条贯清晰，叙事详尽，纡回宏衍，纵意所如，在史学上固如日光之普照，在文学上亦为灿烂之明星，故自《隋志》以来，即列于正史之首，后世之史，无不由其孕育生出者，实为中外古今之大著作，西人以迁与西史之开山祖师希洛多德 Herodous 并列，其伟大可知也。

司马迁在西汉虽为史官，而《史记》一书，却为其私撰，《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则其非官书可知也。然司马迁何为而作《史记》乎？其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之作书也，虽为"述故事，整齐世传，整齐百家雅语"，而其最大之目的，乃在成其一家之言耳。而所谓成一家

之言者,即是将自己心目中之种种理想,表现于文字之间也。故更在其自序一文中,引孔子之言以自喻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意即所谓:吾心中之种种理想,可用以救世觉民,然若空发议论,难以警切,却不如借史事为题,发挥我个人之理想,俾众人易为了解耳(大意采梁任公《史记》之读法)。赵翼《陔余丛考》有言曰:“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可谓真知史公者矣。夫司马迁之作《史记》也,既在成其一家之言论,与后世之史书性质不同,自不可以纯粹之史书视之,高阆仙师谓其书旨趣,与子书相近,非若后世之史,沾沾于簿记之为者,则后人读史公之书者,当可得史公之思想也。

## 二

中国自汉代迄今,数千年间,全被纲常礼教之儒家所支配,学者多着儒家眼镜以视史公,属司马迁于儒者。如:

> 王鸣盛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推崇老氏道德,谓其能兼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旨要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儒家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较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视其下文称引仲舒之言,隐隐以已上承孔子,其意可见也。”

又日本渡边秀方,亦谓司马迁之学风,有异于其父,其父谈属

道家,而迁则崇尚儒教,其言曰:

> ……至于其子迁,则青年承父命,成其绝代的功业,但其学风则稍异于父,他专崇儒教,以儒为人世上惟一之教学……

此亦袭取中国学者之说法,非其自己所研究之论断也。清人黄承吉氏有《梦陔堂文说》一书,竟谓司马迁尊儒抑道(文长不录),是皆有所蔽之见也。盖司马迁之思想,本偏重于道家,专隶之为儒,实为大谬,苏洵《史论下》谓:"迁固史,难以事词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之遗意焉。"似稍有几分见地;今分析《史记》书中,得史公论断,尚好,摈斥,之言论,而归纳之,足证其思想,实偏重于道家者,约有数项,述之于左:

(一)主自然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师古曰任自然也),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舍。可知道家之政治主张,为无为,自然,一切无须加以人力造作也。司马迁亦以为因民为治,即可省却许多力量,而登人民于衽席之上,苟如对人民加以教诲,加以整齐,是治民之下策也。《货殖列传》曰:

>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

与之争。

看此则可知司马迁之政治主张,为自然主义,“故善者因之”一语,足以表明其政治之倾向。“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此实反对一切人为法令道德之口吻也。但司马迁之所以主张任自然,无为,而一切事毋庸加以教诲整齐者,盖以为人民之种种动作,皆有一种“天道”存于其间,为自然之一种法则,苟对于人民加以教诲整齐,则与“天道”相违背,与自然不合矣。故下文更曰:

>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此等无治主义,实与庄周相似,《庄子马蹄篇》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言伯乐失马之本性,陶匠失埴木之本性,圣人为政教道德法令,失人之本性,背自然之理,其说不过较史公更进一层,其言较史公更深刻一些,而其大旨则相同也。

司马迁之政治主张,既属自然,故于当时之能顺“天道”,行“清净无为”之政者,无不极为赞许,如曹相国世家赞曰:

> 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曹参行清净无为之政,史公褒之曰:"天下俱称其美。"又如文帝好黄老之术,即位之后:"除肉刑,除田之租税,除收孥相坐之法,除诽谤之妖言律,除秘祝之官,罢左丞相及衔将军,二十三年之间,宫室苑囿无所增饰,畏烦民而不治坟墓,施清净之政。"《文帝本纪》庶几于无为之地步矣,史公谓之曰:

>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以"德至盛"三家褒赞之,则史公崇尚无为之精神,可以概见矣。

(二)斥法令

司马迁传老庄而附以申韩,韩非有喻老解老之文,缘法家者,原自道德也,盖道家为人君南面之术,已含有法家作用。虽然,法家固乃原自道德,而实已改头换面,非复道家本来之真像,而独自成一支派矣。法令纷繁,惨礅少恩,是又法家之流弊,而为尚道德者之所极力反对者也。史公既主自然,尚无为,故于法令极表反对,《酷吏传》曰:

>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此引老氏之言,来作反对法令之语,然司马迁之所以反对法令者。盖以为法令之实行,则与自然,相违背,与"天道"相反,徒为治民之具而已,非能致民于治之具也。故曰: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司马迁以为自然,无为,即为人民致治之本,背自然之天道,行人为之法令,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又举例以明之曰:

昔天下之网常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

秦时偶语弃市,法之严密以至于此,然而奸伪萌起,上下相遁,则治民之术,实非违背天道之法令所能胜,其能胜之者,却为一任自然之道德,故下文曰: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在彼不在此”,注文韦昭曰,“在道德不在严酷也”。反复论说,以明法令之物,只为治民之具而已,非能致民于治者也。且法令不惟不能治民,而背天道,违自然之法则,又且以害民;是以治民之具,惟在一任自然之道德也。

(三)轻名利

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道家以名利之为物,为人类相互争夺之原因,苟欲使民不相争,不为乱,而安其居,乐其俗,任其自然,必先弃名利而后可。司马迁轻弃名利之旨,亦颇见于《史记·孟子荀卿传》曰: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

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不好利,恰恰与司马迁之意旨相合,于是大肆发挥,"利诚乱之始也","放于利而行多怨"两语,是直谓利为不祥之物矣。又如《日者列传》曰: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坠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宋忠、贾谊二人具好名,竟以死亡,史公评之曰:"务华绝根。"此可知司马迁又以名为不祥之物矣。司马迁自序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其轻弃名利之旨,每每借史事为题,以发挥之。如《袁盎列传赞》曰: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

袁盎仁心为质,善于傅会,史公评之曰"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是名为不祥之证明也。又如《吴起传》,吴起"为西河守……节廉而自喜名也",及其败亡也,史公评之曰:"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以其只见到名,而忘掉一切,致亡其躯,此亦名为不祥之证明也。其关于利者,如《郑世家》曰:

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是借他人之言以证明自己之主旨;又如《张耳陈余列传》曰:

> 太史公曰:"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

张耳、陈余未据国之初,相然信以死,及据国争权,则相互灭亡,史公谓其所以然者,为利之所致,则此非其"放于利而行多怨",而利为不祥之证明乎?然《史记·蠡测》有言曰:"张耳陈余,所争者大,非为私也,其始则多疑心,其后则各负气耳!试观吴楚反时,条侯以梁委吴,不肯往救,本以为国,非为身也,而梁孝王深恨,汉高末年,陈平夺樊哙兵,亦以为国,且免哙于死矣,而哙妻吕须进说。盖疑心未释,则气不平耳!余之相怨一方,无足怪也,史公以利责之,似过矣!"夫耳余相争,是否为国,且不必论,而蠡测之言,可谓不明史公之旨,而武断评论矣!盖迁主自然,不尚名利,耳余相争,以利责之,固史公黜利之意耳。

(四)戒杀戮

《老子》曰:"好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知杀戮之事,乃道家之所忌;盖残杀同类,最为不仁之事也。司马迁于《史记》书中,处处亦寓有其戒杀之意,如:项羽"才气过人","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及其困于垓下,西走东城也,谓其骑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司马迁于其赞中却极力驳斥之曰:

> ……谓霸王之业,可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是史公明明谓项羽之败亡,实用兵之罪,杀戮之过耳!此为

由史公口中评论,明其戒杀之意也。又如,《李将军列传》: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此则借他人之言,明其戒杀之意,是老子"好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之意也。又如《白起列传》,述白起曰"攻韩斩首二十四万","拔魏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贾偃战沉二万","攻韩斩首五万","长平坑赵卒四十五万";极力写白起杀戮之多,末尾则叙白起之语曰: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此则又由杀戮者自己口中说出,反复证明杀戮之害,则史公戒杀之苦心,可得而见矣。然司马迁戒杀之意,不宁惟是而已也,且更假因果报应之说以明之,如《黥布列传》曰: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军,用此得王,亦不免身,为世大僇。"

黥布以杀戮得王，而终不免为世大僇，此杀戮者之报及自身者也。《王翦传》曰：

> 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

后王离攻赵，果为项羽所败，此杀戮之报及后世子孙者也！茅坤曰："此于传末叙其后世之报，而以客曰或曰发明之，叙事兼议论，亦一例也。"此可谓真知史公者矣！按后汉书《耿弇传》论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章怀太子注曰："《史记》曰，'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代必败，以其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观此则司马迁之思想，具有道家之色彩，益明矣。

(五)贬儒术

汉初，黄老盛行，儒道不兴，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诸儒冠来者，取解其冠溲溺其中，及至武帝，始能绌百姓，专崇儒术，《汉书·武帝纪》，《董仲舒传》，《儒林传》等，可得其详也。然司马迁生当此儒术尊之际，却对儒家作反对之论调，(儒家虽孔子所创，然儒家分派，往往失孔子本旨，故太史公虽尊孔子列于世家，而于当时儒者，颇致不满之意)如《游侠列传》曰：

>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
> 按《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

而仁义存焉”。

夫儒者之所倡者，仁义也，史公却极对仁义致其贬词，盖以为有仁则有不仁，有义则有不义，而善恶之名以生；但恶人者，能窃善名以为己有，则世俗之所谓善，所谓恶者，不足为凭也；是以伯夷丑周饿死，文、武不因以贬王，跖、跞暴戾，其徒诵义也。是史公自己口中之言论，而犹有借他人以发挥此意者，如《老子韩非列传》曰：

>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此则外面虽为老氏教诫孔子之言，实亦史公对儒者之抨击：此所谓借他人酒，浇自己心中块垒者也。然《礼记·曾子问》一章，所写便与此处不同，《曾子问》曰：

>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葬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有老聃云。"

此则状老子为一沾沾于礼法之人,夫老子果如是之所写乎?又果如史公之所写乎?盖两方之立场不同,而言之自各异也。但史公之所谓“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者,实对当时所谓儒者之抨击耳,按《荀子非十二子》谓有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则儒家者流,其流已难,非复孔子之本来面目矣。及至汉武帝,以利禄相诱,而儒术遂为戈取名利之具。盖自赵绾王臧明儒学以承上好,公孙弘以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从风,又请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为郎中,而公卿士大夫,斌斌多文学之士(《史记·儒林列传》)此可知当时之儒者,如何之悦主求荣矣!司马迁生际此世,眼见一般人竞竞利禄途中,故不得已而将时儒之奉为傀儡者,有所责贬,实乃对时人之讥讽耳!文如《刘敬叔孙通列传》曰:

>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耶?
>
> 案《老子》四十五章,有大直若曲,大巧若拙之语。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亦讥其媚世取荣语也。

此外亦有足证其偏重道家者,即于《史记》书中,多引用道家之语,以评史事,如管仲列传曰:

>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案《老子》三十六章“将固与之,必固取之”,与此意同。又《货殖传》曰:

>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此则认老氏理想之政治,为至善之政治。案此文《老子》八十章之语。又,《太史公自序》曰:

>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

案《老子》十一章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又《吴王传》:

> 太史公曰:“毋为权首,反受其咎。”

庄子应帝王“无为谋府”,与此意同。余则举不胜举,故此皆可为其偏重道家之证明也。

以上分析,已证史公之思想,实偏重于道家方面,后人谓之纯属儒家者谬矣!案《前汉书·扬雄传》赞曰:

> 桓谭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

又《史记集解序》裴骃曰:

> 班固有言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

《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又案明,杨慎曰:

《乐毅传赞》及老子传授次第,太史公之学,盖本老子。

此三人者,或言史公崇尚老聃虚无之言,过于五经,或言史公之作书,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或言其学即本之于老子,则不可为吾说之助乎。

然司马迁思想,之所以偏重道家者,或不无与其时代及家庭有关,缘汉初黄老盛行之时代也。黄老者,道家也。盖汉初兵革扰攘,人民凋敝已达极度,地方靡烂,已到不堪之境,及中原底定,人人各欲谋身家之安适,而恬淡无为之黄老思想,遂应合社会人群之心理而生矣。武帝虽倡儒学,罢绌百家,实则儒术在当时之势力极微,黄老思想,已有长久之历史,而根深蒂固矣。君上如文景二帝,窦太后,名臣如曹参(《曹参世家》)、张良(《汉书·张良传》)、晁错(《汉书晁传》)、陈平(《汉书·陈平传》)、田叔(《史记·田叔传》)、汲黯(《汉书·汲黯传》)以及郑当时,万直不疑等,处士如王生(《史记·张释之传》)等,无不习黄老以娱身心,又《汉志》有《老子·徐氏经》说,《老子·传氏经》说,《老子·邻氏传》,《刘向说老子》等书。陈丰东《塾读书记》引洪稚存云“自汉兴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政”,则道家思想,在当时势力之大,入社会人心之深,可想而知矣。至于史公之家庭,则其父谈为黄老信徒,《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

何，习道论于黄子。

案注徐广曰"《儒林传》曰：'黄子好黄之术'"，又谈之《论六家要指》一文，独推崇老氏道德，谓能兼阴阳、儒、墨、名、法五家之长，而无其所短，且更举其旨要易操，事少功多，不似儒者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则迁父谈者纯属道家可断言也。夫人之思想，无不受时代环境所支配者，其生活于某种时代环境之中，则自受某种时代环境之影响，未有能离开其所处之环境，而能不受任何之影响，独自能立一种意识者；司马迁生当黄老盛行之世，长于黄老思想之门，或亦受有时代环境之影响欤？

（原载《师大月刊》第二期，1932 年）

# 司马迁与黄老

## ——纪念沈故刚伯先生八十六诞辰演讲稿

王叔岷

## 一 引 言

司马迁是西汉到现代才学识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文章和辞赋都写得非常好;沈故刚伯先生是当代最负盛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他的文章和诗也都写得很好。司马迁崇尚黄、老之学,“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沈先生领导台大文学院二十七年,“督责大指,不计细小”。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这跟黄、老之治,也很符合。因此,我今天草拟“司马迁与黄、老”这篇演讲稿,来纪念沈先生八十六冥诞。

## 二 黄老其人

后汉王充《论衡·自然篇》云:“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老是老子,这是人所习知的。黄是黄帝,晚近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夏曾佑以为是黄生。(见《傅孟真先生集中编》丙、战国史家叙论八。)据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即是黄生。然而裴骃集解引徐广注:“《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

黄生既然好黄、老之术,可见黄、老之“黄”,决不是黄生。

二、李长之以为是张良所称黄石公,可能是张良假托圯上老人,到汉初便有黄、老之称。(李氏《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一章三、《齐学篇》。)然而楚、汉之际的黄石公,实在没有跟老子并称的证据。

王充认为黄是黄帝,在《史记》中的直接证据可不少。如《乐毅列传》:“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陈丞相世家赞》:“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这些直接证据,黄、老是指黄帝和老子,当然就不应该有异议了。

## 三　黄老并称之由

现今所传说的《黄帝书》,是《战国》时人伪托的。《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原《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原《注》:六国时贤人所作)。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原《注》: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他如小说家、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皆有《黄帝书》。其中《黄帝君臣》十篇,与《老子》相似,这正是黄、老并称之由。《黄帝书》已失传,但至今还残存一些词句,有迹可寻。《六韬兵道篇》,《吕氏春秋应同》、《去私》、《圜道》、《遇合》、《审时》、《序意》诸篇,《韩非子·扬权篇》,《淮南子》之《谬称》、《泰族》两篇,《贾子新书宗首》、《修政上》两篇,及出于东晋的《列子·天瑞篇》,都曾引用《黄帝书》之文。尤以《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无动不生无而生有”,与《老子》四十章“有生于无”之意相合;又引《黄帝书》:“谷

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跟《老子》六章之文全同(只是根上多一之字)。也许是伪托《黄帝书》的人抄袭《老子》。《黄帝书》既然有跟《老子》相同之文,然则黄、老并称,更是理所当然。

## 四 汉初黄老之治

《史记·曹相国世家》:

>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即《老子》五十七章"我好静而民自正"之意。汉初非仅"百姓离秦之酷后",又加以楚、汉相争之难,正当使百姓"休息无为"。亦即《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之意。甚至到汉武帝时,汲黯亦以黄、老之术,大治东海郡。黄、老之术在政治上既收大效,尊崇黄、老,遂成西汉之风尚。王充《论衡·自然篇》云:

> 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

此是极中肯之言,深得黄、老之要义。

## 五 司马迁与黄老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后传略论》,谓司马迁:

>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汉书·司马迁传赞》,亦谓司马迁:

>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的根据,盖由于太史公《自序》,载其父谈《论六家要指》中之儒、道两家云:

>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此虽司马谈所论,而司马迁述之,自是与其父同意。其论儒家,虽长短互见,但与论道家相比,专论长而无短,足证重道而轻儒,亦即"崇黄、老而薄五经",或"先黄、老而后六经"。谈之崇黄、老,由于习道论于黄生,黄生好黄、老之术;且好黄、老,又为汉初风尚。司马迁之重黄、老,固由家学,亦因风尚使然,然谈崇黄、老,仅论及黄、老(道家)之长;司马迁重黄、老,而知老子之言未可尽从。如《货殖列传》:

>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

> 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至治之极",本老子理想之所寄。而司马迁以为如用此为务于近世,是涂塞人民之耳目,则几乎不可行矣。然则司马迁之重黄、老,而知黄、老之理想亦有其时限,其了解黄、老之深,优于其父矣。正由于司马迁了解黄、老之术甚深,故首创法家之学渊源于黄、老之伟论。

## 六 法家渊源于黄老

老子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老子反对法令,似乎法家之学与黄、老无关。然关系实甚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并论及道家与其他五家之关系云:

> 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是说道家兼取阴阳、儒、墨、名、法五家之长。惟此所谓道家,实乃杂家。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非所以上论黄、老也。即以论道、法关系而言,谈谓道家撮法家之要,实则法家乃撮取道家之要。司马迁谓法家如重势之慎到、重术之申不害、及集法家大成之韩非,三人之学皆渊源于黄、老,首以老、庄与申、韩合传,已显出司马迁之特识。兹分别论证司马迁说如次:

(一)慎到与黄、老

慎到在法家三派中特别重势,《群书治要》引《慎于威德篇》云:

> 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

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此慎到重势之要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此所谓黄、老，实仅就老子而言，黄帝附之，盖《黄帝书》出于战国晚期，慎到乃战国中期人，与庄子（前368？～288？）同时，或年长于庄子，《庄子·天下篇》称之，无从见及《黄帝书》。西汉习以黄、老并称，故司马迁谓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老子》十八章：

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

《群书治要》引《慎子知忠篇》云：

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

数语正是发明序老子之指意。又司马谈论道家要指：

其术以因循为用。

《群书治要》引《慎子》有《因循篇》，云：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此段正是发明序黄、老因循之指意。

(二)申不害与黄、老

申不害在法家三派中特别重术,《韩非子·定法篇》云:

> 申不害言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佚文)云:

> 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

并道及申不害重术之要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本作《老子韩非列传》):

>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

申不害亦战国中期人,亦无从见及《黄帝书》。司马迁谓其学本于黄、老,亦以黄附老之意。又所谓"主刑名",及"施之于名实"。义亦相应。"刑名",即《韩非子·定法篇》所谓"循名责实"。简言之,即"名实"。申不害之学虽主刑名,而实本于黄、老。《群书治要》引《申子大体篇》云:

> 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

每句话,都与老子之言相似。如老子云:

>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
> 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 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四十八章）
> 柔胜刚（七十八章）
> 静为躁君。（二十六章）

两相比证，申不害之言，实本于老子。又《吕氏春秋·任数篇》，载申子对韩昭侯有云：

> 至德不德。

亦本于《老子》“上德不德”。（三十八章）

（三）韩非与黄、老

商鞅在法家三派中特别重法，司马迁为商鞅单独立传，未言其学与黄、老有关。盖即有关，亦甚细微，故略而不论。韩非集法家三派之大成，其思想受黄、老影响，最为显著。《史记·韩非传》：

>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据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及所谓“执势以御其臣下”。已兼法、术、势三者言之，可证韩非兼重法、术、势，集法家三派之大成。司马迁谓慎到、申不害之学，并渊源于黄、老，实则仅与老有关，与黄无涉。谓韩非之学“其归本于黄、老”，则黄与老二者皆可征。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其学与老子有关，此人所习知。韩非

之时,《黄帝书》已流传,韩非已明引之,如《扬权篇》:

> 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韩非申其旨云:

> 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杀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君不可不慎。](末句据《意林》引补。)

可证韩非甚重视黄帝之言。惜今传《韩非子》明引黄帝之文,仅此一见。其暗用《黄帝书》之文,或尚有之,惜无从印证。要之,司马迁谓韩非之学,“其归本于黄、老”非仅本于老为可据,即本于黄亦可验。

老子最重视微妙,所谓“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法家“为法,必使明白易知”。最反对微妙之言(《商君书·定分篇》、《韩非子·五蠹篇》)。老子最重视恬淡,所谓“恬淡为上”(三十一章)。法家最反对恬淡,所谓“恬淡,无用之教也”(《韩非子·忠孝篇》)。老子最反对法令,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已见前)。法家最重视法令,所谓“尧之治也,盖明法察令而已”(《御览》六三八引申子)。据上引证,法家与黄、老之思想,似乎是相反,两不相容。司马迁精通黄、老之学,首先以老、庄、申、韩合传,破除道家与法家之界限,以为申不害、韩非之学,皆本于黄、老;于《孟子荀卿列传》所附之《慎到传》,谓“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真千古特识,给予后人研究道家、法家相关之思想莫大之启示。并证明司马迁之意见确凿可据。

## 七 结 语

黄、老之术，重在无为而治。时移世易，人事日繁，如今，虽有为亦难将诸事办妥，无为而治之时代已成过去。汉初黄、老之治，司马迁所崇尚之黄、老之学，令人向往；沈刚伯先生所领导文学院之无为而治，亦令人向往。此过去成功之事实，乃现今回忆之美谈，已不可再得！岷以“司马迁与黄、老”为题，纪念沈先生八十六冥诞，不禁感慨系之！在座台大诸位老一辈同仁，或有同感！不过，无论如何，沈先生在学术上之贡献，领导台大文学院之功绩，将永垂不朽！

（原载《文史哲学报》第30期，1981年12月）

# 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

赖长扬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是春秋公羊学发端并取得正宗地位的时代。这个学说,是一个唯心的神学体系。它据阴阳五行说,全面地编造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世界模式。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司马迁对这个学派及其学说的态度怎样,他以毕生精力所作的《史记》和这种学说间有什么关系,不能不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问题。我在这里,主要想就司马迁对春秋公羊学的态度谈一点看法。

严格说来,春秋公羊学并没有什么历史理论,只有附会历史的政治思想。但是,因为它托史立论,以神意虚构历史,也演绎出一套历史观点。这套历史观点的基础,同整个公羊学的基础一样,是阴阳五行说,其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其余如宣扬历史循环论的"三统说"、"王权神授说"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对于这种学说,包括对它的历史观点,司马迁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的这种态度,突出地表现在他作《史记》的动机和《论六家要指》上。

司马迁作《史记》,本身就是对春秋公羊学的否定。我们知道,董仲舒系统地提出的公羊学的理论,是答对武帝的《天人三策》,时在建元元年(前 140)。而到司马迁动手作《史记》,公羊学

理论早已得到武帝的赏识；至司马迁基本完成《史记》写《报任安书》（约前93或前91），这种理论的一尊地位已是被确定了。如果说，太史公赞成这种理论，就没有写《史记》的必要。他在谈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时曾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之前"究天人之际"者多矣，特别是有处于正宗地位的公羊学的一套天人论，但在他看来，并不符合自己的思想，所以要"亦欲究"之；要另"成一家之言"。这段话既表现了他对武帝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又说明了他对公羊学的否定。说这是太史公作《史记》的动机之一，是不过分的。

太史公这种冲决思想罗网的战斗精神，还记述在《论六家要指》中。有人说，《论六家要指》"欲与天地久长"之前，是其父司马谈所写，之后，则是司马迁的续作。即便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指》也代表了司马迁的思想。因为，从整个《史记》看，收录的文章不多，而所收之文，大体都能代表司马迁本人的观点，何况这是阐述他的家学，而在《自序》里又把它置于显要位置。说《要指》也代表司马迁的思想，似无问题。

《要指》"整齐百家"，以黄老为主兼容它学，和公羊学对百家的态度完全不同。《要指》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而董仲舒却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本传）《要指》认为，各家都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不可不重之"的长处，不必互相扑灭。而董仲舒却"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公羊学崇"六艺之科孔子之

术”,《要指》偏尚道家,且有意把两种学说进行对比,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欲施事,无所不宜。……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以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要指》所不满意的儒家,就是公羊家。这里表露的,和以上所述的作《史记》的动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批判态度,还充分表现在他对作为公羊学赖以依存的基础——阴阳五行说和《春秋》的态度上。

春秋公羊学的哲学依据是阴阳五行说,其搓捏的历史材料是《春秋》。董仲舒袭阴阳家之言解说《春秋》,把历史记载变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

司马迁对阴阳家的祖师爷驺衍就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家宗。”对这个先是阴阳家后又成为公羊家祖宗的驺衍,司马迁是很不客气的。《要指》就公开反对他的学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封禅书》则干脆把他们称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对其说报以尖刻的嘲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孟子荀卿列传》把驺衍的《终始》、《大圣》称作是“深观阴阳消息”的“怪迂之变”,指出“其语闳大不经”,只不过是“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

对公羊学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春秋》,司马迁也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春秋》二百

四十年的历史记载，编造出适合最高皇权的一整套原理。从“春王正月”的解释到谴告论（及其反面的祥瑞论）的发挥，在他的思想中，《春秋》是一部天人感应的圣经。他认为：“《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以诸侯之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又大谈天人感应的谴告和祥瑞，说：“《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天之所大奉使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他甚至说《春秋》就是孔子为了揭示天人关系而作：“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同上》）可见董仲舒怎样充分利用《春秋》进行神学的推演！太史公则不同，他完全摒弃了董仲舒对《春秋》唯心主义的解释。在《自序》中，他巧妙地征引董仲舒有关孔子作《春秋》的一段话，完全没有神学的意味。而他自己则明确地以人事论《春秋》的。他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

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可以说,据人事论《春秋》,是司马迁的卓识;以天意论《春秋》,则是董仲舒的虚构。甚为令人佩服的是,在春秋公羊学肿胀的时候,司马迁敢于说出和公羊学派完全不同的对六经的看法。他说:"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天官书》)这就等于说,你公羊学派以天道论六经,只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而他自己在《史记》中,比"纪异而说不书"更进了一步,变为了"纪异而驳谬"了。在自然史方面,他从符合事实之传闻而弃荒诞怪迂之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继承了荀子唯物主义传统,批判了笼罩在自然史上的谬说。在社会史方面,他不满足于前人的记载,而注意对实事的调查研究,纠正了前人不少的错误。这种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公羊经学家不能比拟于万一的。

司马迁曾经就董仲舒学《春秋》,但他对这位公羊学的创始人并不恭维。作为思想家和史学家的司马迁,对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学派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学派在武帝时期的政治地位,思想上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为董仲舒立专传,仅仅把他列入《儒林列传》中。如果说,《儒林列传》的字里行间只委婉地记述了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的目的,是以阴阳灾变的迷信取悦于武帝,那么,不录董仲舒代表公羊学理论的《天人三策》,就不能说不是对董学的直接否定了。《史记》对董仲舒和他的学说的讽刺是十分辛辣的。《儒林列传》说: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

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弟子不知师说而责之为下愚，而董仲舒也因此“竟不敢复言灾异”，都很可笑。太史公虽平平道来，却活画出这派人的丑态！其结尾又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斌斌”“文学之士”，原来就是这样一群丑态百出的人物！

把《汉书》对董仲舒的处理和《史记》相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班固不仅为董仲舒立专传，而且收入了为司马迁所弃的《天人三策》。对我们上面所征引的《儒林列传》中的一段文字，班固纳入《汉书》时也作了重要修改。《董仲舒传》添加了少量文字，结果使事情变成了：(1)主父偃所奏书，不是《史记》所说的已成就了的灾异之记，而只是一堆“草稿”。(2)董仲舒写作解释高庙失火的东西不是在失火之前，而是在之后“推说其意”。(3)《汉书》说主父偃奏书是因为他嫉妒董仲舒，而不是如《史记》所说是因高庙失火“疾之”。(4)班固改《史记》主父偃“取其书奏天子”为“窃其书而奏焉”。一言以蔽之，照班固说来，之所以闹出大笑话，是因为诸儒生看见的只是主父偃偷去的董仲舒的草稿而已。班固维护董仲舒及其学说和司马迁有意暴露其丑态，两者的立场是何等鲜明！

以上我们讨论了司马迁对公羊家及其学说的直接表态。下面，再看看在具体的历史记叙中，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批判。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道德观点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和公羊家对立的观点，论著很多，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他对公羊学的批判立场。

首先，司马迁对朝代兴衰更替的缘由，作出了和公羊家不同

的回答。

秦王朝的兴亡，是汉初直至司马迁时期议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六国年表》中，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认为秦之一并天下，不是五德或者三统的作用，而是"形势利也"，但由于它各方面的条件都不甚优越，而终成一统大业，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天"助一般。这又是对公羊学历史观点的责难！

秦建立之后，自认水德，其结果又怎么样呢？"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按五行说执行，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但是，秦"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本纪》），最后导致灭亡。他引贾谊的话作为总结，说秦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在这里，完全没有天意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子。

其次，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人物的境遇时，往往有意识地用具体的事实去否定天道和天命。《伯夷列传》就是锋芒毕露的一篇。他诘问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

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记事甚少而为七十列传之首，其原因历来聚讼纷纭。从《史记》全书看，这种论多事少的篇章确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旨出发，来检讨《伯夷列传》，特别是其中的以上一段议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太史公是有意借伯夷而发论，总领七十列传；《伯夷列传》是七十列传之纲。你看，一个"或曰"，引出公羊家的观点，接着用一个又一个的与其矛盾的事实加以反证，说明它的荒谬。接着总括一句："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反言之，其他能证明无天道无天命的事实还多得很！由此论及近世，力斥天道论的不合事理。最后迸出一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古至于近世，列举了那么多的人物，落脚处是探寻天道天命，从而否定之。从具体的历史人物的遭遇来证明公羊家是谬说，是《伯夷列传》的主旨，也是其余列传在这个方面的主心骨。司马迁正是这样从历史的事实出发，来"究天人之际"的。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评白起、蒙恬、王翦祖孙三代、李广的怀才不遇、歌颂张良的文字中。

在《白起王翦列传》中，司马迁记叙了白起引剑自杀前的一段话："'我何罪于天而至此战?'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又记客论"为将三世者必败"的说法，和王翦孙的被擒。如果太史公崇尚天道，或信获罪于天的邪说，那么，他很可以顺水推舟，接天人感应而论其事。但是，司马迁并不是这样。他最后评论说："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

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显然不是以天罚论人事,而是以人的能力论成败。

司马迁还嘲笑那些崇天道而非人事的人。他评论项羽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天道的存在。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他对方士的态度。方士和公羊学有同一血缘关系。太史公对他们的讽刺也是十分尖刻的。《封禅书》道破了方士来源于驺衍,尤其揭露了历史上鬼神之事的虚诞。他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细究共“表里”,是很有趣的。《五帝本纪》记:“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又记李少君言黄帝乘龙化仙而去,而武帝竟笃愿“如黄帝”。明言“李少君病死”,又说“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这些“表里”的记述,无一不是对方士及其被方士所欺的人的嘲弄。他直称方士们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可见司马迁思想与其不两立的态度。

总之,仅仅从以上粗浅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司马迁虽然活动于春秋公羊学派发端并取得正宗地位的年代,但是,不论从他对春秋公羊学依据的哲学理论的看法上,或者从他对这个学说及其创始人的态度上,都表现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倾向。并且,司马迁把这种精神贯注到了整个《史记》之中。司马迁的思想是和唯心主义的公羊学派对立的。当然,司马迁是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毕竟不能完全脱出唯心论的羁勒。但是,他整个世界观中的光辉的唯物主义因素,及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春秋公羊学的尖锐对

立,是不容人抹杀的。他不是早期彻底的唯心主义公羊家中的人物,而是代表中国进步史学的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原载《史学史资料》1979 年第 4 期)

# 试论“明《易》道”在《史记》研究中的意义

李叔毅

对《史记》的评价不应低于《水浒》和《红楼梦》。司马迁在民族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应低于施耐庵和曹雪芹，而现在学术界的研究、纪念活动，后者远比前者热闹。这是不正常的。常此下去，会使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失掉宏观控制。《史记》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首先因为它内容博大精深语言简古质朴，猎谈资助消遣者不爱读，普及率低；其次因为我们还有旧的教条主义框架的影响。认为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就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史记》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大家公认，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块里程碑，其所创之义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尚罕有大的突破。人们皆知《史记》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实际它还是中国第一部全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确无愧于一个“全”字。如果说孔子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工作的鼻祖，司马迁应是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职志的中华民族通史、全史的鼻祖。炎黄子孙都常以“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在全世界面前竖起大拇指，如果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司马迁《史记》这个最早最大的历史文化宝库那是

很不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做很多的艰苦工作。本文试图从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说明有关上述问题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不是“圣贤驰骛而不足”，而是“庸夫高枕而有余”，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拼搏中立汗马功劳。凭他的光辉家史，完全可以靠交际逢迎争取逐步升迁，而他却要利用公余时间写《史记》。在顺境中他付出了艰辛劳动，“细绎金匮石室之书”，“东渐南浮”；在逆境中，在“下蚕室”之后，他忍受着愚夫愚妇也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苟全性命于当世，其卓绝的信心和毅力仍然来自要完成《史记》的著述工作。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只要对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有个实事求是的认识，也就容易评价《史记》一书的意义了。

有的同志说，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这不全面，而且是舍大取小，舍“道”就“器”。因为其前还有一句话：“究天人之际”。这句话讲的是世界观问题，是理论基础。或以为“究天人之际”的“天”指天帝，这不妥。因为司马迁并不相信天帝，这有《项羽本纪》、《伯夷列传》等篇可证明。八书所记那些似乎很玄的问题也可以从侧面作证明。司马迁所说之“天”应是荀况《天论》之“天”，也就是《易》道中之“天”，这两种书中的天都不指天神而指自然规律，其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规则”相同。“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自然规律是如何支配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的，这是他“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理论基础。

有的同志说，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就是“继春秋”：“他从为封建地主阶级制度定道德纪纲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要像孔子作《春秋》那样，显示褒贬和爱憎。就是‘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因为是非、善恶，贤不肖等，都是有阶级内容的，他的标准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即统治阶

级的政治道德标准。"(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119 页)这种见解也有商榷余地。且不说把自幼"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的地主阶级立场突出到那种程度是否恰当,单就把《太史公自序》所陈作《史记》的目的砍头断臂又截去下肢,只抽出中间的四分之一来作论断,这显然是断章取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读《史记》及有关资料,应该承认司马迁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他不甘心碌碌无为虚度此生,他不屑于阿谀权贵苟图荣宠。他以有光荣的祖先而自豪,他深怕自己有辱乃宗。他的为人处事准则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自己定的做人样板是周公;他之后以定周公为样板,是因为周公"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自序》)。从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家庭有崇高而坚厚的责任感。这是他不畏艰辛,含垢忍辱坚决完成《史记》著述的动力之一。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又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借助他自述的写《史记》的目的来评价了。

司马迁写《史记》是目的明确、观点清楚的。《太史公自序》中对每一篇的目的都有具体交待。在各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的序言、赞语中。都更清楚地亮明了他自己的作意,文繁不赘。不特此也,他写《史记》还有纲领性的,总的目的观点,这些总的目的观点,都和各类各篇的目的观点互相协调,互为补充。从中可以认识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态度。

大家公认司马迁写《史记》是因物赋形"口无择言",因而他对目的的表述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举例来说:

"述往事,思来者"是其一;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其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其三;

“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是其四。

上述诸例,因其所从入之角度不同,看来是四,而就其实质含义而言,仍须归而为一。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看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要认清中华大地社会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变化发展的轨迹,从中找出治乱兴衰的原因,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切实的经验教训。相比之下,下面这段话,总家事、国事、天下事于一体,阐明艰苦恣睢以著《史记》的用心,最为明切,最为具体,最为严肃认真。

>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里所谓“绍明世”,自然是指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达成昌明隆盛之邦。他所要“绍”的“明世”很可能就是“五帝”、“三王”、本纪所记述者。“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五帝”全是“明世”、盛世。自“维禹之功,九州攸同”至“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三王”有明有暗,有盛有衰。单从五帝、三王本纪看,就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借鉴作用。

这里所谓“正《易》传”即“明《易》道”,就是要通过历史事实阐扬“法天则地”的重要性,强调按照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则来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太

史公自序》里至少两次宣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又曾多次以充分肯定的口气宣扬《易大传》观点。而《易大传》则特别强调“《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明《易》道”就是宣扬“法天则地”;不“法天则地”就不能“绍明世”。这样解释《易》道,势将惊世骇俗,下文另有解说。

这里所谓“继春秋”,就是继孔子写《春秋》的原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五伦(即五种社会政治道德规范)为准绳,来评价社会历史人物的是非。这“五伦”是周公在“稽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参照“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和“殷因夏监”的经验,损益古礼而成。司马迁之前,人们就依此来处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起过良好的作用;沿袭千年来,在社会舆论上很有权威。所以孔子作《春秋》能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要“继《春秋》”就是要使《史记》也能起这种作用。这里必须说一些与评价《史记》作用有密切关系的题外话。就是应该怎样认识先秦儒家提倡的“五伦”。有的同志把它和西汉中叶根据荀韩学说制定的“三纲”混为一谈,解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这不妥当。这和司马迁本人的理解不一样。他在《自序》中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从《论语》、《春秋》、《孟子》等先秦正统儒家文献的有关章节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必需具备君德,恪守君道;臣必需具备臣道,恪守臣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莫不皆然。孔子曾想支持“以费叛”的公山弗扰。又曾要求弟子们对盲从主子的冉求“鸣

鼓而攻之”。孟子也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话,可见先秦正统儒家认为“君不君”,既可叛又可诛。其余四伦类此。窃以为司马迁的继《春秋》以正“五伦”,使“乱臣贼子惧”,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起码在阶级社会消灭以前,齐景公的体会即“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仍不可忽视。唯须如“四圣遵序”之“各成法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加以因革损益而已。

这里的“本《诗》、《书》、《礼》、《乐》之际”当与“继《春秋》”连做一片看。据章学诚的《易教上》,自汉至清,以经世济人为职志的学者都承认《诗》、《书》、《礼》、《乐》、《春秋》是先王之政典;这些政典之形成都不是为著书而著书,都是与社会兴衰治乱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即事而言其理。既以《春秋》笔断是非。当然必须以《诗》、《书》、《礼》、《乐》之具体运用为依据。《自序》讲得很清楚:“尧舜之盛,《尚书》载之(亦不废桀纣之衰);礼乐作焉(亦不废桀纣礼乐之坏);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诗人亦未放过幽、厉之替)。《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春秋》推三代之德”是近代学者很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难免影响其对司马迁《史记》作者的深度和广度的理解。为了便于弄清这一点,谨抄录先秦思想家尹文的一段话:

>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导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

> 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善,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荀子《天论》讲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之以治则吉,用之以乱则凶。”此说可与尹文之论相发明。司马迁的“本《诗》、《书》、《礼》、《乐》之际”,就是认识历史事实,必以对《诗》、《书》、《礼》、《乐》为依据,但又必须因地制宜,不可看死。“际”者,交叉之点线,所当审势损益伸缩之处也。有人说诸葛亮的治蜀名言“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就是脱胎于司马迁的“本《诗》、《书》、《礼》、《乐》之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司马迁几经琢磨,理会了家庭、民族交给他的伟大使命,又以“小子何敢让焉”一句掷地有声之言,承受了艰巨重担。青中年时代“东渐南浮”,备尝艰辛;受宫刑之后,奇耻大辱不足以挠其志。这种精神情操,是可歌可泣的。而其所考虑所表达的范围,言时间则远于黄帝,近及汉武;言空间则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述华夏而兼及四夷;言事类则“本纪”、“世家”以见治乱兴衰之道,“书”、“表”、“列传”以明性命成败之理,真可谓熔天道人事于一炉。善读史者,尽可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要素从“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角度去认识《史记》,则对《史记》作用与内涵的评价,应比现在一般人的评价为高。

司马迁曾以不同形式在多处自陈《史记》的作用与意图,而以“绍明世…小子何敢让焉”一处最庄严、最明切、最具体。“绍明世”是其愿望,“继《春秋》……”是其亮明决不违背民族传统的坚定态

度。“明《易》道”则是要宣扬发展中国的最古老的哲学传统，即中国文明的理论基础。“述往事”何以能“思来者”？这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规律，即《易》哲学阐明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太史公自序》中的提法，时在“下蚕室”任太史令之后，思想更成熟，提法更简赅，抽象程度也最高，所以也最容易使观点各不相同的读者“千百其意焉”。

令人骇怪的是，解放以来学者研究《史记》的作意都避而不谈“明《易》道”。这可能是因为《儒林传》中有“《易》为卜筮书，得不毁”之说；卜筮是唯心迷信，而宣扬唯心迷信是错误的。由古至今，以为《易》为卜筮书的人很不少。《易大传》、《周官》、《国语》、《左传》等书都有以《易》卜的记载。朱熹的《周易本义》还附有《卜筮仪》。但是就两千多年来为数近千家的《易》学专著看，《易》的主要作用不是卜筮，而是阐明宇宙的本源及其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混沌初开，生出阴阳二气。即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力，然后，“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见《九家易》）。这就是所谓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先民早已抽象概括起来的公式（冯友兰称之谓“宇宙代数学”）的实际含义。去年庞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把中国的“五行”和“八卦”卦象加以砍削，以附合于古希腊哲学的“地水风火”，并以之为《易》学的宇宙本源，这不一定符合《易》哲学的实际。《周易本义》在《大传》注中说“有理乃有气，有气乃有数”，“万物皆数也”。他是在解释《易》道时说这番话的。这番话看似玄虚，实有至理。我读过的古今数十家《易》学专著都是从“道”、“理”、“气”、“数”四个基本方面对

天时、人事进行研究的。道(自然规律)→理(必然趋势)→气("由静趋动,自无入有,兆而未形"的象)→数(物之成形条件即各种制约性数据)。《易》哲学以此为天下万物"生、住、异、灭"的本源与动力。它以为"天地一阴阳,物物又各一阴阳":万事万物皆以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阴阳二"力"的消长及环境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生长、发展、变化。这种认识与我们现在坚持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只有精粗之分,而无根本背谬之处。《易》学是主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这就是《天官书》中"太史公曰"段所说:"……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口耳孤传到宋代始公诸于世的《伏牺六十四卦图》(包括平图、方图、圆图)实际是先民观察天象与四季变化关系的总结记录。这是游牧与农业时代必须集中力量精心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相信司马迁的"伏牺至淳厚,作八卦"的说法。"至淳厚"就是具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毅力。《自序·律书序》还说"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这应该是他改造古历为太初历过程中的经验体会。黄帝造甲子诸说,有人以为先民思想必极简单,"无征不信",但是根据"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的准则,只信文献记载,不信口耳相传,也未免武断。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曾细致地考究古代夹心镜的制作方法与理论,终无所获。他说,"古人淳朴,制作多密;今人性粗气浮,或不能精"。我在杭州西泠公园看过"汉洗"以后,深有同感。尽人皆知,创造电子计算机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数学上的二进位制,而二进位制是来布尼兹在钻研"伏牺六十四卦"的逻辑规律过程中悟出来的,李政道、杨振宁先生回国讲学曾一再呼吁认真研究《易》八卦,以前有人曾以针灸、气功为唯心,盲目加以排斥,现在已证明是个错误。可见用先验主义

理论框架,不加深究就乱贴标签,危害很大。

司马迁写《史记》以"明《易》道"为主要任务,这在《史记》的各体各篇中都可看出来,"八书"更为明显。《太史公自序·礼书》:"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这是要通过古今礼制变革,来说明《易》哲学的"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见《易大传》)。《乐书》:"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音、乐上的邪与正。自始至终如阴阳二气之对立依存)……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见《自序》)"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见《乐书》)。这是从乐舞发展史上说明《易》哲学的人事、政治相互依存制约关系的。其余之《律书》《历书》……类皆如此。

例如:《日者列传》记司马季主把自视颇高的宋忠和贾谊批驳得"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狼狈有如《庄子·盗跖》所述见盗跖后的孔子。而司马季主所言,全是"明《易》道"。写《扁鹊仓公列传》目的在说明"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其所守之"数",与后世"弗能易"之"序"全是《易》哲学中"道→理→气→数"之序与数。这是通过古代中医学发展史以"明《易》道"。写《孙子吴起列传》目的在说明"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这里面重要的是"与道同符";此"道"即《易》道,这是在古代军事学上"明《易》道"。《孙子兵法十三篇》早在唐代已被郑友贤公开宣称为"兵家之《易》"。列传"明《易》道"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再多举。

《易大传》在阐释"爻变"理论时,特别强调"参伍以变,错综

其数”。司马迁写《史记》大量采用“互见法”,随宜创造体例;写列传或单或合,使人与事都体现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易》学规律。不能说其中没有“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这种通变法则的影响。这是在创例实验中“明《易》道”。

中国古代哲学和史学大都以社会政治的“治乱兴衰”之由为主要研究对象,司马迁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他的“明《易》道”的目的表露得更为明显,论六家要指以“《易大传》……”开头,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其“一致”与“同归”皆指推治乱兴衰之由使天下达到大治;进一步说,即“同归”于《易》道,“一致”于《易》道,以《易大传》为代表的儒家《易》以讲社会人事上的吉凶祸福为主,集中到王权政治上,则只有一段言简意赅的话:

>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人,朱本作“仁”,此从吕本)。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在这里,帝王的首要条件是本天地好生之德,惠济苍生,王位(权)是帝王之大宝;如有德而无位,则德无可施。众庶拥戴是保持王位最基本的条件;帝王与众庶“亦一阴阳”,互相依存,无众庶便无所谓帝王。在上述前提之下,帝王的职责只有三项:理财——发展生产,保障物质生活条件;正辞(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各有其名,有其名者必须有其德与才,消除“鹊不为鹊、乌不为乌”的贤愚无别、吏治昏乱现象;禁民为非——“牧马者,亦去其害而已矣”。为非者(害群之马),或教之,或罚之,甚或杀之。不为非者,则听之任之,使各尽其性。这样的王权王责真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这近乎一种“乌托邦”,但作为学者的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它却一点

也不坏。司马迁以"绍明世,明《易》道"为职志,不惜含辛茹苦,含垢忍辱去完成《史记》,也正是如此。他写"本纪"、"世家"、"十表"、"八书"和"列传"都以此为主要指导思想,他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都以此为主要准绳与归宿。在司马迁的书里,五帝三王之所以兴,桀、纣、幽、厉之所以亡,秦王朝之暴兴与暴亡,以及"文景之治"之所以成,都可以而且必须从上述《易大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段话中找到最合理的证明。这是《史记》"明《易》道"的较具体较易于理解的方面。如欲从"世家"中找到例证,则可以先研究《汲黯传》,特别是其中的"弘大体,不拘文法",与"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如欲从"合传"义例中找证明,则可以先研究《管晏列传》中"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其术相反,其功则同,因为《易》道政治学只要在有德、有位,能得人的前提下,才能做好"理财"、"正辞"与"禁民为非"三件事。

据上所述,班固说司马迁"尚黄老"是对的,黄老之学是《易》学之一变,其术以"无"为本,始于"太极",终于"太极";其政治学就是《易大传》的政治学,说司马迁"贱六经"则不对;《易》为群经之首,司马迁以"明《易》道"为一生最大职志,何况还有"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对孔子的推崇已经无可复加了。司马迁批评的"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只是儒家末流之敝,也许就是直指公孙弘、桑弘羊等冒儒术之名,以苛细苟阿宠荣,以苛细穷民,所搞的那一套;如孔子治单父也是那样,就万难奏效。韩愈以儒学"圣圣相传"的接力站长自任,其实他不深通儒学,如果他了解化而裁之之"变",推而行之之"通",他就不会写《原道》阐佛老,因为他所阐的只是以"妖僧妖道"为代表的佛老末流之敝。儒家也有末流之敝,其代表人物为"乡愿",他应该先阐乡愿,因为他们大都掌权,

所以危害社会政治甚于妖僧妖道。"原"老,应原到《易》道上。《金刚经》曰:"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等差。"可见,就其根本立脚点而论,佛道与《易》道初无二致,章学诚《易教下》曰:"佛氏之学,来自西域……反复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罗根泽在《古史辨》四册序言中有个论断,大意说,中国文化到清末已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他虽未谈到三家本原皆出于《易》教,但是如果排除三家末流之敝与手段方法上的差异而衡之以"一致百虑,同归殊途",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要求,的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三家都强调自强不息,舍己从人,与人为善,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在世界观上,这三家都主张从无到有;关于万事万物的本源,儒、道二家都说是阴阳二气的激荡,释家则说是魔与道的搏斗,两家都承认世界是"新新不已"的;释家的"生、住、异、灭"连续起来就是儒道两家的"穷、变、通、久"。追求的目标,儒家是"逍遥",释家是"极乐"。说法不同,手段亦异;但就实质而言,都指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富裕,互相友爱的理想社会。那时,世俗社会不再是"苦海无边",不会再有人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门户之见消释,缺少了对立面。儒家也将不复存在了,那才真是"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而此种美好世界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这种世界的确是崇高而有无比的魅力,但是,求其实现需有很高的哲学。东西方哲学必须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但我们必须认准矛盾的主导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是当代最先进最有威力的哲学,就其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基本点来说,它和《易》哲学相通之处甚多,背违之处则无。当前急需哲学研究工作者排除对《易》学的偏见,不把暂时未懂的术语和道理武断为"唯心鬼话","探迹索隐,钩深致远"是需要一番苦工的。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苏渊雷《易通》、周士

一、潘后明《周易同契新探》等书,对此已有很好的开端。他们都承认《易》道是先民经过观察、验证而形成之世界观,且已把“阴阳”与“动力因、质力因”挂钩,进行对比研究。我们经过辛苦钻研把《易》道和辩证唯物主义沟通起来,丰富它、发展它,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威力必将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技术设备,但在几千年就发明了干支记时法、指南针、木鸢、炼丹术和火药等令西洋人惊叹不已的东西。中国的医药、针灸和气功,其方法和理论之玄妙至今尚不可以科技手段作验证。而它们都是《易》道的产物,它们的祖传秘籍都从“太极图”讲起,便是明证。依此推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国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用以迎头赶上西方暂时先进的科技水平,也不是绝无可能的。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真理太多了,人们不应该有民族自卑感,更不应该画地自限。

从这个高度去理解司马迁为“明《易》道”且写成《史记》,可以认识得更为广阔,更为深刻。如上所述,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在“本纪”、“世家”据《易》道而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一种关于“祖传治乱兴衰”的规律性原因——或兴或衰,只看有为者能否处理好“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三件事。

《平准书》是中国第一篇政治经济史。他用历史事实描述了自秦皇至汉武的经济政策的变迁过程,及其与政治、军事、社会风气的相互影响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已隐约可见。他是根据什么哲学而有此等识力的呢?请看他的结论:

太史公曰:……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这仍是《易》哲学。刘彻是个不肖子,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使他耗尽祖先留给他的富厚家业。财政拮据,就无视经济规律乱改政策。他不能"正辞"(滥用桑弘羊去打击卜式)以"禁民为非",当然也达不到"理财"的目的。

《货殖列传》是中国第一篇工商业经济通史,上自唐虞,下迄秦汉,广及全国地区都邑。有国君致富之道,有个人发家之途。物产、民俗、生意经,无不具备。真是丰富多彩。"口无择言"、"体园用神"如舞龙蛇不见其首尾,如不了解,《史记》"明《易》道"之宗旨,便很难掌握其结构与主题。"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拟议以成其变化"。《易大传》是其"体园用神"之所自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绳之以法);最下者之争(必形成对抗)",这是《易》道中有为者"守位"、"聚人"必须坚持的原则。"君子富以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只要不为非,何必"割尾巴"? 这是"禁民为非"政策的必要补充解释。既然所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至今尚可适用的商业经,但也都是《易大传》"以动者尚其变"在商业上的具体化。与此同为阐明《易》学"穷、变、通、久"之道者,尚有"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

例子不再多举。本文的目的是促《史记》研究工作更加深入。"明《易》道"是司马迁自己提出的哲学任务。不抓住它,《史记》研究就很难深入。本文只是个"试论",如能引起大家把《史记》与《易》学联系研究的兴趣,相信会指正本文的许多纰缪。并把文史哲的研究水平提高一步。

(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4 期)

# 《史记》与《诗经》的三种关系

陈桐生

《史记》的学术宗旨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诗经》作为六经之一，正在《史记》“厥协”的范围之内，《史记》在史料、文化、美学几个层次上都深受《诗经》影响，因而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本文不揣浅陋，试对此做一些专门探讨，以此向方家请教。

## 一

在探讨《史记》与《诗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理清司马迁的《诗》学渊源。

在《史记·儒林列传》论到的鲁、齐、韩三家诗中，以《鲁诗》最为先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汉书·楚元王传》载：“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可见《鲁诗》最早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史记·儒林列传》也说：“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这是汉人对三家诗的评价，也是司马迁对三家诗的认识。从《史记·儒林列传》不载《毛诗》来看，司马迁未见《毛诗》。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司马迁所习为《鲁诗》。

将《史记》所载《诗》说与三家诗比较,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例如对于《诗经·周南·关雎》之旨,《鲁诗》认为是刺康王溺于女色不愿早朝,《齐诗》认为是歌颂后夫人品行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则主张是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史记·儒林列传》亦云:"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司马迁是用"见盛观衰"的方法来看待《关雎》的,他认为在西周盛世之中即已显露出衰败之征,诗人作《关雎》是为了防微杜渐,而这,正是《鲁诗》的观点。

又如《诗经·小雅·鹿鸣》,齐、韩两家认为此诗之旨在宴群臣嘉宾,独《鲁诗》主张周道陵迟,周王宴私妃后,不能厚养贤者,故诗人作《鹿鸣》以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可以看出《鲁诗》为司马迁所本。

再如《诗经·召南·甘棠》,《齐诗》认为召公通过劳身苦体而思与圣人周公看齐,《韩诗》以为诗人通过美政与虐政的对比而作是诗,《鲁诗》则突出召公体恤民情而得民和的一面。《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与三家诗相比,《史记》最近《鲁诗》。

从这些比较分析中,可见司马迁的《诗》学来源于《鲁诗》,《史记》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鲁诗》说。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说:"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在《鲁诗》尚在流传的王充时代尚且如此,今天《鲁诗》早已不存,《史记》之于《鲁诗》,更称得上是千古功臣了。

## 二

司马迁著述《史记》首先必须解决史料问题。他当时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史料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各国诸侯销毁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史书记载,另一方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烧掉六国史书,仅保留秦国历史。这样六经异传中的史料就弥足珍贵,如《诗经》中有一些片断的历史记载,而且经师们在说《诗》时往往要结合历史背景,在一首诗之后往往就有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史记·殷本纪》论赞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不只是《殷本纪》,《史记》中许多史料来源于《诗经》。司马迁还面临着甄别史料的困难。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中有一些历史故事或传说,但是百家言史,其侧重点不在史而在借史立论,他们笔下的历史故事虽然多少有一些真实历史的影子,但亦有相当部分是出于他们的想象与臆造。尤其是上古史部分,更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对此,司马迁自有他的甄别标准,这就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他认为六艺俱经过孔子删述,因而最具有历史真实性。《诗经》也是司马迁用作考信的标准之一。

在殷、周民族起点问题上,司马迁采用了《鲁诗》的"两言"说法。《诗经·商颂·玄鸟》载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诗经·大雅·生民》载嫄履巨人迹而生后稷。《鲁诗》据此提出了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观点。《诗》家这一观点与《礼》家相矛盾,《大戴札记·帝系》载契与后稷俱为高辛所生。在《史记·三代世表》正文之后,附录了张夫子与褚先生的论辩之词。张夫子的问难是:"《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

无与《诗》谬乎?"对此,习《鲁诗》的褚少孙回答说:"《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史记》即采用了这种观点。《殷本纪》和《周本纪》根据《玄鸟》和《生民》,以圣人感天而生作为这两个民族的历史起点。但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又载:"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高辛生卨(契),卨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这就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两言"方法。《秦本纪》关于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以及《高祖本纪》关于刘邦为龙种的说法,应该是受到圣人无父而生之说的影响。

由于史料缺佚,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有时仅根据记载帝王世系的谱牒,记录王位的继承情况。例如《周本纪》从庆节到公叔祖类,前后凡8代,都是一笔带过。《诗经》中的一些史诗,正好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周本纪》文王以前的部分,司马迁主要是根据《生民》、《公刘》、《绵》和《皇矣》等史诗写的。如《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史记索隐》云:"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司马迁认为周民族的兴盛是从公刘开始的,这个观点来源于《诗》家。古公亶父时期有一次从豳至岐下的大规模的迁徙,关于迁徙原因,《诗·大雅·绵》没有说明,《鲁诗》认为是为了摆脱戎狄的进攻。《史记·周本纪》中的古公亶父事迹,是司马迁综合《绵》与《鲁诗》说写成的。从《鲁诗》关于太王避戎迁岐的说法中,司马迁得到深刻启示,认为太王迁岐对周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使周民族摆脱了戎狄的侵略,更重要的是脱离了戎狄文化而接受先进的中原

文化："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从此周民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说："盖王瑞自太王兴。"司马迁根据《诗经》史诗所提供的史料，再结合他的卓越史识，描绘出一条周民族从诞生逐步走向昌盛的线索，他以这几首史诗分别作为周民族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由此而将片断的史料组成系统连贯的历史。

《史记》对有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以《鲁诗》说为准。如《卫康叔世家》载州吁"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此事载于《左传·隐公四年》，但《左传》载州吁伐郑是因为"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不是为共叔段报仇，这与《卫康叔世家》所载不尽相同。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云："《史记》言州吁为共叔段伐郑事，与《左传》异，史公用《鲁诗》，鲁说当然也。"陈乔枞所指，是《鲁诗》对《诗经·邶风·击鼓》的解说。又如卫宣公太子伋与寿争死之事，不见于《春秋》及其"三传"，倒是《鲁诗》在解说《诗经·邶风·日月》时，讲述了这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录用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又载："太子伋弟寿争死。"这一段历史完全是根据《鲁诗》说记载的。再如《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根据《汉书·匈奴传》所载："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夷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可见《史记》所说的"诗人作刺"乃是指《诗经·小雅·采薇》。《鲁诗》认为《采薇》是周懿王时期诗人刺时之作，而《毛诗》则以为是周文王派遣将帅出征之作。《史记·周本纪》在记述周文王事迹时不载《毛诗》所述史事，可见司马迁是采用《鲁诗》之说。

司马迁在上至五帝下迄春秋这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上，广泛

地吸取了《诗》家所提供的史料。没有《诗经》,司马迁写殷、周历史时就会更加困难。

## 三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说《诗经》是王道教化的产物,因为王道政治的崩坏而导致"采诗"制度的中止,而孔子的《春秋》则使中断了几百年的王道文化传统又接续上来。孟子的说法揭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一个认识,即把《诗经》看作是王道政治的遗迹,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王道文化传统的内容,这些文化传统对现实政治能够起到指导与匡正作用。汉家立《诗》学博士,是出于一种文化目光,《鲁诗》学者赵绾、王臧及其师申公积极议立明堂以朝诸侯,试图在《诗》学文化旗帜下实施应天改制。司马迁述《诗》,决不只从中吸取若干条史料,更重要的是出于文化目光。因此,继承《诗》学文化精神,也就构成《史记》获益于《诗》的第二层次。

《史记》的《诗》学文化观的核心,乃在于阐发《诗经》的仁民爱物,勤于民事的德治精神。司马迁在述《诗》时反复说明,统治者如果施德于民,体恤百姓,那么就应该予以热烈歌颂。例如召公能够体恤民情关心民事,他当年遮蔽阳光风雨的棠树成为他勤政爱民的历史见证,所以人民写下了《甘棠》这首诗,怀念这位仁民爱物的杰出政治家。宋襄公修行仁义施德于民,诗人正考父认为这是国家兴盛的关键所在,当年宋人的老祖宗契、汤和武丁等人就是依靠以德为治,才夺取并巩固了殷商王朝的政权,为此正考父写下了《商颂》,借歌咏祖宗业绩来赞美宋襄公的仁义行为。周人写作《生民》,是因为这位始祖是一位杰出的种植能手和农业

发明家，为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做出了杰出贡献。《公刘》和《绵》的创作，乃是出于公刘和古公亶父这两位周人领袖继承了后稷的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他们依靠德治获得了人民的拥戴，由此而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周民族的事业，“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司马迁认为，《诗经·周颂》的创作是以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作为背景的。《周本纪》载“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说明《周颂》是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情欢畅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周颂》中的《丰年》、《载芟》和《良耜》等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那种仓廪丰实、妇孺欢欣的情形。这些颂诗以统治阶级勤政爱民的业绩作为依据，这与后代那种无功而颂功、无德而歌德的粉饰太平的御用文学完全不同。司马迁认为，统治者寄情声色残民以逞，这是《诗经》中大量刺诗得以产生的原因。例如康王迷恋女色不愿早朝，诗人见微知著，认为这是王道缺失的征兆，所以写下了《关雎》这首刺诗。周王不去厚养贤士而与后妃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是《鹿鸣》的创作契机。秦穆公以活人殉葬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诗经·秦风·黄鸟》即是为其而作。这些刺诗是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批判，也为后代的帝王政治提供了历史借鉴。《诗经》中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春秋中叶以前，对汉人来说它早已完成了由政治而文化的转化，特别是在汉武帝表彰儒术，《诗经》的经学地位得以确立后，这种文化传统更具强烈的指导意义。《史记》对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的歌颂与讥刺，都可从《诗》学中找到文化依据。

突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教承担精神,是司马迁《诗》学文化观的又一重要内容。《史记》一方面对最高统治者寄予深切厚望,期待着出现仁民爱物的明主圣君,创造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理想的王道社会;但另一方面,《史记》认为诗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决不能无所作为,不能对现实政治的清明与黑暗无动于衷。诗人,无论他是卿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天下负有不可推托的重大责任。《毛诗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鲁诗》是不是有类似的说明,已经无法看到,但从辑佚的《鲁诗》来看,它在说《诗》时体现了同样的精神,而这种以一身系天下的精神为司马迁所继承。《史记》揭示了诗人们对国家兴亡、人民苦乐所抱有的深沉责任感,指出诗人以他们特有的敏感气质,及时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在君主开明民心欢悦的时候,在时代转折衰败之征初露的时候,在异族入侵危及中国的时候,在君昏臣佞政治黑暗的时候,诗人们挺身而出引吭高歌,抒发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种种情感,他们的诗篇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代表着公平、正直和正义。即使是那些"讥小己之得失"的《小雅》作者,他们虽然歌唱的是个人的苦乐得失,但最终归结到"其流及上",也就是通过他们个人的遭遇,向统治阶级反映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而对现实政治起到讽谏作用,以期政治得到改良。而诗人们的最高政治理想,乃是前文所述的以德治为核心的王道政治。司马迁突出诗人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既是对古代诗人的颂扬,更是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他吸取诗人的宗教承担精神并化为自己的人格,这一点,从《史记》所表现的对人类的严肃的责任心上可以见出。

## 四

《诗经》影响《史记》的第三层次，表现在司马迁接受了《诗》学关于美刺讽谏的美学思想。

《诗经》的某些诗篇表述了美刺思想。如《诗经·魏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其他如《陈风·墓门》、《小雅·节南山》、《何人斯》、《四月》、《大雅·民劳》、《桑柔》都明确地表达了刺诗之旨。《大雅·嵩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烝民》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是美刺思想的极好表述。《诗经》的美刺思想经过儒家的传授与阐发，到汉儒说《诗》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宗旨。如《关雎》为《诗三百》之首，《鲁诗》即把它说成是一首刺诗。司马迁说《诗》时也强调了美刺之旨。如《周本纪》说《小雅·采薇》、《秦本纪》说《秦风·黄鸟》、《十二诸侯年表》说《关雎》和《鹿鸣》、《鲁周公世家》说《豳风·鸱鸮》及《司马相如列传》说《小雅》等，都突出了讽刺精神，强调诗歌批判现实政治、干预现实生活的功能。司马迁极为重视《诗经》中的颂美之诗，如《殷本纪》说《商颂·玄鸟》，《周本纪》说《生民》、《公刘》、《绵》、《文王》和《周颂》，《燕召公世家》说《召南·甘棠》，《司马相如列传》说《大雅》等，都表现了诗歌的颂美功能。在司马迁对美诗的阐述中，渗透着一种理想精神，因为颂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君主开明民情欢畅的政治局面，正是司马迁毕生追求、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些论者认为，《史记》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思想，它以“舒其愤”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与实质，突出了文学所具有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性，司马迁是处处从个体与社会的矛

盾冲突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去观察文艺的。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史记》美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史记》述《诗》凡十八例,其中六例为刺诗,十二例为美诗,美诗的数量正好是刺诗的一倍。这个铁的事实表明,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决不局限于讽刺批判一个方面,他不仅从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去观察艺术,更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角度来说明艺术。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难以使我们看到《史记》美学的全貌。忽视了《史记》诗学观中的颂美内容,也就等于阉割了《史记》美学中的理想精神。那种把司马迁看作是一味地向着统治者冲杀的斗士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司马迁还以《诗》学的美刺讽谏理论去评价、规范屈原的《离骚》,他的依《诗》论《骚》的观点,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中有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司马迁以一个"怨"字来概括《离骚》的创作契机。《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从楚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和屈原的生平遭遇去研究《离骚》,指出屈原是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愁满天地、无可告语的情形下,产生悲愤填膺无法化解的情结,不得已而诉诸诗篇。司马迁指出《离骚》由怨而生,这与孔子所说的《诗》"可以怨"是彼此一致的。

第二,司马迁认为《离骚》兼得《风》、《雅》之旨。《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离骚》以"求女"来表明对美政理想的追求,诗中

虽然激烈地抨击了楚王的昏庸和群党小人的竞进贪婪蔽美嫉贤，但诗人最终旨趣是“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离骚》抒情诗主人公在漫游天国之后最终回到楚国的土地，选择了以死殉国的道路，即是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君国的态度。这就表明在司马迁心目中，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直接继承了《诗经》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灵魂。

第三，司马迁认为屈原创作《离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政治讽谏。《屈原贾生列传》云：“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离骚》历述帝喾、汤、武、齐桓的政治举措，借述说历史上的政治盛衰来讽刺楚国现实政治，由此来深刻地说明德治的重要性和国家兴亡治乱的因果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作辞以讽谏……《离骚》有之。”这种作辞以讽的方式与《关雎》、《鹿鸣》、《鸱鸮》、《采薇》等作者作诗刺时的做法是彼此一致的。

第四，司马迁认为《离骚》具有文约辞微的委婉表达方式。《屈原贾生列传》云：“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文约辞微，言近旨远，这实质上就是《诗经》的比兴二义，尽管司马迁没有明确使用比兴概念。司马迁根据依《诗》论《骚》的思路，用读《诗经》的方法去读《离骚》，由《诗》的“六义”而读出《离骚》也具有比兴二义，后来王逸即在司马迁论《离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观点。

从这四点内容来看，司马迁力求将《离骚》纳入《诗经》的创作模式，他认为《诗》、《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离骚》是《诗经》美刺讽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尽管北国的《诗经》和南方的楚《骚》分别诞生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母体，但它们的区别在《屈原贾

生列传》中被抹平了。司马迁依《诗》论《骚》的批评模式,曾在汉代引起一场关于《离骚》是否符合经术的大论战,这个讨论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可是今天有些论者却认为司马迁丢弃了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继承和发展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发愤以抒情"的楚《骚》美学思想,这种观点显然与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综上所述,司马迁所说的"厥协六经异传",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应该循着司马迁指点的线索,逐一对《史记》与六经异传进行个案研究,理清《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从而使《史记》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5 年第 3 期)

#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

赵光贤

《史记》成书后，最早对它作出批评的人大概要算班彪、班固父子了。《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有这样的评论：

>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按指孔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后汉书·班彪传》述彪对《史记》的评语是：

>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值，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两段文字，大同小异，班固的话当然是根据其父的话，他们的话虽是批评《史记》，其实是批评司马迁的思想。

过去读《史记》的人，多不同意班氏父子这样的评语，但都语焉不详，本文拟就班氏父子提出的三点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不可避免地重复前人的话外，也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 “先黄老而后六经”

这条指摘是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序对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推尊道家,其言曰: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以“虚”为常道,以“因”为君纲,以“神”为生之本,这都是黄老家言。

>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与此比较

> 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这种议论在汉初黄老盛行之时,是不足怪的。但是这些议论,《自序》中明明白白地说是司马谈的。“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

元、元封之间”,这太史公当然是指司马谈。下文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更可证明论六家要指的不是司马迁。班氏父子不察,竟误以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迁之言,真是张冠李戴。

以下我们从《史记》中举出一些对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反证。

《史记》的体裁,列帝王于本纪,列公卿大臣于世家,列一般人物于列传,这是有等级性的。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自序》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列老子于列传,《自序》只有十字:“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与韩非同传。显然他是扬孔而抑老,这是反证之一。

《孔子世家赞》先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后说:“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这几句话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仰心情。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尊孔子为至圣,不独非老子所能比,连五帝三王都没有得到这个美称,这是反证之二。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

>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先人有言”指其父司马谈临终时命他继续作《史记》之意,

他不敢辞。而《史记》之作并不仅仅是记事,而是要“正《易》传,继《春秋》”,这至少是司马谈的想法,而被他接受了的。他对壶遂的问话,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是他谦让的话。他在答壶遂时引董仲舒的话很多,而董仲舒是讲《公羊春秋》的大师,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引董仲舒的话答壶遂,其意旨很明显,就是作《史记》,以继《春秋》。这是反证之三。

司马迁是儒家,认为儒家应当行孔子之道,因此对于曲学阿世之徒非常有反感,常于文中自然流露出来。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

> 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

关于荀卿,他说:

>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从这些话里,可见司马迁感于儒道不行而发的慨叹。在《叔孙通传》以鲁两生与叔孙通对比,讥讽叔孙通曲学阿世、用意亦同。凡此都可见司马迁尊崇儒家的思想。这是反证之四。

司马迁著《儒林列传》讲述汉兴以来,儒学由衰而盛,其序曰: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从这段言论,可见司马迁对战国以来,儒学由盛而衰,汉兴黄老之言盛行,于武帝时儒学又由衰而盛,深有感慨。所以在这些篇序的开头就说:"余读功令(按指武帝时下的法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表示儒学经历过坎坷,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几乎中绝,到武帝时居然又复兴起来,他是多么高兴。这是他轻六经、重黄老的有力反证之五。

《伯夷列传》开篇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六艺是儒家经典,也是最古的史料,孔子用以教学生。

《滑稽列传》首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迁于《滑稽列传》中为淳于髡、优孟等人作传,而首引孔子的话,用意何在? 这表明淳于髡之流能以滑稽语言讽谏君主,使之改过,往往胜于正言直谏,"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合于六艺,可为儒家之羽翼。这是反证之六。

《货殖列传》首引老子之言而驳之(详见第三节),这是反证之七。

孔子主张德治，反对法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司马迁相信孔子的话，他在《循吏列传》序中说：

>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在《酷吏列传》序中也有类似的言论，这都说明司马迁是儒家，此班说反证之八。

从上举八项反证来看，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完全错误的，今有人受其谬说的影响，认定司马迁是道家可以迷途知返了。

##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班氏父子这一条指摘，本于《游侠列传》，传首有长序，以游侠与儒生对比，班氏只看文章表面，司马迁的真义并未读懂，以致发生误解。下面试将《游侠列传》摘要加以解说：

>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按此指史书)，固无可言者。

开篇引《韩非子·五蠹篇》二语，从法家的观点看，儒与侠都犯法禁，二者皆为韩非所讥。但学士即儒生往往见称于世，而任侠之人则多默默无闻。下面再分析儒生也并不一样。有的儒者"以术取宰相卿大夫"，暗指叔孙通、公孙弘之流，能阿谀奉承世主以取

高官厚禄,并不是真正的儒者,所以说“无可言者”。

>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真正的儒者如季次、原宪,是颜渊一流人物,“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虽然终身穷苦,但他们死后四百余年,弟子们还思念他们。司马迁将二种儒者加以比较,显然他推崇后者,而鄙弃前者。

>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以游侠与季次、原宪相比较,其行动往往“不轨于正义”,但“言必信,行必果”,正是孔子所称道的。至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使将亡者存之,将死者生之,“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正是游侠的可贵之处,不能一笔抹煞。以下司马迁又借题发挥他的愤慨,他历举古时“有道仁人”,如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等人,都曾有不幸之时,遭逢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是为他自己发牢骚。下文又以有德的人与无德的人作对比。什么叫有德?他说:

>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以)飨(享)其利者为有德。”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鄙人指一般人,他们认为有利就是有德,什么叫仁义?有利就是仁义。司马迁愤慨当世是非颠倒,义利混淆,所以同意《庄子·胠箧》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愤世疾俗之言,下文说:

>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

这全是反话。因为乱世里没有什么仁义,没有什么是非。这样看来一些儒生读书,自命清高,而穷困一生,真不如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下交征利",还有什么仁义可说,所以他说:

>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这话是说,从表面上看来,真正的儒生若季次、原宪穷困一生与"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不能相比。司马迁也是儒生,即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同情游侠,实际上是为儒生鸣不平,也为他自己发牢骚。所以我们读《史记》不能只看正面,还要看反面,才能理解司马迁的真义。班氏父子读《史记》,看游侠受到称赞,就认为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那真是根本不理解司马迁。

##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史记·货殖列传》与《平准书》讲的都是汉代经济史,但其中心思想与《游侠列传》是一贯的。我们读《货殖列传》应当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司马迁承认自秦末大乱之后,经过文、景用黄、老之术,

与民休息,到武帝时,经济恢复到战国时盛况,并且有所发展,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达到一个高峰,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反。所以在传首引老子言"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说明司马迁根本反对老子的幻想,所以他是反对道家的。司马迁认定社会总是前进的,生产是发展的,农、工、商各业必定随着人民的需要而与时并进。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违反。所以他说:

>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经济生活自然向前发展,统治者最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与之争。老子的开倒车想法,就是要"与之争",那是最坏的。人民要生活,统治者更是穷奢极欲,农、工、商、虞各种生产活动不能禁止,所以他说:

>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按此指物价),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说,人们从事生产、流通之业,是符合"道"与"自然"的,不是人主用行政命令强迫能得到的。他并且进而说明其理论根据。他说: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

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就是说,人的天性,就是为了生活,为了满足嗜欲,用各种方法,追求富和利。于是他列举古之名人,如管仲在齐,范蠡在陶,白圭在周;猗顿、郭纵、乌氏倮等无不致巨万,比于王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除了商贾之外,地主阶级也兴盛起来。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按此指地主)、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此字衍,《汉书·食货志》无户字),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下有错简,删)。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这是没有封邑的地主阶级不劳而获,专以剥削农民致富的非常形象的描写。这在西汉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总而言之,汉代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无不孳孳谋利,司马迁如实地记述下来,认为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迁对于上述情况是不是满意呢?应当说,不满意。他在《孟子荀卿列传》序的开端

就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呼,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这几句话表明了司马迁的根本思想,继承了孔孟,反对自天子至于庶人,地位虽不同,好利争利却无区别。天子影射汉武帝,在《平准书》里详叙武帝穷兵黩武,豪强兼并,民不聊生之状。他说:武帝初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其后汉数伐匈奴,形势又变:

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结果必然使政治日趋腐败,于是:

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固(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

其时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

> 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其费以亿计……而富商大贾或蹛(滞)财役贫……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其后连年用兵,府库空虚。元封元年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汉书·食货志》)作"大司农",管理天下盐铁,禁止郡国商贾冶铁煮盐,完全归国家经营专利,"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总之,武帝一朝,官家与商贾争利,人民遭涂炭。司马迁不敢公然加以反对,只是照事实直叙下来,其意自见。《平准书》以引卜式之言:"亨弘羊,天乃雨"作结,戛然而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卷二六)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当时兴利之臣的做法是不赞成的,特不敢公然反对而已。

司马迁因谏李陵降匈奴事而被刑,是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事,他在《报任安书》中把他满腔悲愤之情尽情宣泄出来。当时他的《史记》还在撰写中,否则他是会自杀的。武帝时买官赎罪,公开进行,如果他有钱,他很可能不受刑而出狱,可是他苦于"家贫不足以自赎",这使他非常痛心。因此他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的致富巨万,存有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又认为像武帝时"上

下交争利”的现象是危险的，是不符合儒家的治国之道的。特别是联想到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那些富商小贩都能坐致巨万，而自己是读书人，又是天子的近臣，“太史令”的官也够高贵的；但是秩不过六百石（《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不要说不能与富商大贾比，也不能和种田的秦扬、掘冢的田叔、博戏的桓发、贩脂的雍伯、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卖胃脯的浊氏、马医张里等人比，他从这些人得出结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侯同乐”。这就是说，富贫不是天生的，在于会不会谋利赚钱。司马迁说这话显然是在发不平之鸣，这是反语，必须从反面看，才能理解司马迁的心情，认识他的思想。班氏父子只看文章的正面，不会看反面，当然是不能理解司马迁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 《史记》与汉代经学

刘家和

司马迁的《史记》作于汉武帝时代，正值经学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崛起的时期。作为一部既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又能从一定角度上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杰作，《史记》自然会与当时的经学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以及具体情况如何，则自班彪、班固父子以下，学者的见解实多分歧。如果想详细地、逐点地讨论前人争论过的具体问题，那在一篇文章中是做不到的。因此，以下可分为几个主要问题来作一些讨论。

## 一　关于司马迁对于经学的基本态度问题

《史记》对于经学所持的态度，是贬抑？还是重视？这是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的问题。

东汉初期，班氏父子在论述司马迁时，是把他视为离经叛道者的。班固说他，“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的说法源出于其父，不过班彪的话说得更重，竟说司马迁“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也不止班氏父子。班彪同时代人博士范升曾向光武帝“谨奏《左氏》之失

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所说具体内容已不可知,而其对手陈元上书光武帝说:"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见《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不论范、陈二人争论的是非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东汉初年,司马迁《史记》是否离经叛道,这已是学者争论的问题了。

对于班氏父子的说法,宋代的沈括、晁公武皆有辩难;而清人梁玉绳的辩驳尤为针锋相对。梁氏说:"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尊孔子曰至圣,评老子曰隐君子,六家要指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穷其弊于申韩乎?固非先黄老而后六经矣。游侠传首云以武干禁,又云行不轨于正义,而称季次、原宪为独行君子。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任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使若辈无所取材也。岂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货殖与平准相表里,叙海内土俗物产,孟坚《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戏、卖浆、胃脯,并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贫富不甚相远,自井田废而稼穑轻,贫富悬绝,汉不能挽移,故以讽焉。其感慨处乃有激言之,识者读其书因悲其遇,安得斥为崇势利而羞贫贱耶?况孟坚于史公旧文未尝有所增易,不退处士,不羞贱贫,所以不立逸民传?又何以仍传游侠、货殖?"(《史记志疑》,卷三六)梁氏词锋之利,可以使班氏语塞。不过,梁氏所说三条本身仍有待于分析。

第一,"考信必于六艺"(语出《伯夷列传》),"造次必折衷于

仲尼”(语出《孔子世家赞》),这都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司马迁作《史记》,基本上也实践了自己的话。考信于六艺,这是他在选择与解释历史材料时的一个标准;折衷于仲尼,这是他在说明历史进程时的一个标准。当然,他在考信于六艺时,对六艺本身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折衷于仲尼时,对孔子本人也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关于这一层意思,以下将有两节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只想说明,班氏简单地说司马迁不推崇孔子、不重视经学,是不对的;同样,梁氏简单地驳斥班氏,也难以使认识深入一步。因此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

第二,司马迁作《游侠列传》,对于能救人之急而不自矜的游侠与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豪强作了区别,对游侠颇有称赞与同情(《自序》说,游侠,“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在他的眼中,游侠比“以术取宰相卿大夫”的儒生还要高尚一些。司马迁反对公孙弘之类的儒生,这是无疑问的。但这也并不证明他就完全反对儒学本身。

第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贤人所以富者”是取肯定态度的,而且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样的话。梁氏为他的辩护是无力的。不过,班氏父子把这也说成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的罪行之一,那也是不对的。孔子本人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又“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儒者对自己的标准是:可以发财、求富,但不能取不义之财;对于一般人民的标准是:先富之,再教之,富先于教。孟子见梁惠王,听到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于是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理由是，恐怕王带头言利，弄得“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可是也正是孟子，他多次谈到“制民之产”的问题，认为只有使人民富足起来，然后才可能兴礼乐教化。他遵循的仍是孔子的思想。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表彰了编户之民经营农牧工商而致富者，赞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这是他的主张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见于《平准书》中，在那里他表彰慷慨输财的卜式而贬斥专门与民争利的桑弘羊之流，此篇之末说到元封元年小旱，武帝下令官兵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所以司马迁主张的也是：在上者不应与民争利以至损民以自利，而人民则必富而后始可言礼义。这基本上与孔孟的主张是一致的，说不上是离经叛道。

从以上三点分析来看，司马迁与其父谈在学术见解上的确有所变异，即从尊黄、老之说转而尊儒。现在再就太史公父子见解转变的背景与条件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如下：

汉高帝居马上得天下，一向轻儒。不过他很想从秦之速亡吸取经验教训，所以陆贾向他陈述儒家仁义之理的重要性以后，他对孔子和儒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但是要汉高帝真懂得什么是儒学那是很困难的，他看了叔孙通为了尊显皇帝威严而创立的朝仪，心里很舒服地说：“吾能为此。”（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也就是他据自己的文化水平所能体会到的儒者的用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汉初经大乱之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一时也无暇顾及儒家的六艺之学。

汉高帝以后直到文、景时期，汉统治者采用了黄、老之道。黄、老之道主清静无为，这既适应于当时经济状况和与民休息的

需要,又简易而便于为统治者(如惠帝、吕后、文帝、周勃、灌婴、窦太后、景帝、周亚夫等)所奉行。

到汉武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情况来看,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使汉初社会与国家由贫而富,但同时有另一方面的后果,即"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平准书》)。于是在黄老之道的推行过程中就准备了否定它自身的条件。

其实,在黄、老与法术之间,本来就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以老、庄、申、韩并列,最后又指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正道出了二者之间的思想上的联系。试看《韩非子·主道》篇,不难发现,人君的"虚静"、"无事"完全是一种"执其契"、"操其符"的南面君人之术;人君的无为原来就是建立在臣下有为的基础之上。因此,毫不足奇的是,汉景帝在奉行黄、老之道的同时,不仅曾经重用"学申、商刑名"、"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而且也用郅都这样的酷吏来对付豪强、贵族。《史记·酷吏列传》就是从晁错、郅都开始写起的。到汉武帝时期,酷吏就更多了。司马迁对于酷吏中具体的人的邪正污廉,给予了不同的具体评价;但是他更担心的是酷吏将带来吏治的败坏以至造成政治危机。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

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是讲的秦代的历史教训,贾谊早已作过透彻的分析了。司马迁对贾谊的《过秦论》是铭记在心的,他自己又亲眼看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见《酷吏列传》)这当然是一种使他忧虑的危险征兆。

司马谈主要生活于文、景时期,所见的主要也是黄、老之道的积极的一方面,因而推崇黄、老,这是很自然的。司马迁则生活于武帝时期,看到了黄、老之道所生的反面效果,因而改变了父亲的主张,这也是很自然的。

司马迁转而崇儒,也与思想受了董仲舒的影响有关。至于他与董仲舒这样的经师的不同,以下将有所论述。

## 二 《史记》引经主要为今文或古文问题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崇儒首先表现在他的史学实践上。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考信于六艺"与"折衷于仲尼"。因为汉代经学有今古文学之分,司马迁的考信与折衷所依据的是今文说或古文说,就成为学者们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一节先讨论司马迁在考信于六艺方面的经学倾向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始于汉代的班固,而争论最盛则在经学甚盛的有清一代。这里先简略地介绍一下前人的争论,然后再谈个人的见解。

《尚书》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材料之

一,而他所用的《尚书》是今文还是古文的问题,学者争论也最多。班固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

对于班固的说法,清代学者的见解不一。臧琳认为:"《史记》载《尚书》今文为多,间存古文义。其训诂多用《尔雅》,马融注及伪孔传往往本之。"他以《尧典》为例,一条条地证明《史记》所引《尚书》的文字为今文而非古文(《经义杂记·五帝本纪书说》条,载《皇清经解》卷二〇二)。段玉裁进一步对《尚书》(不包括伪古文)通篇地作了今古文字的辨析。他也认为:"马班之书皆用欧阳、夏侯字句,马氏偶有古文说而已。"并称"玉裁此书,详于字而略于说"(《古文尚书撰异》,引文见此书序。载《皇清经解》卷五六七)。班氏以为《史记》引《尚书》"多古文说",而臧、段二氏只认为"间存"或"偶有"古文说,所以见解显然不同。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不满于段氏"仅分别今古文字"(按段氏实际不仅分别今古文字,也有辨今古文说处,不过详字略说而已),而着意分别《尚书》今古文说。他以为:"司马氏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引文见《尚书今古文注疏》序及凡例,载《皇清经解》卷七二五)陈寿祺、乔枞父子致力于经今古文说之辨,于今文经说用功尤勤。陈寿祺一方面很赞赏段玉裁的《史记》引《尚书》文字依今文之说,另一方面又指出,《史记》引《尚书》"实有兼用古文者"。不仅于此,他还指出,"今文《尚书》中有古文"。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解释说:"司马子长时,《书》唯有欧阳,大小夏侯未立学官。然则《史记》所据《尚书》,乃欧阳本也。"至于今文《尚书》中有古文,他以为伏生所传今文书中宜即兼有古文文字。(《左海经辨》中《今文〈尚书〉中有古文》、《〈史记〉用今文〈尚书〉》、《〈史

记〉采〈尚书〉兼古文》等条。载《皇清经解》卷一二五一）其子乔枞以为："按迁尝从孔安国问，《尚书》孔氏家世传业，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得壁中书后，始治古文，先实通今文《尚书》。则迁之兼习古今文，从可知矣。"（《今文〈尚书〉经说考·今文〈尚书〉叙录》，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〇七九）总之，臧琳、段玉裁以为《史记》用今文而间存古文说，陈寿祺、乔枞父子基本同意此说，又指出《史记》亦间有引古文文字处。他们立论皆有证据，是可信的。唯孙星衍据司马迁问故于孔安国而断言《史记》为古文说，失之武断，不能成立。

《诗经》是《史记》的另一重要文献依据。那么，《史记》所引《诗经》是今文还是古文呢？陈寿祺说："两汉《毛诗》未列于学。凡马、班、范三史所载，及汉百家著述所引，皆鲁、齐、韩诗。"（《三百诗遗说考自序》）这就是说，司马迁所引为今文《诗》。陈乔枞继承父业，完成《三家诗遗说考》。他认为，"孔安国从申公受《诗》为博士，至临淮太守（见《史记·儒林列传》）。太史公尝从孔安国问业，所习当为鲁诗"（《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自序》。上引陈氏父子文均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一一八）。这就又把《史记》所引定为今文家之鲁诗。皮锡瑞说："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当时（西汉）《毛诗》未出，所谓详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嫄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为帝喾元

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经学通论·〈诗经〉·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条)这就又是说《史记》杂采古今了。

至于《春秋》以及与之有关的三传,自然也是《史记》所引据的重要文献。不过,司马迁所引是今文或古文的问题,前人未作具体讨论。如有讨论,那么肯定也会有分歧意见,而且也会有认为他杂采今古的说法的。

现在开始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史记》引用经书的文字和所取的解说为今文或古文的问题,其本身是很复杂的。为了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前人设立了一些划分今古文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有价值的,但是又不能被绝对化。例如,前人根据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这一事实,便设立了《史记》引《书》为古文说(如班固、孙星衍)或兼今古文说(如陈乔枞)的标准,设立了引《诗》为今文鲁诗的标准(如陈乔枞)。这种标准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条件。可是,只有这一条件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当前人在应用这一标准时还有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条件,即汉儒守师说、重家法。而这一点也恰恰需要具体分析。汉初伏生传《尚书》,有弟子欧阳生、张生,张生又传夏侯氏。武帝时,欧阳尚书立博士。至宣帝时,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尚书又立博士。夏侯胜受业于族父夏侯始昌,又问于欧阳氏;夏侯建受业于族父夏侯胜,又从师于欧阳氏。结果大小夏侯又分为二家。(见《汉书·儒林传》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如果汉儒真的严守师说,怎么会有这许多分分合合?学术流派的分合,本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试看《汉书·儒林传》,因"改师法"而未能补博士缺的,亦仅孟喜一人而已。可是孟喜的弟子以后还当上了博士。可见孟喜未被重用实际与其个人人品不佳有关。

那么汉儒为什么高谈师法呢？看来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是“真正老王麻子”，以便猎取官禄罢了。司马迁时代的经师都没有真正严守师法（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司马迁并非经师，也无意补博士缺，当然更无严守一家师法之必要。所以，他从师问学，自然会受到影响，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这种可能性，而得不出他严守师法的结论。又例如，从司马迁时《书》唯有欧阳立于学官这一事实出发，陈寿祺便得出他引《尚书》为欧阳本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也不能绝对化。司马迁时，诸经立于学官者皆为今文。因此，他考信于六艺时候，自然有采用今文的较大的可能性。不过，也不能说，除今文经与经说以外，当时就没有先秦古文典籍与传说的存在。所以，连陈寿祺本人也认为《史记》采《尚书》兼今古文。他说：“迁非经生，而好钓奇，故杂胪古今，不肯专守一家。《鲁周公世家》载《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说，其后成王改葬周公事为今文说，此其明证矣。”（《左海经辨·〈史记〉采〈尚书〉兼古今文》）

其实，只要对《史记》的引经略作具体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司马迁既未墨守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经和经说，又未严守任何师法。例略如下：

（1）《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基本为今文经。但是司马迁既不满于“《尚书》独载尧以来”，又不满于“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于是他引用了“儒者或不传”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并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如果株守今文尚书，那就不可能写《五帝本纪》。《五帝德》、《帝系姓》（此二篇先秦古文资料在司马迁死后又被收入《大戴礼记》中）保存了黄帝以下的世系传说。此篇还引了《左传》，亦属于古文。

（2）《夏本纪》引《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甘誓》，基本

皆为今文经。但是也引用了《帝系姓》、《五帝德》的文字。

(3)《殷本纪》引《尚书》之《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其本皆为今文经并用《尚书大传》说,但又引《逸周书·克殷解》;引《诗·商颂·玄鸟》,承认"天命玄鸟"之说,但又取契有父(帝喾)说。

(4)《周本纪》引《尚书》之《牧誓》、《吕刑》,《泰誓》皆为今文经并取《尚书大传》说,但是又博采《逸周书》之《克殷解》、《度邑解》以及《国语》、《左传》;引《诗·大雅·生民》,承认弃母履大人迹说,又言弃有父。

(5)《三代世表》主要据《五帝德》、《帝系姓》,兼取《尚书》。在当时流传的一部分古文资料中,"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对不可信的古文并不迷信。

(6)《十二诸侯年表》主要据《春秋历谱牒》和《左氏春秋》、《国语》。他在此篇序中首次承认《左传》为解《春秋》之书。

(7)《鲁周公世家》引《尚书》之《金縢》,兼取今古文说,引《费誓》基本为今文,但又大量引据《左传》、《国语》。

(8)《宋微子世家》引《尚书》之《微子》、《洪范》,基本皆为今文经,以为正考父作《商颂》以美宋襄公亦为今文《韩诗》说;但此篇亦大量引据《左传》。他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所用既是今文《韩诗》说,又是今文《公羊传》说。可是他记宋襄公泓之战的历史,完全依据《左传》,笔下至少毫无褒义。

通过上述例证,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兼采今古文并非出于简单的钩奇的爱好。因为,一则,司马迁引经并非从主观的愿意或不愿意引某书出发,而是首先要看能说明某一时代历史的究

竟是些什么文献。黄帝以下至尧以前,他不得不用古文的《五帝德》、《帝系姓》,春秋时期,他又不得不主要据《左传》、《国语》。这就是说,他引书有无法选择的一面。二则,当今古文资料并存时,他又非从"钩奇"或"师法"出发。他对于"近是"的古文,取之,甚至作《仲尼弟子列传》时也采用了孔氏古文的弟子籍;而对于"乖异"的古文,则不取之。他的确重视今文《尚书》,但是《殷本纪》竟然未引《盘庚》,《周本纪》中竟然未引周初诸诰。他为什么不引用这些极为宝贵而重要的材料?看来因为这些篇《尚书》太难懂,当时今文经师未能解释通,甚至解释有"乖异"(段玉裁即曾指出汉代《尚书》今文说有"乖异"处,见《古文尚书探异》)处。总之,在有选择余地时,不论古文或今文,凡其说乖异者,他皆不选。三则,他既兼引今古文,在一定条件下,也就不得不兼容并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例如,他既从今文《韩诗》说,以为契、稷皆感天而生,又从古文《帝系姓》说,以为此二人皆有父。这看来是留下了矛盾,实际是并存了古代的两种传说。古代有"生于图腾说"或"感天神而生说",同时古人又有重血缘而明谱系的传统。尽管两种说法都很不可靠,但两种说法反映的古代传统本身则是真实的。试看《新约圣经》,第一章《马太福音》一开头就开列着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直到耶稣母亲的丈夫约瑟,共四十二代;同时又说明耶稣之母玛利亚是童贞女,从上帝圣灵而孕育了耶稣。兼存古代传说,并非《史记》或其他中国古史所特有。

如果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概括他引书兼容并包的方法,那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这是否说明司马迁引书是杂家式的?不是。他引六经时协其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时"考信于六艺"。这就说明也是"折衷于仲尼"的。但是他又有自己的特色;一则,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

说的陋儒不同，司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二则，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不同，司马迁主强兼容百家，只不过以儒家的六经为最高标准来整齐百家，所以对百家的态度也是开放的。

## 三　司马迁与董仲舒今文经学在思想上的异同

以上谈了《史记》在引据和解释典籍的层次上与当时经学的关系。现在再就学术观点的层次谈谈《史记》与当时经学的关系。那么，当时经学主要研讨的是什么问题呢？汉武帝在策问董仲舒时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出于汉统治者从理论上总结历史经验以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他所提出的，也正是当时在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两个问题。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第一，关于古今之变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历史如何演变的问题。

在汉代经学兴起以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好久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前一朝的治变为乱的时候，下一朝就要加以损益或变革以求治；当下一朝的治再转为乱的时候，更下一朝又要加以损益以求治。如此在因循与损益过程中一治一乱地走下去，这大概就是孔子自以为百世可知的历史演变方式了。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看来这是他对孔子说法的概括，也是

他自己对历史演变方式的看法。不过，孟子又加了一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这样就多了一个五百年一回转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圈子。孟子以后，邹(驺)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书已不传，其说略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这就是，"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种说法比孟子的"一治一乱"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更系统化、更神秘化了。邹衍"五德终始说"中有着一种战国时期的以力取胜与除旧布新的精神，所以采用了以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相代嬗的演变方式，但总的体系仍是一个圈子。五行相胜说在秦汉时期曾经盛行。秦始皇正式宣布秦为水德以代周(《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文帝时即有人提议至武帝时(太初元年)正式宣布汉为土德以代秦(《史记·封禅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对于历史演变的解释，虽然受到五行相胜说的某种影响，但实际上是与之不同的。董氏在回答汉武帝册问道是否有变化时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

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则,天不变,道亦不变,故历史实无变;所谓变,只是举偏补弊,把偏离于道之弊纠正并返回于道上来。二则,既是救弊,便没有“五行相胜说”的前后相反。三则,把孔子三代因循损益之说神化为教条,认为一切历史的变都不会超出三代的圈子;于是五行的圈子为三代的圈子所代替。

为了神化其事,董仲舒又把他的三代圈子展开为“三统说”或“三正说”。他说:“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之始动,其色赤”。他认为,“夏为黑统,以正月(建寅)为岁首;殷为白统,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周为赤统,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十一月(冬至所在月)阳气在地下开始萌动,植物的根株是红色的;十二月,植物在地下萌芽,其色白;正月,植物芽始出地面,其色黑。这样他就给夏、殷、周三代的三正、

三统、三色找出了似为科学而实为神学的理论根据。[1] 他还构造出一个大的推衍体系。例如,周以本代及前二代夏、殷为三代,以三代前自黄帝至舜的五朝为五帝,以黄帝以前的神农氏为九皇。那么,代周者,将以自身及前二代殷、周为三代,黜夏为五帝之一,再上黜黄帝为九皇。如此等等(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由此又可看出,董氏"三统说"与邹氏"五行说"还有两个重要差别:第一,董氏三统、三正之变,只是同一个道在不同阶段的展现形式之不同(具体化为同一植物根芽在不同阶段的颜色不同),不是一物为另一物所代替。第二,董氏"三统说"中,没有以十月(建亥)为岁首的一统;这样他就把以十月为岁首的秦代排除在正统之外。以后刘歆作《世经》,就正式把秦当作闰统。儒家经学的"正统说"容纳不了反儒的秦王朝,这与"五行说"承认秦占一德,汉继秦为土德不同。以后刘歆《世经》中又以周为木德,木能生火,汉继周为火德(《汉书·律历志下》)。这就是继承了董仲舒不予秦为正统的方法。

司马迁在解释历史演变时,既没有引用"五行相胜说",又没有引用"三统"、"三正"说;大概因为它们都神秘化而远于人事。但是他引用了董仲舒的说法。例如,"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赞》)。这里既承认夏、殷、周三代忠、敬、文三种政教的承敝易变

---

[1] 夏、殷、周岁首推移的次序与三代相传次序相反。《白虎通·三正》解释说:"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年。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

的关系,又把秦置于三王之道以外加以批评,显然受了董仲舒经学的影响。但是,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序》)秦取天下多暴,是事实;其成功大,也是事实。汉基本上继承了秦制,这就是"法后王"。这仍然是事实。怎样抛开这些事实对秦采取"举而笑之不敢道"的态度呢?司马迁把这种对秦的态度嘲笑为"与以耳食无异",应该说这就是对于不予秦为正统的学者(当然首先是董仲舒)的不指名的批评。这是司马迁不同于董仲舒者之一。又如,司马迁在比较三代诸侯与高祖功臣侯者异同时指出,同是诸侯,三代诸侯那么多,历时又那么长久,而汉初受封的功臣侯者百余人,仅经百年,至武帝太初时仅剩下五个,"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于是他深有感慨地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就是说,由于时移世异,古今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所以用古作为镜子照照还是有益的,要求今就像古一样那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司马迁说汉代用夏之忠,那只是说以之为借鉴,而决非汉代又回到了夏的情况。在这里,司马迁是司马迁、董仲舒是董仲舒,"岂可绲乎?"这是司马迁不同于董仲舒者之二。总之,司马迁看历史的演变,从事实而不是从经学或"五行说"公式出发,同意历史的演变有某种循环的特征,而并不认为客观的历史真的就是在封闭的圆圈中循环的。

第二,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用天人关系来解释人世间的盛衰与祸福,有时还用这种关系来解释历史演变的原因。

在儒家典籍中,是有以天人关系解释历史演变的传统的。在《尚书》中,王朝的更替往往被说成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天为什么会改换“元子”(即天子)呢?这是为了把这个天子的地位从无德者的手中夺回来,转交给有德者的手中。夏代先王曾经有德,所以得了天命即王位;夏代末王失去了德,天就命令有德者商汤革了夏代的命。商汤以有德得天命,至其末王又失去了德,于是天又命令周文王、武王革了商代的命。《尚书·周书》中有许多篇都反复讲这个道理。周统治者意识到天命是会转移的,因而也是不易把握的。怎样才能知道天命的动向呢?“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诰》)。看看民心就知道天命的动向了。《孟子·万章上》引真古文《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尚书·周书》中,把天看作能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或上帝,这个认识的水平并不算太高;可是,把天命看作民心的反映,这种认识中就已经具有水平甚高的理性因素了。

孟子对《尚书》中的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万章问孟子说:尧把天下传给了舜,有此事吗?孟子回答说:天子不能拿天下给别人,舜得天下是天给的。怎见得是天给的呢?尧在位时用舜作副手,这就是荐舜于天。舜祭祀,神接受,舜办事,“百姓安之”。这就是“天与之,人与之”。尧死之后,人民拥护舜而不拥护尧的儿子,这样就是天把天下给予舜了。万章又问:有人说,禹的德行就不行了,天下不传贤而传子,对吗?孟子回答说:不对。“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因为禹也曾荐益于天,可是禹死后,人民不拥护益,而拥护禹的儿子启,所以启得天下也是天给予的。益为什么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呢?孟子说:舜做过尧的副手二十八年,禹做过舜的副手十七年,“施泽于民久”,而尧、舜的

儿子又都不肖,所以舜、禹能得人民拥护,而益只做过禹的副手七年,“施泽于民未久”,禹的儿子启又贤能,所以益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先前的国君的儿子贤或不肖,被荐者作副手的时间长短,这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所以传贤或传子都决定于天、于命(见《孟子·万章上》)。这样,孟子就又给天加上了一种偶然性的解释。不过,就连这些偶然性,最终也要由人民的拥护这一决定因素来实现。所以,在孟子看来,天命和民心是一致的;他以天命解释历史的演变,实际即是以人心向背来解释历史的演变。

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讲的也是天人关系问题。他的“五行相胜说”,是以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形式表示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只能适应它的天命。他的“五行相生说”,是讲“机祥度制”(《孟子荀卿列传》)。因而“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太史公自序》)的,其说大体可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礼记·月令》中。这种思想产生的背景大概是,战国社会剧变而争战酷烈,旧体制的破坏势成命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秦始皇正式宣布秦得水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他是在自觉地适应以水克火的天命,而不再顾忌人心了。实际上他也是认为人心不足畏的。

汉代秦以后,儒家讲天人关系,大体分为两支:今文《尚书》家讲《洪范》主要以五行说灾祥;而陆贾、贾谊等则又注意以人心解释天命,因为他们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时重新认识到了人心的重要性。到了董仲舒的手里,二者又合而为一。他的春秋公羊说,既以人心解释天命,又以五行相生、相胜说来讲灾祥。他对汉武帝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

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把天说成人格化的上帝，上帝是爱护人君的，会对人君给以警告以至奖惩，而最后奖惩的标准还在于人君是否能得民心。这实际是把孟子的说法做了宗教神学化的加工，本质上还是儒家以人心解释天命的思想。董氏以天人感应之说讲灾祥，备见《春秋繁露》书中，成为以后史书中五行志的滥觞，这里不多说了。

司马迁对于天人之际的解释，与董仲舒有同也有异。一方面，司马迁相信灾祥，与董仲舒有相似处。《史记・天官书》前面的绝大部分都是古代天官理论或占星学理论，大概是司马谈从唐都那里学来又传给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这是司马迁对上文所引天官理论的总结和提要，说明天官理论的核心在于天地亦即天上人间之间的对应与相通。司马迁承认天地或天人之际的对应与相通，就与董仲舒有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但是，司马迁不赞成以天官理论胡乱解释历史。他在《自序》中说：“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

次,作《天官书》。"所以,《天官书》中,自从"太史公曰"以下,都是他以史书记载与天官理论相核验的推文考应之作。他对春秋时期,只举了很少的例证,而对于秦灭六国、项羽破秦、汉之兴、平城之围、诸吕作乱,吴楚之乱等,都列举了星象的先兆,并说"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为什么要有这种天人之际的理论呢?司马迁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所以,这种理论旨在利用天变警诫人君,使之改过、修德。其目的与董仲舒也是一致的。不过,尽管如此,司马迁与董仲舒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司马迁的态度是:对于天官灾祥理论,必须以历史事实去检验之,能核实者(尽管这也是偶合)才承认之。他的方法是归纳的、实证的。董仲舒则是尽力作天人之际的比附(事见《春秋繁露》书中,恕不举例),其方法是演绎的、玄想的。所以,如果说董仲舒为汉代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奠定了基石,那么,司马迁则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以后兴起的古文经学的先导。尽管司马迁在相信灾祥说的内容上颇有与今文经学一致的地方。

另一方面,司马迁讲天人之际,还有与董仲舒颇为异趣的地方。董仲舒对于皇天上帝的赏善罚恶的性质是充分肯定的,而司马迁对此却将信将疑,甚至疑多于信。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

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由于对赏善罚恶的天人之际的怀疑,司马迁对天及天人之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

司马迁在论秦的兴起时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史记·六国年表序》)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记·魏世家赞》)秦暴戾而终于因天助而得胜,就像《伯夷列传》中所说坏人得好报一样,那么,这个天又是什么样的天呢?其实,司马迁对助秦的"天"已经作了分析和回答。他说,"是(春秋中期)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六国年表序》)山东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的争权夺利,本来都为了营其私利,而结果在斗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并破坏了彼此间的团结,终于为秦的征服与兼并扫清了道路。为秦兼并扫清道路的本是山东六国的人的行为,怎能说是天呢?因为他们的本来目的不是为秦扫清道路,扫清道路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违反他们本来目的的客观后果,所以,这就是天是命了。司马迁在分析秦楚之际形势变化之快并比较先秦统一之难与汉高帝统一之易的时候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

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秦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立诸侯,结果却为汉高帝的统一扫清了道路。这也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事,所以岂非天哉。司马迁所说的这种天,如果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叫做“理性”或“普遍的东西”。黑格尔说:“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了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The Cunning of Renson)”(《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版,第72页)。每一个个体或特殊者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热情地斗争着,而站在背后的普遍者、理性或天却假手于个体间的热情的斗争去实现天自己的计划,个体的自觉的努力却使其自身转变为天的不自觉的工具。司马迁在二千余年以前对天人之际的认识,就已经接近于黑格尔的理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用这样的天人之际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其深度远远超出汉代经学水平之上了。

不过,司马迁的这种天人之际的思想却有其经学的来源。在《尚书》里,天假手于商汤以伐桀、假手于周武王以伐纣,是假手善人以伐恶;人是天的自觉工具,有天人之间的同一而无对立。在《左传》中,又有了这样的记载:蔡侯般是一个弑父而篡位的人(襄公三十年),十二年后,楚灵王把他召到申,杀了他又派兵围蔡。晋国的韩宣子问叔向,楚是否能胜利,叔向说楚能胜利,因为“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而楚灵王也

不是好人，所以叔向又说：“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蔡，只是为了自己兼并的目的，天却假手于他，一则惩罚蔡侯般，二则为他自己的灭亡准备条件。楚灵王做了天要他做的事，在这一点上天人一致；可是他个人的目的与天的目的又是不同的，这一点上天人又相对立。但是，最终天还是利用楚灵王而实现了天的目的，楚灵王只不过是天的一个热情的而又不自觉的工具。以上曾经说到司马迁多引《左传》，现在又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杰出的天人之际的见解，显然也是受了古文经的影响的。当然，司马迁的见解比《左传》又进了一步。《左传》只说到天假手罪人以罚恶人，而《史记》则已经看到天假手怀有自私目的的人去推动历史的发展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 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

朱本源

## 一　从蜀汉迄今对“考信于‘六艺’”一语的误解

司马迁在其“七十列传”之首传《伯夷列传》的开篇，就提出了一条史学方法论的原则：“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汉人有时称“六经”为“六艺”）根据我们粗浅的认识，自汉迄今的《史记》研究者都没有理解这条原则的真谛。一般都从考据学着眼，把“考信于‘六艺’”体会为：以“六经”为标准考订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事件的真伪性。最早作出这样理解的人可能是蜀国光禄大夫谯周（后降晋），刘知幾指出过：“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缪。”[①]谯周认为司马迁本人撰写周、秦以上的历史时，也没有做到考信于“六艺”，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根据旧典（六经）纠正了《史记》中的错误。近代学者陆懋德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即司马迁之法，蜀谯周宗其法，作《古史考》；前清崔述宗其法，作《考信录》，并皆以‘六经’为断。然‘六经’不尽可信，则其方法有时而穷。”

① 《史通·古今正史》。

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一语，并没有考据学的校雠和辨伪的含义，这不是由于司马迁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司马迁的这句话具有比考据学更为精深的历史理论的含义。

首先，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近代历史科学的两个不同学科的区分——即分为“史料学”（heuristic）和“史料鉴定学”（sources—criticism，或译“史料批判”）——来理解“考信于六艺”这句话。这也就是说，通观《史记》全书，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史料学上的史料的处理问题，而不是指史料鉴定学上的史料“真实性”问题。最好还是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表明，他在《太史公自序》的结束语中说：“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在历史理论上把他的“成一家之言”归结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方法论上则把“成一家之言”归结到一个史料处理的原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两个说法是可以相互“发明”的。问题在对于这四句话的本义应当怎样理解。我们先谈谈后二句的传统的理解。如《史记》的权威性注释《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作了同样的理解。《索隐》云：“迁言以所撰取协于‘六经’异传诸家之说（《正义》作“诸子百家杂说”）耳，谦不敢比经艺也。异传者，如子夏《易传》、毛公《诗》及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者也。”《正义》的理解也是这样，不过多举了“丘明《春秋外传国语》而已”。这两种注释的作者对“异传”的解说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他们把“协”训为“比”，从而认为司马迁谦虚地不敢以其所撰比之于“经”，而只比之于各种“传”。他们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司马迁在谈“成一家之言”时，是就他对历史资料的处理

手法而言,没有什么在道义上的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协”应训为“和”,如《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尚书·汤誓》中有“有众率怠弗协”,《史记·殷本纪》在引用时把“弗协”通俗化为“不和”。可见,“协‘六经’异传”(“厥”是虚词)就是努力把“六经”的各种“传”中的不同说法协调起来。在进行协调时,有时必须进行疏通或填补史料的不一贯或不足之处。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拾遗补艺”(《集解》注:艺,六艺也)。用西方历史方法论的术语说,也就是运用历史家的“猜测力”。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尼布尔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贯的片段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谁都不会相信竟能有这么多似乎已经遗失的东西能够得到恢复。”他并且声明,他可以在上帝面前保证:“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考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中西古今的伟大历史家如出一辙。对于“诸子百家”,作为史料搜集的对象而言,司马迁用了一个较严格的动词“整齐”。所谓“整齐”,如司马迁在其《自序》中用于《张丞相列传》时所说: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但“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这虽是对度量制度而言,但就“整齐”一词的一般含义言,也就意味着:当某种文献、文理未明时,应当根据某种标准或原则,加以整顿去取,而纳于齐一的秩序中。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中分为“九流十家”),如班固所指出,确实是“各引一端”,“纷然淆乱”。而司马迁的历史主义,如表现在“本纪”、“世家”和“十表”中者,是把经验中的事实(人事)纳入年代学的顺序中加以考察,即“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例如诸子中的庄子,如司马迁所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皆空语无事实”,而且其宇宙观更是超时空的,总的说来是“非历史出”。不过,司马迁认为庄子“善

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故仍可作为史料搜集的对象,不过要加以"整齐"式的处理。这和"六艺"只须要"拾遗补艺"就有了显著的不同。在孔子以前,"六艺"是"王官之学",即只能由国家的行政官吏来掌管:《易》掌于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用章学诚的话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用西方近代历史大师兰克的术语说,"六艺"是国家的档案,是"第一手资料"。而"六经"的异传,则是私人讲学对"六艺"的"拾遗补艺"。所以班固在其《艺文志》中,把各种"传"分别归于相应的各种"经"中。例如,"春秋家"除了《春秋古经》外,有三传(左氏、公羊、穀梁)以及各种有关《春秋》的异传,如《国语》、《世本》、《战国策》直到陆贾的《楚汉春秋》、司马迁的《太史公书》[1],等等。这样说来,我们认为"厥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不是平行语,而是在史料取舍上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用来判别史料的真伪,而是作为取舍后者的历史观和理论的根据。班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诸子十家(班固以之包括了哲学的、文学的、科技的、历史的一切文献典籍)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关于"六艺"在司马迁史学理论中的意义,我们在下文中再详论。

## 二　从中国考据学发展史看问题:司马迁时代尚无考证意识

在司马迁时代,中国考据学尚未诞生,所以司马迁只有史料

---

① 《史记》。

取舍意识,而无史料鉴定(历史考证)意识。如班固所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按:司马彪本来作"分散百家",见《后汉书·司马彪传》)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①]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说:"〔司马迁〕去圣浸远,百家杂出;博采兼收,未免杂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齐画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为之讳也。"[②]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对于百家杂语是尽了"整齐画一"之能事,而仍有疏略抵梧之处,乃由于尚无考证意识。

在我国,以校雠和辨伪为起点的考据学,开始于刘向、刘歆父子。章学诚的论断是符合考据学的发展史的。他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始,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③]又说:"考订之学,古无有也。……官师失守,百家繁兴,述事而有真伪,诠理而有是非。学者生承其后,不得不有所辨别,以专一是。而辨别又不可以空言胜也,则推此证彼,引事切理,而考订出焉。"[④]章氏所谓的"渊源流别","推见古人大体"乃指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在古代学术源流和分类方面的成就。至于章氏所谓的"引事切理"、"诠理而有是非"则应当属于"超考据学"(Me—Ruellenkritikismus)的范围,我们在下文再详论。这里,我们仅就汉代的考据而言。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4)才开始令刘向及其子

---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② 钱大昕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所写之序。

③ 《章氏遗书外编·信摭》。

④ 《章氏遗书·逸篇》。

刘歆领校国家图书室所藏“五经”以及诸子、诗赋等。这时期，距汉代初建将近两个世纪，先秦传下来的重要经典著作有了不同的版本（抄本），有了进行校勘的可能。例如，《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所谓中古文指“中秘”（皇帝的藏书室）所藏的秦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抄本所使用的古文（秦代通行的小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氏父子领校中秘的藏书时，不仅校勘出佚文、脱字、错字等，而且开始作了辨伪工作。刘歆的《七略》虽已散佚，但班固的《艺文志》是“删其要”而写成的。《艺文志》中对大批藏书作了辨伪：如农家著作《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可能引自《七略》）云：“托之神农。”颜师古《汉书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这就表明刘向研究出这本托之神农的书可能出于李悝和商鞅之手。刘氏父子领导的校订者甚至能从文体方面去辨伪，如杂家有《大禹》三十七篇传世，班固自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到了东汉，我国考据学发展得已相当精审，可以见之于一代通儒马融的考证中。他第一次考证了武帝末民间献上的《泰誓》一文是汉人的伪作。他的严谨的考证见于他的《书序》，但原文已佚，不过从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一中节引《书序》的部分，仍可见其大略。孔氏节引者为：“《泰誓》后得，案其义似若浅露。〔该文〕……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于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古本《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

'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引文中的省略号,是本论文作者用来表明我们又省去了一些字句)由此可见,马融《书序》能举出先秦《泰誓》逸文五则而不见于汉《泰誓》中,这是强有力的考证逻辑。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融使用了司马光所谓的"证验事理"法,司马光说:"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①上述马融所声斥为"神怪"的伪《泰誓》中的记载,当然只能是无从取得经验的验证的奇迹,是伟大历史家孔子闭口不谈的"怪、力、乱、神"之类的神话。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兼历史家休谟在《论奇迹》一文中说,"我们不能轻信关于过去发生的违反物质的自然规律的事件的叙述"。一个世纪后的英国另一个哲学家兼历史理论家布莱德雷在其《批判历史学的前提》(1874)一书中,谈到当时宗教家对奇迹的考证时,主张我们只能相信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所知道的事情有着类似的情况的过去事情。司马光所说的以"某书"(史料B或C,D…)去证验或校勘"本书"(史料A),以发现问题或订正伪误的方法,用现代历史家陈垣的术语说,可以称之为"他校法"。司马光所说的"以事理推之",即陈垣所说的"理校法"②,亦即现代历史家陈寅恪所说的"揆之事理"法。所谓"理"即人类的理性认识,如休谟所说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所谓"事",即经验中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不应当用马融的考据学成就,更不应当用司马光的理校法或休谟、布莱德雷的认识论去苛求司马迁。我们不过借此指出,中国考据学有其本身的发展史及其在东汉所取得的成

① 《与范内翰论修书帖》。

②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

就;它在司马迁死后近半个世纪才诞生,马融之世比司马迁之世更迟了一个多世纪。这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历史学家尚无"史料鉴定"意识,从而我们不应对"考信于六艺"一语作考据学的解释。

我们先就"理校法"方面看,上述马融所声斥的"神怪",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完全把它作为史实而记录下来:"武王…兴师(伐纣)…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所谓"白鱼跃入王舟","有火流于王屋"和"诸侯不期而会"皆见于汉本《泰誓》,司马迁所以不加以任何鉴定地应用,显然是在历史思维中还没有跳出他的老师的"天人感应"论的范围。董仲舒创立了阴阳五行的符命论——"受命于天"的天子必然受到天降符瑞的认可。所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白断定"《书》曰'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①。董仲舒和司马迁并且把伪《泰誓》中的"雕"改为"赤乌",诚如郑玄、马融等人所解说,因为雕是凶残的鸷鸟,而乌是反哺的孝鸟,只有乌的飞来才更好地象征武王的孝道(继文王之志伐纣)。再按董仲舒的"天统论",周所得者为"正赤统",而"由火流为"的乌当然是赤乌,正好象征周之正色。如郑玄所注释:"武王卒父大业,故乌瑞至,赤者,周之正色也。"由此观之,司马迁在应用《尚书·泰誓》的史料时未加任何鉴定,主要由于尚未摆脱董仲舒的历史思维的模式。这是"时代精神"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也应当如钱大昕所说,"不必曲为之讳也"。

我们已从"理校法"方面,举例说明了司马迁尚无考证意识。

---

① 《汉书·董仲舒传》。

以下,再从“推此证彼”(章学诚语)的“他校法”方面,说明司马迁尚无考证意识,而只有史料处理的手法,例如,他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的赞语中说明他在这篇本纪中对史料处理的态度。他认为第一手资料《尚书·尧典》可惜“独载尧以来”史实;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还有传世的《五帝德》及《帝系姓》(二文始见于《大戴礼》中,近人疑为战国后期著作),“儒者或不传”(《索隐》注云:“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不过司马迁仍以《尧典》和《帝德》、《帝系》为主,构成《五帝本纪》,但是司马迁没有对不同的史料作出严格的“史料批判”,而仅访问有关“黄帝、尧、舜之处”(“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从当地父老搜集“口头传说”,他得到的结果是“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当指《尚书》、《五帝德》及《帝系姓》)。司马迁最后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仅从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看,就可证明我们所说的司马迁在历史方法论上是以“厥协六经异传”以“整齐百家杂语”。但是在这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处理上虽“博考古文”,但是又认为“不须更深考论”。他似乎意识到了“推此证彼”地考证一下,所以他说:“予观《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但是事实上《国语·楚语》中记“少昊”事与《五帝德》、《帝系姓》中所记者差别很大,并不能相互发明。他所谓的“表见之不虚”不过意味着看起来是真的而已。

我们再举一个更显著的例子:司马迁在《殷本纪》和《宋微子世家》这两个有着如此紧密关系的篇章中,对比干的死期却作了相互抵牾的记载。《殷本纪》云:“微子数谏〔纣王〕不听……遂

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但《宋微子世家》云:“王子比干者……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显然,在《殷本纪》中认为比干死后,箕子为奴;但在《宋微子世家》中,则认为箕子为奴后,比干才被处死。司马迁对此抵牾,没有作任何说明,显然也不是出于错简。《殷本纪》的说法与《韩诗外传》相同,司马迁可能就是根据它。《宋微子世家》中的说法,不知何所据而云?可能根据《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但是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标明三人的事故在时间上发生的先后,因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是按三人所受的政治迫害的程度而排列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司马迁的矛盾是由于“弗深考”。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认定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即承认老子与孔子同时,或许年岁较大),又说:生存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的周太史儋就是孔子问过礼的老子。司马迁对此并没有做过考证(也许没有任何资料可利用)式的决断,仅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还表现了两说并存的和“多闻阙疑”的正确态度,而关于比干之死的时间先后问题,司马迁似乎没有认为是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不需一一列举了。清代考据家在“考史”时作过很多《史记》方面的考证,特别如梁玉绳写过《史记志疑》36 卷。《史记》中“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之处,是次要的问题,诚如钱大昕所说:“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①

① 《史记志疑》序。

所以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一语不应当理解为“六艺”为史料鉴定的依据,而应当理解为以“六艺”为历史学的“理论前提”,这才是“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真谛。套用孔子的话说:史家应博学于文,约之以“六艺”。

## 三　博学于文,约之以“六艺”

为了容易说明问题起见,我们借用戴东原的与考证有关的术语“义理”一词。他提出的有名的中国古代学术三分法:“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①]他所谓的“制数”有时又称之为“考核”,更通常的说法是“考订”、“考证”或“考据”。我们不过借用“义理”(即我们所谓的“理论”或“哲学”)和“考证”作为两个区别名词,用以表明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乃就义理方面言,不是就考证方面言。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把“考信于六艺”作考据学的理解,那就有悖于司马迁对“六艺”在历史学上的价值的肯定。众所周知,全部六经的文献,即使把直接解释“经”的各种“传”包括在内,都是战国末以前的作品。这是它们的时限性。这也就是说,只有战国末以前的历史撰述,才能以六经作为判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样说来,战国以后的历史就不能通过史料批判而加以陈述。如果把“六艺”的考信理解为“义理”(章学诚称之为“道”)方面的,那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诚如章学诚所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

① 《戴震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

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①]司马迁本人正是把六经的意义归之于义理(亦即归之于历史理论·方法论)方面，而肯定其永久的规范性价值。他说："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②]

如果要保持我们的观点，必须对《伯夷列传》开篇的第一段作出再理解。因为《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对该段作出了不正确的理解而遗误后人。在该段中，司马迁在"考信于六艺"一语后，紧接着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他说的"可知"之事乃指《书》中《尧典》、《舜典》和《大禹谟》三篇"备言虞夏禅让之事"。他指出，《书》中把虞舜、舜禹之间的禅让叙述成非常慎重的事："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他显然根据《庄子》中的《让王》、《外物》、《逍遥游》等篇(司马迁未明说这根据)中所谈到的尧让天下于许由，商汤伐夏桀后让位于卞随、务光的故事。司马迁于是问道："此何以称焉?"又问道："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和《正义》注解为：《诗》与《书》的文辞都"不称说"许由等人的事，"不少(不稍稍)梗概载见"，这是为什么?《索隐》并且由此推断为"是太史公疑说者(指庄周)之言或非实也"。这就是说，《诗》、《书》所以不载庄周之言，在司马迁看来，恐怕是由于说者所言非实。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就是根据"六艺"去考证"六艺"以外的史料

① 《文史通义·原道》。

② 《太史公自序》。

的“真实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索隐》和《正义》的这种理解(包括其前的谯周和其后的崔述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司马迁明白肯定许由、务光等人是真实的人,他们不受尧、汤愿意出让的天下,甚至“逃隐”或自杀也是事实。因为司马迁说:“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又说:“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说的“此何以称焉”是感慨之词,“其文辞不少概见”是惋惜之词(可惜《诗》《书》未载)。他知道,孔子最爱表扬有“让”德的人,他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言下之意,孔子不序列许由、务光等人,是可惋惜的事。此外,司马迁所用的警句如“天下重器”和所引《采薇歌》中的“以暴易暴”都是出自《庄子·让王》篇中的“故天下大器也”和“推乱以易暴”。再者,司马迁对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品德是颇有微词的。他爰引孔子的如下两段话:“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①“(子贡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②但是司马迁根据伯夷、叔齐的《采薇歌》(佚诗)中的怨语,觉得很奇怪,他问道:“由此观之,怨耶非耶?”而孔子道德理论中的“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③,以此标准衡量,伯夷、叔齐是谈不上“求仁得仁”的。

话虽这样说,不过除孔子和儒家的学说外,诸子百家杂说在性质上基本是哲学的(义理的)、文学的(如辞赋家),科技的(兵家、农家),而不是历史的,甚至有反历史主义的(如老、庄)。所以

① 《语语·公冶长》。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雍也》。

司马迁还是承认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规范作用。既然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所以司马迁在撰历史时,在"世家"方面还是始于《吴太伯世家》,因为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①在"列传"方面,则始于《伯夷列传》,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②这是"公论",庄周也是这样评价伯夷、叔齐的。③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归结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真义就在于,以六经的义理去整齐百家杂说而获得历史思维(即历史的义理)的通识,也就是我们上引班固的理解:"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即诸子百家杂说——引者注)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以下,我们略述一下"犹考信于六艺"一语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考信"一词可能来源于《礼记·礼运》的"以著其义,以考其信"。根据标准注释,"著,明也";"考,成也",这两句话在《礼运》篇中是就"礼义以为纪"而言,即"约之以礼"的意思,所以注释家们都理解为用"礼"来"成全"人民的"信"这个美德。司马迁把"考信"用之于史学时,应当是说,学者在载籍极博(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后,用六艺以成全学者的历史信念,以达到"择其言表见之不虚"(即"不虚美,不隐恶",亦即在道德上辨明是非),"甚彰著矣"(张守节语)。这正合于《礼运》篇

① 《论语·太伯》。

② 《论语·微子》。

③ 《庄子·让王》。

中“以考其信”一语的含义。

司马氏是史学世家,太史公司马谈在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司马迁要以“孔子论《诗》、《书》,修《春秋》”为榜样,并继承司马氏的治史家法,完成他(司马谈)未尽的事业。司马谈提出的治史家法的理论的方法论纲领是:“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接着阐明了“六艺”在历史学的纲领性的意义。[①] 我们仅就其最重要的方面谈谈。就“六艺”中的地道的史书而言,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这就是说,历史编纂学的社会职能主要在于褒善贬恶,宣扬王道。再就《易传》而言,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变化是《易传》的基本范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②]《易传》的变化的“天文·人文观”(即世界观、历史观)是历史学的理论前提,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易传》在方法论上要求“原始要终以为质”[③],“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④]。司马迁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作为十二“本纪”的纲要,把“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和“终始古今,深观时变”作为“八书”的纲要,都是以《易传》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依据的。诚如明代学者李贽所说:“《易经》示人以史(学)之所从

① 《太史公自序》。
② 《易·贲卦·彖传》。
③ 《系辞传下》韩康伯注:“质,体也。”
④ 《系辞传下》。

来。”[1]司马迁对《易》与《春秋》的结合对宏观历史认识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视,他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2]《索隐》注:“韦昭曰:‘《易》本阴阳之微妙,出为人事乃更昭著也。’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后来章学诚概括为:“《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3]再就《诗》言,“《诗》…长于风”[4],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5]。如所周知,《诗》有六义,而司马迁以二雅为代表,乃从政治史观而言。《毛诗序》云:“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而《诗》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尚书》本来就是国家的档案,是历史学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如孔子所说:“疏通知远,《书》教也。”[6]司马迁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尧、舜之盛,《尚书》载之”。《尚书》包含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最后,就《礼》而言,司马迁特别重视《礼》所包含的,作为历史学认识论原则之一的人性论,他在其《礼书》的开篇热烈地赞颂道:“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至于《乐》据说已因秦始皇

---

① 《焚书》卷五“经史互为表里”条。
② 《司马相如列传》赞。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④ 《自序》。
⑤ 《司马相如列传》赞。
⑥ 《礼记·经解》。

焚书而亡,所以司马迁认为《乐》不过"以备王道,成六艺"而已。[①]总之,从以上的引文看,司马迁所谓的"考信于六艺"("以著其义,以考其信")的作用,不在于历史事实的真伪的考订,而在于用历史思想辨别道义上的是非。所以司马迁认为"六艺"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②]

## 四　结论:世界学术史上的杰出创见

司马迁的"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一条历史主义原则,如我们以上所论证者,不应当从考据方面而应当从义理方面去体会。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的这一条原则却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一条后世中国考据学发展的光辉道路。

清代是中国考据学的盛世,如清人朱一新指出:"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而国朝诸儒,则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乾、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③]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指钱大昕、钱大昭)之于史,皆陵跨前人。"[④]而考据学理论家,当推戴东原,他提出了"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的概念。他说:

>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博闻以拟其似……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

① 《孔子世家》。

② 《司马相如列传》赞。

③ 指王念孙、王引之——引者注。

④ 《无邪堂答问》卷二。

未至十分之见也。①

简单地说,十分之见必须是"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这才是真正的考证,也就是我们在本文前面已引用的章学诚所说的:"考订之学"不仅要辨别百家之学在述事方面的"真伪",而且要辨明在诠理方面的"是非";因此只有在"推此证彼"和"引事切理"双管齐下的努力下,"而考订出焉"。戴氏所谓的"道",章氏所谓的"理",都是指六经所蕴涵的"义理"。段玉裁在论及他的老师戴东原的的义理、考核、文章三分法时认为,戴氏"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②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如我们已论证过的,基本上指以"六艺"为准绳去辨别一切非六经的史料在诠理方面的是非。例如,就《春秋》而言,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③就《礼》言,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考据学看,也是如此。西方考据学起于"批判的·语言学的方法",其创始人是德国18世纪的语言学大师沃尔夫(F. A. Wolf),始见于他的名著《荷马史诗序论》(Prolegomena to Homer,1795)。该书的要旨为:"一种资料决不能仅仅依靠语言的分析去理解,而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反映了民族精神(Volkgeist)的历史文件,只有这种精神才是理解该资料的关键。"

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② 《戴东原集》序。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司马迁看来,“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六艺”之统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通过“六艺”才能理解一切非“六艺”的史料的精神价值或诠理上的是非。

为什么史料整理或史料批判都要以理论为前提呢?因为任何史料(记录于文字者)都是记录者通过自己的见闻、观察、记忆、挑选等心理活动而陈述出来的,是陈述者的精神上的再生产。因此,运用记录在案的历史资料的历史家应当理解记录者的心理活动,而要理解旁人或前人的心理活动,就得借助于某种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或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加弗洛伊德)。西方近代的史料批判大师、斐声世界的历史学家兰克在史料批判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要利用第一手的、当代的信息资料,而且要透彻地研究每一种文件的作者的人格、倾向性、活动、机遇等等,以便尽可能地确定纪录者的“人格差律”(personal equation)——即个人的动机、目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因素的总和,这些都可能造成他的观察的偏差或误差。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即了解记录者的立场和观点的反映。

再从认识论方面说,如当代德国的诠释学(hermeneutic)哲学的大师伽达默尔的主张,他认为一切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取向都不可能不受“先在意义”或“成见”的支配。所谓先在意义或成见指我们所处的文化·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传统和我们的视野所面临的情势。而这一情势所确定的我们立场的视角总是和一定的框架相联系的,而这一框架为理解的进行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如语言空间。重视传统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使我们认识到传统不仅是过去已形成的东西,并且同时决定着现在。我们永远生活在某种传统中,但是“传统不单纯是我们进入其中的某一先在的条件,传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参与传统的

演变”。所以传统起到为我们提供观察世界更广阔视野的作用。这样说来，传统虽然是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依然是真理的可能来源。认识传统，可以更好地认识现在。司马迁说得好：“居今之世，志（认识）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①

根据我们以上的论证，“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原则应当意味着：“六艺”是理解历史资料或事实的“预先假设”，因为它们已成为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只有作出我们这样的体会，才能符合司马迁的“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学者至今则之”的提法。这原则是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真知灼见，是历史学上的通识。它比沃尔夫的类似见解早了二千年。

再者“考信于六艺”虽然不是针对历史考证而发，却启蒙了中国考证学的超考据意识。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3 期）

①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 《史记》体制义例简论

张大可

《史记》由五体构成。1.《本纪》十二篇。2.《表》十篇。3.《书》八篇。4.《世家》三十篇。5.《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专名《史记》。

《史记》五体结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自班固以下，历代依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称为“纪传体”。纪传体被封建王朝定为国史正体，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前代学者，从唐刘知幾以来。对纪传体得失的探讨，留下了不少的精辟论断，是我们应当继承的遗产。但是，前代学者对纪传体得失的探讨，偏重于史料的编纂方法，疏于从笔法义例上加以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五体结构的笔法义例，揭示司马迁创造纪传体的意义，以补前人论述之不足，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研究两个问题：五体题名义例；五体序目义例。

## 一　五体题名义例

前人探讨《史记》五体，在溯源问题上大钻牛角，认为五体古已有之，司马迁只不过把它汇总在一起以构成一书而已。此种观点很值得商榷。论者引《史记·大宛列传赞》提到的《禹本纪》作

为古有《本纪》一体之证。其实司马迁所言《禹本纪》与《山海经》相提并论，指出是言志怪之书，仅有《本纪》之名而已，与载述帝王事迹的《本纪》风马牛不相及。赵翼说："《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①]泷川资言说："世家言三字，又见《管蔡》、《陈杞》各世家，史公自称其书也。"[②]按查《史记》，正是如此，可见古代并无世家一体。先秦典籍中有"世卿"、"世禄"、"世臣"、"世家"之称[③]，均指卿大夫之爵职秩禄世代相传，司马迁"世家"之体，其名称由此演化而来。范文澜说"《八书》之名，本于《尚书》"，其言可采。但又说："《八书》之作，则取《尚书》之《尧典》《禹贡》。"[④]这就太板而显得推论的太远了。

《史记》五体均为司马迁所创造。刘知幾说：

>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⑤]

此言极是。《太史公自序》反复申说《史记》效《春秋》而作，可见《春秋》之经、传形式对《史记》体例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三代

---

① 《廿二史札记》卷一。

② 《史记会注考证》卷三一。

③ "世卿"见《公羊传》隐公三年；"世禄"见《古文尚书·毕命》，又见《孟子·梁惠王下》；"世臣"见《孟子·梁惠王下》；"世家"见《孟子·滕文公下》。这些名词皆指世卿爵禄之家，父子相继，世代相传之意。

④ 《正史考略》"史记"条。

⑤ 《史通》卷二《列传》。

世表序》云:"余读牒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余读《春秋历谱牒》。"这是司马迁创造年表所借鉴的蓝本。《吕氏春秋》一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用以统一百家思想,包容丰富的内容,这一形式也给予司马迁以很大的启示。但是《吕氏春秋》的各体都是短篇的论文,只是名称不同,并无本质的区别,是不能与各具笔法义例的《史记》五体相提并论的。以上说明,司马迁的创造不宗一书,不祖一体,而是参酌各种典籍体例的长短,匠心独具地汇入一编。《史记》五体,各具笔法,自成系统,而又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不仅是一种史料的编纂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法,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内容决定形式。《史记》的五体创造是由《史记》的创作宗旨,即《史记》所要包容的历史内容直接引申出来的。《史记》的创作宗旨,《太史公自序》有着明确的表述,主要有四点:1."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总结古今一切人间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2.究"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展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汉代流行天人感应学说,自然要给司马迁的思想打下时代的烙印,而究"天人之际"。但是"承敝通变"却又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框架。3.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司马迁认为"运行无穷"的历史,并不只是帝王的政绩,那些"辅弼股肱之臣"的言论行事不应泯没。他的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在《史记》中创作了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来实现父亲的遗言。4."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总括起来就是:司马迁要完成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包容百科全书知识的通史。五体结构的

创作能够完满地体现司马迁的创作意图，于是应运而生。

（一）本纪

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张守节发挥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①]刘知幾曰："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又云："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以显国统。"[②]据此，"本纪"之义有五：

1. "本纪"为法则、纲要之意，它"纲纪庶品"，故为最尊贵之名称。

2. "本纪"为记载天子国君之言事所专用。

3. "本纪"是"网罗万事"的，即国家大事无所不载，不得视为人物传记。

4. "本纪"编年，记正朔，象征天命攸归。从编纂学角度立论，编年记事是我国史法的优秀传统，使叙列的历史事件，兴衰发展的线索分明，它创自《春秋》。

5. "本纪"效《春秋》十二公，故为十二篇。《太史公自序》云："著十二本纪。"

用上述义例来衡量一下二十四史，班固的《汉书》最合标准，而《史记》最不合标准。因为《史记》的十二本纪中，夏、殷、周三本纪包括了三代的先公先王，更有《秦本纪》，这均是诸侯入本纪，此其一。《史记》立《吕太后本纪》，而不立《惠帝纪》，竟把帝王逸出了《本纪》，此其二。《史记》又立《项羽本纪》，却不纪西楚之年，而用"汉之元年""汉之二年"记正朔，且记事章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正义》。

② 《史通》卷二《本纪》。

法为传体。实际上司马迁写的是一篇"项羽列传",只不过定名《项羽本纪》而已,此其三。因此,刘知幾的《史通》处处扬班抑马。他在《二体》篇中虽然以《史记》、《左传》为纪传、编年二体之祖,但真正许为二体代表作的却是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所以他在《二体》篇的结论中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记》的十二本纪何以有这些"破例",刘知幾的评论是否允当,我们将在本节的结论中评述。

(二)十表

司马贞曰:"《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①]赵翼说:"《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②]准上,则"表"之义:

1. 表隐微之事,使之鲜明。

2. 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

3. 表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以上释义仅仅是只从组织材料上立论,远远没有揭示出《十表》的真正价值。尽管赵翼说"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二十四史中竟有十五史无表。计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除《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其余十三史皆刘知幾所见,故他一方面盛赞《表》之功

①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索隐》。

② 《廿二史札记》卷一。

用,“使读者举目可详”[1],同时又有废表之论[2]。刘知幾认为史表既不便阅读,又与纪、传重复,只应单独成书,不宜杂侧纪、传中。刘知幾未能详考《史记》十表之义例,故立论不确。司马迁十表,用以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建立了古代的年代学理论,最有章法义例。本文将在第二节《五体序目义例》中详论,兹从略。

(三)八书

司马贞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3]即八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尚书》是各种体裁的公文档案汇编,略如后世的资料汇编,司马贞以“五经六籍总名”释之最确,司马迁把分门别类记载典章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八书用“书”之名也是十分恰当的。

(四)世家

司马贞曰:“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4]刘知幾曰:“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又曰:“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5]即定名“世家”之义有三:

1. 记诸侯列国史。

2. 载传代家世。

---

① 《史通》卷一六《杂说上》。

② 《史通》卷三《表历》。

③ 《史记》卷二三《礼书·索隐》。

④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索隐》。

⑤ 《史通》卷二《世家》。

3.《世家》与《本纪》同体,均编年记事,因有别于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

但是在实践中,司马迁又有破例:

1)项梁所立楚王熊心,曾统兵遣将,号令一方。刘邦入关,项羽北救赵,均为楚王心所遣。项羽杀宋义自号上将军犹假号楚王之令,入关后尊楚王为义帝。司马迁既不为之立“本纪”,亦不为之立“世家”。

2)汉初诸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叛逆降为“列传”,而西周诸侯管叔叛逆,宗庙不守,却有《管蔡世家》。

3)汉初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爵禄不过封侯而立“世家”,但其他侯国不立“世家”,而且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封为诸侯,又历传数代,亦不立“世家”。

4)三十世家中有孔子、陈涉、外戚三世家。孔子为布衣,陈涉称王不终,汉帝后妃无世可传,但均立“世家”,其例云何?这些问题均属破例,详见本节后面的详述。

(五)列传

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①]张守节曰:“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②]

列者,陈也,列传,即众多之传。传,本为注经之书名,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之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所以刘知幾以《史》、《汉》之纪、传比于《春秋》之经传,议论是很精辟的。

---

① 《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索隐》。

② 《伯夷列传·正义》。

综上所述,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司马迁创作纪传史,正是为了巩固封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

但是,司马迁又确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有别于其他封建史家的可贵之点,突出地表现在《史记》中,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大思精。体大,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包罗万有,贯穿古今。它上起黄帝,下迄太初,汇总古今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地利等无所不备。人物除帝王将相之外,还记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如项羽、陈涉等,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渔夫、猎户、妇女、姬妾等,凡在人类活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物都叙入史中。也就是说,司马迁创作的《史记》虽然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它却扩大范围,描写了整个社会的各阶层。司马迁不仅首创民族史传,记载周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而且记载了国外民族,远及西亚,是他当时所理解的世界范围,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史记》内容如此丰富,正是因为五体结构形式体大思精,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

第二,记事实录。西汉学者刘向、扬雄以及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毕,质而不俚,其文

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这里着重从体制义例上来讨论一下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用以回答本节前面所提出的本纪、世家中的破例问题。

《史记》破例为体,计有三种类型。

1. 序事首尾完整,便于"察其始终"。夏、商、周三本纪上溯先公先王,使记一代兴衰之历史首尾完具,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洞察历史的发展轮廓。魏收作《魏书》,首列《序纪》,记载拓跋氏的先世起源,就是仿《史记》而创造的。

2. 正名实。司马迁认为,秦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②,"昭襄业帝"③,才有始皇的统一,故特作《秦本纪》。参照《六国年表》,寓意更明。表名为六国,实叙八国,首栏列周,以示尊周天子为共主,次列秦,就是记实以体现秦国"常雄诸侯"之意。因此周与秦不在六国数中。司马迁立《吕太后本纪》不立《惠帝本纪》也是记实。因高后孝惠时,惠帝垂拱,吕后称制,故以惠帝附入吕后纪中。司马迁将楚王熊心附入《项羽本纪》中亦同此例。司马迁不为吴芮立"世家"。因其事迹不显,载入年表即足。至于不为赵王张耳立"世家",是有意将张耳、陈余合传。

3. 寓褒贬。司马迁为孔子、陈涉、汉帝后妃以及为汉初萧、曹、张、陈、周等开国功臣立《世家》,是褒显他们的历史功绩。反之,对汉初叛国诸侯,因为他们没有起到"辅弼股肱"的作用,降为"列传",以示贬抑。但是周初管叔、蔡叔虽谋叛逆,后因蔡仲悔改,复封为诸侯,故司马迁仍立《管蔡世家》以劝善。由此可见,司

---

①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②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

③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马迁的破例为体，是寓有深意的。

班固仿《史记》作《汉书》，改通史体为断代史体，这是另一种创造，二者只可对照，不可并论。《汉书》断代为史。本纪载帝王，并取消世家，陈胜、项籍理应入传。《史记》贯通，本纪兼叙朝代，所以夏、商、周三代本纪上溯先公先王；又，《秦始皇本纪》之前有《秦本纪》，《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序列，章法义例是严谨的。如果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就会认为《史记》为例不纯。刘知幾以《汉书》为标准抽绎出纪传体的撰述理论。然后反过来用《汉书》的义例范围创始者《史记》的体例，在逻辑上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所以是迂阔之论。请看刘知幾提出的改造《史记》的意见，其言曰：

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①

又云：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

① 《史通》卷二《本纪》。

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1]

刘知幾以帝王相接来贯通历史的观点不无可取之处,现代的章节体通史正是这样编撰的,但这和纪传体之义例是不相容的。显然刘知幾是以断代之例来绳墨通史体,故其言迂阔。假如真地按照刘氏意见来改造《史记》,势将割裂三代本纪及秦代史事叙述的连贯性。至于《项羽本纪》,司马迁用汉纪年,又用传体叙述,只不过是用"本纪"之名列于《高祖本纪》之前,不仅仅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且构成了楚亡汉兴的强烈对比,增强了文章气势,更加引人深思。张耳被降为列传与陈余合传,亦是此例。司马迁之一升一降,其义则一。司马迁作《陈涉世家》,其因有四:一曰尊汉,二曰反暴政,三曰赞首难,四曰纪实。刘邦反秦是打着楚王陈胜的旗号起事的,得天下后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陈涉首难,"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2]。司马迁认为,秦朝暴政应当推翻,陈涉发难之功应予表彰,这在《史记》中多处讲到。西汉人并不认为陈涉是叛逆者。刘知幾用强化了的后世封建正统观念抨击司马迁不应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当然是迂阔的了。相映成趣的是,今世时贤用形而上学的分析法引出了与刘知幾殊途同归的结论,说什么司马迁"为陈涉这样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立世家",是"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否定班固作《陈胜项籍传》,这同样是一种迂阔的议论。假如班固照抄《史记》,在断代的《汉书》中孤标特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岂非咄咄怪事!作为断代的《汉书》,体例是严密的,马、班优劣在史

① 《史通》卷二《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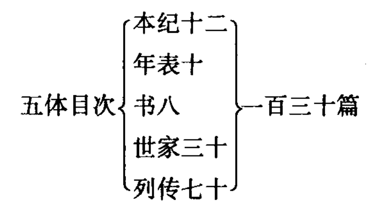
②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识，不在两书体例之得失。比较《史》、《汉》体例以辨马、班优劣，刘知幾正是失足在此，我们应引以为鉴。

## 二 五体序目义例

《史记》的篇章次第，各体均按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这是符合通史体例的。但司马迁往往有打破。尤其是列传、合传、类传、附传四种形式，都有一定的义例，这是研究《史记》不可忽视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体构成，总体是一个宝塔形的结构，与题名的内涵相吻合，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下面，分层讨论如次：1. 五体序列及篇数义例；2.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序列义例；3. 三十世家序列义例；4. 七十列传序例义例；5. 序赞义例。

（一）五体序列及篇数义例




五体序列义例，前节实已述及。篇数寓意，司马贞《礼史记序》云：

> 本纪十二象岁星之周；八书有八篇，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而成岁。[①]

① 范文澜：《正史考略》“史记”条。

张守节《论史例》稍稍做了修正,认为本纪十二象一岁有十二月,其说更详:

> 太史公……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三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

范文澜认为"本纪十二之数,实效法《春秋》十二公而作"[①],这也是正确的。因《春秋》十二公,亦象十二月,所以上起隐公以成十二之数,而使得《春秋》记事晚于平王东迁数十年。《史记》篇数与岁时历法相配乃是反映儒家所宣扬的一种天道观。《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所谓"中"即是"历数",象征天道运行;"执中"即是得天命,所以受命之君必封禅改正朔。司马迁亲自参与了汉武帝的封禅、改历,而《史记》究"天人之际",故五体篇数各有象征,寓意天道运行。司马迁将惠帝事迹附于《吕太后本纪》中而不像《汉书》那样分立两纪,在记实之中包含了不逾十二之数的意义在内。

《史记》五体结构及篇数的寓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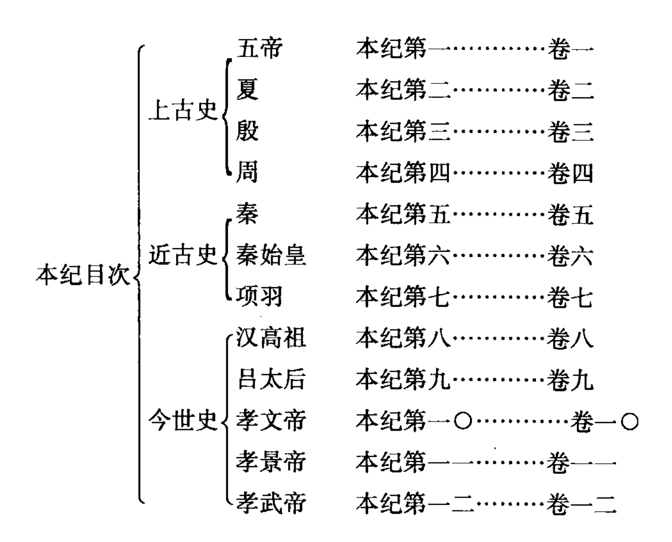
---

① 《正史考略》"史记"条。

也有着明确的交代。十二本纪取法《春秋》十二公，示《史记》继《春秋》而作，三十世家寓意“三十辐共一毂”，象征君臣之道如众星环北辰。但是，我们不必去钻牛角，刻意地探求五体结构及篇数的玄妙微意。我们只须从原则上来把握，《史记》五体结构是有意识创作的一个完整体系，它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数目的限制使司马迁记事简练，把握着严格的取舍标准。篇章次第的排列也遵循着一定的义例，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体系的一种反映。因此，司马贞对《史记》序目次第之批评，以及赵翼的“随得随编”之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序列义例

表、书二体与本纪紧密相连，可以看做是本纪内容的扩大和补充，故三体序列义例宜作通盘的综合分析。



| 年表目次 | | | |
|---|---|---|---|
| 上古史表 | ①三代世表 | 年表第一………卷一三 | |
| | ②十二诸侯 | 年表第二………卷一四 | |
| 近古史表 | ③六国 | 年表第三………卷一五 | |
| | ④秦楚之际月表 | 年表第四………卷一六 | |
| ⑤今世史表 | 汉兴以来诸侯王 | 年表第五………卷一七 | |
| | 高祖功臣侯者 | 年表第六………卷一八 | |
| | 惠景间侯者 | 年表第七………卷一九 | |
| | 建元以来侯者 | 年表第八………卷二〇 | |
| |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 | 年表第九………卷二一 | |
| |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 | 年表第十………卷二二 | |

| 八书目次 | |
|---|---|
| 礼书 | 八书第一………卷二三 |
| 乐书 | 八书第二………卷二四 |
| 律书 | 八书第三………卷二五 |
| 历书 | 八书第四………卷二六 |
| 天官书 | 八书第五………卷二七 |
| 封禅书 | 八书第六………卷二八 |
| 河渠八 | 八书第七………卷二九 |
| 平准书 | 八书第八………卷三〇 |

本纪、年表均编年记正朔,篇目按年代顺序排列。本纪编年以王朝为体系,年表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约两千三百年史事为三个段落(上古、近古、今世),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今世史表为一个时期。分期义例如下:

①《三代世表》,起黄帝,讫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

②《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讫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公元前476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

以上两个时期为上古史。

③《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讫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

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讫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公元前201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

以上两个时期是近古史。

⑤汉兴以来诸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

司马迁的历史分期,是以社会的伦理变化为标准的,这在十表《序》中阐述得很清楚,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具体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家。用以表现历史之"变",具有作规律性探讨的卓识远见。而且司马迁找出历史的大事变,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大事记作为分期断限的临界点。这是十分光辉的思想。明白了司马迁的时代断限,是我们研究《史记》的一把钥匙。

司马迁的这一光辉思想也是有继承的。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学说都在探讨治、乱的根源,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做试探。《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丘儒家学说的观点,认为尧、舜时代为大同之世,三代为小康之世,春秋以来为乱世,历史的发展向着衰败的方向演进,要治天下就得法尧、舜,妄图把历史拉回到西周的时代。《韩非·五蠹篇》记载了法家时移世异的进化论历史观,并有明确的上古、中世、近古、今世的提法。西汉时的《春秋》公羊学大讲《春秋》十二公,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阶段。同时又流行"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循环论历史观。无疑地这些都是司

马迁所继承借鉴的历史思想资料。但是,在司马迁以前的百家学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仅仅停留在思辨哲学的猜测和囫囵的描绘上,而司马迁却第一次用叙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出了明确的断限划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春秋》亲近疏远的笔法,在司马迁手里发展为详今略古法后王的历史观,当然这也受到了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启迪。

八书分专题记载典章制度。《史记》原有《兵书》、《律历书》,由于《兵书》亡,补阙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补缺(依司马贞说)。《礼书》、《乐书》亦亡佚,补缺者摘取荀子《礼论》及《议兵》补《礼书》,摘取《礼记·乐记》补《乐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个方面都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经国大事,故司马迁各列专题论列。但是地理、职官、食货(具体说是"食货"中之"食",即土地制度)、艺文等几个方面未受到司马迁的重视,这给班固留下了创造的英雄用武之地。《汉书》十志比《史记》八书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在这一点上班固发展了司马迁的史学,这是不必讳言的。

(三)三十世家序列义例

目次如下:世家第一吴太伯;二齐太公;三鲁周公;四燕召公;五管蔡;六陈杞;七卫康叔;八宋微子;九晋;十楚;十一越王勾践;十二郑;十三赵;十四魏;十五韩;十六田敬仲完;十七孔子;十八陈涉;十九外戚;二十楚元王;二十一荆燕;二十二齐悼惠王;二十三萧相国;二十四曹相国,二十五留侯;二十六陈丞相;二十七绛侯;二十八梁孝王;二十九五宗;三十三王。三十世家,按时代序列可分为六组:

| 世家目次 | | | |
|---|---|---|---|
| | ①吴太伯至郑世家 | 世家第一至一二 | ………卷三一至四二 |
| | ②赵世家至田敬仲完 | 世家第一三至一六 | ……卷四三至四六 |
| | ③孔子、陈涉、外戚 | 世家第一七至一九 | ……卷四七至四九 |
| | ④楚元王至齐悼惠王 | 世家第二〇至二二 | ……卷五十至五二 |
| | ⑤萧相国至绛侯 | 世家第二三至二七 | ……卷五三至五七 |
| | ⑥梁孝王、五宗、三王 | 世家第二八至三十 | ……卷五八至六十 |

第一组，吴太伯至郑世家共十二世家，载周初所封诸侯，其始祖皆有德于人民，子孙享其德泽为诸侯。但世家篇目序列与《十二诸侯年表》序列不同，对照如下：

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

——《十二诸侯年表》序列

吴、齐、鲁、燕、蔡、陈、卫、宋、晋、楚、越、郑

——三十世家序列

年表反映春秋之世的霸政，以诸侯强弱为序列。周列第一栏，尊天下共主；鲁列第二栏象征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故周、鲁均不在十二之数中。鲁后为齐、晋、秦、楚、宋，即春秋五霸之序列。吴殿后，示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这些都是春秋笔法。世家按诸侯始祖与周之亲疏关系和开国时功劳大小排列，象征诸侯夹辅周室，所以与年表序列不同。司马迁嘉吴太伯之让国，列为第一。第二组赵世家至田敬仲完四世家，乃战国之世以暴力篡夺而得的诸侯，即赵、魏、韩三家及田齐。第四、六两组共六世家，载当世刘姓宗室王。楚元王至齐悼惠王三世家为高祖高后所封，梁孝王文帝子，五宗诸王景帝之后，三王武帝子。第三组为孔子、陈涉、外戚，第五组萧相国至绛侯汉初功臣，仍按时代序列排列的专题世家。

(四)七十列传序列义例

目次如下:列传第一伯夷,附叔齐;二管仲、晏婴;三老子、韩非,附庄子、申不害;四司马穰苴;五孙武、孙膑、吴起;六伍子胥;七仲尼弟子;八商君鞅;九苏秦,附苏代、苏厉;十张仪,附陈轸、犀首;十一樗里子、甘茂,附甘罗;十二穰侯、魏冉;十三白起、王翦;十四孟轲,荀子,附齐三邹子:邹忌、邹衍、邹奭,又附齐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又附公孙龙、李悝、尸子、长卢子、吁子、墨子;十五孟尝君田文,附冯驩;十六平原君赵胜、虞卿,附毛遂、李同、楼缓;十七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附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十八春申君黄歇,附朱英、李园;十九范雎、蔡泽,附须贾、王稽、郑安平;二十乐毅,附乐间、乐乘;二一廉颇、蔺相如,附赵奢、李牧;二二田单,附王蠋;二三鲁仲连、邹阳;二四屈原、贾谊;二五吕不韦,附嫪毐;二六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附聂荣、田光、樊於期、高渐离;二七李斯,附李由;二八蒙恬,附蒙毅、赵高;二九张耳、陈余;三十魏豹、彭越;三一黥布;三二淮阴侯韩信,附蒯通;三三韩王信、卢绾;三四田儋,附田横;三五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三六张苍,附周昌、任敖、申屠嘉;三七郦生、陆贾,附朱建;三八傅宽、靳歙、周绁;三九刘敬、叔孙通;四十季布、栾布,附季心、丁公;四一袁盎、晁错;四二张释之、冯唐;四三万石君石奋、张叔,附石建、石庆、卫绾、直不疑、周文;四四田叔,附田仁;四五扁鹊、仓公;四六吴王濞;四七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附灌夫;四八韩安国;四九李将军李广,附李陵;五十匈奴;五一卫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附公孙贺等十六人;五二平津侯公孙弘、主父偃;五三南越尉佗;五四东越;五五朝鲜;五六西南夷;五七司马相如;五八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五九循吏: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六十汲黯、郑当时;六一儒林:申公、辕

固生、韩生、伏胜、董仲舒、胡毋生；六二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杨仆、减宣、杜周；六三大宛，附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六四游侠：朱家、剧孟、郭解；六五佞幸：邓通、韩嫣、李延年；六六滑稽：淳于髡、优孟、优旃；六七日者司马季主；六八龟策；六九货殖：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师史、刁间、任氏、桥姚、无盐氏，附田啬、田兰等十二人；七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司马迁。

上述七十列传分为四个类型：①专传，②合传，③类传，④附传。专传指一人一传，二人以上为合传，以类标题为类传，凡未人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传中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并非附传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戚友；重要附传人物为事类相从。七十列传载正传人物一百四十人，附传人物九十二人。附传人物本多于正传人物，九十二人只指事类相从的附传人物。孔子弟子七十七人。列传人物总计三百零八人。类传人物古今同传，以类相从；合传与类传为同一类型，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实质是“黄老列传”。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史传分插在人物列传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同天子臣民，此四海一家之观念，表现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进步历史观。《大宛列传》所述为外国民族，单列于类传中。总之七十列

传具有组合义例,可分为十四组,[①]序列如下:

列传目次

| 组别 | 列传 | 卷 |
|---|---|---|
| ①伯夷列传 | 列传第一 | 卷六一 |
| ②管晏至仲尼弟子 | 列传二至七 | 卷六二至六七 |
| ③商君至田单 | 列传八至二二 | 卷六八至八二 |
| ④鲁邹至屈贾 | 列传二三至二四 | 卷八三至八四 |
| ⑤吕不韦至蒙恬 | 列传二五至二八 | 卷八五至八八 |
| ⑥张耳陈余至田儋 | 列传二九至三四 | 卷八九至九四 |
| ⑦樊郦滕灌至季布栾布 | 列传三五至四十 | 卷九五至一百 |
| ⑧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 | 列传四一至四五 | 卷一〇一至一〇五 |
| ⑨吴王濞至韩长儒 | 列传四六至四八 | 卷一〇六至一〇八 |
| ⑩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 | 列传四九至五一 | 卷一〇九至一一一 |
| ⑪平津主父至淮南衡山 | 列传五二至五八 | 卷一一二至一一八 |
| ⑫循吏至酷吏 | 列传五九至六二 | 卷一一九至一二二 |
| ⑬大宛至货殖 | 列传六三至六九 | 卷一二三至一二九 |
| ⑭太史公自序 | 列传七〇 | 卷一三〇 |

第一组伯夷列传,是惟一的三代人物入传。此传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可以称之为论传。八书的中心是探讨天道,律、历、天官、封禅都是直接讲天道的。天官有等级,百神有等级,人世间也应有等级。各种礼乐制度是合于天道人性的,这就是究天道的目的。但自西周共和以来,天道的权威一次次受到社会变革的打击,至上的天道权威伴随着王权的衰落而动摇了。尤其是秦楚之际,“五年之间,受命三嬗”,这更使得司马迁看到人心的背向对历史的发展起最后的发言力量,因而对佐善惩恶的天道发出了

① 本文首发分为二十组,这里将原十三至十九各组类传并为一组,是为十四组。

疑问。如果说八书重在讲天道人性,那么列传则是强调人为的作用。司马迁列伯夷为列传之首,不仅是尊其让国和守节不食周禄的节操,而且更主要的是借题发挥,提示义例,表明七十列传是讲人事的。所以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论形势,论功利,这里是看不到天道的影子的。

第二组,管晏至仲尼弟子六传,传春秋时代人物。第三组,商君至田单共十五传,传战国时代人物。战国四公子排列一起,苏秦与张仪蝉联,都有以类相从之意。第四组。鲁仲连至屈贾四传,表彰品德高尚,壮志不伸,而能以言论德行留照人间的人物,连类相及。鲁仲连、屈原均战国之世人物,故编列于此,下及汉代的邹阳、贾谊。第五组,吕不韦至蒙恬四传,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注重暴力权诈取天下,固轻百姓力,都不得好下场。《刺客列传》是类传,应排在《循吏列传》之后,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反暴政的思想。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司马迁在李斯、蒙恬两传的赞中,既肯定他们的功绩,又直接地批判他们轻忽百姓的罪责,是值得注意的。白起、王翦有大功于秦,白起冤死,王翦善终。因白起坑降,王翦却无此暴行,所以两人合传以示对比。白起坑降不同于李斯、蒙恬的轻暴百姓,故司马迁将王翦前置白起传,而不是将白起下连王翦,以与第五组的暴政人物分开。第六组,张耳、陈余至田儋六传,叙楚汉相争人物。第七组,樊郦滕灌至季布栾布六传,皆辅汉功臣义士。第八组,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五传,叙文、景时代忠勤于王室的人物。仓公传上连扁鹊以表现医学的承传。第九组,吴王濞至韩长儒三传,叙景、武之际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韩长儒卷入魏其与武安两侯的纠葛中,故排列于此。第十组,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三传,序伐匈奴的专题人物。第十一组,平津侯

主父至淮南衡山七传,序武帝时的人臣传记和开疆拓土。第十二组,循吏至酷吏四传作两两对比。循吏传无汉代人,酷吏传无汉以前人。汲郑古朴耿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学而多用酷吏。司马迁用这样的强烈对比来讥刺武帝的政治。第十三组是各种专题类传。《大宛列传》是叙外国史事的类传,西域各国附载于该传中。第十四组是总括全书要旨的自序传。

由上分析,七十列传基本以时代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则,但有组合义例,或以类连及,或对比见义。用八个字来概括是:"时代为序,以类相从。"上面的分组与评论,未必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但总原则的分析不会有错。赵翼评论《史记》篇目是"随得随编"①,其说绝不可信。"时代为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反映;"以类相从"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用历史类比法进行古今纵横排比论证,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这也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方法。古今类比,有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即以古为鉴之意。我们掌握了司马迁的历史类比法,以此为解剖刀去阅读和研究《史记》,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例如附记法,不仅列传中有附传,而且其他各体亦有附记。夏、商、周三本纪上溯先公先王,实质是附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附载其他小国,《管蔡世家》附"曹世家"。司马迁对他的附记法并有所交代。《鲁仲连邹阳列传赞》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这说明合传、类传以某人物或以某时代为中心上溯或下及,是连类而附。也就是说,《史记》附记法的实质是类比法的引申。

---

① 《廿二史札记》卷一。

此外,《史记》命篇,司马迁不作统一标准。《汉书》列传一律以人物姓名命篇。司马迁以姓名、封爵、谥号,别名兼用,其义无法考实,但可以肯定司马迁绝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根据当时所理解的善恶是非所表现的爱憎感情来决定命名的。例如"循吏"与"酷吏"两类传之命名尤为明显。又如汉初三雄,彭越、黥布皆以其名命篇,而韩信用"淮阴侯"之爵名命篇,表现了一种亲切感,最同情韩信。对石奋用"万石"之别号命篇,是口语化的反映。其他不必一一评述了。

(五)《序》、《赞》义例①

《史记》篇末"太史公曰"云云,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习惯称《赞》。十表、八书及类传篇前之"太史公曰",习惯谓之《序》。《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中夹议,亦用"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所创造的议论形式,即篇前作《序》,篇后作《赞》,篇中夹《论》等三种史论形式,对于后世影响很大。《太史公自序》则是全书的总论。不过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命名曰序、曰赞、曰论。《史通》卷四《论赞篇》正式论列"太史公曰"为"赞",也就成了通称。

《左传》的"君子曰"是有议而发,后世的编年体如《汉纪》《资治通鉴》均效法它。《史记》则篇篇有《赞》,为纪传体史所效法,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汉书》称"赞";《后汉书》称"论"而又为"赞";《三国志》称"评",官修各史称"史臣曰"。刘知幾评论《史记》之《赞》是画蛇添足,认为司马迁给史论的泛滥开了一个恶例。我们认为刘氏的批评是不恰当的。一部历史著作,若无作者的评论和观点,只能算做资料汇编,而不是一部真正的史

① 本文略述,详论见本书《简评史记论赞》一文。

学。所以刘氏的批评在实践中不能成立,唐以后官修诸史,仍篇篇有赞,而且唐太宗亲自为《晋书》作《赞》称“制曰”因为“论”、“赞”是史家直接发抒议论的重要形式,并非蛇足。刘宋时的杰出史学家范晔作《后汉书》,他以“论曰”发端的史论以及类传中的“序论”,篇篇精彩,足以夺二十四史之冠。但是范书在“论曰”之外又有“赞曰”,确如刘知幾所说,是“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采”①的蛇足。所以空洞无物的论赞,责任在效颦者而不在司马迁,这是不言自明的。

司马贞对《史记》的论赞却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司马迁为论失于偏颇,没有全面概括篇中内容。所以司马贞注疏《史记》名曰《索隐》,探索幽隐,阐扬光大,重新一一作“赞”,称《索隐》述“赞”。我们看司马贞的“赞”,内容虽全,却不是真正的史论,只不过是史传内容的复述以韵文形式摘要,是标准的“苟炫文采”之作,是不能与司马迁的史论同日而语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对司马迁的史论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②我们认为章氏的评论是中肯的。综观《史记》一百三十篇之《序》、《赞》、《论》,它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内容极其丰富,计其大端有五:①考证史实,如五帝三代诸本纪之《赞》;②调查研究,叙游历之所得,如《河渠书赞》、《齐太公世家赞》等;③对历史人物进行直接的评论,如《项羽本纪赞》、《蒙恬列传赞》、《淮阴侯

① 《史通》卷四《论赞》。

② 《文史通义》内篇三《史注》。

列传赞》等;④明述作之旨,如八书《序》、十表《序》等;⑤提示作史义例,如《苏秦列传赞》交待写翻案文章的原则,《鲁仲连邹阳列传赞》交待连类相及之附记法,《匈奴列传赞》交待对当世历史多微文刺讥等……以上内容往往补篇中所未言之事。正如赖襄所说,《史记》之论赞,"自是一体","特疏己立传之意,又补传所未及,而有停笔踌躇俯仰今古处,足以感发读者心。是论赞所以有用。子长之后,少得此意者"①。我们认为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过去,史学界似乎流行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凡"封建正统"必斥之为"反动"。所以在研究《史记》时为了肯定它的进步性就千方百计美化司马迁,把他和其他封建史学家对立起来,乃至于称司马迁为"人民歌手",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史记》虽然受到一些封建文人的诋毁,但却更受到整个封建社会各王朝的推尊,被颁令为国史正体。班彪、班固父子虽有批评,但也是很推崇的。本来班彪作的是"史记后传",班固才断代为史的。司马迁本人不仅反复申说效《春秋》作《史记》,而且还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等等述史原则。我们通过对《史记》五体结构义例的分析,得出了五体体制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等级秩序的结论,这说明司马迁也是维护封建正统的史学家。《史记》的厚今薄古,却也反映了两汉帝王中心论的历史观。但在当时条件下,司马迁的这些历史观又是进步的。因西汉封建社会处于上升发展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是新生事物,司马迁为这一新制度呐喊是应该肯定的。《史记》的进步性并不只此。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使他在某些方面,例如反暴政,同情人民等,突破了正统思想的束缚,使《史记》的内容无比丰

① 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总论》。

富。司马迁不仅创造了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五体形式,而且还摸索出了新的历史研究法,例如历史的类比研究,划分历史断限的研究,这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就是我们研究《史记》体制义例所得到的结论。也许本文所述是一个谬误,这仅仅是一种探索,热诚地希望史学史专家们给予指正。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6 期)

#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李少雍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纂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司马迁为什么要弃置传统的、现成的编年体，而创立新的体制，为什么要为那么多的历史人物立传，为什么要把自己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饱含血泪的"名山之作"和"发愤之作"，建立在人物传记的基础上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纪传体的文学意义和影响，不是没有益处的。本文拟从史学的发展，司马迁的写作目的和历史观，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方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 从神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但是，在一个相

① 《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创造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在远古时代,甚至连历史观念也没有。那时人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结构,并受到梦中景象的影响,慢慢产生了人死后灵魂脱离身体而独立活动的观念。[①] 又过了很久,由于人类智力在生存斗争中的不断发展和"自然力被人格化",灵魂不死的观念才被神的观念所代替。人们用这个新的意识成果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类与世界都是神创造的,于是,才有了最早的历史观念。

我国古代传说中,就有许多具有超人力量的神:女娲(补天的神),黄帝、蚩尤(战神),夏禹(治水的神),后稷(农神),等等。到了商代,还有了最早的历史记录——甲骨卜辞和最早的历史家——刻甲骨文的"贞人"。不过,那时的历史家所从事的工作纯属占卦吉凶、求神问卜的宗教活动。

西周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大,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及其统治思想宗教神学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到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简单事实,终于被"发现"了。

首先反映这种新观念的历史著作是《春秋》。《春秋》基本上是从人事的角度记载历史的。虽然它也记了不少灾异,但对这些灾异与人事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不加评论。如果说《春秋》所记的还是奴隶主贵族的活动的话,那么《国语》中,则有了"平民"的影子。《国语·晋语》记载了春秋时期在用人问题上从"亲亲"(重用贵族)到"尊贤"(不论身份,唯才是用)的变化。晋文公用人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原则是“先旧族而后贤才”，贤才的地位低于旧族。到了晋悼公，这个原则被修改为“选贤良，兴旧族”。贤良的地位提高了，而且他们人数众多，所以，要择优录用——“选”；旧族的地位下降了，而且他们已经没落，所以要重新组织——“兴”。而《左传》中更出现了“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天道远，人道迩”（昭公十八年）那样的无神论思想，出现了“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圣人与众同欲”（成公六年）一类的重民观点。《左传》所反映的“人”的观念比《春秋》、《国语》更进了一步，“人”的地位更提高了，“民”的外延更扩大了。①

从神造历史的观念，到人造历史的观念，以至《春秋》、《国语》、《左传》的成书，这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可是，这些史书还比较幼稚，还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著作。特别是它们的历史观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虽然着重记了人事，但同时又记了很多灾异，表明神还有相当大的作用；它们虽然承认历史主要是人创造的，但它们所指的“人”，基本上是统治者；它们“重民”、“保民”，并不意味着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主要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争取人心、占有劳动力的欲望。它们所体现的关于人创造历史的观念还很不彻底。

但无论如何，《春秋》等书还是在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方法等方面，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把“人”的范围从贵族扩大到平民，甚至于社会底层，在上述条件下，以“人”为纲，编写出新的、具有完整体系和巨大规模的、充分肯定“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作用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 从一字褒贬到全面褒贬

这个历史重担为什么会落在司马迁的肩上呢?

司马迁有悠远的史学家传,有父亲的临终遗命,有非常渊博的学识和极为丰富的见闻,幼时学过耕牧,后来当过史官。虽然遭到任何有自尊感的知识分子都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宫刑,可是,他却"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而不悔,"隐忍苟活",始终怀抱着发愤修史,以"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的崇高理想和坚强决心,这些都是他成为杰出历史家的条件。

司马迁所以能完成上述历史使命,其原因绝不止此。我以为主要还应该从他的写作目的和历史观点方面加以考察。

《太史公自序》中吞吐曲折、沉痛反复地吐露了他继孔子作《春秋》的抱负。司马谈"发愤且卒"时,拉着儿子的手,哭着作的那番嘱咐,就隐含着继周公、孔子之后"论载"史文的遗志。司马迁是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情的,"俯首流涕"地宣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他在《自序》中还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后面又有"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话。虽然他对壶遂说"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这不仅是谦辞,更是遮掩"刺讥"之旨的遁辞。总之,司马迁以继孔子作《春秋》自命无疑。

同壶遂的一段对话,详细说明了他对《春秋》的看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

恶恶，贤贤贱不肖”，“《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等等。在他看来，《春秋》是一部政治道德全书，其作用在于给人们提供是非善恶的标准。“隐然命于《春秋》”①、深知《春秋》“微言大义”的司马迁，其修史的宗旨也是基于“辨是非”、“善善恶恶”这种褒贬精神的。壶遂问司马迁：“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质问。司马迁回答说：“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这些话表明，他的修史本有“刺讥”的动机，却“非独刺讥而已”，也有“褒”和“诵”。回答中还有“力诵圣德”的表白，虽类官样文章，但褒贬二者相反相成，确乎都是司马迁修史的目的所在。《自序》在说明《史记》各篇的写作意图时，总是流露出他的褒贬情绪。“贬”的意味虽比较隐约，仍可从字里行间窃见。“褒”的意思则很明显。如他喜欢用“嘉”这个字，“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等等。《自序》一共用了二十个“嘉”字。总之，司马迁吸取了《春秋》的褒贬精神是无疑的。

我国还有一种臧否人物的古老传统，即相传始于周代的所谓“谥”。人死了以后，根据他在世时的事迹给他立一个名号，用来劝善贬恶。秦始皇以为“子议父、臣议君”（《史记·秦始皇本

---

① 魏元旷：《潜园类编·〈史记〉达旨》。

纪》),把它废除了。汉代又恢复,一直沿袭到清代。

司马迁虽然继承了“善善恶恶”的传统精神,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春秋》那种“微言大义”的褒贬方式,已不能使他满足。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实际上是在说孔子那种一字褒贬是“空言”。他在寻求一种新的褒贬方式,来达到褒贬的目的。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话来看,他既不能用简单的“一字褒贬”,更不能用死后立谥那样原始的“盖棺论”,他认为为历史人物立传,对他们的一生事迹进行全面评述,才是最好的褒贬方式。我们读《史记》各人物传记,总感到司马迁对每一历史人物的爱憎(褒贬)都是很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合传与类传。合传中人物,其事迹或思想,一般都有近似之处,如管晏、孟子荀卿、廉颇蔺相如、屈原贾生、刘敬叔孙通、季布栾布、万石张叔、魏其武安侯、淮南衡山王等传即是。“类传”,顾名思义,即同一类人的传记。所谓同类,就是志趣相类,职业相同,而主要是指前者,如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货殖等传即是。尤其是循吏、酷吏二传,它们一褒一贬的意思,从题目本身便可一望而知。我们觉得,司马迁建立合传、类传的体裁,是深寓了褒贬的旨趣的,或者说是为了褒贬的目的。甚至可以说,这两种体裁特别是类传,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典型化的手法。同一合传或类传中的人物,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或者说是同一艺术典型。

司马迁为要达到褒贬的目的,一定要寻找一种合适的褒贬方式,既然他摒弃了《春秋》之类的一字褒贬,那他就势必采用新的方式,于是,给历史人物立传的褒贬方式产生了。我们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 重视人的作用的历史哲学

司马迁不仅没有采取《春秋》的褒贬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采取了与《春秋》完全不同的褒贬标准，或是非标准。严格说来，“褒贬”本身并不能算作他的修史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在《自序》中表示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报任安书》里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这才是他修史的根本目的。这些话中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一句说得最明白，也大体上能概括其他各句的意思。“纪”，一本作“理”，我们觉得可以当“规律”讲。这就是说，司马迁所以要编纂史书，目的在于找出成败兴坏等历史变化的规律。他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必然也以是否符合这个“成败兴坏之纪”为转移。

什么是司马迁所谓“成败兴坏之纪”呢？这要从他的世界观中找答案。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发生了一件思想史上的大事：董仲舒帮助汉武帝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立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体系的工作。为了证明汉王朝的专制制度是永恒的、神圣的制度，董仲舒建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的概念：天有人格、意志、目的，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变动，诸如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成败兴亡的转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君权是天授予的，人民必须接受统治，否则天就会降“灾异”，以示“谴告”和惩罚。这就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的主要内容。司马迁要编修史书，首先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个统治思想作出评价并决定弃取。

《自序》中大段引述了司马谈所论的“六家要指”。“要指”提

出百家皆务为治、殊途而同归的主张，分析五家短长，抬高道家地位，“这并非如《汉书》所说的‘先黄老而后六经’，而是托黄老以为重言，隐约其词地反对当时儒者绝百家之道不使并进”。① 司马氏父子都反对汉武帝“定于一尊”的政策。

司马迁特别反对董仲舒的宗教神学思想。他的世界观里虽然也有一个“天”的概念，但这个“天”是指大自然。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自序》）人必须顺应这些自然规律，不可违反。而《天官书》中精确地记载着星球的运行、星座的位置，《自序》中说作《历书》的目的是使“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秒）忽”，这表明人不止是消极地顺应，而且可以积极地掌握自然规律。既然“天”是自然之物，那它就不可能有什么意志、目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以好人遭灾祸、坏人享富贵的事实，对善恶报应的天道观，作了根本的否定。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又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里不但否定了“天”有目的、意志，而且否定了“天”能够奖善罚恶，否定了“天道”的正义性。既然“天”无目的，就不可以把人事的成败兴亡归诸“天意”。他批评项羽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又批评蒙恬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46页。

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司马迁对这两个悲剧人物的命运都有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对他们把自己的不幸结局归之于“天意”的说法,却给予了严肃的驳斥。这一方面是他的“实录”精神使然,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这个关于“天”究竟有无目的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的态度。个人的成败不是“天意”所致,国家的兴亡也完全由人事决定。《楚元王世家》里有一段话:“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①]这里的“妖孽”和“祯祥”不是什么天降的“灾异”,而被解释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现象。完全排除“天”的目的作用,以国家的兴亡发端于政治的得失,把个人成败归结于自身的功过,这既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而且又表明他已经把他的自然观运用到了社会历史的范围。

班彪、班固父子曾抨击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使《史记》长期蒙受“谤书”的恶谥,却道出了司马迁社会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特点。

先看“述货殖”。前人说:“此篇论者甚多。如茅坤、董份则以为自伤;陈仁子、赵访、闵如霖则举王侯患贫、秦皇客巴寡妇清乏文以为讥世争利。后世论者率不外乎此二说。”[②]其实此二说远不如班氏父子的见解高明。《索隐》引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货殖基本上就是指的人的生产活动。《货殖列传》一开头,司马迁便引用老子关于“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话,说明生产可以达到“上则富国,下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2册第89~90页。

② 刘咸炘:《四史知意·太史公书知意六》。

则富家"的目的。显然,他已直觉地看到了生产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所举的太公望、管仲重视发展生产而"齐富强至于威、宣",勾践用计然之谋而成为"五霸"之一等历史事实,的确很有说服力。至于"富家"的例子,则更多,更生动有力。司马迁把物质生产看成是满足人的衣食等天生欲望的一种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珍贵文字的意思是:人的利欲是"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天生的、自然的本性,总是要不断滋长的,生产也就会随之而不断发展,对于这种自然趋势,只可循其规律(道),因势利导,不能加以阻遏,"与之争"的做法是最拙劣的。

司马迁在充分肯定货殖的作用的同时,又热情颂扬货殖者。传末有一段概括的话:"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作者在传中反复赞叹货殖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至于"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业绩。他赞扬货殖者中的"能者"、"巧者",称颂他们的致富之道,如太公望的"技巧"、计然的"七策"、范蠡的"择人而任时"等等。尤其叹赏周代大商人白圭的本领。他引用白圭的话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把一个商人同古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对货殖者的高度评价。把货殖之术同治国之术、用兵之术同样看待,也不能不说是对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深刻理解。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些货殖者原先都是比较贫贱的。在积累财富的过

程中,他们一般都“折节为俭”,很“纤啬”,“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有的甚至订出“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的“家约”。节俭力行,由贫而富,由富而至于“素封”之贵,甚而至于与王侯抗礼,这表明他们与世袭贵族不同,他们属于一种还在向上发展的新生力量,或者可以叫做新兴商人地主阶级。但是,司马迁所以要歌颂货殖者,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体现了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念和由贫而富而贵的幻想。经济上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同政治上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一样,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及其“与王者同乐”的最高理想境界。

金人王若虚针对司马迁“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的话,大动肝火地说:“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又可羞乎? 迁之罪不容诛矣!”[①]可见司马迁的“述货殖”激起封建卫道势力何等强烈的不满,从而也可反证所谓“自伤”或“讥世争利”之说的不足信。

再看“序游侠”。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主要从两个方面歌颂游侠。一是歌颂他们的反抗精神。游侠的斗争锋芒指向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所谓“扞当世之文罔”;他们救助的对象,主要是贫贱者,所谓“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他们的行动非常果敢,所谓“不爱其躯”,“为死不顾世”;他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如在景帝“尽诛”瞯氏等人之后,白氏等侠客“纷纷复出焉”。二是歌颂游侠的高贵品德。他们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功见言信”,他们不自矜功伐,沽名钓誉,“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廉洁退让”,如朱家“诸

① 《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四》。

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郭解"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损己利人,"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如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车,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去其贼,罪其姊子";等等。

我们还要指出,与游侠的高尚道德相对照,司马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所谓仁义道德的实质。他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种道德完全以权力的窃取和财富的掠夺为标准,而这个标准正是"成则为王,败则为盗"的历史观的反映。司马迁所以同情游侠,是因为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为"窃国者"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是因为按照他的标准,他们比之"已享其利者"是最有道德的。司马迁所以为游侠立传,更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们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司马迁认为,"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仲尼等所谓"有道仁人"尚且有过不幸遭遇,"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他从而指出,"士穷窘而得委命"的侠客是"不可少"的社会力量。朱家有着"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的影响。剧孟的影响更大:"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影响所及,将军为他求情,皇帝亲自决定把他家迁至茂陵:"及徙富豪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司马迁不仅没有因为游侠是一些出自社会下层的失败者而忽视他们,反而充分肯定他们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对他们作

出很高的评价，甚至以统治者为陪衬来突出他们的高大形象。仅仅把这解释为“不以成败论人”[1]是不够的，但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确实是不论成败，不问贵贱，只看其历史作用如何。

《陈涉世家》是一个更突出的例子。陈涉、吴广自然也属于所谓“奸雄”一流。他们出自社会底层，与游侠有着血肉的联系；陈涉虽曾短期称王，同样应算作没有“抢得天下”的失败者，与侠客有着共同的命运；其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与朱家、郭解等人几乎完全是一致的。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陈涉世家》、《太史公自序》等篇中，多次高度评价陈涉，特别是在《自序》中把他与汤、武（圣王）和孔子（圣人或“素王”）并提，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为陈涉这样被统治者视为“盗贼”的人立“世家”，把他同古代的圣王和圣人相提并论，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极为卓越的识见，即使在二十四史的所有作者中大约也找不到第二个具有同样胆识的人。而且，在司马迁的心目中，陈涉是完全够资格入“本纪”的，比诸汤、武即其明证。司马迁还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自序》）所谓“三嬗”，即秦至陈涉，陈涉至项羽，项羽至刘邦。除陈涉外，项羽、刘邦都有本纪。司马迁不为陈涉立“本纪”，是自有隐忧在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他要这样高度评价陈涉呢？这当然也是从陈涉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出发的。在司马迁看来，陈涉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贡献，这就是《史记》中反复提到的“发难”之功。“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自序》），没有这“一夫作难”（贾谊：《过秦论》），秦王朝就不会被推翻，刘氏天下就不能建立，真实记录这个历史过程，正确评价“首难”者陈涉的，那时实在只有司马迁一人。而他所以能如此，归根结底又是由他的历史观决定的。

---

①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240页。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历史观里的两个重要方面:重视生产,重视下层人民的作用。

朱家、郭解、陈涉、吴广一类侠客和农民起义领导者,在《春秋》、《左传》的作者们眼里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司马迁为他们立传,立世家,把他们同王侯将相并列,表明他不仅把"人"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下层,而且肯定了这些人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史纪》描述上下三千年间不同社会中的各种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前人早有论述,也是任何通读过全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出现了聂荣、漂母、缇萦、巴寡妇清等各具特色的妇女形象和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少数民族列传。对这各种不同的人,不论华"夷",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贵贱,司马迁一律平等看待,按其历史作用的不同,给以相应的评价,使之各得其所。

重视生产的作用,实质上还是重视人的作用,因为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前面已经谈到司马迁对善计谋、有能力的货殖者的称颂,还提到"择人而任时"的货殖之术。置"择人"(选用劳动力)于"任时"(掌握时机)前,看来是把"人"在生产中的头等重要的作用估计到了的。传中还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这刀闲是个很有眼光的货殖者。他"发现"了奴虏特别是"桀黠奴"的作用,利用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甚至同"守相"交通,因而致富。同时,他也让这些奴虏们"自饶"。奴虏们很乐意卖力,都觉得给刀闲当奴隶比解放为自由民还好。对于"奴虏",一般人是"贱",而刀闲是"贵"而"爱"。这表现了司马迁的贵贱标准与世俗是不同的。"贵"的原因是因为奴

虏们有劳动能力,能创造财富。在这里,似乎有一种新的关于“人”的价值的观念,代替了传统的尊卑观念。

总之,反对神学目的论,述货殖,序游侠,为陈涉立世家,都贯穿着“重视人的作用”这条红线。否认“天”有目的,赞扬货殖者,是肯定人在顺应自然、发展生产方面的作用;歌颂侠客和农民起义领袖,是肯定人在处理人事、干预政治方面的作用。

《史记》结合作者刻骨铭心的身世感慨和愤世嫉俗的幽深情绪,有许多关于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爱惜人的不拘一格的才能、珍重人的人格尊严、相信人的精神力量等方面的记述。但这需要专文论及。本文限篇幅,容不赘列。

综上所述,司马迁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社会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创造的,成败兴亡的关键在“人”。这就是他的所谓“成败兴坏之纪”的真谛。“大”的历史作用,有关“人”的种种问题(《货殖列传》甚至详细记述了各地的风俗人情,各少数民族列传也记述了各种“异国情调”),司马迁都感兴趣,都很重视,这位历史家的目光几乎完全集中在“人”身上。如何利用“毕集”案头的古今历史资料,来寄托身世感慨,体现“成败兴亡之纪”,使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如浮雕般地突现出来呢?变编年为纪传,废弃按“年”记事的编年体,创造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

## 劳动力的发现与社会变革

纪传体的创立,除了意识方面的原因外,还必然有其社会的根源。司马迁的思想本身也只不过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我们没有必要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只是想提一下纪传体的产生同劳动

力的解放、封建等级制度的正式建立等社会变革的深刻联系。

恩格斯曾说,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后来生产发展了,"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于是,"奴隶制被发现了"。[①]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就某种意义来说,即在于战俘的劳动力被发现。尽管那时奴隶还不被看成是人,但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聪明才智,却无法否认。汤的宰相伊尹、武丁的宰相傅说,原来都是奴隶。后来,奴隶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则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周朝开始废除人殉制。春秋战国时,农奴虽被称作"贱人",但到底算是人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对统治者震动之大,教训之深,都是空前的。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武帝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繁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从而也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显露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力量。人的作用,劳动力的价值,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司马迁学识极渊深,见闻极广博,遭遇极惨痛,因而就有可能突破狭隘的眼界,抛弃各种偏见,看到这个客观存在的明显事实。

前文已引过司马迁"安在无土不王"的话。按照贵族世袭特权制,本是"无土不王"的。可是陈涉"一夫作难",却打破了旧例,无尺寸之地的"庸耕者"竟然称了"王"。项羽、刘邦也是"无土而王"的。在贵族特权制下,贵则必富,不贵则不富。可是《货殖列传》中那些从事"恶业"、"奸事"的卑贱者,却也由贫而富,甚至由富而贵了。由"无土不王"到"无土而王",由"不贵不富"到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220页。

"贫而能富"、"富而能贵",这说明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武帝时封建等级制度的正式建立(从侯外庐说),就是这个变化的反映。汉初,就有了按军功封赏功臣的措施。《史记》中对那些开国名将的军功有很具体的记载。据《平准书》载:由于征战等各种实际需要,从文帝起,就颁布了所谓"卖爵令",以"爵"换取钱物和劳动力;景帝时,甚至"削价"出售爵位,所谓"贱其价以召良";武帝时,还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以至于"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后来专门设立"武功爵","以显军功"。这种以耕勤战力者显荣为原则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对于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说,只不过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玫瑰色幻影的一闪,但它的确立,毕竟是生产力发展和农民革命战争的成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统治者对直接参加耕战的广大群众的才能、作用和地位的承认与肯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

我认为:纪传体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编年"到"纪传"这一历史编纂体例的变革,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上述重大社会变革的曲折而深刻的反映。

此外,纪传体的产生还同文体演变的规律、文学发展的趋势等因素有关。但这种"记人之传"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有"人"可记,二是历史家认为有必要记。前者有赖于劳动力的解放,"人"的力量和价值的充分显露;后者取决于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即对"人"的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尽管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谈到过自己为什么要变编年为纪传,但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大体上还是可以弄清楚的。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 《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

孙钦善

《史记》是我国上自黄帝，下讫汉武帝，贯穿数千年的一部通史。司马迁写《史记》，取材极为广博，单就文献史料而言，凡是他生前成书的经传、诸子、史籍大都有所涉猎。他曾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史记》有六经门户、诸子渊薮之称。考察司马迁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对于《史记》这部书的研究、整理及其史料价值的评价，对于如何借助《史记》校读他书，以及对于了解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等，都是有意义的。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虽是仅对写《五帝本纪》时如何采摭史料的说明，但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司马迁在这里告

诉我们:《五帝本纪》主要采用了《尚书》和《五帝德》、《帝系姓》等材料(后两者载于《大戴礼》),如果把《史记》与这些书对照一下,确实如此。但他所据的材料,远不止这些,他还掌握了“经典”之外的“他说”,诸如“百家”所言的黄帝及各地长老传说的黄帝、尧、舜等。他是在全面分析研究了种种材料之后,最终选定了那几篇基本材料作依据,而且对其中“儒者或不传”的《五帝德》、《帝系姓》,又是经过与《春秋》、《国语》印证之后,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才加以采用的。由此可见,采用文献史料,务求做到博征综考,实事求是,是司马迁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实际做起来,与此还是有差距的。下面从《史记》的可靠篇章中选出一些例子,具体谈谈其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和得失。

## 一　力求质实,不取虚妄荒诞之说,但亦有局限

上述《五帝本纪》不取关于黄帝“不雅驯”的说法,已说明求质实、排虚妄这一特点。再如《刺客列传·豫让传》,基本采用《战国策·赵策》的成文[①],但删去了其中荒诞不经的描写,试看下列对比:

| 《史记·刺客列传》 | 《战国策·赵策》 |
|---|---|
| 豫让曰:“……今日之 | 豫让曰:“……今日之 |

① 今传本《战国策》是刘向在旧本(有“国策”“国事”“短长”等名)基础上整理编定的,故成书在司马迁之后。司马迁所见旧本,面貌已不得见,但据刘向《战国策·叙录》“除重复,得三十三篇”云云,可知旧本篇章比今本只多不少,今本内容皆为司马迁所见。故对比时可把今本《战国策》权作旧本看待。下同。

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1]曰：“而可以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

作为怪诞奇特的传说，《战国策》“衣尽出血”云云的描写无可非议，但绝非实事，断然不能写进历史，司马迁把它删掉，是理所当然的。照他的理解，豫让击衣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决不会发生那样荒诞的后果。因此，他在豫让的话中特地加了“以致报仇之意”一句，言明击衣的用意所在。从此例可以看出，一段蒙着奇异色彩的史料，如何在司马迁手中恢复了它的信史面貌。类似的例子不少，又如《太史公自序》说：“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说明司马迁这种去伪存真的做法，并非偶尔所及，而是非常自觉的。在《刺客列传赞》中，他还明确说过：“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贞《索隐》：“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丹乃仰天叹，乌头即白，马亦生角。《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大宛列传赞》也说：

① 《索隐》引《战国策》，有“衣尽出血”云云，今本《战国策》无，当为后人据《史记》回改所致，或许就是据《史记》改《战国策》的鲍彪所为。但删犹未尽，留下“呼天击之”的话，正是下文紧接奇异描写的痕迹。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见,凡是事涉荒诞、言过其实的材料,他一概不取。

当然,也应指出,司马迁在这一方面也有其思想局限。他相信天命,对某些关于天人感应及命相的记载,并不认为"不雅驯",还是照录不疑的。另外,对明显的荒诞材料,他虽能凭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作判断,进行去伪存真的处理;而对一些复杂的材料,诸如表面看来荒诞不经,实则具有合理内核的神话传说,他则无法由表及里地加以消化,往往简单化地加以排斥,或生硬地进行曲解,这也是他采用史料的一个局限。例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熔铸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大雅·生民》具体描述了姜嫄因踩着上帝留下的足迹,有感而孕,生下后稷的传说。商始祖契、周始族后稷,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本是上古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今文经学家虽不能从本质上认识这一问题,但还承认这种现象,认为历史上普遍存在过,如许慎《五经异义》载齐、鲁、韩三家诗及《春秋公羊》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而古文经说如《毛诗》、《左传》等,则认为"圣人皆有父",从父权制观念出发,极力改造、歪曲这类传说,硬是给简狄、姜嫄配上一个丈夫——帝喾(即高辛氏)。司马迁写《殷本纪》、《周本纪》,"采于《书》、《诗》",分别用了这两个传说,但又觉得不经,便袭用古文学家的歪曲解释,说简狄"为帝喾次妃","姜嫄为帝喾元妃",从而把一个曲折地反映历史真实的神话传说改得不伦不类。由此可见,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然处理不好神话传说之类复杂的史料,其结果不是视为糟粕,完全摒弃,就是穿凿附会,弄巧成拙。

## 二、对历史事件,不是简单地袭用旧文成说,而能尊重传闻异辞,多方面研究材料,有根据地取舍、综合,但也有失之主观拼凑的地方

写同一历史事件,往往有不同的材料来源。这些材料不仅可能记载异辞,甚至可能互相抵牾。如果考证不周,抉选不当,就会偏执一端,信从谬误;或者简单拼凑,矛盾百出。司马迁一般能做到不偏信一端,注意博闻多见,慎加取舍。例如《苏秦列传》中的一段情节,与《战国策》的有关记载,既相似又有较大出入:

| 《史记·苏秦列传》 | 《战国策·秦策》 |
| --- | --- |
|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闭门读其书《阴符》后继续游说。说周显王、秦、赵,不成。说燕成,再次说赵成,说韩成,说魏成,说齐成,说楚成)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 (说秦连横不成,归家受到冷落。发愤读兵书《阴符》,继续游说,说赵王成,受相印,山东之国从风而数,使赵大重)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 |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两个材料的主要差别有二：第一，苏秦路过洛阳的时间，《史记》记在合纵成功，做了六国相后，北报赵王之时，而《战国策》则记在首说赵国成功，做了赵相，南行说楚王之时；第二，《史记》把“除道”、“郊迎”记成周显王的举动，而《战国策》记为苏秦父母的举动。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司马迁据《战国策》改写所致；一是司马迁另有所据，采用他说。而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后一种可能的材料来源，加以证实，但是从《苏秦列传》的前后文可以找到这种可能性的内证：司马迁在远隔此事之前，还写了苏秦“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一事，亦不见今本《战国策》，当是另有所据；而后面所写周显王“除道”“郊迎”之举，正是与这件事相呼应的。毋庸讳言，司马迁对史料有润饰、增益甚至附会的地方，这一点下面将谈到。但还没有空所依傍、全系捏造的情况。司马迁写《苏秦列传》，主要依据《战国策》，那么他为什么不袭用上引《秦策》中关于苏秦“荣归乡里”那段记载，而要另采他说呢？只要按之事理，就不难发现他的用意所在；因为像“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个“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人家，总觉不类，而作为王者的举动却是合理的。这正是司马迁抉择的依据。

对于有些传闻异辞，往往难以断然弃取。遇到这种情况，司马迁就抱着谨慎存疑的态度，以一说为主，同时保存异说。如《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老子传的写法就是如此，其中以李耳事迹为主，同时罗列异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有的不同记载，差异甚大，司马迁一味求全，勉强牵合，往往造成抵牾。《鲁周公世家》采用今古文《尚书·金縢》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子。[①] 关于《鲁周公世家》中周公辅佐成王一事的材料来源,前人有种种说法。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据《尚书》武王崩后有此雷风之异。今此言周公卒后更有暴风之变,始开金縢之书,当不然也。盖由史迁不见《古文尚书》,故说乖误。”这里是说司马迁写《鲁周公世家》只根据《今文尚书》,根本未见到《古文尚书》,更谈不上加以采用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班固明确说过:“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此说与实际相符,是可信的。从文字对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鲁周公世家》中关于周公辅佐成王的记载,大量采用了古文《金縢》的成文,但对在记载上有较大差异的今文《金縢》也加以捏合,从而成为《史记》中杂糅今古文的典型篇章,也是司马迁弥缝歧文异说造成矛盾的典型例子。值得具体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1.关于周武王死时周成王的年龄及有无怀疑周公之事

古文《金縢》虽未明言成王当时年龄,但从记载中可知成王已能用事,曾听信流言,怀疑周公。据古文家说,如《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许慎《五经异义》及《通典五十六·嘉礼注》引谯周《五经然否论》所载《古文尚书》说,明言当时成王年已十三;又有些说法明言周公摄政,成王怀疑周公[②]今文家说与此有异。如《尚书大

---

① 因文字过长,对比从略。《鲁世家》及古文《金縢》易见。今文《金縢》已佚,可参见清人陈寿祺所辑《尚书大传定本》。

② 《论衡·感类篇》:“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又郑玄谓: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服丧三年毕,成王年十二,明年将践,周公欲代之摄政,群叔流言,周公避之,居东部,时成王年十三。遭风雷之变,年十五,迎周公反,则居摄之元年。(见《毛诗·豳谱疏》及《礼记·明堂位疏》)《尚书·金縢》伪孔传亦云:“武王死,周公摄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国,以诬周公,以惑成王。”

传》以及《礼记·明堂位》、《大戴礼·保傅》等皆言武王死时成王幼在襁褓，故有周公代成王居住摄政之事，而绝无成王听信流言怀疑周公之事。今古文之说，虽各能自圆而不悖，但以古文说较为属实。陈梦家据金文《宜侯夨簋》"□□武王、成王伐商图"、《小臣单觯》"王后绌克商在成师，周公锡小臣单十朋"等（成王伐武庚，金文称之"后克商"，与武王伐纣有别），并参证《史记·周本纪》"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卫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书序》"成王既绌殷命"等，认为"周公无代王之事"（见《西周年代考》）此说可证成王当时绝非襁褓小儿，已能用事。但云无周公摄政之事，尚值得商榷。《尚书·金縢疏》云："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摄政。摄政者，以成王为主，政令自公出，不复关成王也。"这种摄政的说法，与上述金文及文籍的记载并不矛盾。今文之所以要歪曲史实，把成王的年纪变小，可能是为了回避周公摄政、成王生疑这一矛盾，以维护所谓"圣王"、"圣人"的完美形象（这是今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司马迁写《鲁周公世家》，不单纯采古文《金縢》或今文《金縢》，而是捏合古今文，既云"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又云"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成王看到周公所作《鸱鸮》诗后，"亦未敢训周公"。这里成王既为襁褓小儿，又能用事，岂不荒谬？或云："在襁褓之中"不应坐实理解，只是言其幼而已。此说不妥，据《尚书大传》、《大戴礼·保傅》等篇前后文义，"成王幼在襁褓"皆为写实，并非一般比喻。司马迁既据今文，而为牵合古文说，把"在强葆之中"加以歪曲的解释，这是不妥当的（无独有偶，卢辩《大戴礼注》亦用此说，也是牵合古今文之一例）。

2. 关于启"金縢之书"的时间及风雷之变的前因后果。

古文《金滕》记在周公东征之时,起因是成王听信流言怀疑周公,结果是成王解除怀疑,迎还周公。《尚书大传》记在周公死后,起因是葬地不当,结果是“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毕,示天下不敢臣(以周公为臣)”,并为敬重周公起见,特许鲁国用天子礼——郊祭。两说各自成立,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当然有是非、优劣之别)。司马迁写《鲁周公世家》,袭用古文《金縢》成文,但时序又从今文,记于周公死后,风雷之变的原因也采用今文说,但未交代清楚。至于结果,只局部采用今文说,未言改葬之事,只写了得知周公忠于王室之德,赐鲁行天子礼——郊祭,以示对周公的敬重。拼凑之迹,显而易见。

3. 关于司马迁对古文《金縢》中周公语“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及成王语“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的采用和理解。

关于周公语,历来注家解释有歧:《经典释文》载马融、郑玄注“辟”字曰:“马、郑音避,谓避居东都。”依此,全句当谓“我如果不避流言而居东都,我再没有别的法子告慰先王”。另一种解释见许慎《五经异义》所载:“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并以开金縢之书。”(《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这里的“辟”字是以法制裁之义。伪孔传同,云:“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伪古文《尚书·蔡仲之命》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细审古文《金縢》文义,以后一种说法为是。司马迁对古文《金縢》此语照录无异,但为牵合今文文义,而作了新的解释:“我之所以弗辟〔流言〕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这种解释虽也能自圆其说,但不符古文《金縢》原义,是一

种歪曲。

关于成王语，关键在“新逆”二字的解释。《释文》云：“新逆马(融)本作亲迎。”马融本很值得重视。在古文献中，“亲”“新”二字易混；又声近韵同，多可通假，如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鼎铭》中“亲”作“⿱罒新”，或作“⿱罒新”；《方壶铭》中“亲”作“⿱罒新”，皆比“新”得声。至于“逆”与“迎”，声母同属“疑”，韵母阴阳对转，二字音近义同。故“新逆”即“亲迎”，亲自郊迎的意思。又如《诗经·豳风·东山序》郑笺云：“成王既得金滕之书，亲迎周公。”这是一种隆重的迎接礼仪，目的在于表示对周公的敬重，故下文“我国家礼亦宜之”即指此而言。伪孔传拘泥于“新”字，望文生义，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东未还，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国家礼有德之宜”，颇为牵强。《鲁周公世家》依今文把启金縢之书一事放在周公死后，但又对古文《金縢》成文照录无异，这样迎还周公的情节就无着落。金人王若虚曾指出：“金縢一书，盖周公尝请代武王之死，已乃纳册匮中而秘其事。武王既丧，群叔流言毁公，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鸱鸮》之诗以贻成王，而未敢消。及因天变以启金縢之书，得公代武王之说，于是悔过自新而迎公以还，其文甚明。”认为《鲁周公世家》的编排“戾于经”，并提出质疑：“抑不知所谓‘小子其迎’者认为何义也?”(见《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鲁周公世家》的编排虽然与古文《金縢》相戾，但司马迁并非将“小子其迎”云云置之不顾，而生吞活剥地采用史料；细玩文义，司马迁似认为成王的话意谓：“以前周公为王室操劳，我年幼之人未赶得上知晓，如今上天大动威严以昭示周公的德行，我这小子可逢(即逆、迎之义)上了，我用国家之礼来褒扬周公之德也是应该的。”于是郊祭礼天除去灾异之后，便以天子礼赐鲁(“乃命鲁得郊祭

文王"),以"褒周公之德"(《集解》引《礼记》曰:"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司马迁这样理解,无疑也能自圆其说,但不符合古文《金縢》原义,也是被曲解了的意思。既歪曲了原义,又似能言之成理,几此最易误人,应特别注意辨识。

4. 关于《鲁周公世家》所载周公曾为成王祝祷,后遭谮奔楚,及成王发现祷书,迎还周公一事。

此虽不见他书记载,但又见于本书《蒙恬传》,为蒙恬说秦二世时所引用,可证也是曾经有过的一种传说,并非司马迁杜撰(成书在后的《论衡·感类》,引古文说亦言"周公奔楚",虽主要情节不同,亦可作为一证)。然而仔细分析为武王祷、为成王祷两个传说,后者当为前者的讹传或派生。司马迁在此处兼容并蓄而不加考证抉择,致使真伪淆杂。王若虚对此提出质疑(亦见《史记辨惑》),是有道理的。

## 三 对于历史人物,不迷信偏见成说,能根据全面材料重新评价,选择适当的材料加以表现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指司马迁评论人和事,是非标准不同于儒家的圣人。这正是司马迁的可贵之处。这一思想也影响到《史记》对史料的采用。如《苏秦列传赞》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这里颇有些想替苏秦翻案的意思。《战国策》中有不少关于苏秦的记载,《燕策》有四章,《楚策》、《赵策》各三章,《秦策》、《齐策》、《魏

策》、《韩策》各一章。《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列为纵横家流之首。可见,苏秦本是纵横家的突出代表。但一直受到儒家的鄙薄。司马迁突破儒家的传统观念,从对史料的全面分析中,认识到苏秦“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的主导方面,然后选材加以表现,突出了苏秦作为一个纵横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纠正了世俗偏见。在司马迁笔下,苏秦的形象有的地方比《战国策》的记载高得多,如《战国策·秦策》记苏秦做赵国相后返家后说的话:“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这里的苏秦表露出一片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俗态。而《史记》于苏秦任六国相后是这样写的:“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里的苏秦倒是一个发愤图强的“有志之士”,他的感慨中还隐含着对世态炎凉的不满。此处不同,无法确知是司马迁根据《战国策》改写,还是另有所据;但不管怎样,都说明司马迁写历史人物能立足事实、独立思考而不苟同流俗偏见。① 再如《仲尼弟子列传赞》说:“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也说明了司马迁力求从事实出发选用史料表现人物的特点。

---

① 据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苏秦的真实史料(见《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证苏秦“连六国纵素”,封六国相,纯系后来纵横家流附会出来的传说故事,但载于文籍流传不绝,而有关真实的史料则失传或被歪曲了。司马迁由于没有看到真实史料,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材料中,抓住“合纵六国”这一主要内容来写苏秦,强调其历史作用,以纠正世俗偏见。

## 四　司马迁采用某些史料时，根据需要往往改动细节或虚构情节，虽与具体事实不符，但并不从根本上违背历史真实

例如，《史记》分别在《周本纪》、《楚世家》两处采用《左传·宣公三年》成文，各不相同，试看下列对比：

| 《史记·周本纪》 | 《左传·宣公三年》 | 《史记·楚世家》 |
|---|---|---|
|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 |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无休。桀有昏德，鼎迁于 | 〔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

| | | |
|---|---|---|
| | 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无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 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

《楚世家》详录，《周本纪》概述，各按所需，取舍得当，但《周本纪》在概述时，将楚王亲问九鼎，改为“使人问九鼎”，从表面上看，固如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所指明的：“恐失当时事实”，但楚王问鼎之意却不像郭氏所云，是什么“偶及之而已”；既“观兵”，又“问鼎”，足以暴露他觊觎周王室的野心。司马迁深得此旨，突出加以表现，故在《楚世家》中给楚庄王增写了一句话：“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当亦有所据，不至于杜撰）表现其对九鼎（天子权势的象征）的轻蔑。在《周本纪》中概括为“使人问九鼎”，细节上虽与原始材料有出入，但同样强调了楚王问鼎出于有意，揭示了他的“野心”，并未从根本上歪曲史料、违背史实。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史料所记之事，时间地点不具体，司马迁

常根据它们的内容来虚构情节,不求细节如实。如《孔子世家》对《论语》泛记孔子及其弟子的一些话作了"定时间"、"定场景"的编排,就是如此。这里已突破了史家笔法,用了文学家的笔墨。凡此不宜作信史看待,视作史传文学更为恰当。

## 五　对史料作文字加工

(一)连贯串通

司马迁在组织史料时,对不完整的或割裂的片段史料,往往穿插进叙述语,使其连贯起来,以反映历史的进程,事态的脉络。这种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周本纪》关于周共王和周厉王的事迹,就袭用了《国语·周语》的两段成文。在《国语》中这两段文字本连在一起,但时序上共王与厉王并不相邻,于是《史记》在两段成文中间加上了这样一段叙述:"共王崩,子懿王艱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这样周王的世系就完整了。

(二)删节剪裁

司马迁根据《史记》一书主次、详略的需要,对史料进行删节剪裁。这种例子也很多,如《国语·周语》:"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以下讲了长篇道理)'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周本纪》作:"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把大段谏语删略。

(三)增文修饰

为突出某种含义,使语言更加显豁,司马迁常对史料成文增

一二字作诠释性的修饰。如《战国策·赵策》中豫让的话本作"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刺客列传》作"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把"事人"改作"臣事人","臣"字是名词用作状语,进一步限制了"事奉"的性质,表现了豫让和赵襄子的君臣关系。又如《战国策·燕策》:"太子送之(田光)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刺客列传》采用时将"曰"改作"戒曰",这就在叙述中突出地表现了太子丹说这话的用意和当时的情态。

(四)译释古文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不可避免要容纳一些较古的史料,这是造成它"比于班书,微为古质"(《索隐序》)的原因之一。但司马迁是很注意消除古代史料的语言隔阂的,他常常对一些古奥或晦涩的文句进行译释。有的是把古词语对译成通俗词语,如《五帝本纪》采《尚书·尧典》,将"钦若昊天"译作"敬顺昊天","宅嵎夷"译作"居郁夷","宅朔方"译作"居北方","寅宾出日"译作"敬道日出","寅饯纳日"译作"敬道日入","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译作"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允厘百工"译作"信饬百官","庶绩咸熙"译作"众功皆兴";《鲁周公世家》采古文《尚书·金縢》,将"祗畏"译作"敬畏";《刺客列传》采《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将"光伪足疾"译作"公子光详(读为佯)为足疾",等等。有的近乎意译,如《五帝本纪》采《尧典》,将"畴咨若时登庸"译作"谁可顺此事"。有些文字差别,与材料来源有关,不属司马迁自己所译,应加区别,如《鲁周公世家》:"惟予幼人弗及知",古文《金縢》作"惟予冲人弗及知"。《史记》"幼人"一词,系据今文《金縢》所改,而非司马迁自己所译。

既要译释,就难免要滋衍文字,司马迁为通俗计,并不以繁复为嫌,而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中却常以“字语冗复”来责怪司马迁,这恰恰表明他自己的迂腐。

严格考察起来,司马迁译释史料,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例如:

| 《史记·刺客列传》 | 《战国策·燕策》 |
| --- | --- |
| 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 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 |

《战国策》的“乏”字,是缺废的意思。此义亦见于《庄子·天地》:“无乏吾事”,《释文》:“乏,废也。”“乏”字此义,后不习见,故司马迁采用这段史料时,把“乏”字改为“图”。“图”字是“谋”的意思,与“乏”义相反。这里司马迁不是严格的对译,而是改字。这种改动系依据上文“(鞠武)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史记》采作:“(鞠武)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虽非凭空臆改,但以“图”字易“乏”字,既改动了原话意思,又使语气不顺。《战国策》原是“乏”字,意谓“虽然如此(指已年老不能参谋国事),我不敢因此使国事有所缺废,我的好友荆轲可以任用”,文从字顺。《史记》改作“图”字,意思就变了,是说“虽然如此,我不敢以己身图谋国事,我的好友荆轲可以任用”。这样,“虽然”就与前后文不协调了,因为已是顺承,而不再

是转折。这是司马迁在译释中的疏失之处。

总之,司马迁在采用文献史料方面,有得,亦有失,应当一分为二地加以总结。考察他失误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考证不周。前面许多例子已说明这一问题。再如《史记》中纪年错误甚众,前人多所指正,仅举一例,《刺客列传》"(吴王僚)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隐》指出:"《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吴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并误。据《表》(指《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正当鲁昭公二十六年)。"记事之误也不少,如《史记辨惑》曾指出:"《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鲁周公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毋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毋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毋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盖不惟抵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

二是错会文义。如《左传·僖公四年》:"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本是指楚王使屈完到齐师求盟。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却误作"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史记札记》指出了这一错误,认为不仅改得上下"文气不相应",而且有悖于制度:"楚制,将兵者令尹也,屈完非楚令尹,亦不得将兵扞齐。"又如《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按,孔子年十七,值鲁昭公七年,此年《左传》云:"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即釐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

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即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这里文义甚明,所谓"孟僖子病不能相礼"者,是说孟僖子苦恼自己不精通礼节不能胜任襄助行礼,并不是说他因为害了疾病不能相礼。又,"及其将死"云云,系记叙后来之事,非指当年。据《春秋》,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已三十五岁。司马迁先将"病"字错会为疾病的"病",又将"病"字与"及其将死"联系起来,望文生义,遂造成"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的大谬。

对于《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错误,前人有不加承认者,他们往往维护司马迁,认为是后人篡改《史记》所致。此说难以服人。至于近代今文学家康有为、崔适完全归咎于刘歆,认为刘歆为了推行"伪古文经书",不得不将古文羼入《史记》,以掩其作伪之迹(见康氏《新学伪经考》及崔氏《史记探源》),更属门户之见,不符合客观实际。从文字对勘中就可证明这一点。

关于《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得失,还是班固说得比较恰当、公允。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此说本于其父班彪,参见《后汉书·班彪传》)

以上所述,不一定全面,但从中已可概见《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阅读、研究、运用或整理《史记》时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史记》是部有影响的书,经常被引据。但是对《史记》的史料价值,必须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保存了丰富可靠的史料,有些为他书所不见,有些经过综合考证,大有可资借鉴参考之处;又要看到他对史料理解、采摭和考证,还有不少疏漏谬误的地方,只能作为第二手材料审慎地对待,以免因误致误,以讹传讹。

第二,《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绝少一成不变地加以袭用,而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动。这也是《史记》成其为"一家之言"的因素之一。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史记》与其原始材料之间的文字差异,在校勘方面决不可以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妄断是非,如武断地据他书乱改《史记》,或据《史记》乱改他书。前人在这方面是有教训可资借鉴的:如鲍彪校注《战国策》,一切以《史记》为准,就是本末倒置;相反,也有人不加分析地拿"经典"文献以律《史记》,这是另一种极端,两种倾向都应加以避免。

第三,《史记》又被列入史传文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中加以研究。凡此应注意区分司马迁的"述"和"作"。所谓"述",就是袭用旧文成说;所谓"作",指司马迁自己的创作,如熔铸史料,想象、虚构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从"述"的部分来研究司马迁文学方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是不恰当的。

第四,关于《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探源研究,是校勘、注释、考订《史记》的一个先决环节。前人已在这方面留下不少成果,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崔述的《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等,值得很好地加以利用。但其中一些人观点上主观片面,往往不加分析地以见不见于"经典"作为信否为标准。司马贞的《索隐》做得较好,他不仅着力注明《史记》材料来源的线索,而且态度比较谨慎,对于差异,凡

属明显错误,就明确指正,否则就存异,而推想司马迁可能另有所据。如《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曰:“按:《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采《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类似这种全面的考虑、合理的分析,《索隐》中并不乏见。当然《索隐》也有疏略不足之处。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史记》一书有关文献史料的探源考辨研究,做得更加完善。

(原载《文献》1980年第2期)

# 司马迁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贡献

徐　蜀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文学名著，而且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隋书·经籍志》总序在论述《隋志》产生的渊源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序》曰："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所谓"王、阮志、录"，指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均是古代目录学名著；而"马史"（《史记》）、"班书"（《汉书》）却是纪传体史书。如果说《汉书》中有艺文志，尚可为《隋书·经籍志》提供依据的话，那么《史记》中则无此类目，而《隋志》作者仍然将它列入其中。这说明纪传体史书与古典目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史记》是纪传体的开创之作，又产生于中国第一部正式的目录《七略》之前，所以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首先谈谈《史记》在图书分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图书分类产生于事物与学术思想的分类，这正如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所指出的，"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

有关类别的概念起源甚早。《易象》云:“君子以族类辨物。”《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乾》云:“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著作中,也出现了讲究“知类”、明辨“同类”“不同类”、区分“共名”“别名”、“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论述。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分类已有相当的认识。对学术的分类也已初见端倪。例如《论语·先进》篇,将孔子所授之业分为四科,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孟子将学术分为杨、墨、儒三家,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分百家之学为七派并论其异同得失,将学术分类的思想与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对事物及学术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类,并使之与图书分类结合为一体,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是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历史著作。司马迁著史的动机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对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不仅要搜集、鉴别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将其组织起来,编成一部既能客观反映社会发展的面貌,又便于人们阅读和理解的历史著作。这样,先秦时期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史书编撰形式已不适合需要,于是司马迁首先对史书体裁进行了改造,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传体。纪传体与早期流水账簿式的编年体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对人物、事件及文化学术等分门别类。而且,只有在分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纪传体这一综合性史体的内部体例。司马迁的这一改造,已高度涉及了目录学范畴中的分类问题。对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就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说,“昔《尚书》记言,

《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他还举例说:编年体"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固例迁)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刘知幾上述评论,一方面指出了"区分类聚"在扩大史书记述范围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史记》等纪传体史书对目录学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以下我们再对《史记》的具体分类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司马迁根据叙述对象和史书表现形式的不同,设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实际上,《史记》一书中的类别远不止于此。例如书分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列传中除一般的人物传记外,又有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类传。以上各类,在书中均有明确的类名。其他散见于各篇之中有关"区分类聚"的内容还有不少。如果我们将《史记》与产生于其后的《七略》作一比较,司马迁在分类学上的卓识及贡献就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七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图书进行系统分类的目录,其中大部分类目或有关内容都能够在《史记》中找到踪迹。如《七略》有《六艺略》,《史记》则有《儒林列传》(还有孔子世家与之相辅),对《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进行学术分类,并对其主要传人、学术思想和著作做了介绍;《七略》有《诸子略》,《史记》则在《太史公自序》中以"论六家要指"的形式,对诸子中最重要的六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的分类情况、学术观点及评价做了详细的叙述:《七略》有《兵书略》,《史记》中则有

《律书》(实为“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并作说明:“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七略·数术略》中设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史记》中则有《天官书》、《历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七略·方伎略》中有医经、医方二类,《史记》以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专言医家;《七略·诗赋略》的五个小类中,有四种为赋,而司马迁对赋的特殊价值与作用亦有深刻地认识,他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故设《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以统赋类。

此外,有关《史记》与《七略》在文献资料分类等方面的关系,近代学者梁启超早有认识并曾予以论述,他说:“《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伎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

司马迁对分类学的见解和贡献,从以上所举已略见一斑。但他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封建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分类上。

所谓封建史学体系,从文献角度来说,指中国古代四部分类

法中的史学之书。中国史学虽然产生很早,但在古典目录学中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却是较晚的事情。像《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早期的目录,史书均隶属于经部的春秋类。此后郑默、荀勖作《中经》、《新簿》,史籍才得以独立成类。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史部体系的基本确立,完成于梁阮孝绪的《七录》和唐初魏徵等人所撰之《隋书·经籍志》。《七录》第一次在部类之下划分细目。其《记传录》(即史部)分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十二类,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史籍发展的状况。《隋书·经籍志》史部在此基础上稍加修改,遂成规范,沿至清末,无大变动。

史部目录的确立,孝绪之功不可没。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史部目录的最终形成,亦得益于《史记》以来纪传体史书的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其一,目录学的发展,取决于所记述学科的发展。例如史部目录,正是由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推动,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撰的繁荣,才使目录学家有所依据。其二,纪传体史书的"区分类聚"为史部分类奠定了基础。前一点属史学研究的范围,且不细论。现仅就后一点予以说明。

司马迁肇始于前,班固、范晔等一大批史学家踵武其后。纪传史的内部体例不断改进,至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完备,为史部目录的分门立类提供了参考。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其类目的设置大多能在《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等纪传史中找到它们的渊源。

如职官类源于《史记》的诸侯、功臣、将相名臣等年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的《百官志》;刑法类源于《汉书》的《刑法志》;杂传、杂史类源于《史记》等书的列传和类传;地理类源于《史记》的河渠书和《汉书》的地理志;霸史类源于《东观汉

记》的《载记》;仪注类源于《史记》的《礼书》和《汉书》的《礼乐志》;史评类源于《史记》的"太史公曰"及诸史的"论赞"等等。这一点清代学者早已认识到了,并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中明言:"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纪传体),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抄,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这里将纪传体正史喻为统领史部十五类的大纲,极为恰当,道出了史部典籍及史部目录的发展与纪传体正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不仅限于史部)。

《史记》与中国目录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分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这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史记》相当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对各种学术流派、社会现象和事物性质的辨析考察。这种辨析考察与叙述方法,对目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司马迁对《史记》一书门类的设置,有不少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结果。例如,《史记·儒林列传》是一部经学简史,司马迁在列传的综述中,对经学的产生、发展作了一个扼要回顾。他将经学史分为五个阶段:"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为第一个阶段,即创始阶段;"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为经学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为经学的第三个阶段,即停滞或受挫的阶段;"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

有进者”,此为经学的第四个阶段,即复苏(或中兴)阶段;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此为经学的第五个阶段,即鼎盛阶段。上述分析,言简义赅,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汉武帝以前经学发展的轨迹。接下来,司马迁又以经学的传受人物为线索,对当时五经的传播与发展作了介绍。

司马迁关于经学发展的这些经典论述,被后代包括目录学家在内的学者奉为圭臬,并经常加以引用。如《汉书·艺文志》等目录学著作中有关五经的叙述,就依此为模式,甚至整句整段地搬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求渊源、考流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其各篇宗旨时,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礼书》:“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乐书》:“《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律书》:“《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孔子世家》:“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司马穰苴列传》:“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而最能体现其求渊源,考流变思想的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小序中的一段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

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上述所言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实为司马迁对人类社会分类目、考源流之大纲,全书五十二万余字就是以此为脉络铺叙而成。也只有这样,司马迁才能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方方面面,有条不紊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实际上,《史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其分类目、考源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该说,从《史记》一书中,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的客观规律。

此外,《史记》对中国古典目录学体制及表述方式也有重大影响。

首先,《史记》创立了比较完善的一书目录。过去,一般认为一书目录肇始于《周易·序卦传》,《史记》等序目皆仿此而作。如清人卢文弨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但严格地说,《序卦传》所罗列的既不是《周易》全部内容的目录,也没有排列序号,至多具备了目录的雏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仅详列各篇篇名与序号,而且还使用了二级目录。其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一级目录,即"章";其下之内容,如"夏本纪第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律书第三"、"吴太伯世家第一"、"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等为二级目录,相当于章下之节。这种目录泾渭分明,条分缕析,不仅能通过它了解全书的概况,还可方便检索。

其次,《史记》的篇目提要,为后世的书目解题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解题即书录,或称提要。它的主要作用是介绍图书编纂宗旨、内容概要,以方便读者阅览。《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全书一百三十篇均作了提要。这虽然是篇目提要,但与书目提要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如《周本纪》,司马迁写道:"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短短数语,点明了周先人创业,西伯兴起,武王强盛,到幽、厉中衰,直至赧王国灭的历史过程。又如《孔子世家》的提要:"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这里,司马迁叙述了孔子生活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烘托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为天下制仪法"的不朽功绩,是一篇精彩的内容提要。

当然,完整的书目解题还应包含作者及版本等方面的内容。对此,司马迁在叙述一百三十篇篇目之前,对自己的身世、学术渊源、修撰《史记》的动机和经历作了详细介绍;关于版本流传情况,司马迁则明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可见,书目解题的几个要素,《史记》也已经基本具备了。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一部重要典籍,是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原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 年第 4 期)

# 三代世表

顾颉刚

司马迁作《史纪》,最足表见其截断众流之魄力者,厥惟《三代世表》。

人情好完整,凡作史书,莫不欲使之亹然粲然,事皆可征,年皆可系,而后著者可以踌躇满志,读者可以信据无疑。此情今古所同,而尤烈于古代。盖治学方法于今为密,方法密则其言之也讱,为之也难。惟不讲方法者乃敢于逞志杜撰,以大言欺人也。

今观《世表》之序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明自黄帝以下迄于厉王之年数,史迁时皆有其历历可征之文献在。然其为《世表》,则自黄帝迄于厉王皆有世而无年;其所为《本纪》、《世家》亦然。使他人为之,讵忍斥弃若是;而迁乃无所顾惜者,何也?

按《世表》序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

月，岂虚哉！”此一态度，与其传伯夷、纪黄帝无异。《伯夷列传》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列序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五帝本纪》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夫彼以六艺为考信之标准，此自今日视之，诚有所不足，盖六艺是否出于孔子一手，是一问题；如其非也，则作者既殊，其取舍之见解自不能一致，将何以为标准？如其是也，则孔子之见解能否与客观之史实合若符契？孔子所见之史料又能否得史料之全？此昔非可以一言断者。若标准未移而沈霾已久之史料忽然发现，对勘之下有足以推翻此标准者，复将何以处之？然在史公当日，则建立此一标准确有肃清虚妄之大效。谍记虽尽有年数，而以《尚书》之“略无年月”观之，则其年数为不足信。由、光行谊虽至高，箕山上虽有许由冢，而以孔子之不称道观之，则尧、汤之让天下与许由、卞随、务光之辞天下皆不足信。学者虽多称五帝，而以《尚书》“独载尧以来”观之，则五帝诚有可疑。《五帝德》、《帝系姓》二篇说为孔子所传，是孔子言五帝矣，何以“儒者或不传？”惟以《国语》之文多可与二篇相发明，而《国语》为第二等史料，故不得已而求

其次,取此二篇以作《五帝本纪》,仍删其言之不雅驯者[1]如此之类,其态度之谨严与著作之艰苦为何如!昔人讥"子长好奇",讵笃论哉!

记古代之年历、世次者,检《汉书·艺文志》,有《黄帝五家历》、《颛顼历》、《夏殷周鲁历》、《汉元殷周谍历》、《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诸书。此诸书是否均存在于史迁之时,为其所尽读,固不可知,而迁掌天官,娴天文、历法,主太初改历事,必广搜此类图书而读之则无疑。以其读之多,审之切,故其疑之也亦最勇。当时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家历法,皆自古以通于今。既各有其历,即各有其年。观《汉书·律历志》所记张寿王语,谓自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鲧、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化益[2]代禹为天子;骊山女在殷、周间为天子:此即《殷历》之纪年与隶事也。作此历者欲将年代引而长之,故鲧、舜、禹皆遐寿;又不足,则以化益与骊山女厕入,增益者两代。《殷历》如此,他五家可知,故迁曰"稽其历谱谍……咸不同,乖异"也。以迁之不信而绝之,故后人亦敢致其非薄。杜预《春秋释例》曰:"自古以来,论《春秋》者多违谬,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又曰:"今世所谓《鲁历》不与《春秋》相符,殆好事者为之,非真也。"孔颖达《尚书正义》曰:"古时真历遭战国及秦而亡;汉存六历,虽详于五纪之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其《毛诗正义》亦曰:"今世有《周历》、《鲁历》,盖汉初为之,其交无迟疾、盈缩、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参差,是以汉世通儒未

① 如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

② 即益。

有以历考此[1]辛卯日食者。"抨击既纷起，此类书遂尽亡佚矣。

史迁之前已有编年之通史，汲冢所出之《纪年》十三篇是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谓其"起自夏、殷"，《晋书・束皙传》亦谓其"记夏以来"，而《史记・魏世家・集解》记和峤语则云"起自黄帝"。三人同时，不审何以致异。今此书已亡，就辑录本视之，《路史・后纪》六引云"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似和说颇信。抑束、杜言夏即包黄帝，如迁表三代之亦包五帝耶？《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综括其各代之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世，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则由夏迄西周凡得一千二百二十四年。此书虽不为迁所见，度西汉之世必有类乎此者，如《古来帝王年谱》是。此为史家所定之年，较之历家之出于编排甲子之需要者差为谨慎。而史公则一概绝之。吾故曰惟《三代世表》最足表见其截断众流之魄力者也！史迁之后亦有编年之古史，皇甫谧之《帝王世纪》是，其中皆信手编造，如曰，"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少昊帝……在位百年而崩"；"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岁而崩"；"尧……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舜年八十一即员……崩年百岁"[2]，举茫昧无稽之年一一为之质定，可谓狂妄无艺。而为《史记》之学者乃不能师史迁考信之精神，屡引皇甫之文以入注，史公有知，固所蹙额而不受者矣。

---

① 《十月之交》。

② 并《初学记》九引。

迁云:“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兹试条例之:

《尚书》二十八篇,《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大诰》、《酒诰》、《梓材》、《无逸》、《君奭》、《立政》、《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十七篇皆无年、月、日之记载,可弗论。①

《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此有日而无年、月者也。

《康诰》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此皆有月或有月与日而无年者也。

《洪范》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吕刑》曰:“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此皆有年而无月、日者也。

其年、月、日具备者,惟《洛诰》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虽未明书何王,而就事实言之知其必为成王,自可断定为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事。然以其年、月之间插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一语,则说者遂解为周公居摄之七年矣。又《舜典》曰:“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亦年、月、日之著明者。惟此出后人补撰,不足为据也。

---

① 《无逸》中有商、周名王在位年数,此在论议中,非记事。

夫以《召诰》之文条例绵密，言王至丰则“二月，乙未”，言召公至洛卜宅则“三月，戊申”，庶殷攻位则“庚戌”周公至洛则“乙卯”，郊、社则“丁巳”、“戊午”，用书命庶殷则“甲子”，经历凡三十日，其详于以事系日若此，而终不列其年。使无《洛诰》在，能知其为成王七年或七年以前之事耶![1]《顾命》今篇，王召太保奭受顾命为“四月，甲子”崩为“乙丑”命作册度为“丁卯”命士须材为“癸酉”，而不出其年数，竟使后人无从知成王在位若干年。此非某一史官之脱略，乃古人之时间观念尚甚幼稚，故不能把握严紧，使其记载臻于绝对正确尔。

史迁叹历家之错乱，伤史书之简陋，知文字资料虽多，实无一可以遵循，故毅然舍去，但系以世，此荀子所谓“默而当”者也。然即此世次之中仍有其牴牾在。《表》云：“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桀二十世。”又云：“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又云：“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夫依《帝系》、《尧典》及《史记》所载，周祖弃与商祖契为同父昆弟，与禹亦虞廷同僚，年相若也；何以黄帝至桀二十世，而武王生于桀后四百数十年[2]才得十九世，竟超出纣二十七世？是则史迁自读其表，一加校核，亦当哑然失笑者矣。

《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3]，前于《春秋经》[4]凡一

① 所以未敢确定《洛诰》之年即《召诰》之年者，《召诰》为始营雒事，《洛诰》为营雒已成后事，两事相距有一相当久之时期。观《史记·吕太后本纪》云：“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九月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取作比例，谅亦尔也。

② 此依《汲冢纪年》说；若依《左传》则六百年。

③ 公元前841。

④ 公元前722～481。

百一十九年。此一时期中之王朝与列国之年数不知迁由何处得来?书既未述,莫得而明。然迁既承认为可信,则在其比较精密之标准下,如无别种资料足以否定之者,吾侪自当信之。故凡言中国史之正确年代必托始于"共和",至今一九六二年凡二千八百零四年。今人论古史每分史前期与历史期。余意,分期标准如以有无文字记载为断,则盘庚迁殷,爰有甲骨文,是迁殷后为历史期;如以有无正确年代为断,则共和行政,《年表》肇焉,应以厉王流彘后为历史期。如持后说,则《三代世表》所载并视为史前期可也。

(录于《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 1963 年)

# 读《封禅书》

马其昶

太史公作《礼书》，乃颇采荀卿氏之言，或因后人所附益，迁所谓止数百言，其于礼意礼制故已具，不待取足于荀书，然其于汉制要为简略。秦杂六国礼仪，用尊君抑臣，宜无可纪述。汉兴叔孙通定仪法，希世取宠，大抵皆袭秦故。孝文好道家言，孝景时廷臣惩鼂错受诛，无敢言更制，其有意儒术制作者，独武帝耳，武帝兴祠祀，致不死之术，其侈心广骛，一与始皇同。当是时宫观土水祷祠巡行赏赐之费，至不可殚数，海内骚然受其弊。迁别为《封禅书》，不与《礼书》合，明其祠祀之非，礼非能赓续圣制，而叔孙通之起朝仪，亦陋其事，不见本纪，非洞礼乐之原，乌能及此哉！

其后班固之志《郊祀》，不载汉宗庙诸兴坏之议，反取《封禅书》以充入之。迁固之识，其悬绝乃至此。

吾读《封禅书》，其于鬼神事"具见其表里"，诚使武帝因其言或发寤于心，何至自沉溺必不得之数以匮竭元元取讥于后世。宋真宗之崇天书也，其臣孙奭犹得援迁所记载以著其矫诬。且夫文之不得已而指陈过失无所避者，其为用二焉，曰忠讽，曰鉴后。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或乃不得直致其词，则惩文隐约，要归于记其实而已。斯义不明，世乃谓迁以身陷刑之故，而有所刺讥贬损。悲夫，迁之为谤书也久矣。吾友郑杲论三百篇之有美刺，以谓凡

诗刺其人，盖皆爱其人，而欲救正之，故方书之言，刺其穴者，皆所以已其疾也。诗意欲得此人闻之，非欲他人闻之也。若救快己意，抒愤懑，为深疾之辞，岂刺之谓乎！自说诗者失其义，而温柔敦厚之思遂不可复睹，吾谓他人闻之，亦所以已他人之疾，此鉴后之说也。

人与人相续，于终古是非得失之切于君父，与吾身无以异也。吾爱之、救之、刺之、生之，又有来者焉，其是非得失踵相起也，则吾爱救人之心，又宁有极乎！

乌乎！吾盖未见迁之果为谤书也。

（原载《民彝》第5期，1927年）

# 《史记》立儒林、游侠、货殖三传论

李　澍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呜呼！固岂未闻史公《自序》之言乎？曰:"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是史公于六经之文,开宗明义已郑重及之矣。又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盖史公之设,始自黄帝,而六经在孔子未删定以前,藏于史氏,不专属于儒家,史公欲记载旧闻,网罗百氏,上继六经,以明大道,而成千秋之业,不得不溯厥源流,此通史体裁,固大异于断代成书,可见史公之于六经、黄老,未尝有所偏徇也。故《史记》一书,无论尊孔子为世家,进弟子于列传,崇孔、荀而附庸诸子,其节取传记,采虞夏、商、周之书,犹必考信于六艺。而于太伯、伯夷、季次、原宪、颜渊诸人则称道勿置,何尝后六经、退处士、崇势利而羞贱贫如班氏所言。

且以六经为孔子所定,凡传授六经诵法孔子之人,则列于《儒林》,其于儒林之外,而复列《游侠》、《货殖》各传者,亦正有微意存焉。不知其意而妄肆讥评,未可谓之确论也。盖道先天地,本无乎不包。孔子以前,无六经之名,而道不尽于六经;孔子以后,有六经之述,而道悉该于六经。六经既为孔子删定,皆载道之文,

俾儒家世守其业,于道家最尊。史公立《儒林》,非传经之人不列入,亦即尊之也。然儒家之所以可尊者,以其经明行修辅助国家,能如《艺文志》所云“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自圣王不作,大道不行,井田学校之规替,百氏失其官守,教养无术,相沿至战国之世,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而怀才负异抱策干时,若苏秦、张仪、蔡泽、范雎之类,大抵不儒不侠不商贾伏轼撙衔,挟其智术诈伪,庭说天下之诸侯王以取卿相。斯时有势力如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其人者,又复出其金玉锦绣以号召天下,于是谈天雕龙、鸡鸣狗盗、市伍里侩之流,莫不傲睨王公,争效一时。而学问如孔孟,反栖栖皇皇,辙环天下,至老死不得行其道,岂非所谓盗跖尘埃、圣贤寂寞者耶!故在当时,庄生有“儒以诗礼发冢”之言,韩非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语,谓段干木为晋国大驵,颜涿聚为卫国大盗,而邹峄之徒,亦尝疑及阿衡负俎,百里饭牛,虽出于偏激附会之谈,不足征言,然儒、侠与商贾,流品不分,贤不肖无别,亦可见当时之风会矣。

窃谓儒家者流,本出于古司徒之官,太宰九两,所谓儒以道得名者也。然世盛则道统于一,故儒术显而游侠、货殖不名;世衰则道术分裂,而人才杂出,凡夫操一艺挟一技者,皆得与儒术争鸣,又何论游侠与货殖,此固世运之变也。善为国者,就其变而因势利导之,惩其所过而勉其不及,则夫儒、侠、货殖三者皆有利于国家者也。而始皇狃一夫之见,恶其扰扰,焚《诗》、《书》,坑儒士,逐游客,杀豪杰,以为如此可以长享牧长倮之金、寡妇清之财矣。岂知吴广、陈胜乃起而亡之,汉惩秦弊,一反所为。然高祖挟数用术,未离杂霸,文、景休养生息隐资黄老,时则季将军以侠显,张廷尉以赀进。至武帝而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谓别黑白而定一尊矣。然任侠如汲黯，殖产如卜式，亦皆列于显位，为时名臣，此其登崇俊良兼收并蓄，夫岂自宄其法哉，亦欲广其途以劝天下耳！天下之井田、学校不可复，则民之失其业而诡于正者多矣，苟有稍知正道而能赡生产、重信义、急患难而见称于世者，是即斯民之雄也，安得不诱而进之耶！

天下真儒少而伪儒多，自昔已然。故孔子谓今之命儒也妄，范蔚宗谓利禄之途使然。春秋之时，齐人尝讥鲁儒书，而钽麑轻死生志行卓绝，弦高知大义扞国家之难，岂可以其不名为儒而少之乎！天下之美其名而隳其实者亦众矣。彼汉初儒者申、韩、伏、董十数人之外，如公孙宏之辈，觇人主好恶弋取名誉钩致富贵，是皆以商贾猾贼之为为之于儒者也。游侠、货殖何遽不如乎！世徒见朱家、郭解、陶朱、猗顿之所为，而不见公孙子之所为，毋乃循其名而不考其实耶？

抑思王治无不贯，司徒兴六行兼及任恤，《洪范》数八政，首重食货。百家皆六经支流余裔，固未可崇彼而独此也。故术无论纯驳，业无论高卑，有过人之才而能拔出于俦类之中者，皆足有利于国家，在后世治天下者善用之耳。此史公立儒林、游侠、货殖三传之微意也。后儒不明世变升降之由，与夫史公立传之意，信班氏之谰言，而訾龙门之卓识，亦适见其胸次之陋且狭矣，盍更为之讨论古今，以一扩其胸次也哉！

（原载《学术世界》第12期，1936年）

# 《史记·西南夷列传》概说

方国瑜

司马迁继其父谈作太史令，读秘中书，著《史记》一百三十篇，开纪传体之先例，博洽谨严，为杰出之历史著作。其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载巴、蜀以外西南地区氏族部落之分布与社会生活情况，以及汉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开设郡县之过程，颇为具体，有较高之史料价值。此由于司马迁曾亲至西南，且留心边事，故所说多可据。

本书《自序》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按：《河渠书》说："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条以为瞻岷山及离碓，即为中郎将时使巴、蜀事，是也。故离碓在大渡河流入岷江处，司马迁曾至此，即为经略邛、筰、昆明。又《自序》"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此当为元封元年（前110），可知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在西南也。

司马迁"奉使西征"及"还、报命"，是何任务？据《西南夷列传》及《南越列传》载：元鼎五年（前112）秋，汉发兵分桂阳、豫章、零陵数路征南越，又命驰义侯征、调巴、蜀、犍为兵由牂柯道进，策应攻南越；既至夜郎，为且兰君阻道。六年（前111），南越破灭，驰义侯诛且兰君、平南夷设牂柯郡。然后移兵征西夷，诛邛君，并杀

筰侯，冉駹诸部振恐，设越嶲、沈犁、汶山、武都数郡；《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冬十月，命驰义侯西征西南夷，平之；定西南夷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是时已平服西南诸部。由此记载，故疑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即为参与经略西南夷，随驰义侯（《汉书·武帝纪》作"越驰义侯遗"。盖越人，名遗，不详其姓）而来，则当于元鼎五年（前112）秋出发，至六年（前111）十月以后始归，在西南有一年多时间。《自序》"迁仕为郎中"下，《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此谓司马迁仕为郎中，参与平西南夷，是也。如是，则《自序》之文，应作"奉使出征巴、蜀以南，西略邛、筰、昆明"。司马迁既为负有经略西南夷之任务而至巴、蜀以外之南夷与西夷区域，当必从事调查，了解此地区之情况，及以前汉朝对西南夷之交涉事件，此司马迁对西南夷有较深刻认识之由来。后为太史令作《史记》，其《西南夷列传》一篇，信而有征，非寻常著作可比也。

司马迁至西南之年岁，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说："司马迁仕为郎中，在元朔、元鼎之间，何自为郎？不可考。"又说："奉使西南在元鼎六年置郡之后。"郑鹤声《司马迁年谱》谓："仕为郎中在元朔五年。"如此说法，则司马迁《自序》所述其自身经历，于不能理解矣。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考》谓："'元封元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此从王国维之说，实误。"

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大理府王案山条说："汉元封间，郎中司马迁到此观西洱河。"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二说："司马迁立讲堂于叶榆（大理），为滇云讲学之始。"二说并未有据。司马迁《自序》"南略邛、筰、昆明"，昆明在西洱河，曾"选略"昆明，但未尝至其地，更无"立讲堂"之事。万历《云南通志》又说：司马相如亦曾至西洱河，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命使西征，因朝冉、从駹、

定笮、存邛、略斯榆。斯榆即叶榆(古音叶读涉,与斯音近),盖其曾“远略”,并未至其地。又张训铭《藕航诗草》卷十诗注:“宾川有孙水,司马相如桥尚存。”惟相如桥,孙水在邛都,不在西洱河,《相如传》明白言之。以上所说,皆出于附会,两司马奉使西夷,并未曾至金沙江以南地,但远略江以南之部族,了解其情况,故其记载皆有据。

司马迁生年,有以为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有以为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后说为近是。据《自序》:年十岁读古文,二十出游四方,后仕为郎中,出使西南,盖在元鼎五年。时司马迁为二十四岁,正当盛年,故从征经略西南,因而了解情况,乃“还、报命”,可能已作记录,为后来作《西南夷列传》之依据。诸家考究司马迁生平事迹,不详考出使西南事,而恍惚其词,故略为解说。

司马迁对西南夷所持之态度亦较公正,《自序》说:“唐蒙使略通夜郎(南夷),而邛、笮(西夷)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共列传七十)认为是中国版图之一部分,故叙此区域事迹录为专篇。列传次第,公孙弘之后为南越、东越、西南夷诸传,又次为司马相如传,盖因事相关而排比如此。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以为“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此乃大民族主义之偏见,不能理解司马迁之用心。《史记》以后之纪传体多依此范例,在边区以地区作传,但《汉书叙传》已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以后则称为蛮夷传或外国传,且次第多置于列传之末,视为外纪,此《春秋》内夏外夷之偏见,与《史记》书法异矣。

《史记》流传甚久,辗转抄录刊刻,不免错落,现存最早之本为南宋黄善夫刻本,今有涵芬楼影印及廿四史百衲本影印,亦为较善之本,所收三家旧注(司马贞《索隐》、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正义》早佚,独赖此本得存。明、清两代刻本,虽有以此本

为祖者,于旧注每多删节。

历代学者对《史记》作校勘考证之著作,不胜繁举,且有为某篇某传作专题研讨,惟对《西南夷列传》作专篇研究者仅见,丁谦撰《蓬莱轩地理丛书》,校注边裔传记,而于西南诸篇甚为疏略。兹就《西南夷列传》之校勘,未见前人所发者,略说数事:有以版本校雠可订正者,如清武英殿本"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金陵局本"地"字作"池",百衲本亦然,是也。有以录自《史记》之文可订正者,如"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汉书》作"滇王离西夷,举国降"。是本书衍"难"、"南"二字。离即丽,谓附丽西夷,举国降也。有据后人解释可订正原文者,如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颜师古注:"池旁之地也。"则数"千"里当作数"十"里,方与地理实际相符。有以史事可订正者,如夜郎"听(唐)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事在元光三年(前132),而设犍为郡在建元六年(前135)则当作"乃以属犍为郡"。应劭说:"犍为郡,故夜郎国。"此不察所见本之误字而因之致误也。有后来作书录自《史记》事迹可校订《史记》文字者,如说"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维长。"二书所载同为一事,则《史记》之"毋君长",应作"毋大君长",夺"大"字,与夜郎、滇、邛都不同也。又有可以《史记》之文校正他书之误者,如《史记》"庄跻将兵循江上",而《后汉书》"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此"沅水"应为"延水"之误,即将兵循江上,从延水伐夜郎。《汉书·地理志》鳖县"沅水"为"延水"之误,前人已有说也。又有误字犹待考究者,如"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此同师,非"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曰嶲、昆明"之同师,疑为"句町"之误,此可以部族相联系为之解说,惟不详致误之由。

《史记》所载西南事,除《西南夷列传》外,散见于其他纪传者,如驰义侯事见《南越列传》,张骞事见《大宛列传》,司马相如事见本传,滇、蜀交通事见《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汉书》有关各篇亦载之)虽数语亦可资参证。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汉武帝时经略西南之事迹,多费周折,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参酌《史》、《汉》有关各节略录年代如下:

建元六年(前135),因唐蒙使南越归,上书请通夜郎,即命蒙出使至南夷夜郎,约为置吏以属犍为郡。

元光元年(前134),发巴、蜀兵治南夷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以通南夷。

元光五年(前130),再发巴、蜀兵治南夷道,作者数万人。

元光六年(前129),命司马相如出使至西夷邛、笮,设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又发巴、蜀兵治西夷道。

元朔三年(前126),因公孙弘数言经略西南夷不便,且有害,于是罢经略西夷,帷设南夷都尉,领二县。

元狩元年(前122)因张骞使西域至大夏归,上书请通蜀至身毒国道,至是遣使四出求道。汉使至滇,而因昆明阻道,四岁,道不通。

无鼎五年(前112),发兵攻南越,命驰义侯调南夷兵助征,司马迁为中郎将从,军至西南。

元鼎六年(前111),既至南越,驰义侯兵经略南夷,置牂柯郡;又征西夷,置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及武都郡。

元封二年(前109),汉兵临滇,滇王出降,置益州郡,合已设数郡隶益州部刺史。

元封六年(前105),汉兵收服昆明夷(及哀牢夷),设数县,属

益州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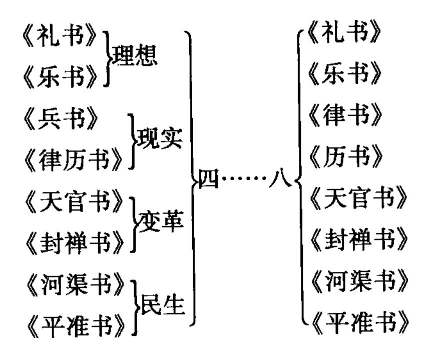
按:汉武帝时经略西南,历三十年完成,设置郡县,历史家夸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之业绩,称一时盛事。实则,此乃汉武帝顺应时势所趋,对祖国政权统一起一定作用,而在西南设置郡县,则历史所必然。盖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历史发展,为巴、蜀附庸,是全国整体之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即通道置吏,虽此地区社会尚处于落后阶段,要求向内,与巴、蜀息息相通。汉武帝顺应时势,广置郡县,其功绩不可没。而当时朝臣如御史大夫公孙弘之流及蜀郡缙绅先生,以其偏见,逆时代朝流,认为经略西南有害无益,妄图阻止历史发展。当时争论激烈,故经略西南之三十年中,几次反复,而时势要求,非彼等所能阻挡,终于设置郡县,为西南重要史事。司马迁作《西南夷列传》之赞语,歌颂经略西南"卒为七郡",是祖国统一之盛事,亦为历史发展所必然也。自汉初以后,西南历史发展过程存在两派主张,祖国统一进步与分裂倒退之争,各时期有之,此历史经验,为研究西南史事所当重视者。

(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4 期)

# 《史记》八书序列新论

徐日辉

司马迁撰《史记》八书，形式上出自《尚书》八政，思想上源于《易》八卦哲学，取八卦之数寓意奇正包罗万象[①]，就此本文新论八书序列拟为四大部分：一理想部分；二现实部分；三变革部分；四民生部分。表列如下：




表中显见，八书序列聚则四部分而八门，上符四时八位天下纲纪，下合微言大义古今之变。作为经国大事，司马迁采八政重构八书，以《易》为原则，围绕黄老思想分辨是非论政得失，始终用《春秋》笔法褒贬社会昭示后人。

---

① 徐日辉著：《〈史记〉八书题名新探》载《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 一 追求和向往理想的《礼书》与《乐书》

礼,司马迁毕生追求和向往的目标之一,曾寄于无限美好的希望。他认为:礼"通王道","经纪人伦"[1],所以能规范行为指导行动,礼就像天地日月一样为施法之前的圣人之道。《仲尼燕居》说:"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可知礼不仅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共同规范,更是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因此司马迁赞扬孔子作《春秋》正名分,恢复礼义秩序是"礼义之大宗也"[2],对那些滥法暴民者深恶痛绝,得出凡超越礼制的行为必将自取灭亡的结论,并举秦发论:秦王朝建立后,仍旧以急法治国,不给人民丝毫的宽松休息,终于"本末并失"[3]。司马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对秦王的暴政恨之入骨,不遗余力批判鞭挞。他引贾谊的《过秦论》说:"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4]不仅如此,司马迁对法家学说及其人物也颇有微词,他认为韩非以法用事发展到了极端,太惨急苛刻无情无义一味以法为标准,所以不能自免于难。对于商鞅,他评论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5]指责商鞅个人品质残

---

①② 《史记·自序》。

③ 贾谊《新书·过秦论下》。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商君列传》。

酷无情,虽有功于秦,但过分暴苛,其蒙受叛逆之罪,不是没有道理的。

司马迁尚黄老,赞"无为而治",对于"法"尤其是历代峻法十分憎根,他对法家的总体评价是:无爱亲、尊长、人情关系,一律施法,结果是"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①。因此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礼义,所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才是根本大法。并引用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③之格言为其标准,特别崇拜《周礼》时代,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礼仪"④,试图恢复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故此在八书中首举《礼书》序列第一,而且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宣扬礼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蕴藏着深厚的道德,可以主宰万物驱使群臣民众。考察夏、商、周三代对礼的增减,才知道礼是顺应人情感的产物,仪是符合人品性的规矩,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和方法,具有协调人们行动的功能。所以司马迁多次指出:治人之道千条万绪各不相同,只有礼仪制度才无所不能,是治人治国整齐万民的有效手段,所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⑤,即是此意。故"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⑥。为此,他把超越礼仪的行为上升到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

---

① 《史记·自序》。

②③ 《史记·酷吏列传》。

④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⑤ 《礼记·祭统》。

⑥ 《仲尼燕居》。

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①],是说在王道衰落的形势下社会失去礼仪的约束,结果是好人备受欺侮,而不法的坏分子却反受荣宠。在司马迁的眼里,如此颠倒黑白的现状均来自于礼崩乐坏,因此又作《乐书》第二,意在“治定功成,礼乐乃兴”[②]。只有治理得天下太平礼乐才能兴起。就乐而言,司马迁认为是为了节制人们过度地逸乐而作,君子谦让为礼,以节制为乐,“乐其如此也”[③]。《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乐之说贯乎人情。”天地阴阳孕育万物,是大自然的和谐,犹如社会的仁义礼乐一样,是有序社会的产物。一旦秩序破坏,则礼乐必败,所以他举孔子作歌五篇以讥刺鲁国执政的故事,借以表达自己“乐正”的看法。强调好的音乐可以使人心正去邪,恰如孔子在齐听到有人演奏失传已久的《韶》乐,兴奋得他老人家“三月不知肉味”。[④] 雅颂之音如同号角一样让壮士振奋向前,反之如郑卫靡靡之音则使人心淫意移,是亡国之曲,故“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⑤],秦二世极意声色以淫为乐,其身首异处就是最好的例证。

司马迁一向认为礼通王道变古今,乐善民心“助流政教”[⑥]移风易俗。他借礼说道,借乐明理,与圣人国兴民乐相结合,称“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⑦]。他追思三代现身说法,本身就对现实社会不满,叙孔子“修起礼乐”[⑧],就是想恢复礼仪时代,

---

① 《史记·礼书》。

②③⑤⑥ 《史记·乐书》。

④⑧ 《史记·儒林列传》。

⑦ 《史记·太史公自序》。

弦外之意讥刺汉武帝步秦皇之后尘开汉代淫奢浮华之风。仰慕圣贤孔子序《书传》,编诗三百首,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使周天子衰微以来被破坏的礼乐得到恢复和流传,并"以备王道"①,是为不世之功德。司马迁以《礼书》喻道,以《乐书》明道,是他追古讽今的理想之举。

## 二 讥刺汉武帝穷兵黩武和改历太初的《律书》与《历书》

兵者,古来有之。"非兵不强,非德不昌"②是司马迁一贯的主张。他对战争有三种看法:一、作为伐暴安良的工具,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国;二、战争有正逆之分,颂扬正义之战,讨伐不道的逆理之战;三、研究战略战术,慎用将帅人才。司马迁战争观的形成,与他所处的黩武时代息息相关。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奢侈无度,把祖宗留下的一点家底挥霍得一干二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③,强盛的西汉王朝由此开始走向衰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司马迁只能用《春秋》笔法实录现实状况,巧借汉文帝偃武修文无为而治的国策,讥讽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政策,隐隐约约抒发着战争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他在《律书序》中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兴邦建国、除暴安良,因此"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④反复强调战争的功能与人的德行。三代以武而兴,桀、纣、二世以武而亡,一德一暴、一仁一苛就

① 《史记·孔子世家》。

②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汉书·昭帝纪》。

是最好的说明。对于汉武帝从正义的反击匈奴走向极端，司马迁没有正面批评指责，而且通过《律书》及其他篇章以《春秋》笔法互见其中。他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警句告诫当局，如果一味地自恃武力必将祸国殃民后患无穷。事实证明武帝黩武的做法已达到“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1]的地步，并引发出一系列政治危机，直到汉宣帝时尚未完全恢复。司马迁撰《律书》在支持正义战争的前提下，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发出“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2]的疾呼，喻示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3]的既定事实。

汉承秦弊，物质条件极为困苦，当时“米至石万钱”[4]，经文、景之治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故尔他大树特树无为而治的仁德举措，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5]，“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德至盛也”[6]。所以司马迁认定汉兴以来自于德政，是老子“道佐人主，不以兵强”[7]思想的体现，反之如秦，虽有天下，然“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8]。司马迁虽然没有将武帝直比秦皇，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汉武帝穷兵极欲的做法非常不满，而且我们从《匈奴列传》等传记中也得到同样借古讽今

---

① 《汉书·夏侯胜传》。
②⑧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平准书》
⑤ 《史记·孝景本纪》。
⑥ 《史记·孝文本纪》。
⑦ 《老子》三十章。

的“隐讳”信息。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①,在《自序》中司马迁对《历书》作了上述的总结,阐发他认知阴阳万物的观点,指出:《历》推日月五星运行,使人知道节气的到来,所以推定四时顺序丝毫不能疏忽。实指武帝时改历太初的活动。太初历为邓平等人所编,以迎合武帝改元的需要,是国家的盛典,但该历推步不密,运行二十七年后就有太史令张寿王请求废弃,却被昭帝下狱。因此司马迁在《历书》中不载邓平其人及太初历法的推步,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借三代历法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②,举九黎、三苗作乱,幽、厉无德及周室衰微时历法的失误,端出汉武帝改元太初的当年就发生了“西伐大宛,蝗大起”③的不利事实。寓意现实中的武帝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强行实施推步不密的历法,置生产、生活而不顾。作为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司马迁有意识地把历法与“道德”相提并论,慎重指出改元制历事关国家命运和人民生产、生活,如同兴戎用兵一样容不得丝毫“翲忽”。

## 三 借天象人事探求变革的《天官书》与《封禅书》

《天官书》从科学史上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天文史,但从思想分析,则是司马迁《易》学、黄老的有机反映。

《天官书》是司马迁追求变革的直接篇章,与其他诸书一样,始终围绕着天道德政这个中心而述发议论。本书全篇 8107 字,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历书序》。
③ 《史记·封禅书》。

论赞 1211 字，占正文 6896 字的 18%，是《史记》全书唯一的一篇长赞。在《天官书》里，司马迁提出“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的推究古代天变的观点，认为只有总结五百年的经验，考察一千年的变化，才能达到“天人之际续备”。校读《史记》，得知五百年大变实指周公卒后至孔子的年代，而孔子之后至司马迁本人恰好又是五百年，这前后一千年的变化，真可谓礼崩乐坏、王道丧尽，春秋二百多年天象多奇，日蚀三十六次，彗星三见，至公元前 644 年齐桓公时天又下了一场特大的流星（陨石）雨，于是乎人世间周室衰落、诸侯并起，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兵戎四起，诸侯相争。因此司马迁认为“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①]，指出天象预兆人事，日蚀发生君王要修德仁政；月蚀发生要平反冤狱；列星变异则要和结邻邦。总之要符合民众的意愿，根据天象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才能相安无事，否则大祸将至不堪设想。

司马迁在提出修德、省刑的同时以“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②]的忠言，劝告汉武帝修德政、除苛刑、少战争，并为其设计了不同档次的修正方案：一等“太上修德”，是说最好的国君是修养仁德；二等“修政”，谓修明政治；三等“修救”，及时补救过失；四等“修禳”，即祈求鬼神保佑；五等“正下无之”，不闻不问任其发展。[③] 汉武帝属于哪一等级，司马迁没有明确归类，但从《封禅书》等处的记载分析，得知汉武帝其人其政在司马迁眼里笔下大抵与秦皇比肩，充其量只能列入三、四等级的品位。

《天官书》借天象变化究人事德政，而《封禅书》则讲祭天封

---

①②③ 《史记·天官书》。

地祀鬼神须有仁德的前提,才能调整天人关系顺乎"道德"含义。二书一个谈天一个说地,探索天地人事变革,宣扬《易》理、黄老之说,讥刺汉武帝不施德政而尤敬鬼神的做法,是自欺欺人之举,其结果与政无益、与民有害,只能加速国家的衰亡。"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是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告诉后人他作该书论秦皇、汉武的目的所在。

司马迁力主封禅,认为"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①,为此他亲自参与和加入了汉武帝封禅大典,但是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活动的本身,而侧重于由此而产生的"变革"因素。所以他在《封禅书》里以圣德、修德、无德事例紧密地与政治联系起来,推崇舜帝治平天下巡狩五岳、告祭泰山的壮举,赞扬大禹、周成王等三代封禅的盛事,是圣德受命的行为。列举殷王武丁仁德不济,被野鸡站在鼎上鸣叫吓得惊慌失措,但他能听从大臣祖己"修德"的劝告,才得以相安太平"位以永宁"②。最后对秦始皇暴政失德的封禅结局作了如下的结论:"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③是讹非讹,秦二世历泰山封祀,勒石"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④,足以说明是无德自取,而不是讹传无据的向壁虚构。至于武帝,司马迁实录其人好封禅、祀鬼神、亲小人、近方士、求神仙等一系列劳民行径,暗寓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应予批判。作为讨伐汉武帝的一组檄文,司马迁在《天官书》与《封禅书》中以《春秋》笔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则是檄文中的点睛之笔。

---

①②③④ 《史记·封禅书》。

## 四　关系民生国运的《河渠书》与《平准书》

治理河患兴修水利，是古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司马迁衡量历代统治者作为的标准之一。中国的水患以黄河为最，据统计有史以来，黄河决口泛滥为1575次之多，大体三年一小患五年一大患。在《河渠书》中司马迁高度颂扬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典范和楷模。他以大禹治水为叙事论政的坐标，树立人定胜天的信念，考察自禹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治水害、兴水利的态度、做法及其成败得失，评价汉武帝在堵塞瓠子口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事情经过非常简单，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东郡（今河南地）瓠子决口。当时汉武帝曾派汲黯、郑当时等人去堵塞，但由于决口太大，致使屡堵屡坏，正在这关键时刻丞相田蚡，这位专横跋扈的外戚上言给汉武帝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①，把黄河决口的责任推给上天，而且以为人力强行堵塞不一定顺应天意，最好听之任之。更有一伙专门望气测数的方士亦随声巧言附会。汉武帝当即听从其言，"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②。田蚡上言的根本原因是黄河决口于南岸，他自己的封邑地"鄃"在黄河的北岸，不仅水害无浸而且是"邑多收"③，所以他上言罢塞。之后二十多年间黄河肆行于下游地区，其间水注巨野泽，夺淮、泗水道横流千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司马迁实录这段事情的详细经过，寓意十分明确，即"唯在择任将相

①②③　《史记·河渠书》。

哉！唯在择任将相哉！"[①]

司马迁二十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游历，行迹大半个中国，看到水利事业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利益，用极大的热情记载春秋以来各国争修水利的事迹。对武帝修漕渠、龙首渠、辅渠、轵渠和引淮水、汶水，通巨定湖等发展农业的水利工程，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司马迁还参加了由汉武帝亲自指挥的堵塞瓠子口的战斗，体验人与大自然斗争的壮举，追思大禹"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②]平治天下的丰功伟绩，叹息汉武帝延误堵河时间所带来的损失，从内心发出"甚哉，水之为利害也！"[③]的呼叫，以告诫后人。

《平准书》是八书的最后一篇，就序列而论是司马迁从"理想"落实到"民生"的必然结局。本书专记汉兴到武帝太初这一百年间一盛一衰的经济状况，阐发无为而治、重义轻利的黄老思想。司马迁向往老子所讲的那种"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④]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尽力赞美无为而治的文、景盛世："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⑤]达到春秋以来最富庶的太平盛世。对此司马迁看作是"网疏而民富"的结果，因为民富则社会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夏本纪》。
③ 《史记·河渠书》。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⑤ 《史记·平准书》。

安定国家升平，"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①。但是，自汉武帝即位以来对外连年用兵，个人又奢华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破坏了汉兴以来七十余年间的良性循环，汉朝强大的经济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对外用兵的需要，汉武帝采取了：卖官鬻爵、入粟除罪、改革货币、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并重任酷吏张汤等采用急法严刑的高压手段聚敛财钱，自始"百姓不安其生"②，甚至发展到因交不起口赋而"生子辄杀"（《汉书·贡禹传》）的悲惨局面。

在《平准书》里，司马迁集中谴责了汉武帝卖官鬻爵、入粟除罪及改革货币的三大政策。这些政策，无其他任何好处，只能助长贪赃枉法行为的合理化、公开化，使危机毫无节制地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使不平等的法律走向极端，结果是富人更富，穷人受害，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其中的一例。至于国家机关更是"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③。与此同时，汉武帝反复放铸禁铸铜钱，并以白鹿皮方尺值四十万钱推向社会及铸白金钱等，造成一连串的混乱，人民苦不堪言，纷纷冒死犯禁。一时之间盗铸者蜂起全国，其人数之多杀都杀不完，形成法不治众的局面。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只能开赦，其"赦自出者百余万人"④，足见当时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程度，而酷吏们自张汤起如"义纵、尹齐、王温舒等

①③④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酷吏列传》。

用惨急刻深为九卿"①,皆以嗜杀取贵,全国上下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高压政策下政治危机日益突出,起义四起,大有三户亡秦之势,官府捕禁不止"无可奈何",只好"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②。所以司马迁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根本,即便是暴秦之酷法,也只能是负薪救火、扬汤止沸,根本无济无事。汉初去秦苛法,采取重视德教与民休息的方针,其法治之宽松,如"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③。韦昭解释说:"在道德,不在严酷"④。这段议论集中了司马迁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贯看法。对此,他在《平准书》中提出"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的重要问题,并以秦始皇"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事实,以古喻今,批评汉武帝兴兵烦民及采用高压手段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是造成文、景以来经济下降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在《自序》中引《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殊者,千变万化的方式;同者,天下之本的道德。因此,他撰八书从理想的《礼书》开始,以"经纪人伦"到关系民生"以观事变"⑤的《平准书》结束,其意即此。

(原载《学术月刊》1996 年第 10 期)

① 《史记·平准书》。

②③ 《史记·酷吏列传》。

④ 《史记·酷吏列传》集解引文。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司马谈作史

顾颉刚

《史记》一书,历经后人窜乱、续附,前人辨之详矣。顾其未受窜乱与续附之部分将尽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乎?此一问题,前人虽已略见其端倪而尚未作仔细讨论者也。

案《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诸执兵者不得上,独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提之,秦王乃得拔剑击轲。篇末赞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夫荆轲入秦在秦王政二十年,即公元前227年,而史迁之生有二说[①]《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张守节《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岁”,是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卒三岁”则元封三年,如其说则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说相距凡十年。近张鹏一作《太史公年谱》,王国维作《太史公行年考》俱从《正义》说;郭沫若同志作《〈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据居延汉简记人名、年籍方式,证《博物志》[②]予谓以生于公元前135年说为可信,若是则史迁之

① 此二说皆出于《太史公自序》之三家注。

② 此条本先汉记载,非魏、晋人语,惟“司马”下传写脱一“迁”字耳。

生上距荆轲之死已九十二年。公孙、董生既与夏无且游,则必秦末汉初人也,待史迁之长而告之,不将历百数十岁乎!是必不可能者也。又《郦生陆贾列传》记平原君朱建事,赞曰:“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案朱建尝为黥布相,其子当生秦、楚之际或汉初,与史迁世不相及亦与公孙、董生无异。又《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孙他广袭封舞阳侯,孝景中元六年(前144)。夺侯为庶人,赞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他广年世固较后,而史迁之生,九年前彼已夺侯,度迁长成时亦未必在。是以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论之曰:“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按,此非或然,乃必然也。谈于赞中自称曰“余”,《荆轲传》曰“为余道之如是”,《朱建传》曰“平原君子与余善”,《樊哙传》曰“余与他广通”,著传文之来源,作一篇之总结,则此三传成于谈手无疑。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盖与尔后班固之袭父彪作者同。彪踵迁史,仅作《后传》数十篇耳;固乃合迁与彪两书而整齐之,遂成《汉书》百篇。观其《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应劭《注》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晋灼《注》曰:“班彪之姑也。”是彪自述其所见闻为两篇之《赞》,固遂沿而不改;知《赞》语之出于彪,亦知《纪》文之出于彪矣。

不第此也。《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唐事,曰:“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按武帝初立,唐年九十余,推其生年,当在秦王政十年左右,犹是战国末人。其子遂生年虽不可知,而补父官职,当是长子,父生三十而生之,至是亦六十余矣,

迁时尚未生也；及迁生而长，遂已耄耋矣，岂真有此忘年之交耶？是亦其父谈之事也。① 冯唐无瑰节奇行，传中所载惟对文帝用将一问，以其敢于犯颜，故与释之同传；实则了无特立一传之必要。此必缘谈与遂友谊之深，故过而存之。《赵世家》之赞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与冯唐之告文帝曰"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者同，知遂闻诸唐，谈闻诸遂，《赵世家》与《冯唐传》实出一源。唐为赵人，当其少年赵犹未亡，故记忆其本国之故事独多，观其对文帝称说廉颇、李牧可见也。《六国年表·序》曰："秦既得意，烧……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是史迁所得战国史料，《战国策》而外惟《秦记》一书耳。然《史记》战国诸世家中，赵事独详，有造父御穆王西巡狩之事焉，有屠岸贾灭赵氏与程婴立孤之事焉，有赵简子梦至帝所与帝赐翟犬之事焉，有赵襄子拜受霍泰山三神之令之事焉，有武灵王梦见处女鼓琴歌而得孟姚之事焉，是皆《国语》与《战国策》之所未记而极富于故事性之民间传说也。昔尝甚以为疑，以为秦烧赵史书既尽，史迁之生远在秦亡之后，彼乃何自得之？何自闻之？今作此考，推求来源，乃知为司马谈所得于冯氏者也。更臆测之，《史记》中赵之将相若平原君、虞卿、廉颇、蔺相如之传，及其流寓若乐毅、信陵君，封国若张耳，其中振奇恢诡之故事必有绝大部分为冯氏父子所宣扬，故能笔墨生动若此。然则冯唐虽无瑰节奇行，而其助成迁史，厥功甚伟，读《史记》者可不饮水而思源乎！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前127)。徙豪杰于茂陵。《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被徙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

① 此传云"武帝立"者，不但非谈文，并非迁文，出后人改笔。

声争与交欢。旋以杀杨季主事受捕,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解大逆无道,遂族之。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至四年。而《游侠列传》赞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计其年,解之入长安,迁不及十岁,疑其不及见解,见解者其父谈也。

谈生何年不可知。兹姑假定长于迁三十五,则当生于文帝九年(前171),距高祖即帝位三十五年,宜其与公孙季功、董生及朱建之子相接;而建元间为太史令,其时冯遂为郎,距樊他广之夺侯亦才五六年耳。按《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又曰:“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当谈为太史令时已有在官搜集资料之便也。又记其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正义》曰:“‘先人’,司马谈也。”是谈固斐然有继孔子而述作之意;首举《易传》者,以其受《易》于杨何也。又记谈临终执迁手而泣曰:“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是谈已自定其论著之计划也。又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是谈所欲论载者为明主、圣君,为忠臣、死义之士,即《史记》中之本纪、世家、列传百余篇之中心思想与其主要题材也。又记迁俯首流涕之辞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记其答壶遂之语曰:“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谈已有其所次之旧闻,迁乃弗敢堕而悉论之也。云“明圣、盛德”,即谈所云“明主、圣君”也;云“功臣世家贤大夫之

业”，即谈所云“忠臣、死义之士”也。“论”，字本作“仑”，从“亼”(集)从“册”，集合竹简而比次之，犹今言“编辑”；先人已次旧闻，兹更编理之耳。谛审上数语，谈既立其著作之宗旨与计划，又已积累若干稿本甚明。所惜者，前所举之《刺客列传》诸篇，其出于谈固有确据，而他篇之不著所闻之人者，则胥不辨其孰谈孰迁矣。

从《史记》各篇中判别谈与迁者，昔亦有之。方苞《书〈史记〉十表后》云：“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其《自序》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而本纪、八书、世家、列传无称其父者，故揭其义于斯。则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此以十表序中称“太史公”与“余”者分别两人，似无确证；然谓谈、迁父子相承述作，则得其情实。方氏别有《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一文，以《史记》中之“太史公”专属之谈，凡其必属之迁者则悉定为褚先生增窜；又以言“著”者归谈，言“作”者归迁，益近穿凿。试问《文选》载迁《报任少卿书》，云“太史公牛[①]马走司马迁”者，宁亦褚少孙所窜改耶？

《自序》记《史记》之断限有两说：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一篇之中，所言全书起讫之异若此。按自元狩元年(前122)获白麟，下逮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历岁凡十有八，然则书中序事究将终于元狩耶？抑太初耶？于是考辨今、古文问题者摭前一语以标真本《史记》之终点，悉斥获麟后事为羼附，崔适先生《史记探源》其

① “先”之误文。

选也。予既论此题,求其歧说所以发生之故,颇疑谈为太史令时,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获麟,故讫麟止者谈之书也;及元封而后,迁继史职,则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改历,故讫太初者迁之书也。《春秋》家谓"西狩获麟",孔子感焉而作《春秋》,亦绝笔于斯事。今武帝幸雍,其"西狩"也同,其"获麟"也又同,此最足刺戟久任史官且对于史事有深刻注意之司马谈,使之属草于此时,亦断其述作之下限于此时。然而父与子之思想不必尽同,故迁为《封禅书》云:"郊雍,获一角兽……盖麟云。"对所谓麟者已作疑词,又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讽)符应合于天也。"云"风"则明其为宣传之辞,云"符应"则明其托于天以自重之辞。盖彼时正值卫青击匈奴得胜,淮南、衡山两王谋反,武帝为稳定政权与振奋人心计,故作《白麟之歌》以夸张其事,明己得受天命,而司马谈为太史令,郊祀亦其职掌之一,故建甘泉太一与汾阴后土两祠,《封禅书》均记其为谈与祠官宽舒所议定,其后以不得预封禅则遂发愤而卒,其宗教思想之浓厚可知,盖习之既久,与之俱化耳。获麟,《春秋》之所终也,《帝尧》,《尚书》之所始也。谈既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若史迁者,少负不羁之才,获麟事正当其少年,曾不屑措意,二十而遨游全国,闻见既广,益不信神鬼,故其所作《封禅书》,凡武帝之受欺与其欺人者,咸出以讽刺揶揄之笔,欲其认获麟为一划时代之大事,非理性之所许也。而改历者,人民希求之一大事也。汉初虽有六家之历,然推术未密,至于"朔、晦月见,弦、望满亏"[①],极不便于民生日用;又袭秦正朔,以十月为正,先冬后春,不应于四时之序;故改历实为全国

---

① 《汉书·律历志》。

人民之迫切要求。《史记·历书》亡矣,《汉书·律历志》记其事云:"至武帝元封七年(前104),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则在此改历运动中,司马迁乃其中心人物之一,博士既共议以为当行,乃由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而较《颛顼历》显然精密之《太初历》出焉。此一事为汉代政治中之最有科学性者,适与宗教性之获麟站在两极端;史迁目见其主张成为现实,安能自抑其兴奋,故述事至太初而讫,实为其最适当之断限。至于其书起于黄帝,则以武帝之世,方士言黄帝者过多,迁于《封禅书》中虽已随说随扫,而终不易脱出时代氛围,且改历之事,公孙卿与迁同主持之,卿之札书言"黄帝得宝鼎宛朐……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于是黄帝迎日推策",是即太初改历之托古改制也。在此种空气中,迁之作史,其上限必不容仅至陶唐而止,乃据《五帝德》、《帝系姓》而作《五帝本纪》,始于黄帝,即于《黄帝纪》中以公孙卿之语为史文,曰:"获宝鼎,迎日推策。"是则《史记》一书中起讫之延长固皆有其政治背景在,非迁故意改父之道矣。使余此一假定而得其实,则《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故犹存此牴牾之迹耳。

夫迁之作史始于改历,七年而遭李陵之祸,越四年《报任安书》时已云"凡百三十篇",以如此究天人、通古今之空前著作,在当时物质条件限制之下,又为私史,纂于公余,十年即成,无乃太速?知其父作之于先,迁特增损其成稿,并补入元封以后事,即可晓其易于毕工之故。其后班固袭彪史以成《汉书》,又半录《史记》,而潜精积思至二十余年,犹未能完,赖其妹昭补撰而成书。迁之因谈,谅亦类是,特其才气博大,不屑多修饰,又晚遇屯遭,务求急就,故其竣工仅半固之年尔。

《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如书家之作“一笔书”然。《封禅》、《平准》、《酷吏》诸篇,在当日为“谤书”,而在今日则为最可宝贵之真实历史记载。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世,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色绘声,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故自有此问题之提出,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录于《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 1963 年)

#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us)之比较

邓嗣禹

司马迁为东洋历史之祖,希罗多德为西洋历史之祖。两人的著作,已并垂不朽;两人的大名,常相提并论。而专门比较他们二人的文章,似乎很少见。因将此两大史学鼻祖之生平及著作,作点综合比较的研究。

当然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已有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在希罗多德以前,西洋也有史学家,如 Hecataeus of Miletus 及 Hellanicus of Lesbos,司马与希罗是承先启后的大著作家。他们将写著历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创造历史学,故享受始祖的盛誉。他们虽非同时代的人(司马迁生于纪元前二世纪,希罗生于纪元前五世纪[①]),而在东西史学界,占同样重要的地位,故可以比较讨论。

① Herodotus 的生卒年代,有的作 484 ~428B. C. 有的作 484 ~425 B. C. 有的说,Herodotus was born"not long before 480 B. C. ""His death occurred a ltitle after 430.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I, 3(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The edition of Herodotus used in this essay is George Rawlinson's translation, and Rawlinson's translation edited by Manuel Komroff,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 1941。

# 一 时代背景与传记

大概是公元前135年或前145年[①]司马迁生在陕西西安附近的仕宦之家。他的祖先们世典周史。古代史官的传统是必须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眼光,知巫祝卜筮之事,兼有公正不阿、铁面无私的职业道德。史官是政治家、预言家和新闻记者合而为一的人物。[②]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个博学的人;学天文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为汉武帝太史公,职掌天时星历,典司记录,保管文献。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公元前110年卒。司马迁承继父亲的学问及职位,所以他是一个有家学渊源的人。

他生在西汉隆盛时代。当时的版图广大,东至朝鲜,南至安

---

①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问题,至现在尚为热烈辩论之点。其最普通的生年有二,一为《史记索隐》说,生于建元六年(135B. C.)。二为《史记正义》说,生于中元五年(145 B. C.)。1911年王国维作《太史公击年考略》,即根据正义说。1929年郑鹤声又依据王国维之说,作《司马迁年谱》,皆以迁生于公元前145年。1934年桑原骘藏驳王国维说,以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东洋文明史论丛》,261~276)。以后施之勉主公元前135年说(《东方杂志》40.16(33.8)30~34)。李长之也主张公元前135年说(《国文月刊》47(1946)8b-9;1954曲颖生《太史公行年考辨误补证》,断定司马迁生年,实为135B.C.(《大陆杂志》8.2(January,1954)78),1955年郭沫若、刘际铨,力证太史公生年为135B.C.(《历史研究》5 1955.12)1956年1月郑鹤声,重版《司马迁年谱》,极力反驳公元前135年说,而维持公元前145年生之说。两说虽各有理由,实难作具体决定。比较起来,似以公元前135年为较近情理。其卒年在公元前86年或公元前87年亦无法考定。

② 参李长之:《司马迁之史学及其他》见《东方杂志》42-10(1946)39-40李氏论《史记》各文,陆续在《东方杂志》、《团文月刊》等杂志发表。后又印成单行本。因单行本一时找不到,仍用他在杂志上发表之文章。

南,西南至黔滇,西至新疆乃至中亚。殊风异俗,传至中土,可引起少年人的好奇心,激发少年人的游历狂。当他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从名学者孔安国习《尚书》,到二十岁的时候,他随着祖国新兴事业的发展,开始游历全国的壮举。首先"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以印证他从前所得的书本上的知识。"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乃"仕为郎中",扈从天子,巡幸四方,又开始了第二度的远行。他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所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部。时间前后经过十余年,大概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①

司马迁游历的目的,似乎主要是过历史瘾,访求名胜古迹,考察人证物证,以及风俗人情。他可以说是田野考察工作的开山大师(a pioneer investigator of field work),举例来说吧。

"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78.22)②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95.35)

司马迁将书本上的知识,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地理上的考察,与社会上的经验,冶于一炉,融会贯通,打成一块。诚如傅孟真所说,"《史记》是读古书治古学的门径书"③——是一部集大成的书。

---

①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当时交通不发达,在中国大部各省旅行一次,必费长期的时间。以后仕为郎中,又西至空桐,奉使巴、蜀、滇中。这些事实郑鹤声《司马迁年谱》(页 32~54 1956 重印本)言之甚详,可供参考。

② 本文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

③ 《6 史记研究》见《傅孟真先生集》,中编,戊 1-17。

现在让我们看希腊名史学家,希罗多德。他被称为说故事之王(the Prince of Story - telling),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与人类学家之祖(the Father of Anthropology)。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希腊有雅典与斯巴达之争,又欲将波斯人的势力,驱除消殁。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期,希腊王政衰颓,专制盛行,崇贵族,屈平民,希罗多德即生于贵族家庭。他的出生地是小亚细亚的 Halicarnassus,那时小亚细亚在波斯人统治之下,故按国籍法,他生为波斯人,可是侨居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常常想慕他们的祖国——欧洲的希腊。大概年三十或三十五岁以后,他因故被迫离开他的生长地,住在雅典自由城。后又参加建设雅典在意大利的殖民地,Thurü 工作;他也许在公元前 430 年左右死在这个地方。

希罗多德的父母,都是有身份的高级贵族。他的兄弟 Theodore,堂兄弟(一说 uncle) Panyasis 都是有名的咏史诗人(epic poet)。他生在一个充满古诗,古神话,故事以及酷好自由的家庭,自小就练习说故事,说给他的父母听、兄弟听;说得不好,他们替他改良;说好了,又另找故事。在这样的家庭,从最小的时候起,希罗多德就受了很好的文艺训练、环境熏陶。稍长,他爱穷搜博览,当时所有的韵文诗歌,几乎阅读殆尽,此后成为古代最优美的散文家之一。[①] 所以司马迁与希罗多德,都是有家学渊源的人,这是他们生活相同点之一。

跟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也爱游历。他好奇,希望多知道人间一切的事情,因而在壮年的时候,到处去游历,他的足迹,不但印遍了希腊,也去过好些外国,如波斯、Assyria、巴比伦跟 Scythia。

---

① SIR JOHN SANDYS, *History of Scholarship*, Vol. I, p. 371 and T. R. GLOVER, *Herodotus*, p. 20。

他在埃及住过长期的时候,尤其是在尼罗河畔,勾留得很久,观察得入微。① 黑海沿岸以及巴勒斯坦一带,他都观光过。以时间论,他也差不多游历了十七年(从20至37岁)。他们两个人的游迹,都踏遍两个人所知道的世界。可惜司马迁不知有希腊的存在,希罗多德也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②

希罗多德游历的动机,似乎与司马迁的不完全一样。司马主要是过历史瘾,希罗起初仿佛是以商人的资格出游。因此之故,他很小心地留意各种商品,如肉桂、桂皮(Ⅱ,110-111)、麻布(Ⅱ,105)、麻衣、角类(Ⅳ,74;Ⅶ,126)以及俄国南部的咸鱼(Ⅳ,53)。他爱描写运输方法,如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中的船,尤其是他们的载重量(Ⅰ,194;Ⅱ,196)。他注意到河中可以通航的阶段,如在幼发拉底河(Ⅰ,194,5)与尼罗河(Ⅱ,96,3)。他说到奇异的交易方法,如七译之商业队,及西非洲以手指作交易之法(Ⅳ,196)。他注意金银矿,及其开矿的方法与收入(Ⅲ,57;Ⅵ,46,47;Ⅶ,112,144;Ⅸ,175)。因此种种,可知希罗多德是以商人资格,或同商人旅行。③

希罗多德的求知欲与好奇心,非常旺盛。他爱谈奇禽怪兽、

---

① J. ENOCH POWELL, *History of Herodotus*, (Cambridge, 1939) p. 29。

② Herodotus只知道大夏(Bactria)和康居(Sogodiana)都向波斯纳贡,只知道波斯于侵入希腊时,两地皆曾出兵助聂克斯王(Xerxes);至于这两地的高山大岭,希氏似乎一无所知。他虽然知道阿尔泰山(Altai),但关于在波斯境内或边界上的帕米尔与兴都库什或喜马拉雅等山的知识,则绝无所有。希氏对于里海以东的平原,只说他是一片广漠无垠的荒地。参吴祥麟《希腊与西域及张骞之通使》见《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号,第5~13页。

③ W. W. How,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1912) 17, and JOHN L.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3) 5。

奇风异俗、婚姻礼节、食人肉之习、以敌人的头颅骨为饮器(Ⅳ,65)、以生人殉葬(Ⅳ,71)、歃血为盟(Ⅳ,70)。各种人的皮肤色泽、家庭用具、生活状况,他皆加以仔细的观察与描写。[①](司马迁在匈奴、大宛等外国传,也谈到这样的事情;但在其他部分,限于体例,不能随便插述)[②]希罗多德说:Souromatai 的女子一定要杀掉一个与她本族为仇的敌人,才可以结婚(Ⅳ,17)。他发现 Mount Pangain 人实行一夫多妻制(Ⅴ,16);Lycians 人依母命名而不依父命名(Ⅰ,173);巴比伦有著名出卖女子的市场(Ⅰ,196);Thracians 有花钱买妻子的(Ⅴ,6);Pelasgians 或斯巴达人似乎实行过用武力强抢别人的女子为妻奴的办法(Ⅵ,64,138)。他又说:埃及人食莲藕及蓖麻子油(Ⅱ,92,94);巴比伦人常食将干鱼捣碎的鱼粉(Ⅰ,200),也许把苎麻叶子作烟抽;Scythians 人爱食面粉、葱、蒜、扁豆(Ⅳ,17);Libyans 人竟吃蝗虫(Ⅳ,172)、猴子(Ⅳ,194)跟虱子(Ⅳ,168);有的 Libyans 人,把头发前部剃光,后面留长,或左边剃光,右边留长(Ⅳ,175,180;Ⅴ,191)。其他衣服、墨面、纹身等制,希罗也加以描述。他确是一个不惮烦劳,仔细的,聪明的观察者。所以他被称为现代人类学之祖,或称之为古代的马可孛罗。[③] 他的头衔,确是不少。

可是希罗多德并没有忽略历史。在他的游历当中,也许在 Ionia 地方,在公元前 448 年以前,他草成了一部《波斯史》。很显然

---

① J. L. Myres, "Herodotus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d Classics*, edited by R. R. Marett(Oxford 1908)121 ~ 168。

② 详参《〈史记〉中的神话传说和初民遗俗材料索引》见《培正中学图书馆刊》,一卷二期。

③ L. R. Farnell, *Outline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p. 9; and Adolf Erman, *Egyptian Religion*, p. 175。

的他一面游历观察,一面著书,大概到了他快要衰老的时候,大改变计划,把他的《波斯史》改成现在的样子。他晚年以公开说书为职业,他去世后两三年,书中的内容,即在雅典戏院中排演,剧场中的听众,好像对《三国志演义》一样,多半熟悉其中的情节。①

结果,希罗多德的书,是一部历史、考古、人类学、民俗学各方面兼收并蓄,娓娓动听的名著。他讲埃及、波斯等国的古史,直到现在,还有参考的价值。因为材料丰富,方面广博,若以俗手写成,一定变为零零碎碎的杂货摊;但以希罗多德的高洁文艺处置之,成为布置整齐的博物馆的陈列品。他虽然不是单刀直入,平铺直叙的写法,而是随处离题旁涉的记述,却能引人入胜,读之听之,都觉得津津有味,从文笔论,从保存古代传说资料而论,希罗多德的历史,已证实了它能长久存在的价值。

## 二 作史的动机与目的

从他们的著作看,司马迁父子都是聪明种子,有学问,有见地,有本领的人。否则司马谈不能以寥寥九百余字,畅论六家要旨,原始要终,长短得失,一览无遗。司马迁也不能以五十余万言,写出一部包括两千余年,体大思精的通史。他们父子有本领,也有脾气,不甘受委屈。作《史记》的动机就是因为不甘受委屈,要泄愤,才努力完成的。司马谈若为庸碌之人,尸位素餐,汉武帝不叫他去参加封禅泰山的盛典,一时不愉快,不久也就处之泰然了。他可不然,他气愤,伤感,以至于病;病到临亡的时候,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

① J. ENOCH POWELL,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86,203 - 204。

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130,17-18)”。这样才可以借一部大著作使后人知道他的名字,不致为汉武帝所轻视而湮殁无闻;他未能参与封禅泰山的典礼,就可以补偿了。于是司马迁俯首流涕曰:他一定要谨遵遗命,完成这部史书。

可惜司马迁比他父亲更不幸,在公元前99年,为相识人(并非莫逆之交)李陵降匈奴事,说了几句公道话,武帝使他受腐刑。壮年人无辜受此酷刑,他的冤屈忿怒,远在他父亲之上。既乏生人乐趣,又不愿愚昧自杀①,只好咬紧牙根,聚精凝神,完成一部好书。因此他作《史记》的动机,一是恪遵父命,一是发泄受腐刑的耻辱。他自己也说古来许多名著,都是受了大刺激而产生的。②

他立志要写一部垂之万世的大作,要承继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他不愿率尔操觚写文章,而是将所有的资料收集起来,精细安排,条理井然。好学深思,将古今事物,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大抱负,他算是达到了。

希罗多德的生活传记,后人知道的很有限。③ 据说他堂兄弟,Pynyasis 为反对波斯统治者,牺牲了生命。希罗多德,也被放逐于

---

① 李长之把司马迁受腐刑事,写得有声有色。他也说,“司马迁只活到四十六岁,或自杀死,亦未可知”。参《司马迁与李陵案》见《东方》杂志41.7(1945年4月)49~58。

②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孙子膑脚,而论兵法……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30 28~29)。

③ “We cannot escertain whether he [Herodotus] was single, or married, or the name of any of his closer friends or relative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h, 14, p. 417。

其生长地 Halicarnassus 之外。[①] 因此他选择了一个研究题目，东西之争——东方波斯人与西方希腊人之争，在放逐生活当中，他到处游历流荡。最初，如前所述，有点商业性的好奇，或随商人同游。由好奇而搜罗了各种奇风异俗。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主题，东、西人之争，缩小为波斯侵略希腊之争。未在入本题以前，他要推究自由与专制之战的原因。他描写各种宗教、风俗、城市、建筑、生活习惯。凡是希腊人及野外人(Barbarian)的大事，他都要记载下来，使人不至于遗忘，兼使人知道彼此斗争的原因。他想以客观的态度，记述往事，将有趣味的故事，随时解释，随时穿插以增进听众的兴趣，增加他以说书为职业的收入。[②] 他起初将史书朗诵给观众听时，不很受欢迎。受了这点挫折，他到雅典去居住，在公元前 445 年的时候，才接受了雅典公民的奖状同奖金，其数量约当于现在 1500 元[③]，不无可观。

由此看来，希罗多德作史的原动机，是由于被放逐，与司马迁受腐刑，同为"发愤"而作。希罗多德作史的目的有三，一是述往事知来者，使人不至于遗忘。二是找出东、西两大民族相争之理由与背景。三是将史事说得娓娓动听，以便叫座卖钱。他似乎没有司马迁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远大雄图。

---

① JOHN L.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2。

② JOSELP WELLS, *Studies in Herodotus* (Oxford 1923) 201-203. ; and T. R. GLOVER, *Herodotus*, 194 ~ 195。

③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edited by Manuel Romroff. (Tutor Publishing Co. ;1941) vii-viii。

## 三 史书之组织与范围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部分。十二本纪,纪历代帝王的国家大事,近乎政治史纲;十表近乎年表;八书近乎社会、经济等及文化史制度史;三十世家是封建时代的国别史,及其有功于国的诸侯,有影响于社会的特殊人物史;七十列传,近乎普通人物的传记和社会思想史。司马迁从社会各阶级中,挑选一百六七十个人物,将他们分类如循吏、刺客等,以代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以及"四夷"与中国的关系。这种纪、传、表、志体,又简称为"纪传体",司马迁创始以后,成为中国二十六种正史的典型。天下古今万物的史料,不管大小,皆可包罗,错综为体,详略互见,《史记》全书有整个的组织,每篇有各别的结构。每篇前、后,多有论、赞,仿佛新闻社评之提纲挈领略示己见。篇中则多以客观的态度,叙述史事。故中山久四郎说:司马迁为纪传体正史之创始者,论、赞之创始者,年表、书、志之创始者。又自序中之六家要旨,开学术史评论之先河①,司马迁的《史记》,确是体大思精,他有综合、归纳、与创造的天才,前人评他的体例为因袭,不足为凭。②

---

① 中山久四郎,"司马迁学之二大特征",《史潮》7.2(1937.1月)22~28。

② 郑樵、邵晋涵、章学诚等,谓司马迁的纪、传、表、志体为因袭,非创始,是不确实的。邵氏《江南文钞》,《史记提要》曰:"迁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变通。《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按《吕氏春秋》体例,与《史记》绝不相同。邵氏之言,牵强特甚。参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见《燕京学报》37号(1949)95-120;及罗根泽,《从〈史纪〉本书考史记本源》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2(1930)7-20。

希罗多德书之组织与范围,比《史记》要简单狭小。他的书,好像一种博士论文,主题是公元前490年左右的波斯(侵略希腊的)战争,而他在入本题以前,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占全书约三分之二。在导言部分,主旨是清流溯源。全书分九章(books),六章为导言。

第一章回溯远古以东欧亚之争,及波斯国之发达史;第二章述波斯侵略埃及,因而考察埃及的历史;第三章述 Cambyses 之征服埃及及其远征 Ethiopea 与 Ammonia 之失败;第四章述波斯王 Darius 之征 Scythians,因而谈及北欧各民族之风俗,宗教与社会情形;第五章述波希相争。第六章分析彼此相争之原因。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 Marathon 战败后,其国王 Darius 预备再战等情;第八章希腊联军在 Salamis 大挫敌军;末一章写公元前480年在 Thermopylae 之殊死战,双方损失惨重。可是波斯人侵略希腊的雄图,终未如愿以逞,失败而归。

这是全书主要的骨干,希罗多德却是从容不迫,轻描淡写,用非正式的,说故事的体裁,写希腊的悲剧随时离题,插入其他许多相关联的故事,人情哲理,将重要史事的政治、地理、社会、文化的背景和盘托出,令人读之或听之,有时如阅《庄子》寓言、《天方夜谈》或《三国志演义》;有时如在雄辩会中、战争场中,轻轻松松,感觉愉快,不必聚精凝神,记人物、地名,年月时日,而主要的故事,自然印入脑中。所以希罗多德享盛名二千余年,其书至今仍为人所诵读。

在西洋学者当中,有认为这位"历史之祖"头脑很简单的;①也有人以为古代西洋人写史,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根据官方对事情的看法,能使读者痛快满意,不必证明某种学说与理论,就算成功之

① ARNOLD J. TOYNBEE, *Greek Historical Thought*, xixff。

作[①]，希氏以听众的兴趣，为选择与布置材料的标准，原书并不分章分段，现在的九章，是公元1608年印行时，编者替他勉强而分的。[②]其书虽目为通史，而忽略三个重要的国家：Phoenia，Carthage及Etruria；虽详记战争，而对于Trojan之战，言之极略。希罗多德的原来计划也许就不想包罗万有。可是以希氏游历之广、见闻之富、印证之详、叙述之美，虽至今日，他的书仍是研究公元前五世纪前希腊、波斯、埃及等国之必须参考书，他的贡献也算不小了。

## 四 史学方法与史观

司马迁的历史学方法，是先勤读十年，然后遨游全国，以印证所学。后又穷搜博览，再事游历，将两代（他父亲及他本人）所经营的历史著作，徐徐布置整理，细细思量考察。故能综合前代史料而加以创造。

论其所据资料，有用现成的书篇——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整齐百家杂事；有用父亲的旧档，“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无忘吾所欲论著”；[③]有用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实际的见闻，与好学深思的推断。“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他将辛勤搜集的资料，常常注明出处。在他全书中，他说明采用之书籍者，凡三十余处，如《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

---

① JAMES T. SHOTWELL,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69 – 70 and *passim*。

② JOHN L. MYRES, *Herodotus*, 64。

③ 《史记》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有，《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详参李长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可能的推测》见《东方杂志》40.32(1944)39 ~57。

《春秋》、《国语》"[①]等,大概当时所有的书,多已采用。其不见书本而注明闻之人证者亦十余处,如"吾闻之周生曰"(7.15《项羽本纪》),"吾闻冯王孙曰"(43.96.《赵世家》)等。其得之目睹及物证者又十余处,如"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47.93.《孔子世家》),"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84.36.《屈原传》),"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124.17.《游侠列传》)。又如观张良之图"状貌如妇人好女"(55.31.《留侯世家》)。又有采之于书或闻之于人而辨其不然,示以论断者,如《五帝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66)。仲尼"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67.53.《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之一,是异说纷纭,莫衷一是时,根据一种比较足资凭信的材料。但他不愿人云亦云,而在可能的范围内表示独到的见解。如《周本纪》:"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4.96)又如《刺客列传》:"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86.39-40)如《郦生陆贾列传》:世之传郦生书,多曰……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97.28)。"世言苏秦多异……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念独蒙恶声焉"(69.62《苏秦列传》),"人皆以[李]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李斯列传》87.45-46),可见司马迁有疑古和考证学的方法。

若证据不足时,如老子问题、吕尚事周问题,他采阙疑的态

① 罗根泽《从〈史记〉本书考〈史记〉本源》见《国立北平图书馆创刊》4.2(1930)7~20。

度,所谓“疑者传疑,盖其慎也”。[①] 间或对于历史原因不能充分解释时,他归之于“天”或“天命”,他的“天命”似为上帝的主宰,或许相当于数学上的无穷大∞,令读者自己去决断吧。[②]

对于史事的驾驭,时代愈近司马迁的记载愈详。错综复杂的史事,若用文字描述,或使人不能卒读,史迁乃列表以明之,使人一览无遗。普通习见之事,常见之书,或略而不谈。[③] 他的史学方法,似乎相当近代化。

司马迁的历史观,可说是社会史观。他大量地记录普通人民的生活,把社会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他对于古今许多特立独行之士,为人格正义而奋斗之士,如伯夷、田横、汲黯非常推崇。对于趋炎附势的卫将军骠骑,则甚痛恨。他表彰游侠,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64.3),又曰“有足多者”,有足禄者,“曷可少哉”,他尊敬布衣,歌颂郭解、荆轲、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陈涉、项羽等不同类型

① “疑者阙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三代世表》)。“或言”,“或曰”(《老子韩非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

②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卷二三《礼书》叙:“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卷五五《留侯世家赞》:“岂可谓非天乎?”卷六一《伯夷列传》:“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此亦天授也”。卷一二七《日者列传》:“自古……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

③ 如“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司马穰苴列传》64.9),《管晏列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62.10)。“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孙子吴起列传》65.19)。“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孟子荀卿列传》74.14)。

的英雄。如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廉颇蔺相如列传》81.25)"。又云"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鲁仲连邹阳列传》83.33)。他敢于指斥帝王,贬抑权贵,扬发黑幕,暴露罪恶。对于皇帝之愚昧残暴,往往极尽讽嘲之能事。他写《循吏列传》五人汉无一人。酷吏传十人,而九人在汉武帝时,所谓相形见绌,相得益彰。他有广大的兴味,广大的同情心。帝王诸侯的事,他感觉兴趣,寡妇流氓(即游侠)的事,他也感觉兴趣。他没有中国传统的正统历史观念,专为帝王歌功诵德,而忽视其他。他敢为项羽与吕太后作本纪,为孔子与陈涉作世家。他的历史,是以全社会为对象。传记人物的选择也是看他们对社会有无贡献与影响为标准,凡是有贡献有影响于社会的,不管智愚贫贱,成败得失,皆传其人。故以文治名于天下者如管、晏、商鞅,以政运名于天下者如苏秦、张仪,以豪迈名于天下者如孟尝、平原,以经营影响社会者如卓氏、宛氏,以行动影响社会者如刺客、游侠、滑稽,各传皆是为全社会着想。

司马迁的历史观与人生观,有不可分离的连带关系。若不懂他的人生观,也难完全了解他的历史观。他是一位非常容易伤感的人。例如"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24.2.《乐书》)。"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毅列传》80.17)。"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84-36)。"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十二诸侯年表》14.3)。"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儒林列传》121.2)。因为他是这样的易于伤感,所以他有广大

的同情心。他念书时,也仿佛时时刻刻不忘史官的职责与见地。

司马迁是一个讲自由主义,个性很强的人。他的见解,不能为任何人所左右,任何威武所屈服。他能父子异趣。父亲崇拜道家,而他却崇拜儒家,继孔子作《春秋》,以仁义为准则。[①] 他能独排众议,替他相识的人李陵说公道话,而不顾盛怒之下的武帝的意旨。

因为个性强而对于史官的责任心重,所以他能坚守《公羊左传》之笔诛传统,时时求真理,不党同伐异,与史事以严正的批评。举例来说吧,他最崇拜项羽,比之于舜,夸之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可是他评论项羽曰,"自矜功伐……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7.75-76)可见他的态度很公平。司马迁评袁盎、晁错、魏其、武安、灌夫、公孙弘,皆很坦白。汉刘向、扬雄等人,皆以为司马迁的长处,在"不虚美","不隐恶"。

司马迁以严正公平的态度,发扬他的社会史观,凡渺视民瘼者,宜受诛讨,"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勿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夏本纪》2.49)。"吾适北边……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固轻百姓力矣……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蒙恬列传》88.11)。

司马迁反对严刑竣法,在《酷吏列传》,他引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酷吏列传》122.2-3)在《吕太后本纪》,他说,"刑罚罕用,罪人是希"(9.38)。

他提倡仁义。"仁义"二字,与法治相反,与孟子所谓"王道",儒家所谓"德治"相近。他说一个国家,"形势虽强,要之以

---

① 参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第125页。

仁义为本"(《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17.7),一个小国能长保者,也要"笃于仁义,奉上法"(《高祖功臣侯者年表》18.3)。孝惠及孝景追修功臣,"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间侯者年表》19.3)。

司马迁常从史事中求教训,得经验,把历史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教科书,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秦始皇本纪》6.91)。"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18.5)。在《酷吏列传》,他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122.45),从历史教训中,观察一些日常生活的哲学。如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平津侯主父列传》112.12),"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高祖本纪》8.88)。这是他所看出的历史周期性。"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50.8)。他喜引谚语,以表达日常的人生哲学。例如"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42.37)。又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扁鹊仓公列传》105)。

希罗多德的史学方法,在资料的搜罗与鉴别上,与司马迁的相仿佛。他书中材料的来源,可分为三种,一为有文字的记载:如古诗散文、说书(logographoi)、占卜词(oracles)演说词与档案。他也用了一部分波斯政府的档案(Ⅲ,89-97,Ⅴ,52-53),而以说书式的历史(logi)用得相当多。二为考古学的材料:他用了Amasis与Ladice的石像(Ⅱ,182;Ⅰ,181.5)、Scythia国的灵墓(Ⅳ,71.1)、巴比伦皇后Nitocris的灵墓(Ⅰ,187)、战争纪念碑(Ⅶ,225,228)、古寺庙(Ⅱ,101.2,110)、埃及金字塔等。三为口述的资料,经他多年游历与考察得来的。而且这样的材料,在他书中占一大部分。例如他在第二章中对于埃及仔细的描写,

据他说,他的材料,多半是根据他自己的考察和访问(Ⅱ,29)。

说书家开希腊历史之先河,他们想建立希腊的历史,注重地理学与民俗学的资料,以增加听众的兴趣,促成历史的发展。这些资料,希罗多德加以充分的利用。他自己所搜集的口碑资料,尤足以表示他的史学方法。他跟四十多个希腊城市的市民谈过话,征求材料。[①] 有时他也说明材料的来源"In all this l only repeat what is said by the Libyans"(Ⅳ,261)。或述异闻"Besides this there is another story told,which I do not att all believe"(Ⅶ,423),如传说有误,则改正之(Ⅳ,192);或就所知者改良之。"yet so much I do know"(Ⅶ,152),或存疑(Ⅱ,123;Ⅳ,195;Ⅴ,9),或阙疑,如对于欧洲地理,因他所知甚微,则略而不言,[②]或疑信参半。他相信北欧产多量的金子,但不相信有一只眼的民族,叫作 Arimaspi,他们将金子从别处偷来的(Ⅲ,117),对于 Scythian 的人种与国家的起源,希罗多德先引 Scythians 人自己的传说,而他自始就说,"I do not believe the tale,"次引希腊人关于 Scythians 人来源的说法,再次又引比较近乎情理的普通说法。他说:

There is also another different story, now to be related, in

---

① JOHN L. MYERS, *Herodotus* p. 9.

② It is the normal rule of Herodotus, when he is writing on points of geography, not to make definite statements about regions of which his knowledge is worse than secondhand. With regard to Western Europe he makes his attitude perfectly clear in iii, 115 when he refuses to believe definitely in Eridanus (Rhodanus) saying that he has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the authoritative statement of an eye Witness that there is an ocean on the farther side of Europe. Lionel Pearson, "Herodotus on the Source of the Danube", *Classical Philosophy*, 29 (Oct. 1934), 328 ~ 337.

which I am more inclined to put forth than in another. It is that the wondering Scythians once dwelt in Asia, and there warred with the Massagetae, but with ill success; they therefore quitted their homes, crossed the Araxes [Volga], and entered the land of Cimmeria. (IV, 5.8.11)

从此可知希罗多德的史学方法,与司马迁是同样的谨慎,但希罗多德似乎多用常识与逻辑学的判断,显得更科学化。司马迁喜用抽象的描写,以求行文的流利与简洁;希罗多德却爱用具体详细的描写,以求叙事逼真,使人相信他所说的故事,使听者觉得他是观察入微。如关于埃及之土壤成分,气候潮汐,他有时议论风生批评众说,表示己见。如关于尼罗河各问题,使人读之,乐而忘倦。有时他用统计数目字,描述人物,使人觉得他很科学化。

Wonderful as is the Labyrinth……The measure of its circumference is sixty schaenes, or three thousand six hundred furlongs, which is equal to the entire leng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The lake……in its deepest parts is of the depth of fifty fathoms……In the center there stand two pyramids rising to the height of fifty fathoms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Thus the pyramids are one hundred fathoms high, which is exactly a furlong (stadium) of six hundred feet…… II, p. 134.

希罗多德爱用数目字描述。如在第七章中,记载海、陆军人数,为2317,610人,或2461,610人(VI, p. 414)。他说,波斯海陆联军,竟有五百余万人。据识者云,他的统计数目,多不可靠。他

的天文与数学知识,非常薄弱。甚至加减乘除,亦常多误。[①]

希罗多德的史观,第一似为秉客观的态度,求记载的翔实:

> If things happened so or not, I know not, but I write what men say. For myself, [he says] though it is my business to set down what is told me, to believe it is not at all my business; let that hold for the whole of my history.[②]所以他在书里,他开章明义说,他要保存"the great and wonderful actions of the Greeks and the barbarians from losing their due meed of glory."其结果是"in spite of his fondness for a good story and tendency to romanticize, there is no conscious dictation; that he was an honest and veracious historian …… What Herodotus sees, he describes clearly, what he hears he relates faithfully, and he bestowes the same care on the composition as he had bestowed on the investigation.[③]

历史家可不仅是以客观的态度,求公平翔实的记载,而第二步在求真理,历史大事,不是单独的存在与发生,而与其他事件,有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地方。史家的责任之一,是寻出前因后果。这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样的用意。希罗多德,注意考察,留意寻源,——人类国家之源,其至于寻尼罗河的河源。

见解与判断,是希罗多德第三个着重点。他说:

> "In any experience, good judgment is more valuable than

---

① GLOVER, 155.

② MYERS, 176, and MARTIN, 14.

③ MARTIN, 9.

any other accomplishment. Even if something goes amiss the soundness of original judgment remains unaffected and its frustration is due to Fortune."(VII,10)

在他书中,他常常侃侃而谈,申述他自己对于某个问题的见解。

希罗多德也酷好自由。他以为东、西亚人之争,主要为自由与专制之争。一个国家,最需要的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主,第三是非专制的政体,第四是民主政体,他自己想做一个典型的希腊人,最喜欢雅典的自由,有人说,他也许以这本书教训青年之爱自由,崇拜英雄,不怕牺牲。[①] 他推断希腊之所以能战胜波斯人,是因为民主政体。在民主政体之下,每一个公民觉得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非为专制君主而战。[②]

这些观点,表示希罗多德之思想,是现代的。

可是他的宗教哲学史观(religious philosophy of history),就显得有点陈腐了。在他生存的时候,筮卜(oracles)之风固然盛行,颇与殷、周之习相似。然希氏一面求翔实客观的记载,一面自己也没明白反对 oracles 与梦兆,因为在他书里常常提到神灵可以干涉人的行动,可以决定人的成败与幸福,以筮卜之结果,决定国家大事的行动;好像卜辞为人神之间的交通媒介。好些史事的因果,好像为超人力(supernatural agents)或个人的狂念,或历史传统所决定[③]。稍后 Thucydides 就抛除了神怪的笼罩。司马迁虽然也有非人力的解释,却没有希氏相信迷信与神奇之深广。司马迁不

① T. R. GLOVER, *Herodotus*, p. 146.

② JOHN H. FINLEY, Jr., *Thucydides*, 23 ~ 24.

③ MACAN, *Herodotus*, vol. 1, vii – ix, lxxxvii; Glover, 267; and Myers, 57.

忽略流行的筮卜之事,为社会现象之一,而将这一类事情,归纳于《日者列传》与《龟策列传》之中,可是并没有把这两部分写完。现在这两篇,是褚先生等人东抄西补的。

## 五 优点与劣点

这两大家的优劣之点,已屡经前人批评与夸奖,如班彪云:"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班固云:"以身陷刑之故,微文讥刺,贬损当世。"在西洋有以希罗多德为撒谎之王(Prince of Liars),抄窃大家,从别人书中,杂采故事,而不注明出处者。[①] 这些批评,不完全确当,前人辨之详矣,不必多事重述。有一点当申明者,希罗多德之书,生前似已完成,并屡加文字上的推敲,死后数年,书中内容,已是家读户诵,凡是受了教育的人都已熟悉。原书流传至今,少经窜乱。司马迁之书,当他死时,未必已成写定本,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前73~前49)外孙杨恽始宣布其书,共后褚少孙等人补之,杨终删之。将《史记》自序中所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删去十余万言,其后又经刘歆等人窜乱,以致现在约有六十万字左右。《史记》的书名也是在汉灵帝至献帝(168~220)的时候,才确定的[②],汉、晋名贤,未将此书见重,大概在他死后三百余年,至晋末徐广(352~

---

① 详参宋高似孙《史略》I,6-15;(《古逸丛书本》);*Les Memaires Historiques de Se - Ma Ts' ien*, transla ted by Edouard Chavannes, t. I, CLXXXI - CXCVI and CCXXII - CCXXV; and John L. Myers. *Herodotus*, 17 ~ 31.

② 李奎耀:《史记决疑》见《清华学报》4.1(1927年6月)1175-1275;杨明照:《〈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26(1939年12月)191~214.

425),始加以研究,作《史记音义》。故《史记》有许多校雠与考证学上的问题,不在此文中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在作大概的比较时不能不提到两书的传授系统。

在结构与组织方面,司马迁最大的贡献,是铸成一个历史的模型,可以包罗万象,并用之于古今中外。不但中国历朝正史用这个模型,日本史用之;近年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亦用之。甚至于美国史,也未始不可以此模型驾驭材料。如将各大总统作本纪,Adams,Morris,Rockfeller,and Ford 等作世家;将各科学家、文学家、实业家、电影明星作列传,将社会、经济、交通、地理等作专题研究;将各州发展史,内乱与大战进展史作年表,则全部美国史,亦可以包罗排列,有的部分供人阅读,有的供参考。所以司马迁《史记》其应用,已非常广博与悠久。希罗多德之书,没有他这样的体大思精。

从内容方面看,《史记》的优点,是包括全社会各阶级二千余年的通史。其中材料,多经过谨慎地搜罗与选择。这也是司马迁最大的长处。而希氏的书是一部最初最大的文化史,包括无数有趣味的题材。他的历史可说在史学上有三大贡献;一为记载人类各种活动,二为盘根索源,三为将近代史看作世界史,而不拘于一时一地的历史。从趣味与惊人的故事方面看,希罗多德书中的内容比司马迁的更有意思。司马迁有时客观地记述历史事实时,在初学者与外国人读之,不免枯燥无味。因为司马迁在本国游历,各地的语言习俗,他早已了解,风俗人情,早已司空见惯,好些趣事,毋庸描写。希氏在外国游历,外国的语言,他多半不明了,要依赖导游者或翻译者,供给他的材料,凡是新颖的令人动听的东西,他都很小心地记载下来了。用现代的眼光看,有的故事,虽然有趣味,却没有很多历史价值。有好些政治经济的资料,司马迁非常注意,而希氏却忽略了。司马迁作正式的历史,或简称“正

史”,希氏作非正史的历史。所以有两位英国学者说:希罗多德对于上古与偏远地方的记载,常常倾向于接受奇异的故事。他书中充满了有趣味的跟有教训的故事,但不一定有历史的价值。他缺乏时间观念,使他的记载,有时先后失次,前后矛盾。他神学观念太重,使他不能深刻明了历史的原因。①

有几种希罗多德的短处,恰是司马迁的长处。希氏缺乏历史的年代知识与工具,而司马迁对于年代系统,非常留意,非常清楚,所以他能作出各种年表。中国上古史,若非司马迁理清年代,提纲挈领,则其错综复杂,恐不亚于印度史。所以傅孟真认为“整齐殊国纪年”,为司马迁史学特色之一。

希氏描写军事与战场情形,亦甚薄弱。而司马迁能写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如《项羽本纪》,几乎可以拍电影。希氏描写许多古代国家,对于地理学有贡献,而他本人的地理知识,并不见佳。如说“Dauube 发源于 Pyrenees 而往南流”。司马迁对于地理学却特别见长,藤田元春认为司马迁是世界上人文地理学最初开拓者,他注重交通经济地理,并建立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关系。② 此外,司马迁对于地位与方向观念,(sense of derection)特别见长。

---

① H. H.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Oxford,1912), 1-40.

② 藤田元春认为司马迁是世界上人文地理学最初之开拓者,足迹遍十八省,他是“当时第一流の实际地理学者”。《史记》全书中对于地理学有明确之认识,八书中之《河渠书》,实为当时之漕运水利,即当代之交通地理学。《平准书》、《货殖列传》为经济地理学,他注重陕西盆地、巴蜀盆地、齐鲁平原。他在《西域》、《匈奴》等传,注意外国地理。他建立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确定地理区域的划分。详参《司马迁の人文地理学》见《立命馆文学》1.12(1934)1595~1616。

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想象,凡是他所去过的地方,他可以画出一个地图。故凡写战场上的行军布置及排列,宴会席上的座位,他皆以东西南北等方向,描写得了如指掌。

希氏不注重政治史事,而司马迁特重政治史事。

将两书的内容略加分析与此较,我们可以说,西洋若无希罗多德氏之作,其损失尚小;中国若无司马迁的《史记》,其损失甚大。

就文章价值说,两人皆很高超,西洋如 Cicero, Byron, Hume, Gibbon, Mac anlay 等人皆赞美希罗多德的文笔,为散文生光辉;中国如扬雄,韩愈,柳宗元,章学诚,曾国藩,各大家皆服膺司马迁之文笔,为唐、宋、元、明散文之模范。在文章高妙之中,希罗多德长于说故事,折衷异说,辨别事理,有现代科学家的态度。司马迁长于写传记,写个性,有戏剧与雕刻家的天才,稍为引申,当引 Macan 对于 Herodotus 的评论:

> Upon the materials which reached him one way or another, at various times and various places, the mind of Herodotus seems to have exercised a two - fold action, for the one - part critical and selective, for the other representative and creative.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text of Herodotus, is occupied with the express statement and exposition of his own opinions, views, judgements, while indirectly and inferrentially this element is largely reinforced by his methods of historiography. ①

这是对于 Herodotus 最恰当,最有力量的估价。因为希氏有

① REGINALD W. MACAN, *Herodotus the 4th, 5th and 6th Books* ( London 1895). I, cii.

这样的本能,所以虽然常常穿插,离题说话,而加入的故事,材料,本身有趣味,不使读者厌倦,可是他书中的长篇演说词,十之八九,是他想象虚构的。虽然写得适合身份,恰到好处,而其历史价值,不无疑问。

在司马迁《史记》里大大小小,表现好几百不同的个性人物,比《水浒传》与《红楼梦》所表现的人物,更为显著,他能写出各种不同的喜怒哭笑。常模拟各种身份不同的人所说的话,所用的字眼,常用汉代的白话解释古典,使明白易晓,他避免穿插离题,而用详略互见的方法,使文章清洁,他最善于用虚字,如之乎也者之类,将文章表现得轻松流畅,常露出法外之音,言外之意,使人阅读之后,觉得有余韵,有隽永之味,情不自禁地发生回想。他确是以诗人的性格写历史。但他书中的所引的长篇说词,却不是臆造的。所以鲁迅说:《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同样Macan 也说:

> The work of Herodotus is a prose Iliad and Odyssey in one rich in episodes and details and more disputedly one and indivi - sible than either Epos. [2]

就态度方面说,希罗多德为希腊人而记希腊与波斯之争,虽然有时免不了左袒或歌诵雅典人,而对于波斯人与其他野外人的记载,还算公平翔实。[3] 司马迁有诗人的性格,而兼受了腐刑,虽

① 《鲁迅全集》10.581。

② MACAN, *op. cit.*, lxxiii; and *Martin Classical Leciures*, 16 ~ 18.

③ H · H · How and J ·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dotus (Oxford, 1912), 1—40。

然有时不免以感情用事,如对于汉武帝与当时人物如李广将军等略带讽刺之意,把汉武帝写成一个迷信极深神经病狂之人(参今之本纪、《封禅书》与《龟策列传》)而武帝之穷兵黩武,求神求仙,皆为事实,值得讥评。《史记》全书,对于人物的选择,事实的申述,皆不失史家公谨与冷静的态度。

总之,希罗多德为业余史学家,司马迁为专门史学家。两人比较,强弱互见。(Thucydides 与班固,才能好好的对比)。古代文史不分,二人皆为最大的文学家。他们的散文,充满了幽默与诗意。希罗多德用纪事本末体,如章回小说、侦探小说,原原本本,系统分明,条理井然。司马迁用纪传体,其组织之周密,包罗正式史料之广博(如政治、人物、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似较希罗多德目光远大,思想慎密。而希氏以客观的态度,用数目字的描写,讨论众说,折衷已见,似较司马迁为科学化。两书影响东、西史学界颇大。东、西史学之兴趣,已发端于两大鼻祖。读西洋史书如吃杂碎(chop suey)荤素作料,皆混合之,读者读之而已。读中国正史,如吃西餐。本纪如牛排,列传如素菜……读者须自加抉择,自己调味。东寻西找,颇费工夫。"把历史割裂为无数的碎片,诚为纪传体最大的缺点"。① 而希氏讲故事的方法,为我们保存好些史料,否则已被人遗忘。讲通史者也许仍然要奉希氏的方法,为教通史之金科玉律罢。

(原载《史语所集刊》第 28 卷上,1956 年)

---

①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见《中国史论集》,第 37 ~ 74 页。

#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

公姓司马氏，名迁，字子长（案子长之字，《史记·自序》与《汉书》皆不载。扬子《法言·寡见篇》：“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二字之见于先汉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论衡·超奇》、《变动》、《须颂》、《案书》诸篇，张衡《应间》，皆称司马子长，或单称子长。是子长之字，两汉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见《史》、《汉》为疑矣）。左冯翊夏阳人也（案《自序》，司马氏入少梁，在晋随会奔秦之岁，即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阳。自司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年。）《自序》云：“昔在颛顼……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集解》引晋灼曰：地名，在鄂县。《索隐》云：晋灼云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

北四里。国维案:《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阳夏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城西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此《索隐》所本也)。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汉书》作毋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集解》引苏林曰:"长安北门。"瓒曰:"长安城无高门。"《索隐》云:"苏说非也。案迁碑,高门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南迳高门原,盖层峦蘩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云:"高门原东去华池三里。"《太平寰宇记》:同州韩城县下,引《水经注》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名马门原。《正义》引《括地志》亦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盖亦本古本《水经注》,马门原或以司马氏冢地名矣)。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说见后)。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历书》:"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造汉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又《公孙弘传》论:"治历则唐都、落下闳。"是唐都实与于太初改历之役。考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师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则都亦寿考人矣)。受《易》于杨何(《儒林列传》:《易》,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汉书·儒林传》:"何字叔元。")。习道论于黄子(《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案《传》云:"辕固生,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是黄生与司马谈时代略相当,徐说殆是也。谈既习道论,故论六家要旨,颇右道家,与史公无与。乃扬雄云:"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班彪讥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认司马谈之说为史公之说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

迁,即公是也。

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大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岁。

五年,乙巳,十岁。

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

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岁。

二年,戊申,十三岁。

案《汉旧仪》(《大平御览》卷二三五引):“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岁。

三年,乙卯,二十岁。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考《自序》所纪,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五帝本纪》曰:“余尝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

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蒙恬列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余大抵是岁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同上)。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据《越绝书》,则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吴)。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

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又案《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儿宽传》考之,则儿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张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太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又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鼎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证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确为"三"之讹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岁。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岁。

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岁。

案《封禅书》:“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宜于泽中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则司马谈等议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谈为太史令始见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岁。

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公西至空同,当是是岁十月扈从时事。

又案《封禅书》:“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一郊见。’”案《汉书·武帝纪》:是岁十一月,立太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则太史谈等议泰畤典礼,当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岁。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云云。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

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缑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子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岁。

案《河渠书》："余从负薪塞宣房。"考《汉书·武帝纪》，是岁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从塞宣房，则亦从至缑氏、东莱、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岁。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当作三十八，说见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阳人，而云茂陵显武里者，父谈以事武帝故，迁茂陵

也。大夫者,汉爵第五级也。汉人履历,辄具县里及爵。《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卌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顼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为太史公,《自序》具有明文。然全书中自称及称其父谈皆曰"太史公"。其称父为公者,颜师古及司马贞均谓迁自尊其父,称之曰公。其自称公者,桓谭《新论》谓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见《孝武本纪》及《自序索隐》引)。韦昭则以为外孙杨恽所称(见《孝武本纪集解》)。张守节《正义》则以为迁所自称。案东方朔卒年虽无可考,要当在《史记》成书之前。且朔与公友也,借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称之为"公"。又秦汉间人著书,虽有以公名者,——如《汉书·艺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后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称。则桓谭、张守节二说,均有所不可通。惟公书传自杨恽,公与恽为外王父;父谈,又其外曾祖父也。称之为"公",于理为宜。韦昭一说最为近之矣。自易"令"为"公",遂滋异说。《汉仪注》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本传注》如淳说,皆引此文。《西京杂记》卷六语略同,亦吴均用《汉仪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自序·正义》引《汉旧仪》。案《汉旧仪》与《汉仪注》本一书,皆《汉旧仪注》之略称,卫宏所撰也)臣瓒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集解》引)晋灼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且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汉书·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又为调停之说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犹以旧名,尊而称公也。"(《自序·索隐》引)国维案:汉官皆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为九卿。中间名有更易,员有增省,而其制不变,终先汉之世,惟末置三师在丞相上,他无所闻。且太史令一官本属奉常,与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五令丞联事,无独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汉之三公,官名上均无公字,何独于太史称太史公?史公《报任安书》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宋祁援此语以破卫宏,其论笃矣。且汉太史令之职,掌天时星历(《续汉志》),不掌纪事。则卫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说,亦属不根。既不序事,自无受天下计书之理。晋灼谓卫宏所说多不实,其说是也。窃谓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见《茂陵中书》;公为太史令,见于《自序》。较之卫宏所记,自可依据。至太史令之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文,或以为千石,《报任安书》:"乡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臣瓒曰:"汉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为八百石,《汉书·律历志》: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有言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据此,则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为六百石,则《汉旧仪》(《北堂

书钞》卷三五引)、《续汉书·百官志》皆同。又据《索隐》所引《博物志》,则史公时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称"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称壶遂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据《汉书·律历志》,壶遂此时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为上大夫,则八百石为中大夫,六百石为下大夫矣。汉时官秩,以古制差之,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当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当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当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当上中下士。《续汉志》引《汉旧注》(即《汉旧仪注》):三公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则下大夫六百石审矣。又《汉书·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是亦隐以比二千石以上当古之卿,比六百石以当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当古之士。则下大夫之为秩六百石,盖昭昭矣。臣瓒千石之说,别无他据。元凤中,太史公张寿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据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说为最长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岁。

案《五帝本纪》:"余北过涿鹿。"考《汉书·武帝纪》,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服虔曰:"独鹿,山名,在涿郡遒县北界。"今案《汉书·地理志》,涿鹿县在上谷,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云: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独鹿、涿鹿为一地。史公北过涿鹿,盖是年扈跸时所经。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岁。

案《汉书·律历志》："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借半日，名曰阳历；不借，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云云。如是,则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故《韩长孺列传》言:"余与壶遂定律历。"《汉志》言:"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盖公为太史令,星历乃其专职;公孙卿、壶遂虽与此事,不过虚领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时",五百年后卒行于公之手。后虽历术屡变,除魏明帝、伪周武氏外,无敢复用亥、子、丑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业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云云。于是论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记》,虽受父谈遗命,然其经始则在是年。盖造历事毕,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汉元年,辛巳,四十六岁。
三年,癸未,四十八岁。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曰:"天汉三年。"《正义》亦云,"案: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然据《李将军》、《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腐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岁。

案《汉书》本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事当在此数年中。《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云云，是当时下蚕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学登用，奉使扈从，光宠有加。一旦以言获罪，帝未尝不惜其才。中书令一官，设于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史、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略也。《汉旧仪》(《大唐六典》卷九引)："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汉书·佞幸传》："萧望之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者。元帝不听。"《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者，置尚书员五人。"《续汉书·百官志》："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据此，似武帝改尚书为中书，复改士人用宦者；成帝复故。然《汉书·张安世传》："安世，武帝末为尚书令。"《霍光传》："尚书令读奏。"《诸葛丰传》有尚书令尧。《京房传》："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事皆在武帝之后，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虽置中书，不废尚书；特于尚书外增一中书令，使之出受尚书事，入奏之于帝耳。故《盖宽饶传》与《佞幸传》亦谓之中尚书。盖谓中官之干尚书事者，以别于尚书令以下士人也。《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五七引)："尚书令并掌诏奏，既置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盖武帝亲揽大政，丞相自公孙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等，皆以中材备员，而政事一归尚书。霍光以后，凡秉政者莫不领尚书事。尚书为国政枢机，中书令又为尚书之枢机。本传

所谓"尊宠任职"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岁。

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大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从上东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岁。
后元元年,癸巳,五十八岁。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岁。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惟《汉书·宣帝纪》载: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丙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此内谒者令,师古注云:"内者署属少府,不云内谒者。"二刘《汉书刊误》因以"谒"为衍字。又按《刘屈氂传》有内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为刘说之证。然《丙吉传》亦称内谒者令郭穰,与《宣纪》同,然则果《宣帝纪》与《丙吉传》衍"谒"字,抑《刘屈氂传》夺"谒"字,或郭穰于征和三年为内者令,至后元二年又转

为内谒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谒"字非衍,则内谒者令当即中谒者令,亦即中书谒者令。《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夏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然中谒者本汉初旧名。《樊郦滕灌列传》:"汉十月拜灌婴为中谒者。"《汉书·魏相传》述高帝时有中谒者赵尧等,高后时始用宦官。《汉书·高帝纪》:"少帝八年,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史记·吕后本纪》作大中谒者张释,又称宦官令张泽,自是一人。大中谒者乃中谒者之长,犹言中谒者令也。《成帝纪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其官当有所本。《贾捐之传》:"捐之言中谒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后中书令出取封事(见《霍光传》)言之。是则中书谒者,武帝后亦兼称中谒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纪》与《丙吉传》之内谒者令,疑本作中谒者令,隋人讳忠,改中为内,亦固其所。此说果中,则武帝后元二年郭穰已为中谒者令,时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

《史记》纪事,公自谓"讫于太初"。班固则云"讫于天汉"。案史公作《记》,创始于太初中,故原稿纪事以元封、太初为断,此事于诸表中踪迹最明。如《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讫于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则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则云"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云"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为二,明前三十六年事,为史公原本,而后十八年事,为后人所增入也。《惠景间侯者年表》与《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后"一格,亦后人所增,殊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后五元并为一格,尤为后人续补之证。

表既如此,书传亦宜然。故欲据《史记》纪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故据《屈原贾生列传》,则讫孝昭矣;据《楚元王世家》,则讫宣帝地节矣;据《历书》及《曹相国世家》,则讫成帝建始矣;据《司马相如列传》,则讫成、哀之际矣。凡此在今《史记》本文,而与褚先生所补无与者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史公虽居茂陵,然冢墓尚在夏阳。《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历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案:汉永嘉元四年,晋永嘉时又无汉阳郡。此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疑四字或误)。《括地志》(《正义》引):"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夏阳县故东南",与《水经注》合。又云"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则误也。

史公子姓无考。《汉书》本传:"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是史公有后也。女适杨敞。《汉书·杨敞传》:"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又云:"大将军光谋欲废昌邑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案恽为敞幼子,则《敞传》与延年参语之夫人,必公女也。废立之是非姑置不论,以一女子而明决如此,洵不愧为公女矣。

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

客列传》有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汉书》所纪有临淮太守孔安国、骑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谧《高士传》所纪有处士挚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后世谓之《史记》,《史记》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屡称"史记",非自谓所著书,《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又云:"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七称"史记",皆谓古史也。古书称"史记"者亦然。《逸周书》有《史记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公羊疏》引《春秋说》(谓《春秋纬》)云:"邱揽史记。"又引《闵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至后汉犹然。《越绝书》(四十)云:"夫子作经,揽史记。"《东观汉记》(《初学记》卷二一引)云:"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后汉书》改"史记"为"国史")。"《公羊》庄七年《传》何休注云:

"不修春秋,谓史记也。是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故在前汉,则著于向、歆《七略》者,谓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其在后汉,则班彪《略论》、王充《论衡》、《超奇》、《案书》、《对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传正义》引),亦谓之《太史公书》;应劭《风俗通》谓之《太史公记》(见卷一及卷六),亦谓之《太史记》(见卷二)。是两汉不称《史记》之证。惟《后汉书·班彪传》称"司马迁作《史记)",乃范晔语;《西京杂记》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则吴均语耳。称《太史公书》为《史记》,盖始于《魏志·王肃传》,乃《太史公记》之略语。晋荀勖《穆天子传序》,亦称《太史公记》。《抱朴子内篇》犹以《太史公记》与《史记》互称。可知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窃意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此种著述,秦汉间人本谓之"记"。《六国表》云:"太史公读秦记。"《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汉著记》百九十卷。后汉班固、刘珍等在东观所作者,亦谓之《汉记》,蔡邕等所续者谓之《后汉记》。则称史公所撰为《太史公记》,乃其所也。其略称《史记》者,犹称《汉旧仪注》为《汉旧仪》、《汉仪注》,《说文解字》为《说文》,《世说新语》为《世说》矣。

《史记》一书,传播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其所谓"宣播"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七略》"春秋类"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是汉秘府有是书也。《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为

利往'(见《货殖列传》)。"此桓宽述桑弘羊语。考桑弘羊论盐铁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论次之之桓宽,乃宣帝时人。此引《货殖传》语,既不出弘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汉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写以别行者,《后汉书·窦融传》: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又《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是也。

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太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宫中书令之后,其为史家著述甚明。故此书在公生前未必进御。乃《汉旧仪注》(《自序·集解》引)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西京杂记》卷六同)。"《魏志·王肃传》亦云:"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二说最为无稽。《自序》与《报任安书》皆作于被刑之后,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两本纪;《报任安书》亦云本纪十二,是无削去之说也。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有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盖后人所辑,书已久佚。今其遗文存者:《悲士不遇赋》,见《艺文类聚》卷三〇;《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及《文选》;《与挚伯陵书》,见皇甫谧《高士传》。《悲士不遇赋》,陶靖节《感士不遇赋》序及刘孝标《辨命论》俱称之,是六朝人已视为公作;然其辞义殊未足与公他文相称。若《与挚伯陵书》,则直恐是赝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载:梁有太史公《素王妙义》二卷,

亡。他书所引则作《素王妙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北堂书钞》卷四十五、《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条。其书似《货殖列传》,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故曰"素王";非《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晋人所依托也。

(《观堂集林》卷一一,商务本 1940 年)

#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李长之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前110)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前108),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中元五年(前145)。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

是指太初三年(前102)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前129)。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135年。理由是:

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145年,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135年,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的过去。

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参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前93)。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145年,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么,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余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都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127年,如果司马迁生于前135年,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前145年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前124)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前111)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吗?这十几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前135年,则仕于前115或114年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

事(前112年),奉使巴蜀之事(前111),不是更合情理吗?

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么,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六、《自序》上说,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还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127)。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见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前119),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些。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多岁!

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么,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135年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

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是指司马迁一生只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是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事情一切吻合罢了。

《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

（原载《中国文学》1卷1944年5月第2期）

# 司马迁生年考

钱 穆

司马迁生年向有两说。一张守节《正义》,云: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则当生于景帝之中元之五年。一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此指元封三年初继职为太史令,依此推溯,应生于武帝建元之五年,两说前后相差凡十年。众家旧说,皆从《正义》。老友施君之勉独据《索隐》,以《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一条为证。我近作司马迁新传,仍依《正义》,循旧说,施君远自台南,遗书讨论。因重述我的取舍意见,草为斯篇。

“二”字与“三”字,古书常易讹写,《索隐》“二十八”,当系“三十八”之误。“四”字古或作“亖”,亦易讹写成“三”字,但“三”字讹写成“亖”字,机会便不易。今考武帝时郡国豪杰徙茂陵,前后三次,一在建元二年,一在元朔二年,一在太始元年。若依《索隐》,迁在建元五年,其时尚在夏阳之龙门。元封三年已为太史令,其时早已住茂陵之显武里,则迁之徙茂陵,定在元朔二年。依《正义》,是岁迁十九岁,翌年即出外远游。依《索隐》,是年迁九岁。但迁之《自叙》明说:

>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十岁幼童,如何说耕牧河山之阳呢。这是第一证。

《封禅书赞》:"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

考《封禅书》:

>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盛,……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寿宫。神君。……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其所语……无绝殊者,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通鉴》定其时在元狩之五年,赞语所指,即此事。若依《正义》,迁年二十八,时已为郎中,故得从巡祭天地鬼神。若依《索隐》,迁年仅十八,尚未为郎中,便无从驾巡祭之资格。这是第二证。

《游侠传》:"郭解家徙茂陵,其客杀人,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到元朔五年,他便任丞相。可见郭解徙家茂陵,也定在元朔之二年。若依《正义》,是年迁十九岁,即在茂陵认识了郭解。他曾说:

> 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依《索隐》,公孙弘为丞相时,迁仅十二岁,尚在童年,这应在此以前,便认识了郭解。而谓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这些

观察,似乎又与十龄左右的年岁不相称。这是第三证。

李广自杀,在元狩之四年。迁曾见李广,他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迁与广相识,断在元狩四年前。若依《正义》,元狩四年,迁年二十七。依《索隐》,迁年十七。十七岁以前的青年,也不能说定无机缘认识到李广,但那样的观人于微处,似乎放在过了二十以后人身上更相称。这是第四证。

同样的理由,迁奉使西征,从巴蜀到昆明,依《索隐》,当年二十六。继职为太史令,当年二十八,这也未尝不可能。若依《正义》,迁三十六奉使,三十八为太史令,似乎在年龄上更近情理些。这是第五证。

迁《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矣。”依旧说,诸家之考订,《报任安书》应在征和之二年。施君据王静安《太史公行年考》,《报书》太始四年,因云,“若迁在景帝中五年,至武帝元朔三年为二十岁,四年二十一岁,游历归为郎中,下至太始四年已三十三年,岂得云‘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耶?”今考迁之《自叙》:

>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

他这一次出游,所经历甚广,再看《史记》各篇,叙述到他在各地之访问与考察,都极精详。决非短期间所能。我们先不能判定他一年即归,又不能判定他归后立即为郎中。我们只能说他在为郎中在远游西归之后,却不能说定在哪一年。但元狩五年他二十八时,必然已仕为郎中了(说见第二证)。循是下算至征和二年《报

任安书》,那年迁五十五岁,前后共搭上二十八年。纵使他再早一年为郎中,也不够作推翻《正义》的根据(若依王氏说,则《报任安书》又提前了两年,更不成问题)。

据《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得之,安国为谏大夫,司马迁从安国问故。"汉廷初置谏大夫,在元狩五年,那时司马迁已仕为郎中,与安国同在宫廷,向其问故当即其时事。若依《索隐》,迁是年仅十八,天才夙悟,不能说他无向安国问故之资格,但二说相较仍似《正义》较近情。

董仲舒为胶西王相,在元朔五年,免归家居,在元狩二年。仲舒家亦在茂陵,其免归居家,依《正义》,值迁二十五岁时,迁于仲舒处获闻《春秋》大义,亦当在此后。若依《索隐》,其时迁年仅十五获闻《春秋》大义,应在二十远游前,此亦非不可能,而仍似依《正义》说为允。

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壶遂等定律历,是为《太初历》,律历天官,自古属专家之术业。依《正义》,是年迁四十二岁。依《索隐》,是年迁三十二岁。两说均可通,而仍似依《正义》为较允。

司马迁草创为《史记》,亦始于太初之元年。其记载先,亦以太初为限断。故《高祖功臣表序》曰"至太初",《自叙》云"至太初而讫"。迁既是一天才,三十二即著书,事非不可能。即以从事著作之年为其书之内容之限断,事更无足怪。惟若依《正义》,草创为《史记》,迁年四十二所学已成熟。并年事已高,故其书预定体例即以太初为限断,实亦较依《索隐》三十二岁之说为更允。

根据上述第一、第二、第三证,断当依《正义》。根据第四、第五证,《索隐》、《正义》两说俱可通,而依《正义》为较合。此外"待

罪辇毂下二十余年”一条，只不确说迁仕为郎中在二十一岁时，《正义》仍可通。而考之迁之学问著作与师友之关系，其与孔安国、董仲舒、壶遂诸人之交游，皆似据《正义》较据《索隐》为更惬。总之《索隐》、《正义》两注必有一讹字，详为斟酌，应该说讹在《索隐》不讹在《正义》。所以我草写司马迁新传，在没有更新的发现以前，宁仍沿袭了众家旧说，依据了《正义》，认为《索隐》“二”字乃“三”字之讹写。

（载于《学术季刊》（台北）第1卷，1953年6月第4期）

# 《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郭沫若

王国维有《太史公行年考》，对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考证颇详。他考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因而到了今年便当为诞生二千一百周年。史学界曾经拟议，在今年举行纪念。有的朋友更已写了纪念文章。但经仔细推考，王国维所定的生年是有问题的。司马迁的生年应该还要推迟十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到今年只能是诞生二千〇九十年。

推定司马迁生年的根据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有两个。

首先是司马贞《索隐》在《史记·自序》"迁为太史令"下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里面没有这一段话。王国维认为"当在逸篇中"，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还举了些汉人写履历的例子来证明"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特别是左例两条敦煌汉简是最值得重视的证据：

一、"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卌八"；

二、"□□、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这些和"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是出于一个公式。因此，司马贞所征引的材料是完全可靠的。王国维所见到的汉简不多，他引证的两

例也残缺不全,有的人或许会感觉着证据不够。我把《居延汉简》翻阅了一遍,发现这样的例子竟多到一百五十条以上。我现在把十项最完整、最典型的例子写在下边,以补王国维引证的不足。

一、出吏、觻得、高平里、公乘范吉,年卅七,迎司御钱居延,八月戊戌入。(《释文》卷二第四页第十四行)

二、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皂尊,年廿七,袭一领,犬袜一两,绔一两,私袜一两,贯赞取。(《释文》三·一·一五)

三、田卒、淮阳郡、长平、北朝里、公士李宜,年廿三,袭一,犬袜一,绔一,贯赞取。(《释文》三·七·背八)

四、戍卒、颍川郡、陕翟里、成适,年卅二,为部卒取私橐。(《释文》三·十·一)

五、敦煌、效谷、宜王里、琼阳、年廿八,轺车一乘,马四,闰月丙午南入。(《释文》三·三二·一)

六、登计掾卫丰子男、居延、平里、卫良,年十三,轺车一乘、马一匹,十二月戊子北出。(《释文》三·三二·二)

七、水门燧长、张掖、下都里、公乘江朘客,年卅,建昭二年〔下缺〕。(《释文》三·三八·九)

八、〔上缺〕长平、田辛里、公乘王弘,年廿八,五凤元年十一月丁酉除,就还。(此简折为三段,上缺一段不明,中段“长平田辛里公”六字见《释文》三·四二·背八,下段见《释文》三·四二·一三)

九、居延甲渠止害燧长、居延、收降里、公乘孙勋,年卅,甘露四年十一月辛未,除。(《释文》三·五三·一三)

十、□□甲□第十三燧长、□田、万麻里、上造冯匡,年

廿一,始建国天凤元年闰月除补,止北隧长。(《释文》三·五四·一七——一八)

从这十个例子中,特别是七、八、九、十四例,可以看出和"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是完全一致的。官职、乡里、身份、姓名、年岁、事由带年月日,是完整的一个公文格式。有这许多例子,的确可以佐证"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是一点也不错的。

这里的"三年六月乙卯"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六月二日。司马迁在这一年既为二十八岁,那他便当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但是,王国维却说"二十八"当为"三十八"。他是根据了另外一个材料。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史记·自序》"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前104)"下注云"按迁年四十二岁"。这就比司马贞所引的材料要早生十年。

张守节的根据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王国维认为他所根据的应该也就是《博物志》,他说"四十二"是正确的,"二十八"是错误了。为什么呢?他举了三个理由。

第一,"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这就是说"三十八"误为"二十八"是容易的,"三十二"误为"四十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便断定张守节没有错,司马贞是错了。这个断定的根据是异常薄弱的。由上举汉简已可看出,汉人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卌"。这是殷周以来的老例,如就廿与卅,卅与卌而言,都仅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因此,这第一个根据便完全动摇了。

第二,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古文。又据

《史记·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安国生驩,驩生卬"。王国维云:"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太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王所推定的有关孔安国的年代大抵正确,但把司马迁学古文之年定在"二十左右",却是自我作故。其实司马迁自己在《史记·自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年十岁则诵古文",可见他学古文是在元朔三年(前126)。这又表明王国维提前十年的推算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王云"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朔(沫若案当是元鼎之误)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这位董生是董仲舒,家居广川,在今河北省南部。司马迁见董仲舒,不知是在何处,在京有可能,在广川也有可能。如在京师,何以必"当在十七八以前"?司马迁早慧,他自己说过"少负不羁之才"(《报任安书》),年幼时曾见董仲舒,何尝不可?如在广川,那就更晚几年也没有问题了。

如上所述,王国维的三个根据,证明《博物志》"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为"三"之讹字,是大成问题的。但仅仅这点,还不能够驳倒他。因为究竟是司马贞错,还是张守节错,这机数是一比一。根据司马贞可以说得过去,根据张守节也可以说得过去,那么司马迁的生年就会成为疑案了。在这里有个确切的根据可以判定这个疑案,但却被王国维所遗漏了。

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司马迁的母亲死于何时虽然不知道,但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死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在这一年,依王国维的推定,司马

迁当为三十六岁。三十六岁死父亲,怎么能够说“早失”呢?这正给予王说一个致命伤。但司马迁的生年如推迟十年,则元封元年为二十六岁。二十六岁死父亲,要说“早失”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此司马贞所引《博物志》,在元封三年司马迁二十八岁为太史令,并没有错;而张守节说为太史令后五年为“四十二岁”则确是错了。但有人说张守节的“年四十二岁”说,是总括司马迁的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这也有可能。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十一月,以后的事迹即无可考见。司马迁可能即死于太始四年尾,那他只活了四十二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面整录了《报任安书》,而在赞辞里面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指《报任安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苍伯》之伦,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从这句话来推测,似乎司马迁之死有点不明不白。在“既陷极刑”之后,又不“能保其身”,那么,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了。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司马迁的生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今年是他诞生2090周年,而不是2100周年。

(原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

# 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

赵生群

司马迁生年问题，不仅关系到司马迁的生平履历，而且与其交游、创作以及司马谈作史、《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等重大问题紧密相关。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数十年，前后发表的论著不下五六十篇（种）。我也曾就司马迁生平、交游进行考索，认为司马迁当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本书仍予保留）。去年给三位研究生上《〈史记〉研究》专题，让他们分别从事《〈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的辑佚工作，竟意外发现了《玉海》所载《正义》、《索隐》征引的《博物志》的资料。这两条资料，为考定司马迁生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以前考证司马迁的生年，主要的材料有两条：

一、《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二、《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

王国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泷川资言、水泽利忠、钱穆、朱东润、季镇淮、徐朔方、张大可、施丁等人依据《正义》，认为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索隐》引文有误。桑原

鹭藏、山下寅次、李长之、施之勉、郭沫若、王达津、陆永品、赵光贤、吴汝煜、袁传璋、李伯勋等人则根据《索隐》,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正义》之文有误。

双方考证司马迁生年,虽有十年之差,但其所据资料,实际上同出一源,即《博物志》的有关记载。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敦煌汉简有'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卅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三本作二,此为王氏所改)',与彼两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顼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词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郭沫若撰《〈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据《居延汉简》,列出十条资料,再次肯定"司马贞所征引的材料是完全可靠的"。然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又云:"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可见,王国维立论,基于如下两个假设:一是《索隐》引《博物志》之文有讹误,二是张守节所见本《博物志》作"年三十八"。因此,《博物志》所载年岁是否有误,是考定司马迁生年的关键,由于《索隐》与《正义》存在矛盾,而又没有其它直接证据,无论是对两者加以取舍,还是从另外一些方面作间接推论,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考《玉海》卷四十六载:"《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又《玉海》卷一百二十三载:"《索隐》曰:《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

石。"这两条资料所载司马迁年岁,与今本《史记》中司马贞引《博物志》之文完全一致,这说明《索隐》引文准确无误,王国维"三讹为二"的推测不能成立。同时也证实,张守节推算司马迁生年的根据也是《博物志》。如此看来,《博物志》确实是考定司马迁生年的唯一的、也是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张守节云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比司马迁实际年龄多出十岁,肯定有误。这究竟是张氏推算有误,还是后人传写不慎而致误,现已不得而知。

下面再就《玉海》所引《史记正义》与《博物志》记载之可靠性作些分析。

《玉海》二百卷,王应麟撰。该书共分二十一门,二百四十余类,《四库提要》称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王应麟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卒于元初。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是宁宗庆元中黄善夫本。也就是说,早在王应麟出生之前,三家注合刻本就已经出现。但从《玉海》引用《史记正义》的具体情况看,王氏编书时所依据的当是单行本《正义》。据初步统计,《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之文不见于标点本《史记》者,达 50 余条(个别条目见于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今择其简明者,略举数例。1.《玉海》卷三:"《史记正义》: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凡周天七万一千里。"(此注应在《天官书》)2.《玉海》卷十一:"《史记正义》:按马融以昏明为限,郑玄以日出入为限,故有五刻之差。"(此注应在《历书》)3.《玉海》卷十四:"《史记正义》:《周地图记》云:'长安城南为斗形,北为北斗形。'"(此注应在《吕太后本纪》)4.《玉海》卷一百三十五:"《史记正义》云:'《楚汉春秋》无奚涓、薛欧,有韩钦、陈濆,而王吸为王崇,丁复为丁侵。'"(此注应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5.《玉海》卷一百五十五:"《史记正义》:

《括地志》云:'泮宫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百里鲁城内宫之内。郑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于天子之璧雍'"。(此注应在《封禅书》)正因为王应麟所用的是《史记正义》单行本,所以能征引更多的《正义》注文。而且,因为他所见的版本较早,文字讹误的可能性也比后来的版本更小。

王应麟其他著作如《困学纪闻》、《诗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等书引用的《史记正义》之文,也多有点校本《史记》所无者,说明也依据的确是比较完备的本子。

从《索隐》与《正义》的关系来考察,也可以肯定张守节曾见到并且认同《博物志》的有关记载。司马贞《索隐后叙》提到自己《史记》之学受之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而张守节注《梁孝王世家》、《匈奴列传》,也一再提到"张先生旧本"、"先生旧本",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贞张守节事历》认为"马、张二人同其师",据《旧唐书·刘子玄传》,司马贞为博士在开元初,而张守节《正义序》称"开元二十四年八月杀青斯竟",程金造《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据此认为"《索隐》成书,早于《正义》二十年"。程氏还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指出《正义》对《索隐》多有疏通补正。邵晋涵《南江文抄·史记正义提要》云:"守节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正义》与《索隐》之间特殊关系的认定,使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判断:其一,张守节肯定能见到《博物志》有关司马迁事迹的记载。他注释《秦本纪》、《赵世家》、《留侯世家》、《司马相如列传》诸篇,就都引用过《博物志》的资料。退一步说,即使他未见《博物志》原文,至少也可以见到司马贞的引文。其二,《正义》与《索隐》原本各自独立成书,《博物志》的记载,是确定司马迁年岁的唯一资料,《正义》加以征引,当在情理之中。否则,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的按语就显得突

兀无据。其三,如果张守节所见资料与《索隐》所引《博物志》有不同,他应加以说明,他对司马迁年龄的推算,就更需交待清楚。若是他认为司马贞所引《博物志》有误,则应予以驳正。张守节对《索隐》引文不置一词,本身即是一种认同。《玉海》所引《史记正义》与《索隐》若合符节,绝非偶然。

总之,《玉海》所引《正义》佚文是可信的。司马迁的生年应该是武帝建元六年而非景帝中元五年。

(原载《光明日报》2000 年 3 月 3 日)

# 主要论著索引

## 一 专著

**大陆：**

史记私笺一卷/鹿兴世/山西高平县刊/1902 年

史记发微/杨赞襄/成都印本/1910 年

太史公年谱一卷/张鹏一/1923 年

史记通论/杨启高/清山阁排印本/1926 年

史公论六家要指篇释/方元/惠阳方氏山山馆国学别录本/1928 年

史汉研究/郑鹤声/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0 年

太史公书知意/刘咸炘/成都尚友书塾刻/1931 年

史记货殖传新诠/潘吟阁编纂/商务印书馆/1931 年

司马迁年谱一卷补遗一卷/郑鹤声/商务印书馆排印中国史学丛书本/1933 年

史记释例/靳德峻/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3 年

史汉文学研究法/陈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4 年

史记纪年考/刘坦/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7 年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鲁实先/长沙湘芬书局/1940 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罗倬汉著/商务印书馆/1943 年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上海开明书店/1948 年

六国纪年表考证/陈梦家著/北京燕京大学/1949 年

司马迁与史记/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史记书录/贺次君/商务印书馆/1958 年

点校本《史记》/中华书局整理/中华书局/1959 年

史记选讲/郑权中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年

司马迁所见书考/金德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年

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五卷/张森楷校注　杨家骆编/台湾中国学典复馆筹备处/1967 年

史记新证/陈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

史记新论/白寿彝/求实出版社/1981 年

司马迁研究新论/施丁　陈可青　杨燕起　赖长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司马迁研究/陆永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史汉论稿/徐朔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史记研究/张大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张衍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郭双成/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史记管窥/程金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韩城市司马迁研究文集/中国民主同盟韩城市委员会、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编印/1985 年

史记论稿/吴汝煜/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

《史记》艺术美研究/宋嗣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周经/档案出版社版/1986 年

司马迁和史记/刘乃和主编/北京出版社/1987 年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李少雍著/重庆出版社/1987 年

司马迁的心理世界　《史记》抒情内涵纵论/周先民/南京大学/1987 年

司马迁论稿/聂石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

史记注译/王利器主编/三秦出版社/1988 年

司马迁审美意识及《史记》悲剧色彩初探/李立炜/陕西师范大学/1988 年

《史记》训诂札记/王迈/苏州大学/1989 年

司马迁年谱新编/吉春/三秦出版社/1989 年

《史记》美学论/何世华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周一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史记》与日本文化/覃启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司马迁研究/冯庄等/三秦出版社/1990 年
司马迁与太史祠/吉春　徐兴海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史记研究史略/张新科　俞樟华/三秦出版社/1990 年
《史记》历史研究法初探/杨振之/四川大学/1990 年
史记通论/韩兆琦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货殖列传与经商艺术/王双　王文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司马迁人生哲学述评/王成儒/中国人民大学/1991 年
《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可永雪编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 年
司马迁政治思想简论/余翔/北京师范大学/1991 年
司马迁人格论/高益荣/陕西师范大学/1991 年
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证/刘操南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史记与中学古文/宋嗣廉　赵国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司马迁评传/许凌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　第一辑/何清谷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史记·货殖列传》人物传记别论/周德仓/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 1 辑/1994 年
《史记》通假字汇释/易国杰著/苏州大学/1994 年
史记新探/俞樟华著/民族出版社/1994 年
太史公书研究/赵生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韦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池万兴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与宗教神话/张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史记》与中国文学/张新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史记文学论稿/李志慧著/三秦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杨生枝/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陈桐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行年新考/施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第二辑/徐兴海等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袁仲一　陈绪万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程世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霍有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司马迁的历史学/毛曦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
史汉经济与地理著作研究/李剑林著/湖南地图出版社/1996 年
《史记》的学术成就/杨燕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史记》名篇述论稿/陈桐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袁仲一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王子今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司马迁《史记》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宋丽军/东北师范大学/1997 年
史记文献研究/郑之洪著/巴蜀书社/1997 年
命运与性格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史记》文化符号论/齐效斌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太史公书校读记/李人鉴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史记索隐引书考实　上/程金造编著/中华书局/1998 年
史记索隐引书考实　下/程金造编著/中华书局/1998 年
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朱枝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朱枝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史记》文献研究/张大可著/民族出版社/1999 年
《史记·历术甲子篇》解读/张立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年
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朝政问题的思考/康清莲/北京师范大学/1999 年
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黄镇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与文化意蕴/弋言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孙子与史记/刘毓生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
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吕培成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司马迁与中国天学/吴守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史记新注/张大可注释/华文出版社/2000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四辑/张文立等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史记与诗经/陈桐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史记》文献学丛稿/赵生群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史记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赵安启　王宏涛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徐日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史记新论/施章//民国刊本
史记意/齐树楷/四存中学排印本
太史公书义法二卷/孙德谦/元和孙氏四益宧孙隘堪所著书本/1925年

**港台:**

景祐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栋/台北廿五史编刊馆/1956年
史记方法试论/游信利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史记新探/丘述尧著/明文书局/1992年
司马迁春秋学/张添丁著/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5年
司马迁的史传文学世界/周先民著/文津出版社/1995年
史记订补/李笠/瑞安李氏横经室刻本/1924年
史记旧注评议十三卷/王骏图撰　王骏观续/正中书局排印本/1947年
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张兴唐/台北国防研究院/1962年
史记今注/劳干　屈万里/中华丛书本/1963年
史记天官书合注/高平子校注并章句/台北中华书局本/1965年
史记导读/黄华表/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5年
史记汉书儒林列传疏证/黄庆萱/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

史记地名考/钱穆/香港龙门书局/1968 年
史记考证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编/大陆杂志社/1970 年
史记今释/杨家骆编著/台湾正中书局本/1971 年
《史记》评介/徐文珊/台湾维新书局/1973 年
史记考证研究论集　第二册/大陆杂志社编/大陆杂志社/1975 年
史记论文著/陈新雄　于大成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76 年
司马迁政治思想之研究/邓璞磊/台北市华冈出版社/1977 年
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戏剧性的一生与史记的世界/郑梁生/台北志文出版社/1977 年
白话史记/60 名教授合译/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 年
司马迁撰写史记才采用左传的研究/顾立三著/台北正中书局/1980 年
史记考证·秦汉中古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编/大陆杂志社/1981 年
史记论文选集/黄沛荣编/台北长安出版社/1982 年
史记述尚书研究/古国顺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司马迁与老庄思想/刘光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司马迁与其史学/周虎林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
史记政治人物述评/汪惠敏著/师大书苑公司/1991 年
史记研究粹编　一/张高评主编/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 年
史记研究粹编　二/张高评主编/复文图书出版社/1993 年
话说史记——历史兴衰胜负的症结/蔡信发/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
史记考索/朱东润/上海开明书店版,1948 年再版/1943 年
史记与战国策之关系/江润勋/香港大学中文会刊/1959 年
史记地名考/前开明书店编/太平书局/1962 年
司马迁思想研究/刘伟民著/香港中文大学/1964 年
司马迁研究/刘伟民/台湾国立编译馆/1975 年
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王恢/国立编译馆/1990 年

**国外:**

史记读本/田中庆太郎校订/文求堂发行/1930年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韩)朴宰雨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史记会注考证/(日)泷川龟太郎/1934年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全十五册/(日)水泽利忠/1955-1957年

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目录)/(日)池田四郎次郎著、男英雄校订增补/明德出版社/1978年

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日)武田泰淳著 李君奭译/彰化市专心企业出版社/1978年

司马迁 史记列传/(日)贝冢茂樹责任编集/中央公论社/1981年

新编史记东周年表/(日)平势隆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的动向/(日)池田英雄/明德出版社/1995年

# 二 论文

## (一)司马迁其人

**大陆:**

太史公系年考略/王国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排印《学术丛编》/1916年

太史公/袁丕钧/《尚志》第1卷第2号/1917年12月1日(民国六年十二月一日)

司马迁疑年之讨论/素癡/《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6月9日第126期

读史记对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之异议/萧鸣籁/《现代史学》/1933年第2期

太史公名位考/闻惕/《安雅月刊》/1935年第1期

太史公行年考/王国维/商务印书馆写印《观堂集林》/卷一一,1940年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李长之/《中国文学》/1卷1944年5月第2期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李长之/《国文月刊》/

报》/1984 年第 2 期
试谈《报任少卿书》与作者死之关系/久行/《河北师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袁传璋/《安徽史学》/1984 年第 3 期
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与《史记》成书的关系/朱其铠/《中国文学史二百四十题》/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年 3 月
司马迁“卒于武帝之后说”斠误/袁传璋/《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 2 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8 月
从王国维、郭沫若共认的“先汉纪录”考定司马迁父子的生年/王重九/《陕西师大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再谈《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问题/李伯勋/《青海社会科学》/1985 年第 5 期
司马迁评传/肖黎/《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 5 月
司马迁的时代及其悲剧/乜一鸣/《中国文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范振国/《河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
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倪昭敏/《贵州文史丛刊》/1986 年第 3 期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王云/《贵州文史丛刊》/1987 年第 3 期
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念(兼论李陵事件)/苏诚鉴/《贵州文史丛刊》/1987 年第 3 期
司马迁生年问题辨析(续完)/罗芳松/《成都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
司马迁生葬地新探/呼林贵/《人文杂志》/1987 年第 4 期
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冷冬/《史学集刊》/1989 年第 1 期
司马迁立身行事及其它/罗芳松/《成都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仆又佴之蚕室”的注释问题/李惠昌/《汕头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从“诵古文”、“南游”、“北涉”到“仕为郎中”——司马迁生年及其与当时儒

林关系的再探索 /苏诚鉴/《贵州文史丛刊》/1989 年第 3 期
司马迁的冤案和汉武帝的私心:兼与刘重来同志商榷/李申/《争鸣》/1991 年第 3 期
司马迁的理想人格、悲剧命运与先秦游士文化的关系/袁伯诚/《青岛师专学报》/1991 年第 3 期
汉代士的地位变化和司马迁的不遇心态/尚学锋/《文学遗产》/1991 年第 4 期
秦汉督责之术比较研究:兼谈李陵与司马迁的冤案/赵志远/《文史知识》/1992 年第 10 期
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个盲点: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刘洪生/《黄淮学刊》/1992 年第 1 期
从考古发现考证司马迁出生地/高增岳/《人文杂志》/1992 年第 4 期
"李陵之祸"及其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马玉容　蒋经魁/《驻马店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
《史记》成书年代及司马迁死因考/罗庚岭/《人文杂志》/1994 年第 1 期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和《史记》的断限、残缺问题/何世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自卑情结与悲剧意识:司马迁悲剧心理探幽/李建中/《唐都学刊》/1995 年第 4 期
司马迁后人今安在/李镜/《炎黄春秋》/1996 年第 10 期
从"黄老之学"到"小国寡民":再论司马迁的悲剧/田启霖/《哈尔滨师专学报》/1996 年第 1 期
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韩兆琦/《古典文学知识》/1996 年第 2 期
司马迁卒年及死因考释/赵德政/《渤海学刊》/1996 年第 3、4 期
司马迁真有侍妾随清娱吗? /程章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 年第 4 期
司马迁学术渊源谈——释"司马氏世主天官"/吴锐/《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孟祥才/《齐鲁学刊》/1999 年第 2 期

《杜周传》与"司马迁去世的时间"/叶小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赵生群/《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

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易平/《光明日报》/2000年4月28日

司马迁人格特征及其成因探析/史瑞玲/《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试论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周洪/《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

**港台:**

太史公行年考辨疑/施之勉/《东方杂志》/1944年第16期

太史公昭帝初年尚在考/施之勉/《大陆杂志》/1952年8月第5卷第3期

太史公行年考辨误/施之勉/《大陆杂志》/1953年9月第7卷第5期

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元年/施之勉/《大陆杂志》/1967年6月第34卷第11期

司马迁生年考/钱穆/《学术季刊》(台北)/1953年6月第4期

太史公行年订疑: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的年代/王保德/《台湾日报》/1970年10月22日第8版

太史公行年订疑:司马迁在其父迁居茂陵而后生/王保德/《台湾日报》/1970年11月3日第8版

太史公行年订疑:司马迁的公费式游学考察/王保德/《台湾日报》/1970年11月4日第8版

司马迁的性格与风格/徐文珊/《学园》/1972年12月第8卷第2期

**国外:**

司马迁之生年/(日)佐藤武敏/《三上博士颂寿纪念论集》/1979年

## (二)史记通论

### 1.总论

**大陆:**

《史记》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史地学报》/1923年第7期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王增恂/《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

《史记》旨趣新说/石荣伦/《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史记》的语言特点/何旭光/《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论《史记》兼容性/陈友冰/《学术界》/1994年第3期
论《战国策》对《史记》的影响/程远芬/《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读《太史公书》/章炳麟/《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3期
史记讲录/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1月
史记评议/韩兆琦/《史记名篇赏析·前言》/北京出版社/1990年8月
司马迁民族观批判/星汉　栾睿/《殷都学刊》/1993年第1期
读书随笔·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刘师培/《国粹学报》第44期(第4年第7号)/1908年8月16日
斥胡适对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诬蔑/麦若鹏/《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7日
略谈《史记》的体例与版本/卢中岳/《赣图通讯》/1982年第2期
试论《史记》的编次/田汉云/《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略谈《史记》的形成/孙正容/《历史知识》/1984年第2期
《史记》的研究/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群学社排印本)/1927年
论史记之宜读/齐树楷/《四存月刊》/1923年2月第18期
史记解诂/吴国泰/《居易簃丛书》本/1938年
《史记》谤书辨/周国伟/《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是什么/林伟群等/《古典文学常识百题》/岳麓书社/1983年2月
史记校/《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期至2期
司马迁的素封社会论/马非百/《力行月刊》/1940年第2-4期
“史记”的特色/朱子方/《文化先锋》/1946年8月第5卷第25期
史记发微/汤用彬/《国学丛刊》/1941年第4册
“史记”于众所习知之事皆弗论/程芸/《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
史记斠读/程金造/《学术季刊》/1946年第2期

《史记》的特质/阮芝生/《中国学报》(韩国)第29辑,1989年6月
我国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汪篯/《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读太史公书/太炎先生遗著/《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3期
史记发疑/齐燕铭/《中法大学月刊》/1934年第5期
史记决疑/李奎耀/《清华学报》/1927年第1期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梁任公/《史地学报》/1923年第7期
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的辩证艺术之一/何旭光 李毅凌/《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史记》妙笔三例/张中行/《读书》/1992年第11期
《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张新科/《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
太史公书讲记/陈柱/《学术世界》/1935年第6期
《史记》讲录/钱基博讲 吴忠匡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高亨/《文史哲》/1956年第2期

**港台:**

左传、史记、战国策之史学价值与文学特性举隅/陈瑞芬/《艺术学报》/1995年6月第56卷
Ssu - ma Ch'ien and His Monumental Work the Shih Chi: Part One: Ssu - ma Ch'ien - Father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张其昀/Chinese Culture/1982年6月第23卷第2期
Ssu - ma Ch'ien and His Monumental Work the Shih Chi: Part Two: The Shih Chi -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张其昀/Chinese Culture/1982年9月第23卷第3期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下篇)/钱穆/《文艺复兴》/1971年第2卷第17期
史记研究自序/卫聚贤/《国立中山大学说文周刊》/第4卷第39期
论《史记》(上)(下)/徐复观/《大陆杂志》/1977年11至12月第55卷第5、6期
史记賸义补/郑良树/《书目季刊》/1978年12月第12卷第3期

史记导读/田博元/《国学导读丛论》/1979 年第 4 期
司马迁的历史艺术/李美月/《史苑》/1969 年 6 月第 12 卷
司马迁、档案、《史记》/布英/《实践》/1982 年第 12 卷
史记导论/潘重规/《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0 年 9 月第 2 卷
司马迁的世界/Burton Watson 著 张端穗译/《东海中文学报》/1983 年 6 月第 4 卷
司马迁及其成就/尤信雄/《国文学报》/1983 年 6 月第 12 卷
史记剩义/郑良树/《大陆杂志》/1976 年第 53 卷第 2 期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钱穆/《文艺复兴》/1971 年第 2 卷第 16 期
史记商兑录/李笠/《历史研究》/1959 年第 7 卷
论《史记》非谤书/王健民/《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3 年 12 月第 28 期
史记探微/张性如/《台南师专季刊》/1969 年 12 月第 2 期
史记札馀/李笠/《复旦学报》/1958 年第 1 期
司马迁的世界(下)/华生著 张端穗译/《东海中文学报》
司马迁与《史记》/(韩)洪淳昶/《邱大学报》/1958 年第 32 号
补充:
史记选/王伯祥选注/《中国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山西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班编)/1980 年
史部要籍解题·三·史记/王树民/中华书局版/1981 年 11 月
《史记》与汉代文化/丁琴海/中国人民大学/1989 年
《史记》探索/陈曦/北京师范大学/2000 年
四史评论/陈垣/北平辅仁大学讲义

## 2. 版本、体例、文献

**大陆:**

史记体例之商榷/胡朴安/《国学丛刊》/1923 年第 4 期
《史记》体制义例简论/张大可/《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6 期
从史记本书考史记本原/罗根泽/《北平图书馆月刊》/1930 年第 2 期
《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十

篇》(中华书局)/1936 年
史记引尚书文考例/张均才/《金陵学报》/1936 年第 2 期
史记体制探源/逸民/《学艺》/1937 年 7 月第 16 卷第 3 期
北宋政和修补景祐本史记集解跋/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十/1941 年
《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李长之/《东方杂志》/1944 年 11 月第 40 卷第 22 期
史记版本考/李巹/《中国学报》/1945 年第 3 期
《太史公书》体裁探源/王利器/《申报》/1948 年 1 月 31 日
"史记"体例溯源/程金造/《燕京学报》/1949 年第 37 期
《史记》体例的分析/葛一之/《文汇报》/1961 年 8 月 27 日
史记版本书录/何慰华　江绣瑛/《图书馆学刊》/1976 年 6 月第 3 期
《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孙钦善/《文献》/1980 年第 2 期
司马迁的旅游活动与《史记》/王希浚/《旅游报》/1981 年 11 月 29 日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陈子谦/《厦门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关于《史记》的断限问题/王重九/《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
司马迁译古文/邬国义/《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档案学家/李学彬/《档案学通讯》/1982 年增刊
《史记》对《战国策》的吸收与改造/毕熙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史记》断限考略/张大可/《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史记》体例研究/张大可　肖黎/《秦汉史论丛》/1983 年第 2 期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赵生群/《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关于《史记》的著述目的、断限及其他/吴汝煜/《徐州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施丁/《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史记》的体例与"通变"/杨燕起/《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赵生群/《人文杂志》/1984 年第 2 期

史迁是否见过淮南王书的疑问/雪克/《杭州大学学报》/1984 年增刊
史记的体例/朱其岂/《中国文学史二百四十题》/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年 3 月
通史而兼纪传体的史记的出现/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6 月
太史公书凡例考论/《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5 年 9 月
浅谈司马迁档案史料的收集和运用/李仁春/《成都档案》/1985 年第 1 期
《史记》篇目的编排及其他——读《史记》札记之一/萧绍基/《滁州师专学报》/1985 年第 2 期
司马迁见过《司马相如集》吗/金德建/《人文杂志》/1986 年第 1 期
《史记》和"舒愤懑"/王成军 王炎/《人物》/1986 年第 5 期
"史记"版本考索/易孟醇/《出版工作》/1987 年第 1 -3 期
《史记》版本述要/安平秋/《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 年第 1 期
现在的《史记》是司马迁的原书吗/顾颉刚/《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 年第 1 期
司马迁父子撰史断限计划管见/朱枝富/《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徐克文/《辽宁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司马迁写《史记》终讫考/施丁/《汉中师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史记》结构新探/孙绿江/《兰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李瑞河/《九江师专学报》/1991 年第 3 期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何世华/《渭南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
《史记》亡缺与续补考/赵生群/《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 年第 2 期
《史记》体例平议(上)/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史记》引书异文释例/吴泽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4 期
《史记》体例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关系/赵英/《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 年

第4期
《史记》体例平议(下)/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史记》混淆了《康诰》与《康王之诰》/徐万发 任穆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陈桐生/《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试论《史记》创作的文化氛围/李衡眉 王仁厚/《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司马迁《史记》终讫再考/施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俞绵超/《安徽商专学报》/1995年第2期
司马迁所见书新考/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汉家改制与《史记》/陈桐生/《唐都学刊》/1997年第1期
司马迁编纂《史记》过程中对图书文献的考订和运用/李志清 许秀臣/《大学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3期
《史记》为何从黄帝开始/高强/《华夏文化》/1999年第3期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马雅琴/《渭南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史记》记事断限与成书关系考/袭新江/《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1期
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取舍原则/江文贵/《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浅议司马迁治史动机的嬗变/陈颖/《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史记体例之商榷/胡韬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国学周刊》/第21期
《史记》六朝残本考/张玉春/《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9期
古写本史记残卷跋/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罗氏排印本)

**补充:**

《史记》春秋史料探源/钱律进/南开大学/1998年
《史记》版本研究/张玉春/北京大学/1999年

**港台：**

史记版本考/赵澄/《史学年报》/1931 年第 3 期
史记纪事终讫年限考(上)/潘重规/《大陆杂志》/1959 年 4 月第 18 卷第 7 期
史记纪事终讫年限考(下)/潘重规/《大陆杂志》/1959 年 4 月第 18 卷第 8 期
北宋刊《史记》五种版本辨正(上)——宋元明清史记版本考证之一/赵铁寒/《大陆杂志》/1961 年第 2 期
北宋刊《史记》五种版本辨正(下)/赵铁寒/《大陆杂志》/1961 年第 3 期
《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海屏/《学宗》/1963 年 3 月第 4 卷第 1 期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逯耀东/《大学生活》/1963 年 6 月第 147 期
史记引述左传考/梁荣茂/《国科会报告》/1965 年
太史公书采用战国策考/欧缬芳/《国科会报告》/1966 年
司马迁著作史记的环境、目的和条件/秋煦/《幼狮月刊》/1970 年 12 月第 32 卷第 6 期
《史记》真赝本鉴别的方法/姜渭水/《中华日报》/1971 年 9 月 28 日第 9 版
史记一百三十篇篇目的研究/刘伟民/《联合书院学报》/1972 年第 10 卷
史记篇例考述/李崇远/《中华学苑》/1972 年第 9 卷
试为司马迁史记撰拟史例/徐文珊/《史学集刊》/1973 年 5 月第 5 期
史记终止时期及伪篇考/高葆光/《东海学报》/1973 年 7 月第 14 期
史记体系结构整合论/侯立朝/《国魂》/1974 年 7 月第 344 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及其评价/林宗霖/《艺文志》/1975 年 12 月第 123 期
史记引尚书文考释/黄圣雄/《台中师专学报》/1978 年 4 月第 7 期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黄俊郎/《汉学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12 月初版
史记迻录尚书原文例/古国顺/《孔孟月刊》/1985 年 3 月第 23 卷第 7 期总第 271 期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今"之开端/逯耀东/《(台湾辅仁大学)辅仁历史学报》/1993 年 12 月第 5 期

"巫蛊之祸"与《史记》的成书/逯耀东/《(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4年12月第18期

**国外:**

影宋百衲本《史记》考/(日)武内义雄/《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

3. 思想

**大陆:**

驳班史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说/陈作霖/《可园文存卷二》/1909年刊本
《史记》先黄老后六经辨/傅以辉/《国学(杂志)》/1915年4月14日第1期
司马迁崇尚道家说/程金造/《师大月刊》《文学院专号》/1932年1月第2期
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章炳麟/《国学论衡》/1934年第4期
史记本于公羊考/张鹏一/《陕西教育月刊》/1937年7月至8月第3卷第3至4期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为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年而作/侯外庐/《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殷孟伦/《文史哲》/1955年第12期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任继愈/《新建设》/1956年第6号
论司马迁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杨增华/《甘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肖黎/《北方论丛》/1983年第5期
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的非马列主义倾向/施锡才/《文史哲》/1965年第4期
略论司马迁《史记》道表法里的政治倾向性/张志岳/《哈尔滨师专学报》/1975年第3期
司马迁世界观初探/陆永品/《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7月第3辑
司马迁的世界观与儒、道、法的关系/周满江/《广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关于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些浅见/郭双成/《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赖长扬/《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4期
《史记》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庄维石/《语文教学》/1980年第2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读《史记》札记/汤贵仁/《泰安师专学报》/1980年第3期
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张维华/《文史哲》/1980年第5期
"《史记》谤书说"驳议/张振珮 张新民/《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史记》与公羊学/吴汝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徐宗文/《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司马迁尊奉黄老论/张家顺/《中州学刊》/1982年第5期
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张大可/《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杨燕起/《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
浅谈司马迁的哲学观和历史观:略说司马迁的基本思想观点之一/何旭光/《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论司马迁与儒、道、法之关系/肖黎/《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吴忠匡/《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
从《史记》看司马迁与诸家之关系/肖黎/《古籍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浅谈司马迁的政治观和经济观(略说司马迁的基本思想观点之二)/何旭光/《温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谈司马迁的思想/方步和/《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2期
司马迁思想中的"天"与"变"/肖黎/《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
论司马迁的"天道""天命"观/李泉/《聊城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
司马迁对"天命"的矛盾认识/潘啸龙/《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道家在司马迁历史观中的地位与作用/胡大雷/《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司马迁不是无神论者/李泉/《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史记》所体现的系统观/徐兴海/《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

司马迁思想组合结构论——兼与袁伯诚同志商榷司马迁漫游之目的和意义/魏耕原　张新科/《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唐都学刊》/1988年第2期
关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几个问题/王明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蔡尚思/《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的苦闷: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公式论略/霍松林　尚永亮/《人才杂志》/1989年第1期
以道家为根基,以儒家为主干——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系/朱枝富/《汉中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简析司马迁“原始察终”的思想方法/曾海龙/《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略谈《史记》的史论/曾庆鉴/《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1987年
略说司马迁的哲学观和历史观/何旭华/《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司马迁社会思想与时代的选择/陈其泰/《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史记》与汉代经学/刘家和/《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司马迁社会思想与时代的选择(续)/陈其泰/《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史记》“人民性”悖论/谢贵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天人之际”与司马迁的德教思想/王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8期
也谈《史记》的人民性:与谢贵安同志商榷/亡羊/《荆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司马迁与春秋公举学/赖长扬/《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4期
司马迁儒学思想透视/孔令兴/《唐都学刊》/1993年第3期
司马迁论《易》/沈延发/《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
论司马迁与《史记》的人民性/丁宏宣/《图书馆论坛》/1993年第5期
司马迁笔下最早的儒学史/高焕祥/《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史记》尊孔重儒论/方铭/《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4 年第 1－2 期
司马迁儒道互补说/刘兴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司马迁思想的时代特色/许凌云/《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略论司马谈的思想转变/杜玉俭/《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师专学报》/1994 年第 3 期
司马迁与阴阳家/王明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人文杂志》/1994 年第 4 期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陈桐生/《山西师大学报》/1994 年第 4 期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李颖科/《唐都学刊》/1994 年第 6 期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周文玖/《唐都学刊》/1994 年第 6 期
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朱本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3 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的灵魂与终极目的/佘树声/《陕西史志》/1995 年第 5 期
《史记》的志怪和司马迁的思想/袁达/《南都学坛》/1995 年第 5 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的灵魂与终极目的（续）/佘树声/《陕西史志》/1996 年第 1 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的灵魂与终极目的（续完）/佘树声/《陕西史志》/1996 年第 2 期
从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谈起/陈桐生/《著作权》/1996 年第 2 期
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郎宝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从董仲舒到司马迁——关于哲学与历史的思考/杨润平/《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 年第 3、4 期
《史记》人民性思想探微/王云林/《淮阴师专学报》/1997 年第 1 期
再论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郎宝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析论——兼论司马谈对其思想的影响/汪涌豪/《殷都学刊》/1997年第2期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王保顶/《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
略论《史记》通变观与《易》道的关系/叶文举/《安徽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陈桐生/《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
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王绍东/《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研究司马迁思想体系的几个问题/曲哲 观潮/《渭南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儒学思想/许凌云/《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司马迁自然哲学与《史记》社会哲学/霍有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张涛/《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司马迁的德治思想与宗教神学/张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儒的崇高:谈司马迁对儒家理论的实践及其意义/蓝家勇/《语言研究》/1999年增刊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张强/《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汪高鑫/《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王萍/《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
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陈业新/《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司马迁的平民意识/胡大海/《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
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朱钟颐 罗炳良/《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论司马迁《史记》的人民性/林志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补充：**

《史记》与秦汉道家思想/郭必恒/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

**港台：**

论司马迁的思想(上)(下)/文崇一/《大陆杂志》/1962年第10、11期

太史公左氏春秋义述/刘正浩/《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1962年第6卷

史记所显示的群经大义/杜松柏/《孔孟月刊》/1970年9月第9卷第1期

司马迁古文尚书义释例/李固龙/《孔孟月刊》/1971年5月第9卷第9期

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阮芝生/《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12月初版

史记引述左传“君子曰”及易筮之研究/何三本/《台东师专学报》/1976年4月第4卷

司马迁之尚书学/洪安全/《政治大学学报》/1976年5月第33卷

史记易学观/胡自逢/《中国学术年刊》/1978年2月第10卷

司马迁与黄老——纪念沈故刚伯先生八十六诞辰演讲稿/王叔岷/《文史哲学报》/第30期,1981年12月

司马迁的思想/张端穗　郎亚玲合译/《东海中文学报》/1981年4月第2期

试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阮芝生/《史学评论》/1981年第6期

司马迁对儒、道二家思想之融合/汪惠敏/《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982年6月第11卷

太史公思想研究：“儒”之真义与太史公在思想史上地位之探讨/谢大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84年6月第28卷

司马迁的心灵世界/鲍国顺/《孔孟月刊》/1992年11月第31卷第3期

司马迁继《春秋》辨/戴晋新/《辅仁历史学报》/1993年12月第5期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儒道思想/庞海珊/《辅大中研所学刊》/1995年9月第5期

**补充：**

太史公尚书说/谭固贤/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66年

4. 史学

**大陆:**

司马迁史学的研究/施章/《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12月第2卷第5期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蒯伯赞/《中山文化季刊》/1945年6月第2卷第1期

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杨翼骧/《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7年第59期

司马迁父子的史学创义及其子学评述/侯外庐等撰/《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上册/1950年排印本

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卢南乔/《文史哲》/1955年第11期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齐思和/《光明日报》/1956年1月9日《史学》版

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吴寿祺/《安徽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

论司马迁"史记"编纂的创造性和思想性/卢南乔/《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施锡才/《辽宁日报》/1963年3月18-19日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陈可青/《新建设》/1965年第1期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杨向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施丁/《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4期

司马迁写当代史/施丁/《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凌轩/《光明日报》/1980年10月28日

司马迁对专制主义弊病的批评/陈可青/《光明日报》/1980年12月9日

太史公笔法小议/资中筠/《光明日报》/1980年4月16日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陈可青/《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施丁/《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司马迁的历史观——兼与杨向奎等同志商榷/陆永品/《河北师院学报》/

1980 年第 3 期
论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赖长扬/《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6 期
司马迁历史学形成的基础和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赖长扬/《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
从《史记》的人物评论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王天顺/《南开史学》/1982 年第 1 期
论司马迁的世界观/张兆鸾/《宁夏教育学院学刊》/1982 年第 1 期
互文见义——司马迁史笔札记/宋怀仁/《北方论丛》/1982 年第 4 期
略论司马迁对明君贤臣和循吏的肯定和颂歌/郭双成/《郑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说“成一家之言”/白寿彝/《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史记》书法释例/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司马迁的进步史学/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 月
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起源和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刘付靖/《研究生学报》/1985 年第 3 期
从《春秋》看《史记》在古史学上的发展/程金造/《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略论“太史公笔法”/田林/《大连师专学报》/1986 年第 1 期
论司马迁对汉匈关系之见解及对武帝征伐匈奴之异议/徐景重/《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曲笔/杨成孚/《南开学报》/1986 年第 3 期
“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谈司马迁之识/徐传武/《临沂师专学报》/1986 年第 4 期
论司马迁的史学道德/李克非/《道德与文明》/1986 年第 5 期
《史记》在历史观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其反映的时代精神/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4 月

论司马迁的民族平等观/黄君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历史研究方法浅探/鲁尧贤/《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司马迁视陈涉为汉之发端/封五昌/《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现)/王天顺/《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孙绿江/《河北学刊》/1987年第3期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刘重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试论司马迁《史记》著录人物的标准/滕建明/《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论《史记》东渐扶桑的史学影响/覃启勋/《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

《史记》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哲理性和时代性/吴怀祺/《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浅谈司马迁以儒学为主体的历史观/晁广斌/《固原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论《史记》当代帝王形象及司马迁当代帝王观/杨佐义/《长春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易平/《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施丁/《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司马迁“承敝易变”之思想/赵荣织/《西部学坛》(新疆昌吉师专、昌吉教育学院)/1988年第4期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施丁/《文史哲》/1988年第6期

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瞿林东/《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汉初的稳定发展与司马迁的进步史观/牧野/《成都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正统化倾向/赵英/《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常德忠/《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历史研究法初探/杨振之 邓前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史记》的全方位研究法/杨振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论司马迁的正统观/陈广武/《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简评汉武帝黩武之弊:兼及司马迁的良史之笔/王世英/《东疆学刊》/1992年第3期
司马迁“治道”的探求/王积秀/《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史记》“曲笔”刍论/李运宁/《学术论坛》/1992年第5期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及其实录精神/孙海洋/《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石荣伦/《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周文玖/《齐鲁学刊》/1993年第3期
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毛曦/《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司马迁历史哲学论纲/段建海/《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浅谈《史记》中下层社会历史人物/赵佳丽/《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从《史记》的成就看史学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夏祖恩/《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5年第3期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 易平/《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巫史子文化的承传与重构:司马迁历史哲学论纲/俞樟华 梅新林/《东方丛刊》/1996年第1期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王成军/《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
试论司马迁历史观的出发点/崔康柱/《临沂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史记》书法六题/阎晓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
试论司马迁的零年观/温储基/《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史记》“详变略渐”的历史研究法/杨振之/《文史杂志》/1996年第4期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陈其泰/《史学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史记》与司马迁的历史观/王双怀/《华夏文化》/1997 年第 1 期
司马迁的史学原理本于《六经》/朱本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西方新史学观照中的《史记》范型/朱玉麒/《南京师大学报》/1997 年第 1 期
司马迁史学理论的构成:兼驳班氏父子的妄评/朱本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在受命、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王培华/《晋阳学刊》/1997 年第 3 期
试论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池万兴/《武警技术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
《史记》的历史分期研究法/杨振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浅探司马迁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作用和贡献/阎崇东/《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 年第 3 期
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黄留珠/《人文杂志》/1997 年第 3 期
试谈司马迁世界观的进步性/孙丽华/《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
战国秦汉之际的审微思潮与司马迁的见盛观衰/陈桐生/《东方论坛》/1997 年第 4 期
司马迁的“大禹治河”论/袁建平/《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司马迁不没汉武帝功绩/高继宗/《天人古今》/1997 年第 6 期
司马迁笔下的汉代帝王/蔡孝莲/《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
求真　扬善　显美　贬恶——浅析《史记》度事论人的标准/尹迪/《天人古今》/1998 年第 3 期
《史记》“寓主意于客位”的历史方法/杨振之/《文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史记》在史学上划时代意义的再认识/邓鸿光/《史学月刊》/1998 年第 4 期
论司马迁的帝王史观/张强/《江苏社会科学》/1998 年第 5 期
司马迁的古代历制研究/郭书兰/《郑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司马迁的史学创新意识/汪高鑫/《淮北煤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论《史记》中人情世态描绘的特点及其成因/江文贵/《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从对神话传说的处理看司马迁的神话思想/赵沛霖/《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略论《史记》历史观的二律背反现象/贾行宪/《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论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评说/梁向明 黄树宏/《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民族精神历久弥坚:试论司马迁《史记》"大一统"的历史观/李莲/《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论《史记》对世态炎凉的感叹与批判/赵乐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刘国民/《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浅谈司马迁融民族史传于大一统的历史观/谢军鹏/《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略论司马迁笔下的礼乐制度/徐日辉/《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
司马迁的历史变化观及其对人物的评价/陈可青/《北京师院》/1980年第2期
司马迁有没有突破传统民族思想/陈桐生/《湖北大学学报》
司马迁论汉初民族政策的得失/俞樟华/《湖北大学学报》

**港台:**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刘咏娴/《建设》/1972年9月第21卷第4期
司马迁的史学力避神话/徐文珊/《学园》/1973年4月第8卷第6期
史记及两汉书作者对边疆民族文化之认识/阎沁恒/《史学集刊》/1975年5

月第7期
司马迁论史家的任务/阎沁恒/《中央日报》/1978年5月2日第11版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生态学试论/汪荣祖/《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卷
司马迁对匈奴问题处理的限制/逯耀东/《辅仁历史学报》/1994年12月第6期

5. 文学语言

**大陆:**

史记中之人物描写/周乐山/《文学周报》/1928年第7卷
史记文学之研究/袁菖/《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5月第1卷第13期
史记中的歌谣和谚语/韩一鹰/《培正校刊》/1933年9月第2卷第1期
史记中的神话传说和初民遗俗材料索引/韩一鹰/广州《培正中学图书馆馆刊》/1934年10月第1卷第12期
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李长之/《苦雾集》/1943年第2辑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李长之/《文潮月刊》/第1卷第5、6期,1946年9月、10月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李长之/《国文月刊》/1947年1月第51期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李长之/《国文月刊》/1947年2月第52期
史记句调之分析/李长之/《国文月刊》/1947年6月第56期
伟大的现实主义散文作家司马迁/任访秋/《长江文艺》/1954年第8卷
谈史记人物的刻画/梁道西/《上海新民报晚刊》/1955年11月12日
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殷孟伦/《文史哲》/1956年第2期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李长之/《语文学习》/1956年第8卷
司马迁的讽刺语言的艺术/卫仲璠/《文史哲》/1958年第2卷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1-4)/冯其庸/《新闻战线》/1959年第7-10期
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吴汝煜/《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2日
《史记》译语/谢再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司马迁刻画人物的笔力/杨子才/《新闻战线》/1980年第2期

论《史记》的民间文学色彩/杨迅/《江西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王克韶/《延边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姚凤林/《北方论丛》/1980 年第 5 期
试论《史记》中传记散文的文史分野/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1981 年第 2 期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赵逵夫/《社会科学》(甘肃)/1981 年第 4 期
《史记》的语言研究/朱星/《河北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司马迁的审美观/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白静生/《河北师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史汉语言风格的比较——试析关于项羽、刘邦和苏武的描述/杨松浦/《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朱东润/《人物》/1983 年第 1 期
《史记》的对比艺术/田汉云/《教学与进修》/1983 年第 2 期
谈《史记》文笔之“疏”/李世萼/《杭州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史记》与汉语成语/黄懋颐/《南京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徐宗文/《辽宁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潘啸龙/《安徽师大学报》/1983 年第 3 期
《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韩兆琦/《北方论丛》/1983 年第 4 期
司马迁传记文释例/季镇淮/《名作欣赏》/1983 年第 5 期
《史记》中的“异称”/何文才/《读写月报》(南昌)/1984 年 12 月 15 日
《史记》和汉乐府中的市井人物形象/侯文正/《城市文学》/1984 年第 10 期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讽喻文学理论的影响/袁伯诚/《固原师专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史记》中歌谣谚语的思想性及其艺术价值/康学伟/《松辽学刊》/1984 年第 2 期
《史记》的语言艺术/李孝堂/《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史记》“互见法”初探/刘松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

论司马迁之"爱奇"/刘振东/《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关于《史记》名词性补语的句式特点及其影响/韩陈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李少雍/《中国文学史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

司马迁史传文学理论初探/韩湖初/《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传记文学写真实的典范——《史记》/郭定功/《青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性格化语言的创造和奠基——《史记》人物语言成就谈/洁芒/《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我国史传文学历史渊源初探——史记研究之一/叶幼明/《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增刊

爱奇——司马迁的审美原则和趣味/叶幼明/《求索》/1986年第1期

《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几个特点/徐传武/《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司马迁对训诂学的贡献/蔡正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史记》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影响刍议/赵清永/《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

《史记》修辞辨证篇——也谈《史记》修辞之偶疏/罗守坤/《修辞学习》/1986年第5期

《史记》中的骚影/吴汝煜/《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史记》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关于成分省略/吴静容/《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司马迁对我国古典传记的贡献及其影响/李世萼/《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及其叙事特点/季镇淮/《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论《史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整一性/刘玉平 周晓琳/《南充师院学报》/

1987年第2期
《史记》中的俗谚和民谣/鲁金波/《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3期
滑稽入传,深得语言三昧:《史记》语言艺术举隅/安达/《修辞学习》/1987年第4期
司马迁的文学理论/蒋凡/《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司马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
略论《史记》的艺术成就/顾建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史记》通假举隅/王海根/《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与文艺批评/张啸虎/《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司马迁的传记理论与传记创作的关系/李世萼/《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
小议《史记》与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断裂/王增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史记》艺术略论/杨树增/《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
司马迁的妇女观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陈兰村/《汉中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司马迁的实录观与中国文学的自觉/袁伯诚/《青岛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略谈《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彭会资　田野/《社会科学探索》/1990年第4期
司马迁文学观概述/王景山/《承德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从异文看《史记》的语言锤炼/蔡镜浩/《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论《史记》叙事增饰的形成/施伟忠/《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
《史记》"爱奇"说考述/曹东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4期
《史记》对《战国策》人物形象塑造的继承和发展/布莉华/《承德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史记》动词直接作定语考察/章新传/《上饶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论《史记》女性形象描写/马宝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略论《史记》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贡献/舍之/《社会科学家》/1992 年第 3 期
《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朱正义/《渭南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史记》中的数词/张家英/《绥化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史记》对比手法初探/王中德/《广东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
《史记》倒文二例/龚维英/《社会科学辑刊》/1993 年第 4 期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侯忠义/《北京大学学报》/1993 年第 5 期
《史记》中同义词运用的特点/方文一/《文史知识》/1993 年第 9 期
《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可永雪/《语文学刊》/1994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史评杂文/刘洪仁/《求索》/1994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杨松岐/《殷都学刊》/1994 年第 2 期
司马迁与《诗经》研究述议/蒋立甫/《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第 3 期
再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杨松岐/《殷都学刊》/1994 年第 4 期
《史记》峻洁论/俞樟华/《浙江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一)/张新科/《渭南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
论司马迁《史记》对民谚的运用/周洪/《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史记》中的外来词/王东明/《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二)/张新科/《渭南师专学报》/1995 年第 3 期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的价值取向/陈友冰/《安徽师大学报》/1995 年第 3 期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三)/张新科/《渭南师专学报》/1995 年第 4 期
司马迁的“互见法”及其渊源/孙以昭/《安徽大学学报》/1995 年第 6 期
《史记》的训诂价值与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刘阳仁/《怀化师专学报》/1996 年第 1 期
西汉大赋与《史记》: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芽/杨波/《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7 期

太史公"爱奇"试说/赵素蓉/《成都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司马迁运用民间传闻的内在心象/张宗奇/《宁夏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对《史记》人物哭相的文学分析/解国旺/《殷都学刊》/1997 年第 4 期
《史记》中的语义复现形式/王卯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年第 5 期
试论司马迁的创作主张/李贤民/《山东师大学报》/1997 年增刊
《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及其意义/可永雪/《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 年第 3 期
父权制社会里的女性写作——浅析司马迁的女性观/刘胜利/《天人古今》/1998 年第 3 期
《史记》修辞艺术探微(上)/江秀玲/《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
《史记》修辞艺术探微(下)/江秀玲/《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
《史记》双音词比较/汤亚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
试论《史记》引用谣谚的艺术/鲍广丽/《江淮论坛》/1998 年第 4 期
悲壮——《史记》之美/魏良弢/《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文史兼备,成一家言:《史记》中看司马迁的写人标准/左宏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
《史记》的"荒诞艺术"及其他/余锦雄/《民族艺术》/1999 年第 1 期
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范卫平/《青海师专学报》/1999 年第 1 期
东周列国戏之于《史记》叙事意向的转移/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史记》表现的亲情/司全胜/《语文学刊》/1999 年第 2 期
司马迁文学理论观的重新检视/郭德茂/《珠海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诗》学批评观/陈桐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
略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辩证手法/孙玉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史记》人物出场艺术/杨鉴生/《宁德师专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对生与死的历史追索——从历史的司马迁到艺术的司马迁/袁伯诚/《固原师专学报》/1999 年第 5 期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刘兴林/《武汉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

《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兼说“刘向明不歌而颂”为以引者所引为引者语/力之/《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 年第 1 期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可永雪/《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司马迁反暴主题构思浅探/任刚/《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史记》中具礼制价值的“死”义词语语用选择的复杂性及其原因/池昌海/《修辞学习》/2000 年第 1 期

从伯嚭透视《史记》撰述先秦人物的特征/陈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史记》“省略例”补议/大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浅谈传记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兼议《史记》中的虚构表现/许兵/《天人古今》/2000 年第 2 期

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的延伸论略/范卫平/《青海师专学报》/2000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俞樟华/《学术论坛》/2000 年第 2 期

论《史记》人物传记写作的几点失误/王关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论《史记》生命主题的表现形式/田劲松/《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史记》语言艺术新探/朱江玮/《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史记》悲剧艺术新论/陈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试谈《史记》的几种句法结构/宋绍年/《语言学论丛》(十)/商务印书馆

千年的回响——论《史记》游侠精神在元杂剧中的嬗变/杨秋红 孙吉民/《学术论坛》

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汉语构词法发展史探

索之一/祝敏彻/《语言学论丛》(八)/商务印书馆
《史记》中的人称代词/漆权/《语言学论丛》(十二)/商务印书馆

**补充:**

《史记》总括副词研究/何劲和/华南师范大学/1986年
史记艺术研究/杨树增/东北师范大学/1988年
《史记》与汉大赋比较论/朋星/山东大学/1989年
《史记》的感情色彩及其渊源探索/宿宏丽/东北师范大学/1992年
《史记》范围副词/白银亮/南开大学/1993年
《史记》语法研究三题/潘建珊/南京大学/1996年5月
《史记》同义词研究/池昌海/浙江大学/1999年

**港台:**

《史记》中的人称代词/漆权/《语言学论丛》(十二)/商务印书馆
太史公的写作艺术(上)(下)/王平陵/《大学生活》/1956年第6、7期
司马迁的文章风格与人格/林佐瀚/《香港中文学会会刊(年刊)》/1959年
史记微词举例/陈炳良/《香港大学史学年刊》/1960年第1期
史记中的俚语/刘光义/《大陆杂志》/1960年第3期
司马迁散文风格探源/郑康民/《建设》/1967年8月第16卷第3期
谈《史记》的写作技术/绿天/《文坛》/1967年9月1日
史记虚字集释/刘德汉/《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68年
史记称代词与虚词研究/许璧/《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74年
史记语法研究——变换律语法初探/曾志雄/《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74年
司马迁的艺术观/闻从亦/《文学思潮》/1980年第6期
《史记》的心理描写(待续)/刘德萱/《语文》/1986年第3期
《史记》的心理描写(续完)/刘德萱/《语文》/1986年第4期
史记的思想性及其艺术特色/田博元/《人文学报》/1995年10月第19卷
《史记》叙事的暧昧性及其效用/刘汉初/辅仁中文系所"两汉文学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

**国外:**

司马迁与发愤著书说——不遇与文学/(日)青木五郎/《中国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7年

《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日)牛岛德次著;周生亚译/《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韩)朴晟镇/《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6. 经济

**大陆:**

司马迁经济思想阐微/王肇鼎/《厦大国学周刊》/1927年1月第1卷第2期

太史公划分的西汉地理区域/林一岁/《世界文化》/1941年5月第2卷第5期

略论司马迁的若干重要经济观点/李守庸/《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司马迁的货币思想/刘枫/《上海金融研究》/1981年第2期

司马迁经济思想初探/刘含若/《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

在抑商政策下司马迁的重商思想/刘枫/《社会科学》(上海)/1981年第6期

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陈可青/《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司马迁的致富三说及现实意义/黄宝兴/《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司马迁的商业人才论/张南/《历史知识》/1983年第2期

司马迁工商经济思想论述/周怀宇/《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司马迁的商业经营管理论/王炜中/《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肖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王明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4年第4集

司马迁"法自然"的经济思想/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司马迁的产业结构思想简析/杨文良/《农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韩兆琦/《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
司马迁经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鹿谞慧/《宝鸡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论司马迁的地理思想/徐日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试论司马迁以“三不朽”说为中心的价值观/黎雪/《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司马迁的重商思想/白涛/《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月4日第2版
论《史记》中的经济史传/朱枝富/《盐城教育学院院刊》/1988年第3、4期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与现代经济理论/王同勋 唐任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司马迁反抑商思想初探/何清谷/《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
司马迁经济思想初探/何清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异趣/朱枝富/《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石世奇/《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朱枝富/《渭南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略论司马迁经济地理思想形成的因素/徐象平/《经济地理》/1990年第1期
司马迁的富民思想初探/魏晓明/《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伦理观/王明信/《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汪锡鹏/《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义利关系/任冠文/《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崔凡芝/《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司马迁经济思想评价管见/牛鸿恩/《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论司马迁的经济地理思想/朱枝富/《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史记》货币思想浅探/范泽宇等/《北京金融》/1994年第7期
用孙子兵法探讨经商规律的历史先驱:司马迁/张守军/《商业研究》/1995年

第2期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及其局限性/崔凡芝/《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
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简论/曹桂华　李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司马迁的贫富观/丁毅华/《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
《史记》中的商人形象/何德乾/《凉山文学》/1996年第2、3期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观和干支论/温储基/《经济经纬》/1996年第2期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丁祖豪/《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司马迁的义利观/王福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善因论:司马迁的经济理论/刘社建/《唐都学刊》/1996年第3期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地理观/官悠房/《昆明社科》/1996年第6期
中国古代的商业道德/徐少锦/《哲学动态》/1997年第10期
司马迁"羞贫贱"源于孔子论/杜玉俭/《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李彤/《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司马迁对中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贡献/王鑫义/《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司马迁"善因"主张/吴青/《天人古今》/1997年第5期
司马迁的善因论述评/陈世陔/《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
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吴宏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商业谋略/王兆祥/《商业文化》/1998年第4期
司马迁的区域经济学与当代西部经济发展/韦苇/《渭南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史念海/《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1 期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2 期

《史记》与秦汉豪富/施丁/《史学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古代早期的市场理论/罗群/《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略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张连举/《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浅谈司马迁的货币经济思想/王祥/《贵州农村金融》/2000 年第 4 期

**补充：**

《史记》中农业问题研究/惠富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0 年

**港台：**

西汉商人势力的消长与政府对策——史汉综读之一/何汉威/《新亚书院历史学系系刊》/1972 年 9 月第 2 卷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分析及其历史意义/沈育贵等/《史绎》/1981 年第 17 期

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年

7. 比较

**大陆：**

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傅振伦/《新晨报副刊》/1928 年 11 月 26 至 29 日

史汉论略/姚尹忠/《民钟季刊》/1935 年第 1 期

比较孔子与司马迁之天文学/吴贯因/《平潮》/1943 年 2 月第 1 卷第 1 期

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刘节/《说文月刊》/1944 年 11 月第 5 卷第 1、2 期合刊

司马谈和司马迁/翦伯赞　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中华书局版)/1962 年 8 月

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

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人民日报》/1964 年 1 月 23 日第 5 版

《史》《汉》异同/黄云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6－1980年

《史记》、《战国策》对照举例 /可永雪/《语文学习》/1980年第4期

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施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用敌人头颅作饮器——司马迁、希罗多德同记亚欧北方民族一习俗/日知/《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7期

马班异同三论/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秦汉五大经济思想家(李斯、晁错、桑弘羊、司马迁、王符)/吴澄华/《黄石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桑弘羊与司马迁/苏诚鉴/《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史记》与《离骚》/关四平/《绥化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莫砺锋/《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史记》与《战国策》比较研究/金家兴/《孝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及其他/吉联抗/《音乐艺术》/1984年第3期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吴汝煜/《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

《史记》与《汉书》中西汉早期人物传记的比较/小驹/《湖南师大学报增刊》/1985年

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施丁/《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宋超/《学术月刊》/1985年第10期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上)——《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货殖传》 /布衣/《江苏商专学刊》/1985年第1期

《左传》、《史记》介宾短语位置的比较/何乐士/《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略论班固、司马迁评价屈原、屈赋的分异/刘晓梅/《盐城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布衣/《商业经济》/1985年第3期
孔子·屈原·司马迁——他们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优秀传统/杨天堂/《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
司马迁、贾谊、晁错经济思想异同论/鹿谞慧/《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下)/布衣/《江苏商专学刊》/1986年第1期
《三国演义》和《史记》/曲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胡凤章/《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论《史记》与《通鉴》的会通思想/徐景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李少雍/《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史记》与《楚汉春秋》/李真瑜/《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刘清河/《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夏祖恩/《福建论坛》/1987年第6期
《史》《汉》繁简之我见:司马迁、班固语言风格比较/万国政/《承德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比较/胡显中/《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史记》《汉书》熟语歌谣的引用及比较/黄荣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史记》与《周易》经传/田汉云/《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司马迁与桑纮羊经济思想比较/朱枝富/《吉林师院学报》/1988年第3-4期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朱永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从《史》、《汉》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宋超/《求索》/1988年第5期
司马迁和苏格拉底的比较研究——个体生存史及其哲学分析/党艺峰/《渭

南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劣固而优迁”,抑“甲班而乙马”?——试论《史记》、《汉书》的差异/邓韶玉/《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刘振东/《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袁定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异曲同工,相映生辉——《水浒》和《史记》漫议/钱茂竹/《绍兴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扆晓红/《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刘一龙/《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谢贵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司马迁、王安石经济思想比较/叶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屈原司马迁异同散论/伏俊连/《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
略论《史记》与《汉书》艺术形式之异同/罗昌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吕氏春秋》与《史记》关联探微/洁芒/《语文学刊》/1991年第2期
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陈其泰/《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比较研究/杨俊明/《求索》/1991年第6期
两个晋文公——从《左传》与《史记》的人物差异说开/姚德彬/《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史记》人物传与方志人物传辩白/赵宏逵/《云南方志》/1992年第3期
《史记》、《历史》比较论/晓明/《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
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阎崇东/《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论《史记》《汉书》写梦/傅正谷/《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
司马迁与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的比较/吴云　董志广/《齐鲁学刊》/1993年

《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何乐士/《湖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道之史”与“史之道”——《春秋》、《史记》比较论/陈国灿/《天人古今》/1997 年第 4 期

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雷戈/《西北师大学报》/1997 年第 4 期

《红楼梦》与《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变奏/梅新林 俞樟华/《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5 期

《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申友良/《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

汉代文章两司马/韩兆琦/《光明日报》/1999 年 5 月 3 日第 12 版

《春秋》、《史记》比较论——兼谈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前期的两种形态/陈国灿/《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

深情叹荣辱 巨笔绘兴衰——司马迁、班固对家族史的研究/李炳海/《社会科学辑刊》/1999 年第 3 期

《赵氏孤儿》与《史记·赵世家》/李金海/《戏友》/1999 年第 6 期

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刘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创作道路之比较/周明侠/《理论与创作》/2000 年第 1 期

孔子、董仲舒、司马迁三人论富评议/周桂钿/《福建论坛》/2000 年第 3 期

**港台:**

司马迁和司马光/夏智/《联合报》/1954 年 10 月 18 日第 6 版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us)之比较/邓嗣禹/《史语所集刊》/第 28 卷上,1956 年

司马迁与塞万提斯/包遵彭/《西班牙文集》/1965 年第 9 卷

谈太史公父子思想异处:从“六家要旨”与“孟荀列传”谈起/翟子清/《文风》/1969 年 1 月第 14 卷

《资治通鉴》与《史记》的比较/梁一成/《国语日报》/1970 年 7 月 25 日

山西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光)/王止峻/《山西文献》/1974 年 1 月第 3 期

**补充：**



8. 其他

**大陆：**

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叶幼明/《求索》/1986年第1期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拓者司马迁/王克奇/《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谈司马迁的非“中和”的审美观/何人可/《延边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创造性思维/朱政惠/《百科知识》/1987年第9期
论《史记》的文化主体意识/骆仁静/《荆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略论司马迁在屈原研究上的奠基作用/戴志钧/《人文杂志》/1988年第1期
论司马迁文化思想的特点/张大同/《东岳论丛》/1988年第2期
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黄新亚/《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浅论《史记》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影响/韩俶举/《贵图学刊》/1989年第2期
司马迁教育思想初探/刘新科/《汉中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论司马迁的爱奇/王明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司马迁的军事思想/薛国安/《军事历史》/1990年第4期
从司马迁笔下的执法者看他的法治思想/孙文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司马迁的民俗观/陈华文/《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司马迁笔下的社会心态:换一个角度看《史记》写人的成就/洁芒/《语文学刊》/1991年第1期
《史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蔡仲德/《交响》/1992年第3期
《史记》与政书体/马雅琴/《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段化民 段建海/《渭南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史记》中的传奇心态略论/卢敦基/《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
司马迁批判精神探源/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司马迁创造性思维考辨/段建海 毛曦/《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可永雪/《天人古今》/1994年第1期
司马迁在妇女问题上的一家之言/《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史记》思维方式初探/刘忠世/《东方论坛》/1994年第4期

历史的审美与超越：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马强/《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
《史记》里的方志学体系 /村夫/《图书馆论丛》/1996年第1期
司马迁对法的认识/徐万发/《唐都学刊》/1996年第1期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王成军/《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司马迁的人文观/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史记》文化形态研究系列之一/马强/《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司马迁的社会心理研究述略/党大恩/《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司马迁的礼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华友根/《学术月刊》/1996年第8期
司马迁刑德理论发微/陈国生/《天府新论》/1997年第1期
《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续) /马强　田昕/《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司马迁的社会整合与社会组织思想/李禹阶/《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司马迁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贡献 /徐蜀/《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4期
司马迁的王权制约思想/张天恩/《天人古今》/1998年第5期
司马迁编纂《史记》的史料来源考辨/吕芸芳/《岱宗学刊》/2000年第2期
司马迁在档案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马绪超/《文献工作研究》/2000年第3期
论《史记》中的智者人格/陈洪波/《培训与研究》/2000年第4期
司马迁的礼学思想/李小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4章

**港台：**

“史记”律书释文/冒广生/《学海》/1944年第2期
司马迁的教育思想/刘伟民/《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万有图书公司/1970年
史记“神秘数字”探微/黄沛荣/《孔孟月刊》/1982年11月第21卷第3期
史记：“太史公书”中国大人文文化生命之向往与追求/张肇祺/《哲学与文

化》/1983年6月第10卷第6期总109期

由史记看中国社会:司马迁史记社会学的研究/徐文珊/《中华文化月刊》/1984年11月第61期

孟子与史记之关系/王基伦/《孔孟月刊》/1985年11月第24卷第3期总第279期

## (三)史记分论

**大陆:**

谈《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读《史记》札记之二/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山西实业报》第1年第14期/1912年9月21日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商学协会杂志》第1期/1913年7月1日

史记不立孝惠本纪论/上海函授国文专科学校正科生王毓藻/《国学杂志》第1期/1915年4月14日

司马迁作史记不立惠帝本纪论/上海函授国文专科学校正科生徐羡于/《国学杂志》第2期/1915年5月14日

太史公自序窃比春秋义证/李国珍/《大中华》/1915年第7期

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浦薛凤/《清华周刊》第84期/1916年10月25日

太史公传儒林不传文苑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学生邹桐初/《学生杂志》第4卷第5号/1917年5月5日

史记本纪起于黄帝说/朱希祖/《史地丛刊》(师范大学)/1920年第1期

读蒙恬传/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二/1923年

《货殖传》中之经济学说及其时代背景/潘文安/《学灯》/1924年2月

补史记箕子世家/郑鹤声/《史地学报》/1925年第8期

读封禅书/马其昶/《民彝》/第5期,1927年

史记屈原传考证/L. M./《益世报国学周刊》/1929年8月19日

中国中古时代经济思想之一斑(《史记·货殖列传》)/徐慎修/《采社》/1930年10月第5期

《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高步瀛/《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3月第1卷第1期
史记老子列传辩证/徐震/《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6期
禹贡职方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物产比较表/孙媛贞/《禹贡》/1934年第3期
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杨向奎/《禹贡半月刊》/1935年3月第3卷第1期
“史记货殖列传新诠”地理正误/贺次君/《禹贡半月刊》/1935年4月第3卷第4期
史记六国表订误/杜呈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5年8月22日第12期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本》/中华书局/1936年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十篇》/中华书局/1936年
史记立儒林、游侠、货殖三传论/李澍/《学术世界》/第12期,1936年
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的读法/子水/《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第68期
史汉西域记传互勘/赵惠人/《禹贡》/1936年第8-9期
读孟荀列传后的稽疑及提要/罔周/《中法大学月刊》/1937年第4期
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叶百丰/《群雅》/1940年6月第1集第3卷
司马迁“货殖列传”与班固“货殖列传”之研究/林升平/《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4-15期
“史记”三种秦世系年代之比较(附表)/易铁夫/《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期
“史记”伪篇考(附太史公考)/德峻/《新东方》(上海)/1940年第1期
史记燕世家书后/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1941年
《论六家要旨》与《汉、志、诸子略》之比观/聘之/《北华月刊》/1941年11月第2卷第1期
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程芸/《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
重订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季月清/《中日文化》/1943年第1期

"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李长之/《东方杂志》/1944 年第 22 期
论前四史合传附传之例/俞静安/《国学月刊》/1945 年第 1 卷第 1 期
"史记"之根本认识(认识史记列传之本质)/檠铭/《文艺与生活》/1946 年 12 月第 3 卷第 2 期
太史公书亡篇考/余嘉锡/《辅仁学志》/1947 年第 1－2 期
史记六国表和对近人考订之商榷/岑仲勉/《中山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
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殷孟伦/《文史哲》/1956 年第 6 期
《尧典》中的四仲中星和《史记·天官书》的东官苍龙是怎样错排的/岑仲勉/《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
读书偶记(《史记》的《律书》、《历书》本为一书)/丁一/《山西师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
史记律书的乐律学/王杏东/《山东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
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史念海/《人文杂志》/1958 年第 2 期
浅论史记屈原列传的缺点/王铁魂/《文风》/1962 年 5 月第 1 卷第 11－13 期
《陈涉世家》的历史意义和它的写法/倪复贤/《青海师院论文集》/1962 年第 2 期
三代世表/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年 2 月
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任继愈/《文汇报》/1963 年 5 月 30 日
司马迁"歌颂"陈涉起义吗?/唐赞功/《人民日报》/1964 年 4 月 26 日
试对史记游侠列传中几个主要人物进行阶级分析/李庆善/《史学月刊》/1964 年第 11 期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有人民性吗?/唐赞功/《文史哲》/1965 年第 5 期
读司马迁的《孙膑传》/何法周/《开封师院学报》/1977 年第 3 期
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祖德/《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1978 年 12 月第 1 期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王气中/《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晁福林/《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守法不阿意"——谈《史记·张释之》传/周勤高/《文汇报》/1979年3月16日

司马迁写《陈涉世家》是想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吗/君奭/《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史记·西南夷传》概说/方国瑜/《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具有天命论色彩吗/高振铎/《北方论丛》/1979年第4期

司马迁赞扬过陈涉起义吗/宋之琳/《承德教师进修学院函授通讯》/1979年第7期

《史记·大宛列传》中的"秦人"到底指什么人——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点意见/莫任南/《湖南省历史学会论文集》/湖南省历史学会编辑出版/1980年

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合——谈司马迁对陈胜、项羽、刘邦形象的塑造/吴汝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史记·陈涉世家》的若干问题辨析(一)/晁福林/《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论六家要旨》是大胆的议论吗/王小孚/《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史记·陈涉世家》的若干问题辨析(二)/晁福林/《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再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高振铎同志商榷/晁福林/《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

怎样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代的"刺客"和《史记·刺客列传》/廖渊泉/《史论》福建省社联历史学会厦门分会/1981年第1辑

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王毓瑚/《抖擞》/1981年3月第43卷

司马迁为什么给陈涉作“世家”?/朱来常/《安徽日报》/1981年5月6日
读《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谢天佑 王家范/《秦汉史论丛》(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何炬/《湘潭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古代的商业利润率——《史记·货殖列传》两段话的分析/吴慧/《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司马迁为陈涉立传就是为汉刘邦立传吗/周国瑞/《安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
司马迁与《陈涉世家》/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正确处理感情与史实的关系——读《史记》二列传/吕锡生/《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我国最早的文学家评传——读《屈原列传》/申建中/《语言文学》/1981年第5期
《史记》为什么把陈涉列为世家/史介/《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俞樟华/《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举而笑之”不是对待历史的郑重态度——读《史记·六国年表》序/彭久松/《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史记》中“僰中”、“西僰”考辨/祁庆富/《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西汉物价/陈连庆/《中国古代史经济论丛》/1983年
《史记·货殖列传》篇首训读异议/苏诚鉴 周怀宇/《文献》/1983年第15期
以《春秋左传》证《史记·陈杞世家》之误(杞桓公称子称伯及辈次考)/骆宾基/《龙岩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
鲁季孙氏之始祖“公子友”非“文姜所生”说——以《史记·鲁世家》证《左传》载“史墨”之言为误/骆宾基/《青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史记·项羽本纪》名词用为动词之初探/孔宪辉/《广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史记》楚表校误/何浩/《求索》/1983年第2期
《离骚》写作时间初探——兼谈《史记·屈原列传》的有关问题/颜新宇/《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司马迁著黄帝于《史记》之首我见/朱枝富/《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4期
史记研究: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程金造/《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
简评史记论赞/张大可/《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论六家之要旨》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肖黎/《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1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司马迁经济学观点和经济政策思想)/崔凡芝/《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王开富/《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司马迁的经济地理分区——《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冯志毅/《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
《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卢文晖/《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郭预衡/《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史记·孙武传》的思想和文学特色/赵成文/《沈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4期
论《史记·货殖列传》体例归属/彭久松/《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
试说《史记》的本纪义例并及史公立项纪的求实意义/谭绪赞/《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4年第5集
《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吴忠匡//1985年12月
试析《将相表》之结构与倒书/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灵活多彩的"太史公曰"/白静生/《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史记·平准书》大观及若干经济史实/刘泽根/《当代经济科学》/1985年第1期

《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列传》及其注文新校札记/佘胜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发展生产,促进流通是治国之道、致富之本——读《史记·货殖列传》/马增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2期

从《史记·赵世家》到《赵氏孤儿》看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改的艺术/史淳良/《孝感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论《史记》及《屈原列传》的史源——兼及"屈原否定论"/吕培成/《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浅评李广利、代宛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读《史记·大宛列传》/赵汝清/《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张大可/《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司马迁为什么将陈涉列入"世家"/叶幼明/《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廉颇蔺相如列传》论赞别解/周本述/《苏州教育学院学刊》/1986年第2期

对《货殖列传》经营管理思想的探讨/刘厚福 鹿谞慧/《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赵季/《文献》/1986年第3期

西汉前期的商业经济区和全国性统一市场——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邓福秋/《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史记》中本纪、世家体例/许志刚/《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

《太史公自序》有研究《史记》的钥匙/高振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8期

《屈原列传》叙述矛盾之刍议/叶晨晖/《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史记》"天官书"和"历书"新注释例/陈久金/《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史记》所载韩非《说难》发覆/朱榴明/《人文杂志》/1987 年第 2 期
《史记》太初以后记事考/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第 2 期
汉武帝见过《史记》叙汉事六表说/黄仕忠/《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7 年第 3 期
论司马迁的货殖学说——读《史记・货殖列传》/刘及佳/《湖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5 期
《史记》律、历本为一书说/姚奠中/《文献》/1988 年第 1 辑
"伯夷"通考——兼释《楚辞》《史记》有关疑义/周建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史记・殷本纪》补正/程有为/《商丘师专学报》/1988 年第 1 期
李斯《谏逐客书》写作年代考辨/叶晨晖/《南京师大学报》/1988 年第 3 期
试评聂政与荆轲:读《聂政刺韩傀》、《荆轲刺秦王》/曲世积/《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史记》中《日者》、《龟策》两传读后/姚奠中/《文献》/1988 年第 3 期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智喜君/《鞍山师专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关于《史记・五帝本纪》的歧解与纠葛/龚维英/《光明日报》/1989 年 12 月 20 日
《史记》老庄申韩合传浅议/王尊/《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地理思想初探/徐象平/《经济地理》/1989 年第 1 期
《史记・货殖列传》散论/吕锡生/《天津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
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与《史记・天官书》/呼林贵/《人文杂志》/1989 年第 2 期
著盛衰大指"见史公学识"——《史记・十表序述论》/陈以鉴/《盐城师专学报》/1989 年第 3 期
《左传》"日南至"辨正——兼谈《史记・历术甲子篇》冬至的推算/张立楷/《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司马迁介绍稷下先生为什么不提宋钘尹文/赵蔚芝/《管子学刊》/1989 年第

4 期
《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段话被误解/赵光贤/《文史知识》/1990 年第 10 期
《史记·屈原列传》关于《离骚》作期矛盾记述的考辨/刘生良/《求索》/1990 年第 1 期
《外戚世家》——司马迁自觉追求戏剧性的 1 例显证/雨山/《语文学刊》/1990 年第 1 期
浅论老子的“道”——兼谈《史记》老庄申韩合传/伏俊连/《甘肃理论学刊》/1990 年第 2 期
《史记·封禅书》发微/汪锡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谈《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营术/王文治/《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0 年第 5 期
《史记》燕事抉误/常征/《北京社会科学》/1991 年第 1 期
论殷人世系与血缘关系的演变——兼评甲骨金文与《史记·殷本纪》所载殷人世系的异同/陈云鸾/《海南师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谁误解了《太史公自序》一段话? /王英志/《文史知识》/1991 年第 3 期
读《史记·乐毅列传》,析《报燕惠王书》及其他/史礼心/《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易经》与《史记·大宛列传》/陈国强/《福建论坛》/1991 年第 5 期
《史记》太初以后记事特征初探/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92 年第 1 期
中西早期交往行为的特性考察——《史记·大宛列传》评说/张三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谁误解了《太史公自序》一段话? /赵光贤/《文史知识》/1992 年第 2 期
试论文史公目录学: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刘洪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史表之作不始于司马迁/朱端强/《云南师范大学哲社会科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司马迁经济思想蠡测——《史记·平准书·货值列传》学习札记/彭清深/《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太史公笔下的佞幸群:读《史记·佞幸列传》及其它/龚杏根/《宜春师专学报》/1992年第6期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牛天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太史公曰"不等于史评论赞/金荣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史记》"本纪"正义/周斌/《衡阳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对汉代"酷吏"的评论应一分为二——读《史记》关于"酷吏"的记载/谢季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史记·日者列传》小察/张铭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6月第1期
司马迁与论赞体/田启霖/《哈尔滨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史记·项羽本纪》与《太平记》中的楚汉故事/邱岭/《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董树岩 戴念祖 罗琳/《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耐人思索的史传文学:读《史记·淮阴侯列传》/艾岩/《名作欣赏》/1994年第2期
《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张丛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史记·货殖列传》/陶礼天/《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史记》中的"庄周传"难以信据/龚维英/《绥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之二/邓福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局限性/孙海洋等/《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谢季祥/《福建论坛》/1994年第6期
《滑稽列传》中的优孟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赖汉屏/《明道文艺》/1995年11月第236卷

略论《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商业观/尹晓晨/《经济论坛》/1995年第1期
《史记》不为惠帝立纪/崔曙庭/《天人古今》/1995年第1期
《史记·封禅书》的几个理论问题/陈桐生/《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周先民/《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司马迁的《天官书》/侯云龙/《松辽学刊》/1995年第4期
《史记》八书序列新论/徐日辉/《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 /刘操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孙亚利 马琪山/《庆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的形象浅论/梦河纳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史记·天官书》献疑(一)/马玉山/《黄淮学刊》/1996年第2期
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多兼营农业小考: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耕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司马迁《儒林列传》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简论/吴莺莺/《合肥教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史记》八《书》题名新探/徐日辉/《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史记·屈原列传》疑误新证/郭瑞林/《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史记·天官书》献疑(二)/马玉山/《黄淮学刊》/1997年第1期
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思想抉微/刘蕴之/《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史记《甲子篇》历谱及其与《太初历》的比较/刘次沅/《陕西天文台台刊》/1997年第20卷
老子之辨与《史记》的书法体例及附传——《史记·老子传》析疑之一(未完待续)/李贤臣/《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老子之辨与《史记》的书法体例及附传(续)——《史记·老子传》析疑之一/

《史记》西周世系辨误/王恩田/《文史哲》/1999 年第 1 期
神龙见首不见尾——读《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叶嘉莹/《天津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邓翠萍/《江汉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今本《史记·老子传》质疑/孙以楷/《中国哲学史》/1999 年第 2 期
《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李埏/《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史记》有关龙首渠的记载得到确证/赵天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2 期
读《史记·五帝本纪》札记/郭维森/《南京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李埏/《历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易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司马迁怎样为韩信鸣冤? /韩凌　曹海/《江汉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史记》的总纲:《史记·五帝本纪》散论/刘阳仁/《怀化师专学报》/1999 年第 6 期
在历史的理性和感性之间——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看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叶瑞斯/《晋东南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史记》"八书"阐述宇宙发生/吴象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1 期
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读《史记·伯夷列传》/虚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司马迁何以为张仪、苏秦分别立传/程慰/《徽州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张晏《史记》十篇亡佚说质疑/王于飞/《东南学术》/2000 年第 2 期
《史记》附传探微/李贤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杰思一字无空设　高论千古横青云——试论司马迁史论之贡献/杨松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史记》纪传的人物选择与缺漏/杨旭升/《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补充:**



**港台:**

"泗上十二诸侯考"引言/吴静安/《中央日报》/1946年12月31日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有省不省"解/黄宝实/《大陆杂志》/1953年4月第6卷第8期
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曲颖生/《大陆杂志》/1954年第12期
由《史记·货殖列传》谈到战国至秦汉的经济社会/罗球庆/《新亚校刊》/1954年第4卷
史记列传以伯夷居首之原因/曲颖生/《大陆杂志》/1956年第3期
史记伯夷列传称"其传曰"考释/潘重规/《大陆杂志》/1959年3月第18卷第5期
史记索骥——项羽本纪(上)(下)/王恢/《人生》/1962年第2、3期
孔子世家商榷序/杨胤宗/《人生》/1963年9月第26卷第8期
读日本古写本史记殷本纪残卷/陈宗敏/《大陆杂志》/1963年第2期
史记殷本纪及其他记录中所载殷商时代的史事/屈万里/《文史哲学报》/1965年第14卷
记日本古钞史记殷本纪/王叔岷/《书目季刊》/1968年6月第2卷第3期
《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施之勉/《大陆杂志》/1970年10月第41卷第7期
史记楚世家研究/张寿平/《国科会报告》/1971年
由国语中吴语越语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得失/陈炎泉/《中国语文学报》/1972年3月第5卷
《萧相国世家》"钱三"、"钱五"诸家注商榷/马先醒/《简牍学报》/1974年6月第1期
释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倒书例/施之勉/《大陆杂志》/1976年第52卷第2期
史记五帝本纪尚书义考征/卓秀岩/《成大学报·人文篇》/1977年5月第12卷
管晏列传析评兼探司马迁的意识和修辞——古文新探/黄庆萱/《中央日报》/1977年8月2-4日第10版
史记刺客游侠列传与唐传奇侠的比较/王瑞雪/《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系

刊》/1978 年 5 月第 4 期
揭开《史记》今上本纪(《武帝本纪》)阙失之谜/金惠/《东方杂志》/1979 年 11 月第 13 卷第 5 期
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理论之研究——悼念屈万里先生/陈万鼐/《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79 年 11 月第 24 卷
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阮芝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9 年 12 月第 6 期
从史记世家引用左传看司马迁之史法/顾立三/《思与言》/1979 年 5 月第 17 卷第 1 期
《史记》十二本纪、十表题解/吴福助/《东海学报》/1979 年 6 月第 20 期
史记五帝本纪辑证/康全诚/《文化学院中文研究所》/1979 年第 172 卷
史记“太史公曰”探析/李毓善/《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981 年 6 月第 10 卷
伯夷列传发微/阮芝生/《(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85 年 12 月第 34 期
太史公自序中与壶遂一段对话的诠释/林聪舜/《中国学术年刊》/1989 年 2 月第 10 卷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考异(上)/潘光晟/《中华学苑》/1989 年 6 月第 39 卷
《史记》《礼书》概说/钟宗宪/《国立编译馆馆刊》/1991 年 6 月第 20 卷第 1 期
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两个层次——《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上)/逯耀东/《(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2 年 12 月第 17 期
论《史记》的两篇合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洪淑苓/《国立编译馆馆刊》/1992 年 6 月第 21 卷第 1 期
史传论赞与《史记》太史公曰/逯耀东/《新史学》/1992 年 6 月第 3 卷第 2 期
《史记》附传析论/蔡信发/《孔孟月刊》/1992 年 7 月第 30 卷第 11 期
论《史记》对吕不韦之评价/周行之/《成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篇》/1993 年 11 月第 28 卷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解读/王令樾/《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993 年 6

月第22卷
伯夷列传与前赤壁赋机轴略同论/王令樾/《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994年6月第23卷
由《酷吏列传》看太史公的吏治观/郭慧娟/《辅大中研所学刊》/1995年9月第5期
《史记》列传及其与本纪的关系/逯耀东/《(台湾大学)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11月第20期
史记序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退处士而进奸雄"辨/沈秋桂/《成功大学学报》(人文篇)/民国七十一年三月第17卷
论司马迁述慎到、申不害及韩非之学/王叔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七十二年三月第54本
史记老子本传的补述/袁金书/《江苏文献》/民国七十四年五月第34、35卷
史记老子本传的补述(续完)/袁金书/《江苏文献》/民国七十四年八月第35卷
仁以取予——读"管锥篇"论"货殖列传"/张明亮/《中国文化》/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第1期
史记合传析论/蔡信发/《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民国八十年六月第9期

**国外:**

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日)武内义雄撰　王古鲁译/《金陵学报》/1931年11月第1卷第2期
史记货殖列传论稿/(日)穗积文雄著　高福怡译/《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7年1月21日、2月4日、2月18日、2月25日、4月22日第121-125期、第133期
汉代盐铁专卖的实态(续):围绕《史记·平准书》记载诸问题/(日)藤井宏著　刘森译/《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史记秦本纪之史料的性格/(日)藤田胜久/《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1991年第24号
史记苏秦·张仪列传之史料的考察——战国中期之合纵连横/(日)藤田胜

久/《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1992 年第 25 号
《史记·傅靳蒯成列传》研究/(日)町田三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史记楚世家之史料的考察/(日)藤田胜久/《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1993 年第 26 号
始皇帝和秦王朝的兴亡:《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历史观/(日)藤田胜久著 黄雪美译/《秦文化论丛》/1998 年 7 月第 6 期
麟止与获麟——《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一考察/(日)伊藤德男/《历史》/第 29 辑

**补充:**

《史记列传》人物形象研究/(韩)李成信/梨花女大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4 年 2 月

## (四)史记三家注

**大陆:**

史记三家注所引书目/程金造/《师大月刊》/1935 年第 18 期
史记三家注引用书目考略叙例/钱永之/《国专月刊》/1935 年第 5 期
史记索隐引书考略/程金造/《北平图书馆馆刊》/1936 年第 1-3 期
关于史记三家注的关系问题——读程金造先生"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黄烈/《文史哲》/1958 年第 4 期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程金造/《新建设》/1960 年第 2 期
《史记》"三家注"的语法注释浅析/黄宝生/《汉中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史记》"三家注"的考证注释浅析/黄宝生/《汉中师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史记》"三家注"的词义注释浅析/黄宝生/《辽宁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史记》三家注考索/吴忠匡/《北方论丛》/1984 年第 4 期
《史记》"三家注"的校勘注释浅析/黄宝生/《汉中师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
略论《〈史记〉三家注》体例/赵英翘/《北方论丛》/1986 年第 4 期
司马贞《史记索隐》声类/游尚功/《贵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史记正义》反切考/龙异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袁传璋/《大陆杂志》/1995 年 4 月第 90 卷第 4 期
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重纽/游尚功/《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
《史记》三家注通假琐议/方心棣/《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
《史记》及三家注引语断限指误 /陈冠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 年第 6 期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考/田大宪/《人文杂志》/1996 年第 4 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史记集解》考/张玉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 年第 4－5 期
《史记》三家注“直音”作用浅析/冯玉涛/《宁夏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史记〉集解》记载的一次古代剖腹产/万小南/《中国科技史料》/1999 年第 1 期
《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考/张玉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1 期
明廖铠刊《史记》三家注本版本系统考/张玉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6 期
明南北国子监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考/张玉春/《文献》/2000 年第 3 期

**港台:**

史记三家注所引地理书考/徐文珊/《禹贡》/1935 年 12 月第 4 卷第 7 期
史记索隐正义因袭孔颖达经疏考/王树元/《国科会报告》/1966 年
《史记》三家注之开合现象/黄坤尧/《中国语文》/1994 年第 2 期

## (五)其他

**大陆:**

司马迁述周易义/刘师培/《国粹学报》/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2 月第 2 号
太史公不为逸民立传论/陈作霖/《可园文存》卷三/1909 年

史记述尧典考/刘师培/《国粹学报》/1909年第12期
斥误据史记以攻左传之妄/冉崇烈/《国学丛刊》/1923年12月第4期
史记版本及参考书/王重民/《国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4期
司马迁指为韩非所作而未可遽信者/容肇祖/《国立中山大学语学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年11月22日第1集第4期
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靳德峻/《师大国学丛刊》/1930年第1期
南宋诸史监本存佚考/赵万里/《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年1月1日
太史公解/朱希祖/《制言》/1936年第15期
司马迁所见周官即今王制考/金德建/(中华文史精刊)《古籍丛考》/中华书局　上海书店/1941年版、1986年12月重印
"史记"源流及其体例/黄文弼/《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
司马谈的《诸子要旨》及其用意/侯外庐/《大学月刊》/1947年7月第6卷第2期
司马谈作史/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太史公书(史记)名考/陈直/《文史哲》/1956年第6期
太史公书名考/陈直/《文史哲》/1956年第6期
史记的名称/陈毖涛/《湖南师院学报》/1957年第2期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陈直/《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仑)、罗暹等族由云南迁去/岑仲勉/《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史记》中的云南——云南与内地早期的交往/尤中/《云南日报》/1962年3月12日
《史记》中的云南——汉初与关中和巴蜀之间经济交流/尤中/《云南日报》/1962年3月15日
《史记》中的云南——云南各部落的生产生活状况/尤中/《云南日报》/1962年3月9日
《史记》《汉书》所记各地经济情况/翦伯赞　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

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 年 8 月
漫谈四川的离堆——兼谈《史记》所载李冰凿离堆的所在地/许肇鼎/《四川大学学报》/1977 年第 3 期
宋刊本《史记》记略/杨鉴/《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1 期
《史记》等所记载的古朝鲜的位置/郑世浩/《朝鲜历史译丛》/1980 年第 1 期
司马迁是"揭露""鞭挞"和"批判"吕后吗? /李永先/《辽宁师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
从《史记》管窥汉代以前的新疆/贾应逸/《新疆日报》/1981 年 12 月 19 日
《史记》"尝逋亡人"为两类适民说/王毓铨/《文史》/中华书局/1981 年 9 月第 12 辑
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陈修纮/《中山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李少雍/《西北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司马谈作史补证/赖长扬/《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
百衲本《史记》考略/杨鉴/《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司马谈作史考/赵生群/《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班马"试解/施景西/《文学遗产》/1983 年第 1 期
《史记》秦纪年考辨/黄海德/《南充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衣三道,时为大"——读《艺概》对《史记》的评述/宋嗣廉/《吉林师范学院》/1983 年第 2 期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玉贵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史记研究:骊山刑徒辨析/胡留元/《人文杂志》/1983 年第 4 期
《史记》是用刀刻写成的吗/冯秉文/《百科知识》/1983 年第 5 期
一朵独具异彩的小花——浅谈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赵乃增/《文学论集》/1984 年 4 月第 7 辑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程金造/《人文杂志》/1984 年第 1 期
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关于《史记》原名问题/王重九/《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试论“明《易》道”在《史记》研究中的意义/李叔毅/《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史记》在日本/覃启勋/《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到《史记》/张新科/《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太史公为官名新证/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司马迁《史记》自注别述/赵英翘/《汉中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
溯源《史记》别开生面——读韩愈的三篇文章/李立朴/《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1988年增刊)目录/《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
《周易》对司马迁、班固史学的影响初探/林晓平/《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赵光贤/《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史记》古今对译述例/吴泽顺/1989年第2期
《太平御览》所引《史记》考/李裕民/《太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王宇信/《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史记》古注疑义二题/孙香兰/《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李文/《镇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释“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司马迁叙述孔子与齐景公间的关系/金德建/《管子学刊》/1990年第5期
唐代奠定《史记》研究的坚实基础/李德元/《通化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美即崇高: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对美的认识 /张胡森/《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邵胜定/《上海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浪漫与忧患的变奏:《离骚》《史记》文学精神论略/孙秋克/《昆明师专学

报》/1992 年第 1 期

论《史记》对《水浒传》的影响/俞樟华/《浙江师大学报》/1992 年第 1 期

《史记》与云南民族史研究/刘春/《史学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司马迁与韩城民俗/党丕经/三秦出版社/1993 年

《诗经》和《史记》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叶岗/《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周易》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

从《史记》本证论庄蹻非“楚庄王苗裔”和“楚国将军”/马曜/《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历代对《史记》评价之初探/陆崇泰等/《长白译丛》/1993 年第 6 期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陈松青/《娄底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

谈杜甫“似司马迁”:兼谈史迁良史“识”“德”修养里的诗家情质/王友怀/《人文杂志》/1994 年第 2 期

简说《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俞樟华/《语文学刊》/1994 年第 2 期

论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杜泽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 年第 4 期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宋嗣廉/《渭南师专学报》/1994 年第 4 期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李贤臣/《河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论《史记》汉初“三杰”形象的典型意义/陈兰村　张金菊/《浙江社会科学》/1995 年第 2 期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念白等/《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 年第 2 期

郭沫若与《史记》/周九香/《郭沫若学刊》/1995 年第 2 期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宋嗣廉/《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3 期

西周共和前诸侯年纪追溯:为纪念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四十年而作/李仲操/《文博》/1995 年第 4 期

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张子侠/《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浙江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鲁迅论司马迁/段国超/《渭南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史记》中辩士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贾俊侠/《唐都学刊》/1996年第2期
略论鲁迅对《史记》的评述/钱茂竹/《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司马迁笔下的西汉疆域/高泳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4期
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黄麟雏/《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汉书》"多用"与"剽窃"《史记》说辨正/朱钟颐　罗炳良/《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俞樟华/《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俞樟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5期
《史记》注、疏、译述略/马临漪　蒋经魁/《天中学刊》/1997年第1期
《史记》中的体育活动/张琴　晓杲/《体育文史》/1997年第1期
漫议《史记》与修志/周永光/《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
孔子、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传承及启示/张小平/《安徽史学》/1997年第2期
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一)/张大可　郑之洪/《渭南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二)/张大可　郑之洪/《渭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郑樵评《史记》之我见/蒋保平/《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史记》标题新论/赵生群/《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桐城"义法"源于《史记》/张文飞/《天人古今》/1997年第6期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三)/张大可　郑之洪/《渭南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立八十周年纪念)
秦简《编年记》与《史记》/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港台:**

太史公考释/钱穆/《学术季刊》/1953 年 6 月第 1 卷第 4 期
司马迁《报任安书》/童寿/《大陆杂志》/1953 年第 4 期
史记战国之部辨正/曲颖生/《大陆杂志》/1954 年第 12 期
圣哲画像记论《史记》失当/唐允/《台湾新生报》/1959 年 10 月 9 日第 8 版
史记之名当起班叔皮父子考/施之勉/《大陆杂志》/1960 年 3 月第 20 卷第 6 期
司马迁"报任安书"的问题/魏子云/《联合报》/1962 年 6 月 13 日 - 14 日第 14 版
也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年代问题/王保德/《联合报》/1962 年 6 月 29 日第 14 版
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陈振兴/《新潮》/1964 年 1 月第 29 卷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试探/黄文吉/《东吴中文系刊》/1966 年 6 月第 3 卷
史记名称探源/王叔岷/《新潮》/1967 年 12 月第 16 卷
司马迁报任安书斠诂/丁介民/《大陆杂志》/1967 年 8 月第 35 卷第 4 期
从《史记》《汉书》中看古匈奴的文化/周昆田/《中国边政》/1967 年第 17 卷
《左传》在《史记》前已是附经编年证/方炫琛/《中华学苑》/1969 年 9 月第 23 期
关于司马谈之研究/杨家骆/(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第 3 册)《史学论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 年 8 月再版(1977 年 4 月第 1 版)
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阮芝生/《(台湾大学)台大历史学报》/1999 年 6 月第 23 期
从司马迁的意见看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张以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七十年十二月第 52 本
司马谈之思想宗趣/傅武光/《中国学术年刊》/民国七十一年六月第 4 卷

## 国外：

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日）池田知久著　刘兴邦译 /《湘潭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
史记与中国出土书籍/（日）藤田胜久/《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松山爱媛大学教养部）/1990 年第 23 号第 1 册
朝鲜士大夫的《史记》理解/（韩）李成圭/《震檀学报》/1992 年
司马谈作史考/（日）佐藤武敏/《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 5 辑/1992 年 1 月
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古今传承 1300 年间的变迁/（日）池田英雄著　张新科　朱晓琳译/《唐都学刊》/1993 年第 4 期
《史记》人物描写研究史略/（韩）李寅浩/1994 年 12 月
《源氏物语》里的孝与不孝——从与《史记》的关系谈起/（日）田中隆昭著　王晓平译/《天津师大学报》/1994 年第 6 期
中西史学思想潮流的发展趋向及省思：兼谈司马迁和章学诚之史学思想/（韩）金甲均/《东北师大学报》/1996 年第 3 期
《史记》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韩）诸海星/《文史知识》/1996 年第 8 期
清人《史记》研究的成就/（韩）徐元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郭银星 王亦妮
封面设计：海马书装



史料整理丛书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
《史记》研究（上、下）
《汉书》研究
《后汉书》、《三国志》研究
《晋书》、『八书』、『二史』研究
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
《宋史》研究
《辽史》、《金史》、《元史》研究
《明史》研究


ISBN 978-7-5000-8013-8
9 787500 080138 >
定价：118.00元